New Ideas from Dead Economists

An Introduction to Modern Economic Thought

天才的回声

经济学大师与他们塑造的世界

［美］托德·布赫霍尔茨｜著
黄延峰｜译



中信出版集团 · CHINACITICPRESS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New Ideas from Dead Economists

An Introduction to Modern Economic Thought

天才的回声

经济学大师与他们塑造的世界

[美] 托德·布赫霍尔茨 | 著
黄延峰 | 译



中信出版集团 · CHINACITICPRESS

版权信息

书名：天才的回声：经济学大师与他们塑造的世界

作者：[美]拖德·布赫霍尔茨

ISBN：9787508669434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代序

我们全都会受政府经济政策和个人经济决策的影响。如果缺乏经济学知识，没有人会成为更知情的选民，甚至不会成为能够读懂每日新闻的读者。若是对塑造我们经济生活的力量缺乏认识，那么谁能够为我们和我们孩子未来的生活和工作未雨绸缪呢？

诸如贸易政策、通货膨胀、政府的恰当角色、消除贫困和提高经济增长率的方法，我们今天所争论的这些经济政策问题已经被经济学家探讨了两个多世纪了。不论其好坏，今天的许多经济政策都是那些已故经济学家思想的产物。今天，许多关于经济政策的争论只能被那些至少对早期经济学思想有些熟悉的人所理解。

在过去的200年中，经济学大师是一些关注他们那个时代重大政策问题的人。他们研究经济运行的目的是提倡较好的经济政策。但是，尽管关心政策，他们却不是能言善辩的人或政治家，而是通过符合专业辩论标准的分析和证明，试图说服与他们同时代的政府官员或更广泛的民众。

和其他科学学科一样，经济学通过发现前人思想的局限性从而得以进步。尽管经济学没有机会像自然科学那样把实验作为自己独具特色的方法，但经济学家可以采用系统观察和经验分析以摒弃旧理论和发展新理论。

技术、政治和制度环境的改变阻碍了对替代性经济政策可能带来的影响得出肯定结论的进程。要解决这些议题需要花费几十年的时间，并且新一代的经济学家和制定政策的官员必须要认识到，过去的结论会在今天不断变化的环境中继续行之有效。

亚当·斯密是18世纪现代经济学的创立者，他与他所处时代的传统观点相左，他主张政府对经济进行干预通常是有害的，并且公众利益通过私人购买者和销售者之间的竞争就能得到最大化的满足。近些年来，世界各地的政府已经认识到基于私营企业而不是政府计划和公有制的市场体制的优点。美国的税率降低、英国和法国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家庭农

场在中国的重新产生，以及被贴上“改革”标签的苏联经济结构的调整，完全是亚当·斯密早期思想的直接体现。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理论是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期间在英国发展起来的，他的理论帮助政府避免了重新陷入大规模失业的困境。但拥护凯恩斯主义的人反对储蓄以及偏爱增加消费的主张正在逐渐被抛弃，因为它不适合当今经济条件差异巨大的现状。现在我们理解了，增加储蓄通常成为增加投资用于建设新厂和添加设备的基础，也因此成为加快经济增长和提高生活水平的基础。

当美联储官员做出有关货币政策和利率的决定时，他们所依据的思想和证据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经济学家，如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以及由华盛顿开发的最新数据。当美国财政部官员对适合于企业和个人的税收争执不下时，他们可能会用到一个多世纪前大卫·李嘉图和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分析论证方法。相似的情况是，贸易政策的分析、能源和环境法规以及反垄断法实乃建立在几个世纪以来所发展起来的思想之上。对于任何想理解新政策可能如何影响经济和为什么某些政策会被选择的人来说，熟悉这些经济思想十分重要。

在本书中，通过对塑造这一学科的伟大经济学家的研究，作者托德·布赫霍尔茨对经济学的主要思想作了生动的介绍，并且很容易理解。与标准的经济学教科书将正规的模型和复杂的图表作为重点有所不同，布赫霍尔茨提供了清晰的、非技术性的解释和时新的案例。

当我第一次遇见托德·布赫霍尔茨时，他正在哈佛大学教授部分的经济学入门课程。布赫霍尔茨是一位优秀的教师，在30位讲授本课程的教师中，他被选中获颁“年度入门经济学杰出教学奖”。在这本非常值得一读的书中，他在课堂上的讲课技巧得到了很好的展示。

马丁·费尔德斯坦
剑桥，马萨诸塞州
1989年6月

修订版序言

在短短两年的时间里，文森特·凡高就绘制了28张自画像。我可不想采用这种自省方式，得设法保住我的两只耳朵，让它们留在我的脑袋上，不能被割掉。1989年初，我把本书初版手稿交付给E·P·达顿出版社，出版社的编辑打算出精装本，之后我就没有再读过本书。我猜想某些作者会重读他们的著作，可以经常回忆起遣词造句的熟练技法和先见之明的想法。我没有重读我的著作，而是在随后的10年中持续地观察世界经济，为的是看到本书的观点和伟大经济学家的思想是如何经受考验的。此次的修订版受益于我从担任白宫经济学家、华尔街顾问和投资基金经理的高度，以及从为人父的角色出发对经济趋势和经济危机的悉心研究。在我写本书第一稿时，这些身份我还一个也没有。

世界的变化是惊人的，多数变化朝着好的方向发展。新药品、新技术、更多的就业、轻度的通货膨胀和较低的犯罪率给美国带来了福音。1989年，我们还没有互联网，没有防止脱发的药物，汽车安全气囊的数量也很少，对失业率下降到5%以下不抱希望，也不幻想美国的股票价格能在20世纪90年代涨到两倍以上。在发行本书第一版的那些年里，我们的所见所闻也证明了这样一种现象，我称为“剪刀经济”。技术已经发展到让美国人可以不必利用中间商就能够购买到许多商品。如果互联网能让人们一边比较一边选购，谁还需要一个股票经纪人或者保险代理人呢？几秒之内，你可以直接从阿拉斯加购买红大马哈鱼，或者购买一张去非洲马里通布图的机票。消费者要比从前具有更大的掌控权。随着电缆、卫星、光纤和无线技术围绕着电视、电话和计算机业务展开竞争，即使是过去的垄断性公共事业也已经垮掉了。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有一个广告的出现特别引人注目，这是一家新成立的电信公司自吹自擂的广告，大幅的画面描绘的是一位极权国家领导人的塑像，只不过在他的脖子上绕着一条绳子，标题文字是“帝国无永恒——让你等5小时才能见到维修人员的公司更不能”。

有三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值得我们注意。首先，对世界和平来说，最具有积极的意义。柏林墙轰然倒塌，让成千上万的东欧人从此摆脱了单调乏味的工作，投身于竞争性的市场。在市场的大潮之中，很多人获得

了成功，其余的人还在挣扎求生。柏林墙倒塌之后的几年内，因为新解放的思想寻求对市场经济的理解，本书的捷克和保加利亚版本得以推出。其次，日本经济改革使其自身从20世纪80年代的一个威猛巨人变成了20世纪90年代的一个谦恭侏儒。主要原因是东京股市崩盘。2007年的日经指数跌至17000点，而1989年的日经指数却攀升到了39000点。那些对优秀日本管理技术的所有描述又该作何解释？再次，中国成为世界贸易大国，它的制造企业大量生产，产量超过了除美国和日本之外其他国家的总和。

俄罗斯经济的崩溃

随着苏联和美国发起冷战，洲际弹道导弹已经各就各位，并且互相瞄准对方，时刻准备着摧毁人类。许多地缘政治战略家认为一个僵持的均衡，或者说一个“稳定的冷战”是一个好的结局，这种局面很有希望会延续到21世纪。罗纳德·里根确定无疑是最乐观的冷战斗士，连他都没有想到苏联会在1989年后那样迅速而平和地瓦解。他的许多顾问以及差不多所有他的反对者都强烈要求他审慎行事。当里根恳求当时的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拆毁这堵墙”时，美国国务院的“专家们”对这一强有力的却又是天方夜谭式的大胆提议表示无法接受。为何要激怒苏联这只大“熊”，并且要求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呢？事实证明，这头“熊”并不是那么强壮，而且这一任务也不是那么遥不可及。仅仅几年之后，东柏林的人和西柏林的人就带着镐头和锤子来到柏林墙进行通宵庆祝，他们的收音机高声播放的是年轻人喜欢听的、使人精神振奋的美国摇滚乐曲。类似的欢庆活动在华沙、布拉格和布达佩斯也举行过。

在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的大胆领导下，联邦德国接纳了民主德国，用慷慨的财政礼物为民主德国的居民提供资助。今天，民主德国的居民仍然比他们同一个国家的“表兄堂妹”们挣的钱要少，但他们的的确确适应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波兰、捷克和匈牙利也在竭力进行自身的经济改革。尽管经济仍然动荡，民主选举却在继续强化市场取向的政策，并且埋葬苏联的意识形态。格但斯克是波兰团结运动的发源地，在最近去那里参观期间，我对波兰年轻人所具有的企业家才能印象深刻，他们在整个波罗的海的港口城市都开设了商店。在布拉格和布达佩斯，还有塔林和爱沙尼亚，人们的生活色彩缤纷、生气勃勃，再

也不是原先毫无生气的单调灰色。

在俄罗斯，发展之路崎岖坎坷。1998年，俄罗斯看上去已经丧失了经济活力，因为卢布贬值大半，恐慌的抛售者又推波助澜，使得俄罗斯的股票市场遭受重挫，哀鸿遍野。持有俄罗斯债券的外国投资者可以把它们当墙纸用。为什么俄罗斯的资本主义试验会失败呢？在通向自由市场经济的道路上发生了一件不是太有趣的事情：这个国家走了一条危险的弯路，从而进入了“裙带”资本主义，在这种体系中，以前公有制时期的老板充分利用了他们的关系，变着法地把以前的国家垄断转变成了他们可以继续加以控制的私人垄断。矿业公司的经理们通过火车、卡车走私贵重金属，甚至将其塞进风衣的口袋中携带出境，从而为他们聚敛了财富。苏联警察的铁腕丧失了控制力，并且这个新生的推行民主政治的俄罗斯只有一个脆弱的法律体系来处理犯罪问题和解决商业纠纷。莫斯科的高级夜总会里充斥着新近富裕起来的诈骗钱财之徒，这里更像是在阿尔·卡彭控制下的芝加哥，而不像是一个经济发展中的国家。身价过亿的大亨们建立了他们的私人保安队伍。而且，总统鲍里斯·叶利钦所领导的政府找不到强制这些财富巨头们缴税的办法。因此，俄罗斯政府迅速积累了巨额的财政赤字，被迫通过向外国人出售债券而从他们手里借钱。1996～1997年间一个疯狂的股市泡沫形成之后，俄罗斯看起来腐败，无力偿还债务，而且随时会爆发危机。因此，俄罗斯人和外国人偷偷地将他们的钱从这个国家转移出去，新中产阶层逐渐获得的不太多的一部分财富也就缩水了。

这里面有教训吗，或者仅仅是一个令人沮丧的故事？俄罗斯1998年的经济崩溃告诫我们，市场经济必须建立在可靠的法律体系之上。自由市场经济并不意味着完全的混乱无序，它需要有基本的规则。没有法院保证合同的效力，没有警察惩罚黑手党成员，并且没有机构收税，俄罗斯走弯路进入裙带资本主义无异于一趟死亡之旅。在西方国家，人们称法律是盲目的，而俄罗斯的问题是它对法律盲目。当然，俄罗斯过去也曾失败过，但整个20世纪就是经济的失败史。在参观像圣彼得堡和乌克兰的敖德萨这样的古城，并且目睹激动人心的19世纪建筑和让人惊叹的歌剧院之后，你就会明白，苏联的问题不是它能否赶上资本主义，而在于它连自身1917年的标准都达不到。让我们期待在21世纪发生一场新的俄罗斯革命，一场既能为经济解放又能为法治找到归宿的革命。

日本经济的大萧条

当我撰写本书第一版时，学者和记者们正在给日本戴上世界经济之王的桂冠。《日元！日本的新财政帝国及其对美国的威胁》和《颠倒乾坤：我们如何把自己的未来交给日本》之类的书籍描绘了这样一幅画卷：日本将要称霸世界，美国人要做的只能是从事薪水低一点的工作以求收支平衡。日本的投机商收集凡·高、莫奈的作品以及购买高尔夫球场的会员资格，似乎它们只是象征着一些纪念品而已。他们尽量购买洛杉矶市区的中心地段以及夏威夷最好的房地产。日本的银行控制了金融业，并且经分析家计算得出，东京帝国大厦下面的土地要比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所有土地还要值钱。一位杰出的日本政治家写了一本抨击美国霸权的畅销书《日本可以说不》。如此一个经济强国何以走向衰败呢？结果证明，日本的投资者并没有能够点石成金，而是把珍贵的资产变成了不值钱的小玩意儿。伴随着东京股票市场毁灭性的滑坡，印象派画家的油画价格随同夏威夷的不动产价格一起跌落了。他们对电影公司的投资留给他们的是惊人的巨额亏损，因为狡猾的好莱坞制片人已经把他们榨干了。返回头再看日本，由于房地产价格和收入下降，狂妄自大变成了谦卑和恐惧。1998年，利率降到了零，意味着你可以从政府手里免费借到钱。只有一件事是上升的，那就是失业率。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很快就有了答案：日本中央银行在1989年提高了利率，有意戳破了股市泡沫。但是，那并不能解释持续了近10年的经济衰退。有两个元凶浮现在我的脑海。第一，日本政府鼓励它的主要公司控制制造业，而此时美国正在转向服务业，例如金融业和医疗保健业。尽管日本银行在世界经济中占有规模上的优势，但它们在营利能力和复杂精密的金融产品设计上却落后很多。从股票指数基金到复杂的衍生品，许多新的金融产品都是美国或英国创造出来的。为什么日本不能开发这些产品？因为在本国，它们面临的竞争压力小。日本大藏省（2001年1月分解为财务省和金融厅）保护保险公司免受储蓄银行的伤害，同时又保护储蓄银行免受法人银行的伤害。然而在美国，这些行业面对的却是相互之间残忍的竞争，日本政府却创造出了“藩”，企业躲在官僚主义的藩篱之后安然无忧。大藏省基本上是强制家庭将他们的钱存放到收益低得可怜的银行账户，从而让公司成了“受制听众”。亚当·斯密应当能预见到它的发生，由于他们让本土市场处于波澜不惊的状态，从而让他们在现实世界里进行搏杀的能力受到了损害。

第二，在信息技术方面，日本也显得势单力薄。当我的一位日本朋友第一次接触互联网，并且注意到几乎所有的网页都是英文时，他摇摇头说道“我们有麻烦了”。尽管日本在制造产品如电子产品方面成功地赢得了市场份额，却发现产品价格受到了来自韩国和马来西亚工厂的冲击。很快他们就放弃了拼杀，并且关闭了日本的工厂，去中国开办了更廉价的工厂。“终身雇用制”的概念宣告死亡，这使工作中的男女老少的自信心备受打击。日本评论员称这一现象为“甜甜圈”经济，因为日本的经济已经变得中空了。

这些结构性缺陷与无力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相伴而生。从本质上讲，日本银行等待降息的时间过于漫长，并且日本的大藏省在经济衰退期间又提高了税率。凯恩斯（见第九章）在大萧条期间告诫世人：当经济每况愈下时，你不应当惩罚消费者。直到现在，这一启示显然还没有在日本深入人心，虽然从1991年开始，本书第1版在他们那里就能买到。

中国经济的崛起

自1990年以来，中国的崛起成就非凡，但也有点可怕，因为它的国内生产总值以每年10%的速度在增长。如果你阅读美国的财经报刊，你会看到几乎世界经济的每一次短暂停滞都会归因到中国身上。油价高？中国肯定在囤积石油。利率低？中国一定在大量抢购美国的中期国债。制造业的工作岗位较少？肯定是让中国抢走了。的确，中国已是当代全球经济中一股庞大的力量，尤其是考虑到仅仅25年前这个国家在经济上还是体弱多病时，更是如此。尽管目前中国在世界贸易中取得了胜利，但接下来的10年将对它构成极大的挑战。当中国不得不用较少的年轻工人来养活较多的老年人时，它便撞上了一堵人口墙。这个国家快速上升的中产阶层的消费将更多地用于国外旅游、卫生保健和奢侈品购买。当民众从穷人步入中产阶层，他们渴望得到三件东西：汽车、蛋白质（肉和谷物）和医疗保健。这为外国人在中国销售商品提供了巨大的机会。有钱后换车的行动已经起步，你会看到北京的街上塞满了汽车，这些汽车喷着尾气，并且挤占了通常是自行车的车道。未来的中国将会成为实现全球繁荣的一股稳固的、迷人的和充满希望的力量。

态度胜过纬度

包括许多经济学家在内的多数人在对一个国家的经济进行思考时，就好比是一个购房者考虑购房一样。哥斯达黎加很是酷热难耐呢！委内瑞拉有石油是多么幸运啊！去澳大利亚购房又不会带来什么好处，真遗憾呐！“位置，位置，位置”，这种陈腐的思想对在伊利诺伊州皮奥里亚购买一套仿殖民地时期式样的三居室可能会很奏效，但在分析一个国家时它简直毫无价值，请允许我以墨西哥为例。墨西哥恰好与美国接壤，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但它并没有获得发展，美国的财富和技术也没有因此而减损很多。现在来看繁荣的澳大利亚，即使你在洛杉矶机场换乘飞机之后，也就只要12个小时的航程！这里原本是罪犯的流放之地，他们是乘坐漏水船只航行到此的。

经济学教科书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关注“要素禀赋”，该理论告诉我们：如果上天赋予大量的矿藏和自然资源，这个经济体就有很大的优势。真的吗？中国香港就是一堆岩石巨礁。荷兰就是下沉的威尼斯，只是没有迷人的桥梁或意大利式的冰激凌，可是在17世纪，它却超越了禀赋较好的邻国。然后是今天的以色列，那可是上帝选择的子民居住之地，但上帝却选择不给他们一滴石油，而在阿拉伯半岛却遍地是自喷的油井。读读马克·吐温对干旱空旷的不毛之地的描写吧：以色列的土地天生就长不出足够的绿色植物，连晚餐盘子中的一小根香菜也不会有，然而在那里蔬菜却遍地开花了。在经济发展的竞争之中，你会把赌注压在哪一边：是拥有数百万吨自然赋予的锌矿资源的国家，还是智商得分高出数个点，并且思想可以自由传播的国家？

自然禀赋的极大丰富甚至可能会是诅咒。非洲许多地区的地下满是矿藏，可是经济发展却很缓慢，因为寡头政治的执政者紧握权力，他们阻止资本在社会上的散播。回想一下教科书中展示每个国家的自然资源的地图册。当我还是一个小孩子时，我总是觉得不公平，因为苏联似乎拥有所有极好的东西，甚至有铝土矿，这听起来有点神秘，它是地球版的氪星石。但是，苏联的体制却是点金成石。它把珍贵的矿藏和肥沃的土壤变成了饥饿和贫穷。回归到1500年前，当时的中国正处元朝，正在烧制花瓶，中国拥有抢在英国之前进入工业革命所需要的所有技术，但当时的官吏对待贸易和资金流动的态度是重重地一脚踩死。因为苏联的“左派”拒绝相信“态度战胜纬度”，他们对苏联70年的“恶劣天气”感到遗憾，并以此作为经济发展缓慢的借口。正如罗纳德·里根说的那样，苏

联的农业只在四种情况下不正常：春天、夏天、冬天和秋天。

那么，什么是最应该考虑的呢？是态度，而不是纬度。最能说明一个国家态度的可能要算从经济学大师那里“悟出道理”的智慧了。

经济思想史告诉我们，成功经常也会导致饥饿，也会让人变得谦卑和柔顺。而这正是你在下面章节的字里行间要加以体会的。

20世纪90年代给了我们许多新的机会来验证经济学大师的智慧，并对他们的思考进行评价。现在，21世纪正在提出它自己的挑战，而已故经济学家的思想就在这里，等着助我们一臂之力。

托德·布赫霍尔茨
圣迭戈，加利福尼亚
2007年1月

第一章 经济学家的坏名声由何而来？

做一位经济学家并不容易。因为不能足够精确地计算成本和收益，他们受到企业高管的责备。利他主义者又指责他们对成本和利润过于计较。对政客而言，经济学家是让他们扫兴的人，因为经济学家不允许他们在毫不牺牲的情况下承诺一个繁荣昌盛的前景。一些才华横溢的作家也抽出时间来羞辱经济学家，这些人包括乔治·萧伯纳和托马斯·卡莱尔。的确，自从卡莱尔把经济学称作“沉闷的学科”之后，对经济学家的公开批评就一直不断。

然而，经济学家感到他们受到了错误的指责，因为他们通常不是造成坏消息的原因，他们只不过是信使而已。他们要传达的信息很简单：人类必须做出艰难的抉择。我们不再生活在伊甸园，这个世界也并非到处流淌着牛奶和蜂蜜。我们不得不在清洁的空气和速度更快的汽车、面积更大的住房和面积更大的公园，以及更多的工作和更多的玩乐之间做出选择。经济学家并没有告诉我们它们中哪些是不好的，他们只是告诉我们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即不能同时得到相反的两方面。经济学是研究选择的学问，它没有告诉我们选择什么，它只是帮助我们理解我们所作决定的后果。

当然，伟大的经济学家并不满足于只是做一个信使。尽管他们备受人们的嘲弄，甚至人们还给他们取了一些无礼的绰号，例如亚当·斯密是做事心不在焉的“笨蛋”，约翰·穆勒是聪明脑袋不长毛的“书呆子”，凯恩斯是讲究生活享受的“锦衣玉食者”等，但经济学家的动机却不应该被诋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如凯恩斯指出的那样，在当今世界，经济学家受到了那么多恶毒的批评，因为大多数有名的实践者是从空想的社会改良者开始的，他们要寻求改善世界的道路。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尤其把经济学视做精明的科学和热爱人民相结合的一种职业。中世纪时期，人们认定3个职业是最重要的：以身体健康为目标的医术，以政治健康为目标的法律和以心灵健康为目标的神学，马歇尔希望能把经济学当作第4个受人尊敬的职业，因为经济学是以更好的物质健康为目标的，它是为所有人服务的，而不只是为了富人。马歇尔勇敢地尝试着在强有力的却又不无遗憾的两个支脉之间进行调和：一个是朝着数理经济学的方向

发展，但没有实际的应用价值；另一个是向纯情绪化的激进主义发展，却不进行仔细的理论思考。他在剑桥大学争取设立的课程聚集了最具有科学头脑的人和最易动感情的人。当然，凯恩斯便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

将经济学和现实世界最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始终是政治。确实如此，20世纪之前，经济学还被称为“政治经济学”。几乎所有优秀的经济学家都在政府的某个层级上担任过职务。其中大卫·李嘉图和约翰·穆勒两人还赢得了英国议会的选举。在最伟大的经济学家身上，我们持续看到的不仅是科学兴趣闪出的火花，而且还有热忱的涌动。在大量的计算符号和统计之间，我们看到的是他们大胆说出的惊人的观点。

纵览经济思想史，我们可以看到政府和经济学家之间时而冲突、时而合作的关系。当亚当·斯密痛斥欧洲的君主和商人之间的“近亲联姻”时，现代经济学也就获得了初始的推动力。亚当·斯密、卡尔·马克思和托尔斯坦·凡勃伦之间少有的几个共识之一，就是他们领悟到商人喜欢利用政治为他们自己寻求庇护。在一次著名的讲演中，亚当·斯密告诫人们：要不是策划针对消费者的阴谋，商人几乎从不碰头。在今天，你也能确认这一点，地方商会会议上鼓吹自由市场的演讲者会急忙抓住机会，获得一个垄断权、一份政府的独家合同或者一个确保自身利润的法规。谢天谢地，政治家并不总是那么好说话。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的工党领导人承诺通过走工会和国有化的道路就可以繁荣昌盛，从而接近天堂，但相反的是，英国经济变得越来越糟。温斯顿·丘吉尔的传记作者之一讲述了丘吉尔在下议院外面的男厕所里碰到工党领袖的故事。工党领袖先进入男厕所，并且采取立姿小便。出于同样的需要，丘吉尔稍晚也走了进来，但自始至终站在同一排便池的另一端，他只是看着他的反对者。“今天感觉我们有些疏远，是不是，温斯顿？”工党领袖问道。“没错，”丘吉尔厉声回答，“原因是每次你看到大家伙就想把它国有化！”[1]

多数美国总统已经暴露出他们对经济学知识领会得太少。肯尼迪曾经承认，他能记住美联储推行的是货币政策而不是财政政策的唯一方式就是美联储主席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的名字是以字母M开头的（货币政策的英文monetary policy也是以M开头的）。显然，肯尼迪不会任命叫Volcker（沃尔克）或Greenspan（格林斯潘）的人担任这个职位。

对于经济学家来说，总统大选是一段难挨的日子。每当一位政治家

向他或她的选民承诺会有更多的人造黄油和更多的武器弹药时，经济学家必定要对其灾难性的后果发出警告。经济学家为提高经济素养所取得的任何进步立刻就会被候选人天马行空般的信口雌黄彻底毁掉。正如电视的黄金时段一样，大选之年的演讲就是政治的黄金时段。每当总统候选人出现在电视上，他不能允许自己比《贝弗利山庄的乡巴佬》里的杰德·克莱皮特还要老于世故。当然，对于某些政客来说，这算不上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不难看出为什么政治家会误解他们的经济顾问。与向大众所讲的话相比，经济学家彼此之间讲的则是一种不同的语言，他们说的是“模型语言”。因为每一个经济现象都会受到成千上万个事件的影响，在试图解释一个复杂的世界时，他们必须先要在任一给定的时间点上精简出几个最重要的因素。例如，美国消费者的支出水平可能会取决于下述几个因素：天气、音乐品位、体重、收入、通货膨胀、政治运动和美国奥林匹克代表队的成绩。为了分离并且排列出哪个因素是最重要的，经济学家必须设计模型，并且要去掉一部分不确定数量的可能原因。最顶尖的经济学家是那些能设计出最持久适用模型的人。

当然，所有的科学家都必须要建构模型。物理学建立在牛顿万有引力模型的基础之上，天文学家仍然在使用哥白尼的理论框架，托马斯·库恩那本经典却有争议的书《科学革命的结构》追溯了这些模型的发展。[2]那么，为什么经济学要比那些“难懂的”科学更难呢？在此举例帮助说明问题，设想有一台肾脏的外科手术。在对X线诊断报告进行检查之后，外科大夫了解到病人的右肾位于其结肠之下大概两三厘米处。然而，设想当外科大夫切口之后，却发现肾脏改变了位置。依此类推，当一位经济学家分析原因且估计它们的影响时，其影响程度早已改变了。随着人际关系和社会制度的改变，我们进行科学探究的学科也在改变。经济学可能不是一门“难懂的”科学，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一门容易的科学。因为经济学太容易变化了，因此它就难以固定，更不用说加以研究了。[3]毫不奇怪，凯恩斯勋爵坚持认为，经济学大师要满足一组特质的要求，这要比当骑士甚至是圣徒所需要的特质还要非同寻常：

> 他必须是数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家、哲学家……他一定要理解经济现象的象征意义，并且用文字加以表述。他必须根据一般性来深入思考特殊性，并在思绪奔放的同时触及抽象与具体。他必须为了未来的目标而根据过去的事实研究当今的现象。人类的本性及

其习俗必须全部在其考虑的范围之内。他必须目的明确，而又淡然无私，他要像艺术家一般超然物外，且不可以被利诱，然而有时又要跟政客一样近乎世俗。[4]

重商主义与现代经济学的起源

我们应该从哪里起步开始学习经济思想史呢？我们可以从《圣经》开始，在这本书中包含了许多关于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的主张。但是，《圣经》更多体现的是清规戒律而不是仔细的分析。[5]尽管亚当·斯密的名字来源于《圣经》，并且从《圣经》中他也得到了道德上的提升，但《圣经》对他形成自己的经济理论却没有多少启发。

我们也可以探究亚里士多德那些清晰有力的表达，他赞美私有财产，同时谴责为了财富而积累财富。但是，亚里士多德对经济学的了解不过是知道时间是稀缺资源而已。因此，他将自己的时间更多地投入哲学以及对亚历山大大帝的教育上，花在经济理论研究上的时间并不多。这表明，亚里士多德成为哲学巨匠之一，是冒着风险的，因为他伤害了热情支持开设“西方文明”这一大学课程的人，我们必须承认在经济学科的历史中鲜有亚里士多德的记载。

在中世纪，神学家们为经济问题展开辩论。美国天主教大学的教授围绕着市场上的公正和道德问题展开辩论。特别是，他们发明了“公平价格”理论，并且使基督教教会对待高利贷的观点趋于完善。鉴于《圣经·旧约全书》特别禁止向同一个社区的成员进行有息的借贷，中世纪的神学家们尝试将利息分解成不同的组成部分，例如风险、机会成本、通货膨胀和不方便的补偿等，以便突破这种硬性限制，钻禁令的空子。现在，神学家们面临着痛苦的选择。如果他们继续坚持对《圣经》的正统阐释，这种阐释已经对商业活动构成了挑战，教授们的说教将会剥夺它们的现实意义，因为许多人将会甘愿冒受到圣罚的危险来碰碰运气。另外，如果神学家们只是简单地宽恕所有形式的重商主义，他们就会丧失作为基督教领袖的公信力。当他们在世俗和宗教之间观望时，他们设计出了他们的大部分经济理论。这种做法让他们处于一个并不舒服的位置，对研究经济学也不是非常有帮助。他们就经济学发表演讲，因为这是他们要对基督教徒履行的责任。但是，他们的责任应该是引导教徒进入天堂，而不是让他们达到更高的生活水平。当新教徒从教徒中分化出去之后，这一任务变得更加无法做到了。[6]

我们不能如此迅速地略过重商主义者。一般说来，他们是16～18世

纪的一群作家和一群向欧洲皇帝谄媚的顾问。他们不会分享一本共同的“正典”，而且他们的确拥有不同的利益。随着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的皇室巩固了他们的边界，并且为争夺远隔重洋的殖民地而发动战争，律师和商人开始就国王和王后如何管理经济提供咨询。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从他们的建议中经常被提及的内容中总结出几条原则：首先，通过给国王的忠实臣民以垄断、专利、补贴和特权等奖赏，国家应当将自己的内部事务料理得井井有条。其次，为了获得特别珍稀的金属和自然资源，国家应当开拓殖民地，这是国家致富的好办法，因为这些殖民地可以负担战争的开支。再次，国家应当限制对外贸易，如此一来，它的成品出口就会多于进口，持续的贸易顺差有助于从债务国身上赚取黄金（财富）。

在重商主义的指引下，我们看到的是国家在开疆拓土。然而，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对国内经济的严格控制，行会、垄断和关税牢牢地控制着经济。在某些国家，这种控制要比其他国家更加强势。路易十四在位期间，财政大臣让巴普蒂斯特·柯尔贝尔完全控制了许多商品的生产制造，并且被授予了管理行会的巨大权柄。在一次令人震惊的显示其超级权力的炫耀中，他宣布来自法国第戎的织物要包含1408股线！

重商主义者为亚当·斯密提供了完美的标靶，他以此为起点开始研究现代经济思想似乎是合理选择。亚当·斯密在几个层面上痛责重商主义的理论。首先，他们根据硬币和贵金属的多少来衡量财富的多寡，而亚当·斯密认为真正的财富应当通过家庭的生活标准来测量，一袋袋的金子并不必然体现为一袋袋的食物。其次，亚当·斯密说财富必须要从一个国家的消费者的观点来衡量。将钱放到国家总理或者阿谀奉承的商人手中的这种策略对国民来说不一定就能产生益处。再次，亚当·斯密确信个人的动机、创造和创新会促使一国经济获得更大的繁荣。将垄断和贸易保护当作礼物加以赠送，重商主义的这种政策使国家陷于瘫痪状态。现代经济学就此开始。

经济学家真的一无是处吗？

自亚当·斯密那个时代至今，只有几位大师级的经济学家。主流经济学理论并不能解释每一件事情。一个特别的情况是，当代的经济学家对劳动力市场和20世纪70年代早期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早期生产增速的下降难以做出解释。然而，经济学家对于这样一种说法却是十二分的赞成：国家和个人忽视了经济理论的基本原则，这是在愚蠢地冒险。怀着对稳定的重商主义时代的向往之情而提高贸易壁垒的国家，伤害了本国的消费者。保持农产品高价的国家也伤害了它自己的消费者，并且发现这个国家过剩的粮食都在粮仓中发霉腐烂了。对于这两种伤害的观点，很少有经济学家持有异议。不过，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听进去这两点的政治家实在是微乎其微。

就算政府并不总是吸取经济学家的建议，我们却可以求助经济学家告诉我们：我们的生活水平达到了什么程度，以及可能会达到什么程度。自从工业革命使英国大放异彩之后，美国人就总是期待着自己的国家会更强大和更富裕。我们把现状看成是最低限度。然而，历史提供不出持续取得进步的先例。在工业化国家摆脱新的黑暗时代的每一个年头，我们都是在为人类创造纪录。听听乔治·杜比描述11世纪欧洲时所说的话吧。这一段几十年的可怕时光是在古希腊、罗马、巴比伦和埃及相对富裕之后而不是之前到来的，想到此就令人不寒而栗。

> ……公元1000年时的西方世界。一个野蛮的世界，饥荒遍地。贫弱人口的数量实在是太大了。人们几乎是赤手空拳地挣扎着生存，成为难以征服的大自然和贫瘠土地的奴隶，这些土地的耕种质量很差。当农民播下一粒麦种，就算年景不是太差，也没有人会期待收获三粒以上的小麦，这意味着要到复活节才能吃上面包。那么，他必须要依靠可食用的草、树根，以及可以从森林或河堤收集到的临时凑合的食物来勉强维持生活，在饿着肚子的情况下，他还得进行繁重的夏季劳作，在等待收获的时候，他已经累得虚弱不堪了……有时，当大暴雨浸泡了大地，并且妨碍了秋耕时，当暴风雨击打并且毁坏了庄稼时，平常食物的短缺就变成了饥荒，因饥饿引起的死亡就会如大浪一样袭来。为那个年代编写历史的人全都描写过这样的饥荒，没有一定程度的食物，这样的饥荒就不会停止。人

们彼此追逐，为的是相互猎食，许多人割断了他们同胞的喉咙，为的是以人肉为食，就像饿狼一样。[7]

发达国家是否会理解此类恐怖的景象？发达国家是否会重新陷入它的某些第三世界邻居所处的这种恐怖状态？甚至连经济学大师凯恩斯做一个最荒诞的梦都无从知晓答案。我们又确实知道，经济学大师的目标就是教导我们如何避免掉进如此黑暗的深渊。

令人吃惊的是，经济学大师的许多理论仍然在传播。他们每一个最睿智的理论在今天都有一个切实可行的点或者可复制之处。通过探究主流经济学，并且提出问题：谁首先具有了这些洞察力，并且建立起这些持久的模型？本书要寻找这些大师的智慧。我们可以从大师那里得到教益。本书中某些当代的案例具有趣味性乃是有意为之。大卫·李嘉图并没有利用电影《盖里甘的岛》中的演员去解说“比较优势论”。但是，这样做并没有冒犯他，只会对深奥理论框架的理解提供一些帮助，我希望如此。没有必要把经济学搞得那么枯燥无趣。为什么不能通过利用已故经济学家去除他们自己背负的坏名声，并且传承他们的教诲，从而让我们最后也嘲笑一下托马斯·卡莱尔呢？相比而言，让已故经济学家的灵魂在他们的坟墓中笑得打滚，这比让他们辗转反侧，并且失望于世人忘记了他们的著作，以及担心我们会开历史倒车返回到11世纪要好得多。

第二章 亚当·斯密：自由市场与“看不见的手”

当罗纳德·里根赢得1980年的美国总统选举时，华盛顿的保守派支持者们兴高采烈。在鸡尾酒会和集会上他们相互道贺，并且非常期待里根的经济政策能够带来繁荣。他们也注意到彼此都扎着同样款式的领结，特征就是上面印着亚当·斯密的侧面像（他们把印有亚当·斯密头像的领结当成荣誉勋章佩戴）。

为什么这些以自己的爱国心而自豪的政治家和活动家，会崇拜一位18世纪的英格兰人呢？为什么他们崇拜的不是西奥多·罗斯福、托马斯·杰斐逊，甚至是巴里·戈德华特呢？亚当·斯密真的能够比成千上万的经济学家及其信奉他们思想的政治领袖对当代的经济危机作用更重大吗？

亚当·斯密相信他的思想将会永远意义重大。这是处于18世纪那个真正革命时代的知识分子所具有的共性。政治的沸沸扬扬在法国和美国开始甚嚣尘上。等到亚当·斯密写完他那部最伟大的著作《国富论》时，商人们正在不列颠群岛之间以及全球进行着贸易，人口也在增加，商人们正在组建小型的工厂，银行体系正在英国和欧洲大陆拓展开来。但最具力量和深远意义的启蒙运动，是由为他们的周边世界探索新解释的思想家发起的。毫不奇怪，亚当·斯密曾经在他的演讲中声称：“人是一种充满渴望的动物”。[1]

从中世纪直到大约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时代，神学家统治着欧洲知识分子的思想。教会长老根据宗教教义对自然现象加以解释，但在亚当·斯密出生之前的那个世纪，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追随弗朗西斯·培根和尼古拉斯·哥白尼的勇敢之路，探寻对自然事件的合理解释。最终，科学家出现了，并且独立于占支配地位的教会，科学家们将科学的方法应用于自然规律的研究，全然不顾得出的结论是否会产生争议。

伽利略·伽利雷攻击了宗教的那句老生常谈：上帝只给了人类两本书，一本是《圣经》，另一本是大自然。伽利略宣称自然之书的语言是数学，他通过数学和实验，而不是在《圣经》的帮助下证明了他的自由落体定律。伽利略知道他踏进了被认为是叛逆的领域，并且试图避免让

他的行为成为教会定罪的理由。1632年，当他借助望远镜这个实验仪器证实了哥白尼的异端邪说，即地球围绕着太阳旋转之后，由于害怕，他将自己的发现奉献给了教皇。他对地球的认识是正确的，对教会心存恐惧也是正确的，因为宗教裁判所最终还是判他有罪。

在《笛卡儿方法论》（1637年）写作结束之时，由于坚决主张借助于实践科学人类能够成为“自然的主人和拥有者”，勒内·笛卡儿成为18世纪思想大爆炸的先驱。

不过，启蒙运动中风光无限的人物却是艾萨克·牛顿，他致力于像伽利略一样的科学研究，在经文之外寻求答案，并且用他的万有引力定律、物体运动定律和微积分的发现来揭示这些答案。牛顿把上帝刻画成了只是在创世之初扮演了关键人物的角色，上帝之于当今世界，就好像是当铺老板在看到一只抵押在当铺的钟表离开当铺之后所表现的无可奈何。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认为牛顿的这一举动加重了对上帝的亵渎。

亚当·斯密就诞生在这一运动之中。像伽利略和牛顿一样，亚当·斯密探求事务的因果关系。但他关注的是人，而没有将他的视野聚焦在行星上。

亚当·斯密出生于1723年，跟着他的母亲在柯科迪长大成人。柯科迪是一个小港口，坐落在相隔福斯湾与爱丁堡遥遥相对的地方。他的父亲是一名海关的监察官，在他出生前几个月去世。亚当·斯密一生未曾娶妻。

亚当·斯密是一个相貌奇特的苏格兰人，在华盛顿的那些政客所扎的领结上并不能看清楚他的模样。他的鼻子很大、眼睛凸出、下唇外突、神经抽搐，并且说话口吃。有一次，亚当·斯密在获知自己与众不同的面部特征后说道：“我只会写书，而且算不上是个帅哥。”

因为成绩优异，亚当·斯密在14岁时进入格拉斯哥大学，后来获得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的学士学位。和当时多数其他的大学生一样，亚当·斯密打算攻读神学，并且加入了神职人员的队伍，他也和任何时候的许多大学生一样抱怨他的教师。他公然抨击授课讲师：“在牛津大学，多年以来，大部分的公共课教授完全放弃了教学，甚至连假装教学都不要了。”[2]更重要的是，亚当·斯密猛烈抨击学术审查，并且对他的朋友抱怨，称学院的官员没收了他的大卫·休谟预言式的《人性论》手抄本。尽

管亚当·斯密被允许阅读所有希腊文和拉丁文的古典著作，他却被禁止阅读他所处时代的最有说服力的著作之一。

纵使存在着学术上的限制，亚当·斯密还是受到了大卫·休谟怀疑论的深刻影响（《人性论》的副标题是：把实验推理方法引入道德主体的尝试），因此他拒绝继续为成为神职人员作准备。相反，他返回柯科迪，后来，他在那里就广受欢迎的修辞学和法律举办公共讲座。

1748年，亚当·斯密返回格拉斯哥大学教授逻辑学。第二年，他填补了他原先的老师弗朗西斯·哈奇森空出来的伦理学教席。哈奇森是一个“校园激进派”，他曾经拒绝用拉丁语上课，让学校管理者大为头痛。长老会的教务评议会因为他散播以下“错误的和危险的”学说而将他告发：

1.德行的标准是增加别人的幸福感。

2.在不依靠上帝的情况下，也有可能判断美好和邪恶。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亚当·斯密吸收了很多哈奇森的危险言论。面对具有统治地位的教义，哈奇森无畏地站在学术自由的一边。和伽利略不同的是，哈奇森并不试图避免由于将他的讲义呈献给教皇而受到责难，在信仰新教的苏格兰，不管发生什么情况，这样做都不会有什么好处。

有趣的是，人们注意到亚当·斯密的观念通常与当今的保守派政治力量相联系，但因为他的智慧之根十分激进，某些当代的保守派对亚当·斯密也是相当不安。然而，其他人却要拼命地争取将他的资本主义理论与上帝、妈妈、苹果馅饼和民主放到同一个圣坛上。

因为与被他攻击过的牛津大学教师那让人昏昧的教学风格相距甚远，清晰易懂的讲课风格再加上对学生的关心，亚当·斯密教授迅速声名大噪。在讲课、辅导和主持非正式讨论之余，他还能抽出时间担任学院的会计主管，并且后来担任了该学院的院长。

亚当·斯密从来没有讲过经济学的课程。事实上，他也从来没有学习过经济学的课程。那时就没有人学过经济学。在19世纪之前，学者们把经济学当作哲学的一个分支。直到1903年，剑桥大学才建立了一个经济

学大纲，把它从“伦理科学”中分离出来。尽管如此，亚当·斯密还是把他关于经济学的初始思想浓缩到法学的课堂上。下面几行文字是斯密的学生的笔记。斯密对劳动所做的关键分析，在这里已经可以初见端倪。后来在《国富论》中，他对此进行了详细阐述。

> “分工是促进共同富裕的主要原因，它总是与人们的勤劳成比例关系，而不是和金银的数量成比例关系，后者只是人们愚蠢的想象。”3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讨论了亚当·斯密的教育背景和他的外貌，但对他个性中的古怪行为却避而不谈。这是一个敏感的话题。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观察到人们有一种吹捧自己祖辈身份地位的倾向。他称为“名门幻想”。崭露头角的经济学家可能会感到失望，因为发现他们的前辈不具有牛顿一样的聪明才智，也不如伏尔泰那样富有情趣，更不像拜伦一样满身风骚。事实上，尽管具有“名门幻想”的心态，经济史学家还是承认亚当·斯密有点笨拙。

专业的经济学家现在已经厌倦了亚当·斯密做事心不在焉的许多故事。不过，对于初学经济学的人来说，这些逸闻趣事仍然可以供娱乐消遣一番。

某一天，著名政治家查尔斯·汤申德来到格拉斯哥，亚当·斯密带他到一家制革厂参观。在热烈地赞扬自由贸易的优点时，亚当·斯密径直走进了一个令人作呕的装满黏稠油腻东西的大池子里。工人们把他从黏糊糊的东西里拖出来后，脱去他的衣服，并且扔给他一条毛毯裹住身体，之后，亚当·斯密诉苦说，他从来做不到让他的生活保持井然有序。

另有一天，亚当·斯密从床上爬起来并且走出家门。他走啊走啊，走了15公里那么远，此时教堂的钟声把他从梦中惊醒。这位那个时代最著名的经济学家被人发现正跑回自己的房子，睡衣在微风中飘摆着。

亚当·斯密首先是位哲学家

早在亚当·斯密撰写《国富论》之前，凭借一本论述伦理行为的书《道德情操论》，他已经在1759年为自己赢得了声誉。随着书的销量迅速增加，他以“哲学家斯密”的名号而为人所知。《道德情操论》遵循了启蒙运动的传统。正如科学家探索太阳系的起源一样，亚当·斯密探索的是道德认同和不认同的起源。

首先，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如何能够对满足他人的需要做出道德的评判呢？毕竟，每个人立足于自我体系的中心，就像太阳处于九大行星的中心一样。太阳会关心较小的行星在想什么吗？亚当·斯密在这种似乎矛盾而又可能正确的悖论中痛苦挣扎，他反问自己：如果人都是自私的，为什么每一个城镇并不像政治理论家托马斯·霍布斯在《利维坦》里描写的那样处于道德败坏的自然状态？霍布斯极力主张：直到政府出现之前，人们的生活一直陷于“孤独、贫穷、肮脏、粗野和短暂”的状态。

最终，亚当·斯密编造了一个聪明的答案。他说，当人们面临着道德抉择时，他们会虚构一个“公正的旁观者”，可以认真地思考并且给他们提出建议。他们不是简单地顺从自我利益，而是听从这个想象中的观察者的建议。通过这种方式，人们做出的决定乃是基于同情，而不是自私自利。

许多批评者认为现代经济学家只会假设自私的动机，只会关心成本和收益，并且对人类更为高贵的一面视而不见，以此来诋毁他们。他们声称经济学家是道德上的侏儒。这种攻击可能对某些人来说是对的，但不适用于亚当·斯密。不仅仅是意识到了同情和情操，在整本书中，他都在论述这些情感。而且，《道德情操论》指出的许多概念在一个多世纪之后才由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进行详细阐述。弗洛伊德“超我”的概念是指良心，当人们不听劝告时，良心可以阻止人们不采取某些行动，并且产生罪恶感，这与亚当·斯密描述的旁观者的角色差异并不大。

随着亚当·斯密的著作在英国和欧洲大陆的传播，他的声誉急剧上升。家境富裕的学生离开他们在法国、瑞士和莫斯科的学校而来到格拉斯哥大学注册上学。我们可以想象亚当·斯密来到了20世纪，出现在电台

和电视的谈话节目中，为他的书做宣传。假设他有习惯性的健忘症，他有可能会成为一个给人带来愉悦的嘉宾，特别是当他穿着睡衣出现在深夜电视节目中时更是如此。亚当·斯密肯定不满足于被锁在象牙塔中。在格拉斯哥，他与城镇居民和大学师生都有来往，并且约见银行家、商人和政治家。在政治经济俱乐部，他尝试着弄明白商人到底是怎么经营的。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他学到了不要信任商人的动机。

经济学测验只能得50分的重农主义者

很快，即使能进行全球交流的格拉斯哥大学也开始让亚当·斯密感到厌烦，于是在1764年他辞掉了教授的职务，做了已故布克莱公爵的儿子的家庭教师。这个男孩的母亲是达尔基思伯爵的遗孀，那时她刚刚改嫁给亚当·斯密的崇拜者查尔斯·汤申德，后来查尔斯·汤申德成为英国财政大臣，他的税收政策使大西洋对岸的一些殖民者群情激愤，他们将茶叶倒入大海使得波士顿港口变成了一个大茶壶，查尔斯·汤申德因此为自己在史书中争取到了一席之地。作为家庭教师，亚当·斯密被要求游历欧洲，帮助这个男孩培养起合乎传统的优雅品质，而且经常参加奢华舞会，他因此可以获得每年300英镑的薪水，外加一些额外补贴，他在离职之后还有每年300英镑的津贴，大约相当于亚当·斯密原先收入的两倍。亚当·斯密向他那位旁观的“公正顾问”征求意见，这个顾问悲悯地给了他“同意”的答复。迫于在学期中间要离开格拉斯哥大学的要求，亚当·斯密决心把从他忠实的学生那里收取的学费退还回去。但学生们都拒绝了。

旅途的第一站是法国的图卢兹，也是最让人心烦的一站。旅途的无趣让亚当·斯密在某天晚上想起老综艺节目的台词，说的是要在布鲁克林度过大约一周的时间。既然亚当·斯密几乎不会说法语，那么在布鲁克林待上一周也许他会比较高兴，因为至少在那里他们可以说英语。可是他们在图卢兹停留了一年半，而不是一周。知名作家塞缪尔·约翰逊曾经说过：没有什么比知道在两周之内将要被吊死，更能让一个人全神贯注达到如此惊人的程度了。图卢兹虽然不是一个绞刑架，但它的确刺激亚当·斯密集中精力开始从事经济学写作。在给休谟的一封相当谦恭的信中，他汇报说：“为了打发时间，我已经开始写书了。”[4]

离开法国南部之后，一行人员继续前往日内瓦，在那里，亚当·斯密遇见了伏尔泰，最后他们来到了巴黎。巴黎正涌现出生气勃勃的艺术创新和智力创造。在那里，亚当·斯密欣赏戏剧，并拜访包括本杰明·富兰克林在内的令人激动的人物，而且还发现了一所充满生命力的经济学院，它因重农主义而出名。重农主义是由国王路易十五的御医弗朗斯瓦·魁奈以及对他评价很高的达官显贵朋友们一起创立的。重农主义者用不可理解的语言和莫名其妙的图表描述了一些相当简单的思想观念，这个图表

被称作《经济表》。魁奈周围聚集了一批对他恭敬有加的弟子，他们称呼他为大师、神甫、“欧洲的孔子”和“现代的苏格拉底”。[5]重农主义者极大地发展了启蒙运动关于自然法则的看法，但他们并不相信人类能够完全控制自然，认为只有在充分理解了自然法则的情况下人类才能存活下去。事实上，重农主义探求的是“自然规律”（而不是自然法则）。

《经济表》出色地阐述了重农主义的思想。就如同克劳德·伯尔纳这样的医生开始解剖人体，并且绘制血液循环图一样，魁奈将经济中的收入循环做成了图表。但与把人体分为手、脚、胳膊和腿不相同的是，魁奈把国家看作由自然形成的且相互依存的三种人组成：农民、工匠和所有者（地主和其他的最高统治者）。遗憾的是，他的之字形图表变成了一个难解的谜题，也只有他能够看明白。魁奈承认即使是他的大弟子老米拉博也是“陷于曲曲折折的图表中而理不清头绪”。[6]然而，米拉博还是称赞这个表和文字一样与众不同，它是一项创新，其实他是在拍马屁。

重农主义者极力主张两点：第一，财富产生自生产而不是对金银的占有，这一点像重商主义的思想；第二，只有农业企业才产生财富，商人、生产制造者和其他的工人不能生产出财富。要是来一次经济学测验，他们只会得50分。他们主张一个生产商品的国家会比一个只是储存贵金属的国家更富有是正确的，但由于强调制造业、商业和服务业是“不结果实的”、徒劳无益的和仅仅是财富的搬运工，他们因此而丢分。我们不必来回地琢磨这个模型，让我们把注意力放到重农主义者提倡的政策上：让农业这个唯一的生产部门获得更高的生产力。比如，政策限制人为地将农业租金压低，并且不鼓励土地投资，他们就力劝政府解除这些限制从而释放经济的能量。而且，他们建议向地主征税而不是处罚他们，因为只有他们能够负担得起税费，也只有他们拥有一个经济“生产”部门。总之，重农主义者热情地接受私有财产和私有收益的概念，但也看到了财产所有人相伴而来的责任。尽管如此，他们的分析到底还是坚持了下来，这只是一种很“自然”的行为。

亚当·斯密聚精会神地聆听法国人的论调。重农主义者的分析证实了他的某些观点，但他并不认同他们关于生产部门和不结果实部门的见解。休谟也不接受重农主义者的观点，他甚至要求一个朋友“怒斥他们、压碎他们、猛击他们，并且让他们粉身碎骨”。[7]或许亚当·斯密公正的良心阻止了他彻底摧毁重农主义者的愿望。亚当·斯密承认，重农主义虽然

存在着缺陷，但或许它最接近真理，只是这个真理现在还没有被政治经济学科公开发表。尽管如此，他还是略带谦虚地补充道，重农主义是“一个体系，从来没人做过，可能也从不会对世界的任何一部分人产生伤害”。[8]他们带给这个世界的是一个无关痛痒的学说，因此，亚当·斯密只是温柔地拍了拍重农主义者扑了粉的假发。

1766年，布克莱公爵患病的弟弟在巴黎死去，悲伤袭来。亚当·斯密的旅游结束了，他经由伦敦返回到柯科迪。接下来的10年，亚当·斯密写书、旅行，他来到伦敦的文学俱乐部，为的是与爱德华·吉本和埃德蒙·伯克讨论思想和喝酒，并且同塞缪尔·约翰逊和传记作者詹姆斯·博斯韦尔说些下流话，讲些黄段子。尽管约翰逊言词刻薄，但每次到巴黎做客，亚当·斯密还是从这些健谈者那里得到了对他狂热的吹捧。

驱动经济发展的只能是利己动机

亚当·斯密为打发时间写的那本《国富论》，终于在1776年出版了。亚当·斯密所崇拜的休谟对此书高声赞美，但提醒说书会流行，只是会慢一点。亚当·斯密有生以来第一次对休谟的判断失误感到高兴。书很快就取得了成功，第1版在6个月内就已售罄。

但是，这是一本好书吗？它不但是本好书，而且是一本杰作。怀着要刺激众神与杀死希腊悲剧英雄的狂野用心，亚当·斯密满怀信心地凝视着这个世界，并且发表了900页的分析、预言、事实和寓言，它们多数是清晰的和迷人的，旨在帮助读者理解。《国富论》用尖锐的、怀疑的，然而最终是亚当·斯密用作向导的乐观主义的态度，向读者介绍了哲学、政治和商业世界。当时正值工业革命爆发时期，亚当·斯密自信地指出，从农夫到修士，再到商人和发货人，每一个参与者都要精准地理解这一社会剧变。此外，亚当·斯密提出的经济政策没有偏向特殊的团体或阶级，没有人可以谴责他谄媚或者伪善。尽管他最终造成资产阶级地位的上升，但他告诫社会不要天真地听信资本家的甜言蜜语。可以这么说，1776年《国富论》的出版等于是发表了经济学家的独立宣言。

完整的书名揭示了亚当·斯密这一杰作的重点所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请注意，亚当·斯密集中讨论研究的是一个特殊的目标：揭示能够解释如何获得财富的因果论。单单这一书名就把他放到了启蒙运动的传统人物之列。通过解释指导“经济行为人”的法则，然后为社会描绘出这些行为法则的含意，《国富论》证实了这一怀疑。“经济行为人”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听起来技术性太强，但亚当·斯密只是表示，在一天中处在时空某一点的每一个人都是经济行为者。就像没有王子就不会有《哈姆雷特》一样，缺乏对人的理解，亚当·斯密也不能创立经济学。在这方面，他效仿马基雅弗利和霍布斯，他们两人都是把人看作什么，而不是应当是什么。霍布斯声称生活就像“肢体的运动……为什么是心脏而不是发条，是神经而不是许多游丝，是关节而不是许多齿轮让整个身体运动起来呢？”[9]人是可以解读和易犯过失的。

亚当·斯密在人类本性中发现了重要的天生内驱力或者说是“性向”，这构成了他的分析和古典经济学的基础。所有的人都想比他们现在生活

得更好。亚当·斯密发现了一个“改善我们境况的渴望，尽管一般情况下它是平静和不动感情的，却是打从娘胎里就有的，一直到进了坟墓也没有离开过我们”。在出生和死亡之间，“也许有那么一会儿无论谁都会十分满意于他的生活状态，以至于不希望有任何形式的更替或改进，这种情况是十分罕见的”。[10]另外，亚当·斯密指出了“人类本性中的某一倾向……采用互通有无、以物易物，用一件东西换取另一件东西……对所有人来说是很平常的事情”。[11]

为了增加一国的财富，亚当·斯密极力主张社会应当利用这些本能的驱动力。政府不应该限制自利的人，因为自私自利是一种丰富的自然资源。如果依赖慈善和利他主义，人们可能会成为傻瓜，国家可能会变得贫困。亚当·斯密宣称，人类持续不断地需要他人的帮助，但要是“期望这种帮助只是出于人们的乐善好施”是会让希望落空的，“如果他能够证明这是为了他们的利益，他更有可能获得成功”。经济思想史中被引用最多的段落之一就是，亚当·斯密宣称：“我们的晚餐并非来自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心”。[12]如果得不到报酬，即使那些乐于杀牛、喜欢酿造啤酒或烤面包的人也不会希望从早到晚地忙活。亚当·斯密从没有表达过人们只受私利激励这个意思，他只是简单地声称，私利要比心地善良、利他主义或牺牲对人的激励更加有力和更加始终如一。简单地说，社会不能将未来建立在最高尚的动机基础上，而是必须以最为可能的方式利用这些最强有力的私利动机。

但是，如果每一个人都朝着自己的方向往前冲，就会类似于处在一个复杂的十字路口，而交通信号灯却发生了故障一样，但为什么社会没有陷于无政府状态呢？当私利发生冲突时，我们不是听到了可怕的猛烈碰撞声吗？如果道路在没有交通管理部门规定谁走谁停时就不能保证安全的话，那么，在没有中央计划权力机构决定谁生产以及生产什么的时候，一个社会怎么能够得以生存呢？

是的，它不但能够存活，而且还要比任何有中央计划的社会生存得更好。更让人吃惊的是，在产量和社会和谐两方面都会胜过任何基于利他主义的经济体系。亚当·斯密研究过天文学，了解即使每个行星按自己的轨道运行也一样和谐。他想，人们也能在不同的道路上前进，也会和谐相处，并且互相帮助，但不是他们有意为之。亚当·斯密宣称如果所有的人都在寻求增进他们的私利，整个社会就会繁荣昌盛，“他……在通常情况下既不是为了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他能促进到何种程度……他

只是为了个人的利益作打算，身处这种情况，就像在其他很多场合那样，他会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促使一个目标的达成，而这并不是他的本意所追求的”。[13]这只“看不见的手”成为亚当·斯密经济学的鲜明特征。

然而，亚当·斯密不会将他的论证停留在任何虚幻的东西上止步不前。无形的手只是象征了社会和谐与自由市场的真正演奏家。作为20世纪自由市场的最强有力的支持者之一，弗里德里克·哈耶克说道，如果市场体系不是自然产生的话，可以讲它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因为市场竞争引导着追求私利的人在早晨醒来，观察一下外面的情况，并且利用原始材料进行生产，生产的东西并不是他所想要的，而是别人想要的。数量也不是他愿意生产的，而是邻居愿意要的。价格也不是他梦想中的卖价，而是他的邻居对他的劳动估值的结果。

自由市场中有只“看不见的手”

让我们拿自利的邻居约翰作例子，开始我们的讨论。与亚当·斯密不同的是，约翰是在自己的床上，而不是在镇上的广场上醒过来的。在阅读报纸的时候，约翰欣赏着一只可爱的秃鹫木雕，这个木雕悬挂在餐桌上方，似乎随时要向桌子上的残羹剩饭猛扑过来。约翰真的很喜欢制作秃鹫木雕。他想到了一个主意：为什么不雕刻更多的秃鹫，并且卖掉它们呢？毕竟，用从塔斯马尼亚进口的经过特殊处理的木材雕刻一个秃鹫木雕成本才50美元，他每周就能够雕刻一个。他决定每个木雕秃鹫售价200美元，巨大的利润可以让他富裕起来，并且可以给他带来梦寐以求的东西，比如大大的汽车和在墨西哥阿卡普尔科无拘无束地度假。不过，最重要的是他喜欢雕刻。

他开始行动，租下了一个店铺，并且邀请邻居和当地的艺术评论家去庆祝开业。众人哄堂大笑，他却哭了。他们认为秃鹫木雕丑得吓人，他的哭声更大了。没有人购买他的作品。最后，他的妈妈用49美元买了一个。他认输了，只好歇业。“看不见的手”竖起拇指表示同意。为什么？

约翰加工的是他想要的东西，而不是他的邻居想要的东西。约翰要价过高，而不是按别人愿意支付的价格定价。但是，在约翰这个案例中，也没有人愿意按加工秃鹫木雕的真实成本付钱给他。难道约翰不应该超过他的成本来定价？不是的。答案不是应该定价更高，而是根本不要加工。为什么“看不见的手”应该同意约翰关门大吉？为了制作木雕，约翰用尽了稀缺资源。地球只给予我们这么多的木材来加工利用。如果约翰使用了贵重的塔斯马尼亚木材，其他人就不能再使用了。如果人们不能生产出比他们所使用的原材料更有价值的物品，“看不见的手”就会强制人们放弃。约翰获得了价值50美元的木材，精雕细刻，而给予这个世界的秃鹫木雕反而降低了原材料的价值。社会可不能容忍通过减少价值来浪费资源。那些得到木材并且制作成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或残疾人专用拐杖的人不仅可以使这些资源增值，而且增加了社会财富。他们理应赢得“看不见的手”的掌声，而约翰应该挨上一拳。

失败的约翰倒上一杯茶，咒骂着餐桌上方的秃鹫木雕，并且用拳头

猛地捶打桌子。茶水从茶杯中溅到了桌子上，现在他又因为茶水弄湿了一个月前他做好的新桌子而咒骂起自己。灵感又来了。他问自己：为什么不做桌子来卖呢？现在他变得有点聪明了。他找到了一家木材加工厂，愿意按每张桌子成本大约100美元给他供应木材。锯开木头、绘制图纸和组装每张桌子要花费大约两周的时间。依照以前做木匠的工作量基础他进行过计算，他的时间价值为每周200美元。考虑到工具、租金和其他杂项费用，他计算每张桌子的总成本约为575美元。约翰在橱窗里浏览过类似的餐桌，发现他可以将桌子卖到585美元。这样一来，他不但能够支付自己每周200美元的劳务费，还会赢利。

“看不见的手”最终向约翰竖起了大拇指。他购买到了稀缺资源，并且生产出的东西比原材料具有更大的价值，不是按照他自己的口味，而是根据社会的需求来做。

至此，我们已经领教了“看不见的手”如何鼓励和阻止生产。但是，亚当·斯密也向我们展示了市场是如何管制价格的。请记住亚当·斯密的性格是自利的。为什么约翰不将餐桌价格提高到585美元以上以增加利润呢？他不能。如果约翰提高价格，利润就会急速下降，因为人们将会走过他的商店，而去价格较低的竞争对手那里购买。当然，所有的家具制造商可能会聚在一起协商共同提高价格。即使他们这样做，其他自利的人看到家具销售的高额利润也会争相开设家具店。通过低价销售和从垄断联盟手里抢走业务，新加入的企业家能够获得巨额利润。

价格和利润向企业家发出了生产什么和价位是多少的信号。高价位和高利润会在企业家的耳旁拉响警报，尖声催促他们开始生产某种商品。低利润或亏损则会揪住商人的衬衫领子，毫不留情地摇晃他，直到他停止生产才罢手。

然而，价格和利润可不仅仅是抽象的概念。高额利润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它表明人们需要或想要一个产品。如果与录音机相比，消费者确定他们更喜欢CD播放机的话，CD播放机的需求会上升，而且其生产者将可以定价更高。但是，如果录音机的制造商对此信号做出反应，减少录音机产量而增加CD播放机产量的话，工人将从一条生产线被迫转移到另外一条生产线，并且CD播放机的价格将会回归到正常水平。过去10年间，个人电脑和DVD播放机的价格已经下降，不仅是因为生产成本的下降，而且是由于太多的高科技生产制造商加入到竞逐利润的行列。从长期看，没有哪个行业会比正常的利润水平赚得更多。自由市场自发地引

导自利的约翰们来满足他们并不认识的人。不需要中央计划者的喊叫，也不需要监工的管制。

20个与4800个的天壤之别

亚当·斯密承诺要向人们展示“看不见的手”如何调节产出、价格和利润。但这个令人愉快的苏格兰人，也承诺要让我们明白什么可以增加一国的财富。如果他不能解答这个问题，他就不会比重农主义者更高明。很幸运，他又赢了，答案只有简洁的两个字：分工。亚当·斯密从逻辑上和经验上为自己的立场进行了辩护。当他描述一个制造图钉的工厂时，建立在实践经验基础上的描述活灵活现，使之成为最著名的表达经济思想的段落之一。马克·吐温说过，经典著作是每个人可以拥有，但从来没有人费劲去阅读的书。甚至更让人伤心的是，经典著作常常变成相当烦人的陈词滥调，当它们最早问世的时候，我们可能未必领会它们所具有的影响力和戏剧性。想象一下下面一段文字的原始冲击力吧，因为它出现在工厂变得普遍之前，而且当时只有三人或四人的小作坊生产大部分的世界商品：

> 一个没有学过制造图钉的工人，……他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或许一天也做不出一枚图钉，而且可以肯定的是一天不能做出20枚。但是，按照现在的经营方法，不但整个作业已经成为专门的手艺，而且还被分成了若干工序，其中大多数工序也同样成为专门的手艺。第一个人拉长铁丝，第二个人拉直，第三个人切截，第四个人弄出尖头，第五个人对一端进行打磨以便衔接圆顶。做圆顶就需要有两三种不同的操作。装上圆顶是一项特殊的作业，将针增白是另外一个特殊的作业，甚至是单单把图钉放进包装纸中就是一种技艺。如此，制造一枚图钉的重要作业被分成了大约18项不同的操作。在有些制造商那里，这18种操作全部由不同的工人完成……我见过一个这种类型的小工厂，只雇用了10个工人，在那里，每个人每天（平均）要制作4800枚图钉。但是，要他们全部分开独立制作，要是任何人没有受过做这个活的培训的话，他们一定做不到每人每天制造20枚，说不定一天连一枚图钉也制造不出来。[14]

仅仅是把工作任务专业化和实行劳动分工，一天的产量就能激增4000倍。亚当·斯密将会对此做何解释？他会给我们介绍说：在我们睡觉时，实际上是一只“看不见的脚”或另外一个公正无私的幽灵在替我们工作吗？公平而论，亚当·斯密从没有指望在任何一种情况下产量能有4000

倍的激增。但是，他确实说过通过分工提高产量的三种方法：第一，每个工人在其特殊的作业中培养出更多的技能，而且更为灵巧熟练。第二，工人在从一个作业转换到另外一个作业时浪费更少的时间。这一点很有意义，如果变化作业时不得不更换工装、工具和位置时尤其如此。第三，专业化的工人将更有可能发明工具，为他们每天要专心致志地开展的特殊作业提供帮助。亚当·斯密认为推动创新发明的常常是工人，而非工程技术人员。

> 在劳动力进行了最大程度细分的制造企业，那里使用的大部分机器最初都是普通工人发明的，他们每个人都被雇用进行一些简单的操作，很自然地就会将他们的想法转向找到更容易和更迅速地完成这些操作的方法。若是对参观此类制造工厂已经习以为常的话，无论是谁肯定会经常看到他们在向你炫耀漂亮的机器设备，这些都是这样的工人发明的。[15]

请注意，亚当·斯密以能够提高生产力而赞美分工开始，又以将技术进步归功于分工而结束。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当日本的股票市场泡沫破裂时，商业顾问、经济学家和商业作家都在研究日本工厂，以寻求他们成功背后的秘密。出于某种原因，日本的工作场所采用的是作业圈而不是装配线，明显没有太多的分工和亚当·斯密所描写的特征。然而，日本商人声称他们的工人比美国的同行有更多的发明和创新。对日本方法的赞扬激起了一些效仿和少许的冒牌货，比如，有一个传奇故事，讲的是日本、法国和美国的企业高管均被判处了死刑。刽子手要求他们提出最后一个要求。法国人要求说："我想要一瓶赤霞珠和一桌丰盛的饭菜，特色菜有蜗牛、野鸡和焦糖布丁。"日本人回应道："我想就日本企业管理的功绩发表一次演讲。"最后，美国人说出了自己的要求："请你在日本人演讲之前处死我吧，拜托！"

亚当·斯密主张，为了激发效率，工作应当根据作业加以分工。但是，他提醒说分工会导致不同作业的工资标准出现差异。亚当·斯密对工资标准的复杂假设阻止了一个简洁和准确的讨论。但他确实给经济理论家解释"为什么一组人比另一组人获得更多的工资收入"打下了强有力的基础：

1.一项工作可能必须要承受令人不愉快的工作条件，因此，除非用工资对他们进行补偿（补偿性差异），否则没有几个人愿意接受雇用。在帝国大厦顶层擦窗的工人要比擦洗富米卡塑料贴面的午餐柜台的妇女收入高。当然，擦窗工人的视野也比较辽阔。

2.某些工作需要特别的培训。法庭速记员的收入要比法警的收入高。

3.没有规律或没有安全保障的工作收入较高。建筑工人要比其他受过相似培训的工人每个小时的收入多，因为气候条件妨碍了他们不如其他人那样能工作那么长的时间。

4.当需要高水平的信任时，工资会提高。因为外行人无法评估钻石的价值，许多人感觉从价格昂贵但却值得信赖的商店（如蒂芙尼首饰店），要比从一个折扣店里购买更为稳妥。

5.当成功的可能性较低时，则成功时获得的报酬将会很高。民事诉讼中的律师经常按风险代理收费的方式受理案件，也就是说，只有打赢了官司他们才能得到酬金。但如果他们真的打赢了官司，他们的收入甚至比速记员的收入还要高。亚当·斯密并不认为所有的经济参与者会表现得非常富于理性。他料想从事风险职业的人往往过高地估计了他们成功的机会，因此，结果是得到的收入会比他们期待的要低。

一支铅笔背后的国际贸易故事

当然，亚当·斯密从没有做过单有分工就能够给一个国家带来财富的保证。制造商、供应商、城镇和城市之间的自由贸易还是不可或缺的。如果10000枚图钉因为贸易限制和高额的运输成本不能进行交易的话，它们还有什么用处呢？制造商每天可能只做20枚，或者也许1枚也不做了。再者，分工会在城镇之间而不仅仅是在工厂的工人之间发生。某些城镇可能会走专业化的道路，这就好比专业化的个人所能做的那样。美国爱达荷州的博伊西或许生产小麦，而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则生产计算机。重点在于，如果市场扩大的话，也就是说，如果越来越多的地区与贸易之路连接起来的话，一个国家的财富才会增长。

考虑一下1750年时的美国。在东部沿海的商船航线上，从巴尔的摩到波士顿的货物运输相对顺利，然而，宾夕法尼亚西部的殖民地移民不得不靠自给自足来维持生活。一个自给自足的殖民地移民类似于一位必须自己切割、打磨、镀铬和送货的图钉工人。在美国，随着河道和陆路交通路线的开发以及货运成本的降低，越来越多的城镇被吸纳到一个共同市场中，从而增加了单个社区和整个国家的财富。事实上，因为海运业建造了更安全的船只，并开发出更好的导航技术，从而压低了横跨大西洋的航运成本，这在18世纪振兴了英属北美殖民地和英国整整一个世纪，甚至是打败海盗都要归功于国家的富裕。

爱默生式的自力更生可能是美国国民精神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尽管如此，美国人的钱包还是鼓不起来。

在呼吁自由经济的同时，亚当·斯密坚持认为，如果英国从另外一个国家购买的商品的生产成本低于在英国生产同样商品的成本，英国会从这一贸易中获益。英国人可能不喜欢法国人，但如果一瓶法国白葡萄酒的成本为1英镑，而在英国相同一瓶酒的成本为2英镑的话，英国再去生产葡萄酒就成傻瓜了。法国在葡萄酒上具有“绝对优势”。当然，如果法国葡萄酒的成本是英国的两倍，英国再去购买法国葡萄酒就成傻瓜了。亚当·斯密的观点很好理解，即如果英国利用资源能够生产出比法国成本低的羊毛，为什么还要浪费稀缺资源用于生产比法国成本更高的葡萄酒呢？根据亚当·斯密的观点，一个国家只应当进口那些别的国家拥有绝对

优势的产品。（请记住亚当·斯密的主张，因为之后大卫·李嘉图展示了真正的才华，他把亚当·斯密的这个观点加以修正，并且用来说服之后的几乎所有经济学家，那就是：甚至当其他国家没有进行更便宜的生产加工时，国际贸易也会让一国富足。）

以自己的大衣为例，亚当·斯密列举了来自不同行业和不同地区，共同让他的保暖成为可能的各类劳动者：牧羊人、羊毛分拣工、羊毛梳理工、染色匠、纺纱工、织工、商人和水手（假定他的大衣衣料是进口的）。最让人吃惊的是，那些工人彼此不必认识，也不必认识亚当·斯密，或者不必知道为什么他想要一件大衣。所有他们应当知道的就是放羊或者染色的工资高到足够让他们觉得值得下这份力气，也就是说，某个人愿意因为他们有助于成衣的完成而给他们支付报酬。在一篇重要的文章中，哈耶克进一步采用亚当·斯密的主张，指出信息分散是社会的最大障碍之一。没有哪个中央计划者能够收集到决定社会是否应当为亚当·斯密生产一件大衣所需要的全部信息，并且即使他得到了所有的信息，情况也会改变。但市场价格体系会告诉人们所有他们想知道的信息。哈耶克在下面一段文字中使用了锡作为例子：

> 假设在世界某地出现了一种利用锡的新机遇，或者有一处锡的供应源已经枯竭，至于两种原因中哪一种造成锡资源更加紧缺，对我们的影响不大。这一点非常重要。锡的用户需要知道的全部情况是，他们以前一直在使用的一部分锡，目前在其他地方获得了更为有利可图的利用，既然如此，结果就是他们必须节约用锡。对于其中绝大部分用户来说，甚至不必知道这个更需要锡的地方在哪里……只要其中有些人直接了解到这一新的需求，把资源转用到这种新的需要上，同时只要意识到由此产生资源缺口的人转而寻求其他来源来填补这个缺口，则其影响就会迅速扩及整个经济体系。这不仅影响到所有锡的使用，还会影响到锡的替代品的使用和锡的替代品的替代品的使用，以及锡制品的供应与锡制品的替代品的供应等。在那些有助于提供这些替代品的绝大部分人对这些变化的最初原因一点儿也不知情的情况下，做到了这一切。

引自哲学家艾尔弗雷德·诺思·怀特黑德的一段给人印象深刻的话宣扬了这一观点：“我们应该养成思考我们在做什么的习惯，这句话不断地被加以重复，大人物发表演说时也反复地念叨。要说这是一句不言而喻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事实恰恰相反。文明是通过扩充那些我们不加考虑

就能实施的重要活动的数量而得以进步的。”[16]通过我们并不理解的符号和信号，我们充分利用了他人的知识。

哈耶克也应用他的“无知论”，攻击经济学基于完全利他主义的乌托邦幻想。一个人是这个世界上了解“自己想要什么”的最权威的专家。对于满足自己欲望的替代性选择的效果，其他的人不会更了解，也不能够做出更好的判断。因此，人们应当关注他们自己的利益。如果所有人都寻求去做“公益”，他们必须像了解他们自己一样了解其他每一个人。吉尔是一位圣洁的女子，她可能爱杰克，她从来没有和他见过面，那么她如何知道他想要什么，以及对他想要的东西做出何等的评价呢？假设吉尔和杰克都是利他主义者。吉尔正在出售她的住房，因为她爱杰克，她想把房子卖给他，售价只有10万美元。因为杰克爱吉尔，他不敢付这么少的钱。他出价20万美元。她拒绝了并且提出可以接受11万美元。对于她拒绝了他的礼物而受到伤害的杰克坚持要付21万美元。我们不知道这种讨价还价会在哪一个价位上结束，而这恰好是哈耶克想要表达的观点，因为没有人确认他们对这个房子的估价是多少，市场信号就不会出现，社会就丧失了分配稀缺资源的能力。正如亚当·斯密指出的那样：“通过追求个人利益，人们倒是经常促进了社会的利益，这要比他真正地想要促进社会利益所带来的效果还要好。我从来不晓得那些假装为公共利益进行交易的人为社会带来了多少好处。”[17]

哈耶克的逻辑是受他的老师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影响，米塞斯在1920年主张反对社会主义，理由是没有哪个政府能够完成构建一个有效经济体系所需要的所有计算。米塞斯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领导者，该学派坚持自由放任的观点，并对数学模型极为怀疑。因为米塞斯相信经济原理是不证自明的，并且对基于真实数据的模型持反对意见，他的观点直到最近才受人追捧。现今，新奥地利学派尝试着要扩展他和他在维也纳的老师卡尔·门格尔和欧根·冯·庞巴维克的研究。

米尔顿·弗里德曼继承了亚当·斯密和哈耶克的传统。如果你拿起他的《自由选择》这本书，你会在封面上看到弗里德曼手持一支铅笔的照片，这支铅笔并非用来表明他是一个写书匠，而是亚当·斯密经济学的一个象征。弗里德曼认为单个人不能制作出一支铅笔，就算是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也不行。石墨来自斯里兰卡，橡皮擦是用印度尼西亚菜籽油和氯化硫做的，木头产自美国的俄勒冈州，而组装是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威尔克斯巴里，成本只有10美分的铅笔是一个国际市场分工合作的产

品。

自由市场与普通人的幸福生活

尽管亚当·斯密不停地赞美自由贸易以及商人的事业，他却不是资产阶级的一个雇用枪手。《国富论》充满对商人们的指责，它并不是为富人书写的辩护状。亚当·斯密极力称赞自由贸易和分工，是因为他确信二者会比王子给普通人提供更多的帮助。

> 没有成千上万人的协助和合作，在一个文明国家里即使最卑微的人也不会获得生活的供给……确实，与更奢侈豪华的生活相比，他的食宿毫无疑问显得极为简单。然而，也许一个欧洲王子的食宿并不总是比一个勤劳节俭的农民高出那么多，因为后者的食宿条件超过了许多的非洲国王。对于10000名赤身露体的未开化的人来说，一个非洲国王就是他们生活和自由的绝对主人。[18]

正如他的追随者所做的那样，亚当·斯密天真地建议，在市场体系之下，即使是穷人和政治上无能的人也能够成功。与此相反，在中央指导的计划体系下，政治力量决定了经济地位：只有国王的朋友和有爵位的人才能够致富。米尔顿·弗里德曼在他的《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再次发展了亚当·斯密的这一观点，主张市场体系有效地减少了种族和民族的歧视，因为不管是谁，只要能提供最合适的价格，消费者就会从他那里购买，而不会从提供适当祈祷的宗教和具有合适肤色的人种那里购买。另一方面，他指出，在社会主义体系下，一个少数群体的成员要想取得进步必须获得计划者的政治偏爱。[19]

弗里德曼的观点仍然存有争议，批评家提出了许多反例，比如认为公司高管绝不会提拔少数族群的工人，除非他们在“软”变量（比如领导能力和个性特征）方面得分很高。而且，批评家坚持认为，经济力量通过竞选捐款能够转化成政治力量，使得经济上的贫困人口在政治上丧失了话语权。弗里德曼接受后一种观点，但是通过主张一个较小的政府，而且这个小政府被禁止在大多数经济事件中进行干预，他对批评他的人进行了反驳。辩论越发激烈，著述文献也在增加。

尽管亚当·斯密自信地认为他已经揭示了获得更大财富的秘密，但却没有在这种思想的引导下创立一个绝对正确的基本原理。他欣然承认分

工中存在的某些缺陷，并且又一次证明了他的敏感性不是只限于成本和利润。要知道，他的初恋是道德哲学。亚当·斯密是一位体质状况影响人类思维的坚定信仰者，他担心组装流水线会剥夺工人们的智力和精神："一生都被用来完成几个简单作业，而且作业也许总是由相同的人完成……没有机会发挥出他的理解能力，或者使用他为寻找克服困难的便利方法而做出的发明……他自然也就因此丧失了如此努力的习惯，并且通常变得像人类可能成为的那样傻笨和无知。"体现出亚当·斯密家长式心态的时刻之一，就是他建议用公共教育来医治大众的浑浑噩噩，因为受到教育的工人在完成体力活的时候进行发明和运用他们大脑的可能性更大。亚当·斯密说道："只需要极少的费用，就能够给大众带来便利，就能够给大众以鼓励，就能够保证几乎全体人民获得最基本的教育（即诵读、书写和算术）。"[20]

此时，让我们对《国富论》作一下总结。亚当·斯密把劳动力看作经济增长的主引擎，它在下列情况下会加速：劳动力供给增加、劳动力被细分，或者由于新机器的使用，劳动力质量得到提升。只要赢利性投资和创新观念不断产生，而且允许自由交换，经济将会不断增长。最重要的是，普通民众可以享受到一个较高的生活品质。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反对米尔顿·弗里德曼的看法并因此写了几本书。他利用现代数学技巧重新检验了亚当·斯密的增长理论，发现"如果发明持续发生……利润率和实际工资增长率将会在他们勉强糊口的生活水平之上达到平衡"。萨缪尔森声称"很高兴发现亚当·斯密成功经受住了现代人对他的思想进行的分析解剖。"[21]

自由市场经济体系下，政府应当扮演什么角色？

亚当·斯密可不是躲在象牙塔里搞研究的理论家。他想让这个世界跟着他的感觉走，因此热切地与政治家和政治掮客来往。当首相皮特采纳了他的建议，或者首相福克斯引用了他的话时，他会激动不已。对于福克斯引用了他著名的一段话却没有读过他的任何著作，他应该是原谅了福克斯的。

总统哈里·杜鲁门曾经恳求得到一位“独臂”经济学家。为什么呢？因为他对经济学家模棱两可的表述方式“烦得要死”，经济学家总是说“从这方面看，我们能够做……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也许吧”。亚当·斯密有两只手，但他会自信地把手指向政府要遵循的最佳政策。他提醒立法者，特殊的利益会对那些增加一国财富的措施施加很大的压力。他的警告应该仍然还在整个世界的议会和国会里回荡。亚当·斯密“自由市场论”这条经济学路径并没有让他像伏尔泰小说中的潘格罗斯博士那样被谴责为“天真的乐观”，这位博士无视他周围的所有证据，认为他生活在一个“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世界”。另一方面，就像威廉·萨菲尔的那句话，亚当·斯密又不是一个“消极的牢骚大王”。相反，他认识到了障碍，并且表明如何绕过它们。让我们审视几个受关注的政策。

国内贸易限制。回想一下前面描述过的竞争性市场体系，在这个系统中，进入一个行业的压力迫使价格和利润下降到“生产成本加上正常投资回报”的水平。亚当·斯密观察到有时商人确实将过高的利润带回了家，为什么他的模型没有奏效？亚当·斯密描述了两种情形来解释超额利润。

第一种情形，仅仅是因为自然资源或条件的限制，企业家们不能进入极为有利可图的行业。例如，只有靠近西班牙赫雷斯的土地才能够生长出酿制雪利酒的葡萄。纵然是皇室成员自愿用他们皇家的土地来种植葡萄，富于创业精神的英国人也不能在白金汉宫周围种植酿制雪利酒的葡萄。因此，在赫雷斯的土地所有者可以享受到较高的利润。当然，企业家能够尝试劝说人们饮用波尔图葡萄酒作为替代品，这样就将雪利酒的超额利润抹掉了。

亚当·斯密指出，第二种情形比较有害。当一小群商人加入保持高价的联盟之中，不正常的利润会持续下去。他写道：“同业中的人甚至是为了娱乐和消遣也很少聚在一块，但他们只要聚在一起，结果不是图谋对付公众，便是搞些提高价格的障眼法。”[22]根据亚当·斯密的观点，商人之间这种魔鬼协议通常不够牢固。因此，商人们怂恿政府去做这种棘手之事。除非政府对垄断联盟表示支持，否则商人的阴谋诡计常常不能阻止竞争者进入市场。亚当·斯密对许多为了联盟利益而对贸易和分工加以限制的矛盾做法进行了抨击。学徒制的法规和垄断联盟对竞争是一种扼杀。亚当·斯密描述了一个愚蠢的后果：马车制造商不能合法地为他的马车制造轮子，但是轮子制造商却能够生产车厢放到自己生产的4个车轮之上。如果车轮制造商通过法律禁止竞争，他们就可以要高价。除了学徒制的法规之外，亚当·斯密对英国的《济贫法》也评价不高。为了获得救济，居民们必须要满足（在当地）居住一定期限的要求，这就意味着就业岗位发生变化，需要不同的劳动者时，他们不能畅通无阻地从一个行业跳到另一个行业，或者从一个城镇迁移到另一个城镇。亚当·斯密猛烈地抨击了政府许可的垄断，指出这种垄断“让市场持续地供货不足，从来没有对有效需求进行充分的供给，以大大高于正常水平的价格出售他们的商品，由此提高他们的……工资或利润”。[23]

大西洋彼岸的美国是如何看待亚当·斯密对于密谋的惧怕呢？自从西奥多·罗斯福反对垄断以来，美国对垄断和寡头垄断（共同控制一个行业的一小群公司）给予了较多关注，超过了对学徒制的关心，因为在美国从来没有像在欧洲那样盛行的学徒制。美国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担心大型公司可以保护自己免于市场竞争，从而大获其利。因此，多年以来，政府将几千家公司告上了法庭，即使这些公司通过它们的律师进行了抗辩和大吵大闹，但美国政府还是依据《谢尔曼反垄断法案》和《克莱顿法案》指控它们操控价格和限制竞争。此外，美国司法部常常设法阻止公司的合并。整个20世纪70年代，一些经济学家和法学教授一致同意：虽然操控价格是罪恶的，通过合并变成“大块头”却未必有害无益，因为变得庞大的公司不必限制竞争者的加入，事实上可能还会增进效率，持这种观点的人有大学教师米尔顿·弗里德曼、乔治·施蒂格勒和理查德·波斯纳，他们曾经是芝加哥大学的学生。

此外，许多当代的学者主张，过去那种反托拉斯的人看待市场的眼光太狭隘。现代的竞争包括外国公司，并不只是包括国内企业。他们将20世纪80年代通用汽车公司的失败与现代汽车公司的胜利相提并论，以

此作为证据。现代汽车是韩国的一家汽车公司，在它登陆美国市场的几个月内就对底特律这座汽车城形成了冲击，并让通用汽车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变得非常难看。在个人电脑市场，从车库起家的投资人组建了一个以水果命名的公司来挑战IBM和霍尼韦尔这样的庞然大物。不无讽刺的是，苹果电脑刚开始进入英国时还被当作粗陋的美国进口货，后来苹果电脑公司成长为影响巨大的行业领袖，并且为更不起眼的新秀如红杏电脑所模仿。

在斯坦福大学毕业典礼的一次出色演讲中，史蒂夫·乔布斯回忆了从大学退学走上挑战IBM的人生之路：“我没有了学生宿舍，所以我只能睡在朋友房间的地板上。我退掉可乐瓶子以得到每瓶5美分的押金，再用它去购买食物，而且在每个星期天晚上我都要步行约11公里，穿城而过，去哈瑞克利希那寺庙吃每周才能享用一次的美餐。我喜欢这样。我追随自己的好奇心和直觉偶尔学到的很多东西，在后来被证明是无价之宝。”[24]在30多年的时间里，美国司法部一直都在打击IBM。但它却是利用如史蒂夫·乔布斯这样一个辍学学生，而不是利用刻板的反垄断律师来创造更为激烈的竞争。

在“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的影响下，里根和布什政府阻止的公司并购案要比他们的前任少得多，因为他们已经受到了很多的批评。相反，他们开始着手于价格操控的诉讼。来自芝加哥学派的批评意见是：价格操控不过是变成大公司的象征，而里根政府批准的合并会很快造就出垄断企业。

少数几个垄断企业已经崛起，事实上，世界经济的竞争一如从前那般激烈。尽管一些萎靡不振的企业存留了下来。最近几年，最引人关注的反垄断案是美国司法部发起的针对微软公司的诉讼。政府的反垄断监管机构认为，微软在计算机操作系统上的垄断使得它阻止了竞争者将其产品展示给消费者。许多记者将微软的创始人比尔·盖茨比作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暗示通过垄断计算机操作系统，盖茨能够做到标准石油垄断石油市场般的程度。当芝加哥学派的智囊之一、前法官和耶鲁大学教授罗伯特·博克带头对垄断者发表一个简短的抨击时，微软的反对者们莫不欢呼喝彩。在播放了给人深刻印象的比尔·盖茨这位世界首富心神不宁的证人录像之后，微软与司法部了结了此案。然而，让微软的反对者感到遗憾的是，解决方案没有强迫微软将软件代码的内核分拆开，或者阻止它为视窗软件编写新的程序。事实上，解决方案不过是强迫微软与其他

公司“分享”界面而已。情况常常是，当律师在法庭上进行争辩时，技术上的新飞跃就会让法庭的解决方案变得既过时又浪费。

不过，最大的讽刺已经显而易见了。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许多杰出的经济学家声称，亚当·斯密所说的完全竞争的简单世界随着岁月的流逝和公司的膨胀已经变得没有多大意义了。然而，许多现代经济学家坚持认为，由于国际竞争的存在，亚当·斯密的洞察力每天都在变得更加光芒四射，并且与当前的重大问题更加密切相关。[25]

国际贸易限制。亚当·斯密写道，“如果每个家庭的治家之道是精明的，那把它放到一个伟大的王国中也就很少是愚行了”。[26]在论证了绝对优势理论之后，他毫不留情地猛烈抨击商人们为了能够保护自己免受外国生产者的竞争而游说政府，并且政府也听从他们的摆布。通过关税和配额，政府等于强迫消费者对商人进行了补贴，因为消费者支付的要比必要的价格高得多。在没有外国竞争的情况下，国内的商人提高了他们的价格和利润。对抗自由贸易的力量看起来“像是一支编制过于庞大的常备军……令政府恐惧，并且在许多情况下可以威胁立法机关”。让亚当·斯密感到伤心的是，反对自由贸易的政府官员因为吹捧式的宣传而得到奖励，而那些为大众利益而战的人受到的却是侮辱和无耻的虐待。[27]

当今，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等我们谈过李嘉图对亚当·斯密理论的改进之后，我们再深入探讨。不过，即使我们接受了亚当·斯密的基本理论，他会允许任何自由贸易的例外情况存在吗？是的，但不会很多。亚当·斯密仔细思考过“幼稚产业”的主张，并且否定了它，这种主张要求对外征收“临时性”的关税，只是为了在产业的早期发展阶段提供保护。几年以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美国欣然接受了“幼稚产业”的主张，200年之后的日本也学会了培育扶植幼稚的半导体产业。但一旦产业成熟，政府能否将政治意愿聚集起来取消这种保护政策，亚当·斯密表示怀疑。尽管这个产业已经有了成人的胃口，它还是会学婴儿一样哭叫。或者用这种主张的新版本来说，这个产业会像一个衰老的老人那样呼哧呼哧地喘息，并且流着口水，继续要求政府提供帮助对抗竞争。美国的钢铁业曾经基于这两个理由大声叫嚷着要求保护，一开始是作为一个“老糊涂”，后来是作为一个“重生的婴儿”。但是，对于钢材行业的保护是一件特别有害的事情，因为它迫使所有东西（从洗碗机到自卸卡车）的价格上涨，并且减少了美国机械设备的出口。

2002年，小布什总统将外国钢材出口商面前的那道卷帘门拉了下来，按他们向美国出口的钢材销售额强行征收8%～30%的进口关税，美国的汽车制造商很快就感到他们像被夹在了老虎钳里，因为美国的钢材价格飙升了30%～50%，远远超过日本和欧洲的价格水平。愤世嫉俗的人认为小布什通过关税方案是为了拉拢摇摆不定的俄亥俄州、西弗吉尼亚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钢铁工人选民。在世界贸易组织于2003年裁决该关税非法之后，小布什放弃了原来的立场，并且废除了此项关税，但在此之前，提高关税已经伤害了美国汽车制造商作为钢材消费者的利益，并招致欧洲人威胁要联合抵制来自佛罗里达州的橘子。

对于将关税作为反击其他国家贸易保护的报复行为，亚当·斯密一点也不赞成，因为报复性关税只是减损了更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潜在财富。当然，一个能够敦促最先违规一方罢手的成功的报复行为是好上加好。但是，人们怎么能够知道一个报复性的关税会不会因果报应地引发第三个关税呢？因为各国出于报复其他国家而设置了部分的高额关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愈发严重。亚当·斯密不无恶意地说：“判断这种报复是否能取得如此效果也许不属于立法者的学科领域……而是属于阴险狡猾的动物的技能，这种动物通俗地讲就是政治家或政客。”[28]虽然美国在明确地保护某些行业，政治家和经济学家还是经常把日本当作一个自由贸易的明目张胆的违规者而加以引用。

有两个报复性的技巧值得一提。据说自从日本遭遇不可思议的管制之后，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亨利·罗索斯基幽默地建议，让日本的进口货经由爱达荷州博伊西的报关代理人之手进入美国。罗索斯基要求充实人员，将他们的工作安排在每周星期一，工作时间为早9点到晚5点，并且是在名称以字母r结尾的9～12月办公。另外一个例子说的是美国前得克萨斯州州长约翰·康纳利，在1980年竞选共和党总统提名时，他同意采取更为强硬的措施，庸俗地提议要阻止日本的商品进口到美国，并且告诉日本人要“乖乖待在横滨的码头上，坐在他们的丰田车中听他们的索尼音响”。在竞选中花费了几百万美元之后，康纳利在美国收到的选票数目与他可能在横滨收到的选票数目一样多。

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基本原理只是偶尔向贸易保护主义者的诉求弯腰。例如，他同意用关税抵消对国内产品征收的国内税。他也接受以国防的理由为关税所作的辩护，因为知道英国的安全需要一个健康的造船业。尽管如此，他仍然坚持认为这样的保护阻碍了“财富的增长”。

如果政府不应保护本国产业、规范管理劳动用工或者袒护商人的话，那它应该做什么呢？亚当·斯密何时才会给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脱掉镣铐锁链呢？亚当·斯密明确地界定了政府的恰当角色：首先，提供国防服务；其次，通过法院制度进行司法管理；再次，维护公共机构和资源，例如道路、运河、桥梁、教育体系和国家主权的尊严。

当下他的思想再度流行

在1980年戴着亚当·斯密头像领结的那些人一般信奉以下内容：限制政府的规模，减少社会福利方案，减少政府的价格管制，减少联邦干预，并对当地政府事务提供援助，自由市场本身就能提供大部分的国民生活之所需。当罗纳德·里根在1981年就任美国总统时，据说他的首席经济顾问跟他开玩笑说："不要只是站在那里。有些事情要放松管制。"虽然解除管制的趋势开始于1978年卡特政府签署《解除空运管制法案》，但里根政府加快了这一步伐，把天然气、石油和航运价格留给"看不见的手"去指导，同时废除了卡特时期的工资和物价管理办法。

尽管里根首战获胜，但当势力强大的海事、货运和建筑业利益集团开始与政府进行斗争的时候，解除管制的努力就变得软弱无力了。1983年，美国政府解散了由当时的副总统布什带队的解除管制特别工作小组。在里根的第一个任期届满之后，解除管制的这群人发现在莫斯科取得的进展比在华盛顿还要多，更值得欢呼喝彩。例如，有线电视业发现美国国会在管制它，之后又解除了对它的管制，完全取决于选民对他们的有线电视收费愤怒到何种程度。可是，银行业成功地争取到了与证券公司结合起来的新自由，随着私营部门首创了革命性的互联网，联邦政府已经多半成为一个局外人。通过取消对许多部门的限制，并将它们置身于激烈的竞争之中，政府强迫美国的公司变得精干和强壮，这种特性对它们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很有帮助。在20世纪90年代，欧洲和日本的公司还没有为面对如此可怕的竞争者作好准备，因此，美国的公司获得了更多的世界市场的份额。

解除管制的反对者常常指出，像瑞典和加拿大这样的国家比美国管制得还要多，然而，那里的家庭收入却与美国差不多，并且人民看起来同样快乐。因此，他们争论道，政府管制一定不会阻止经济的增长。"布赫霍尔兹的评论"回答了这一观点，指出像美国这种相对放松管制的经济政策比其他国家产生了更多适销对路的创新。产生的效果是，即使是高度管制的国家也因超强竞争的美国市场而受益。例如，互联网很大程度上是在美国发展起来的，但全世界的消费者都可以登录。远在中国西藏的学生也可以使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克拉拉市的英特尔公司开发的先进的微处理器。如果美国的公司受到严格管制的话，那可能就不会有互

联网和超级微处理器了。因此，对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简单的比较，往往会忽视它的外溢效应，也就是说，通常发源于最自由的经济体的观念和技术会超越国境惠及全世界。

波普艺术的开创者安迪·沃霍尔说过，在未来，每个人的成名只会持续15分钟。然而，亚当·斯密已经声名显赫了两个多世纪。我们为何对他念念不忘？在西方文明最具革命性的年代，当社会反抗的骚乱、知识巨变和爆炸式的经济增长让弱势群体倍感困惑时，亚当·斯密为世界理出了头绪。他没有发明市场，也没有发明经济学，但他却给世界上了一堂市场和经济学的课。在接近75年的时间里，《国富论》提供了经济学家所知道的大部分知识。

在《国富论》问世之后的200年，亚当·斯密的思想重新流行，并且备受赞扬。但亚当·斯密在《国富论》出版后发生了什么变化？从那以后，他过上了幸福快乐的日子。确实如此，也不无讽刺。“确实如此”是因为他与他那个时代的大多数著名的人物都有交往，他的书被翻译成各种欧洲语言，在英国和欧洲大陆赢得了荣誉，当他讲话时，政府官员会一丝不苟地记笔记。“不无讽刺”是因为在1790年去世前，他作为英国国王的海关专员为政府工作了13年。他手下留情，因此帮助自己的国家增加了财富。

第三章 马尔萨斯：一个悲观的人口预言

退回到很久以前的1908年，在美国棒球国家联盟锦标赛中，芝加哥小熊队在一场决定性的比赛中要与纽约巨人队交手。在第9局的下半时扣人心弦的比赛期间，巨人队年轻且很有实力的替补一垒手由于疏忽大意没有踩触二垒而被淘汰出局，巨人队及时提出抗议，比赛被安排重新进行。然而，小熊队仍然赢得了随后的这场一决胜负的比赛，获得了国家联盟锦标赛的冠军。

这个年轻人的名字是弗雷德·默克尔，但从那时直到他死去，“蠢蛋”默克尔这个称呼一直伴随着他，令他感到苦恼。尽管自那以后他付出巨大的努力，但再也没有摆脱掉这个诨名。

几乎现在的每一个人都知道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式失言和性的象征。任何一个受到教育的人若否认了解弗洛伊德，那他一定是在压抑自己。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从来没有打过棒球，也从没有找精神分析师看过病。然而，他的名字一如弗洛伊德那样著名，他的臭名却跟蠢蛋默克尔一样，并不是那么罪有应得。诗人拜伦可能要比马尔萨斯更需要一位精神分析师，拜伦为马尔萨斯作诗，而孩子们却唱着押韵诗嘲笑马尔萨斯。在马尔萨斯去世几十年后，马克思狠狠地抨击他。在他去世一个世纪后，凯恩斯赞美马尔萨斯，并且预言在他去世200周年纪念日时，“我们将怀着丝毫未减的尊重纪念他”。但丝毫未减是跟什么相比呢？

马尔萨斯犯下了什么卑鄙的罪行以至于让柯勒律治这样的浪漫诗人都发出了悲叹：“看看这个强有力的国家，它的统治者和聪明的人民竟然听信马尔萨斯的话！悲哀啊。”

1798年，马尔萨斯把怀着乌托邦信仰期待着19世纪的人从浪漫的美梦中惊醒了。他受到了报纸的“审判”，因为预言人口过剩不会带来一个欢天喜地的未来，而预言一个社会分裂和衰落的未来会被认定有罪。在新世纪的前夜，马尔萨斯成为最终那个“令人扫兴的人”。或者说，至少

是他的理论令人扫兴。

1766年2月13日，马尔萨斯生于其古怪的父亲丹尼尔在鲁克里的乡间别墅。在只有3周大的时候，马尔萨斯就见过他的两个“教父”：大卫·休谟和让雅克·卢梭，他们是丹尼尔·马尔萨斯所崇拜的人。这个叫作罗伯特的孩子在早年就聪颖过人，很快他就接受了家庭教师的教育。长大后，他个子很高而且很帅气，在1784年进入剑桥大学的耶稣学院学习，在学习如何做一个神职人员的同时，他还阅读数学和哲学。就像亚当·斯密一样，马尔萨斯被牛顿所吸引，并且认真阅读了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虽然对学术研究有着浓厚的兴趣，并且渴望做一个牧师，马尔萨斯还是一个普通而聪明的剑桥学生，装腔作势，随时随地说着嘲弄的、喜剧般风趣的话。马尔萨斯戴着的金色假发是一种卷曲的长发，一直垂到他的脖子，而其他人大多戴着辫子式的假发。他可能还是一个领风气之先的人，因为10年以后，几乎所有的大学生都戴上了长卷发。更让人吃惊的是，在大多数学生给他们的假发扑白粉时，马尔萨斯有时会使用粉红色。或许他是先于时代的一个朋克。

在1788年毕业之前，耶稣学院的院长提醒马尔萨斯，因为唇腭裂造成的言语缺陷可能会影响到他在基督教教会中的升迁机会。尽管他在剑桥大学的希腊语、拉丁语和英语演讲中获得了奖项。马尔萨斯没有理会这一劝告，不管怎样都要做牧师，在奥克伍德的一间教堂进行了短时间的实习之后，在1793年他作为一个研究生又重返耶稣学院。虽然他从此再也没有履行全职神职人员的义务，经济学家仍然把他称作“牧师马尔萨斯”，或许是因为清教徒悲观主义的形象要比快乐又幽默的俗人形象更能匹配他的人口理论。不妨回想一下亨利·路易斯·门肯对清教徒的定义：他们是惧怕某个地方的某个人有时会过上开心日子的人。如果我们把他勾画成一个清教徒，那么，不接受马尔萨斯及其警示，或许会让我们从心理上感到更舒服。

从乌托邦的美梦中惊醒

当马尔萨斯返回到耶稣学院的时候，革命浪潮已经袭来，波涛汹涌。1793年，革命者把路易十六送上了断头台，法兰西共和国也向英国宣战。一些作家和鼓吹者无视这一悲惨的时代，仍然宣称革命的大潮最终会带来自伊甸园以来人类所能拥有的最宁静、最富有的田园风光时代。卢梭先前为乌托邦写过美文，主张人生本应快乐和自由，不过是被社会腐蚀了。伏尔泰讥讽道，当读卢梭的书时，他的超自然主义唤起了人们对四肢爬行的向往。但是，马尔萨斯反对乌托邦的愿景，并且特别反对牧师和小册子作家威廉·戈德温。1793年，戈德温出版了《政治正义和它对一般美德和福祉的影响之研究》，通常简称《政治正义论》。戈德温十分简单地相信，“人类是可臻完美的，或者换句话说，是能够不断改善的”。他的女儿玛丽·雪莱可能不会同意，她是小说《弗兰肯斯坦》的作者。因为“真理是无所不能的”，人类可以改变自己，以便与快乐的生活更匹配，并与邻居更加和睦地相处，“每一个人都怀着友善的热诚在为所有人谋求福祉”。[1]追随卢梭“公民社会的历史就是人类弊病的历史”这一主张，戈德温设想着，当人类达到至善时会废除政府、法院，消除犯罪、战争、忧郁和痛苦，甚至死亡和睡眠都可以消失了，“一代不如一代……在死亡被消除之前，我们必须消除睡眠，它是死亡的镜像。睡眠是身躯最明显的弱点之一。它是……身体机能的一个没有规律和紊乱的状态”。[2]类似糖果在跳舞的幻想在法国哲学家和数学家马奎斯·孔多塞的脑海中也产生过，他的著作《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于1794年出版。孔多塞对于成为一个躲避罗伯斯庇尔追捕的逃犯表现出了惊人的乐观主义，但不久即遭逮捕并被杀害。

让马尔萨斯最感到讨厌的是，戈德温和领班神甫威廉·帕莱主张增加人口是一个好现象，因为它意味着快乐总量的增加。帕莱宣称人口的衰减是一个国家所要遭受的最大不幸。在18世纪末，有一些学者掌握了少量不足采信的数据，据此估计在过去100年里，人口的增长已经变得非常缓慢，而其他人甚至同意人口已经急剧下降了。由于一个强大的劳动大军会支撑经济的增长，总理皮特提交了一个向有孩子的夫妇发放济贫款的法案，这便是当今“对有子女负担家庭的补助计划”的前身。

不出所料，丹尼尔·马尔萨斯对戈德温-帕莱-波斯蒂默斯-卢梭的联合

阵线充满喜悦地点头赞同。但父亲点头，儿子却摇头。他们在树林中交谈和散步，两个人都试图说服对方相信一个理性的结论。最终，罗伯特被这位爱流眼泪而视野模糊的、不切实际的反对者弄得灰心沮丧，盛怒之下他迅速地完成了《人口原理》，书的全名为《论影响社会进一步改进的人口原理，兼评戈德温、孔多塞和其他作家的推测》。直到这时，父亲对儿子的卓越才智也是两眼昏花，竟然安排将它匿名出版。

惊世骇俗的人口增长预言

几乎没有什么文章会让人更震惊的了。设想地球以飞快的速度在萎缩：每隔25年地球就会被分成两半，一半仍在原来的轨道上运行，另一半旋转着奔向太阳，一路上燃烧着和爆炸着。人们必须带着他们的孩子、祖父母和他们能够带走的任何神圣财产，争先恐后地、踩踏着奔向仅存的那一半地球。更糟糕的是，他们不知道哪一半地球可以逃过一劫。马尔萨斯的预言略微不同，但几乎也是这么可怕。与地球被劈成两半和其中一半燃烧着不同，马尔萨斯描述的是人口以爆炸般的速度在膨胀和蔓延，而食物的供给却如蜗牛爬行般缓慢。利用本杰明·富兰克林提供的美国数据，马尔萨斯断言人口数量趋向于每25年翻一番。当然，增速可能还要更快。事实上，马尔萨斯选择了相对保守的数字。富兰克林报告说，在某些村庄只用15年人口就能翻一番。虽然没有从富兰克林那里得到食物供给的可靠数据作为支持，马尔萨斯还是得出了结论：食物的产出从来跟不上人口增长的步伐。马尔萨斯假定，未经核对的人口数量是按几何级数增长，而食物仅仅是以算术级数在增长。

这些级数意味着什么呢？几何级数（或指数级数）表示一个数字不断地被一个常数所乘，例如持续的双倍。算术级数只是一个数字加上一个常数。马尔萨斯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如果现在的人口是10亿，人的数量会按照1、2、4、8、16、32、64、128、256这样的数列增长，而食物则按照1、2、3、4、5、6、7、8、9这样的数列增加。假如起初每个人有一篮子食物，200年以后，256个人只能一起分享9篮子食物。自那开始再过100年以后，4096个人不得不分享13篮子食物。

几何级数非常可观，令人惊讶，而且会产生误解。举几个例子可以说明问题。如果斯科特想借丹尼斯的电视观看1月21日举行的超级杯美式橄榄球比赛，并且许诺在1月1日那天付给他1美分，自此以后直到比赛开始每天付给他的钱会加倍，斯科特必须非常有钱，或者丹尼斯傻到会接受“大富翁”的游戏币。到比赛开球之时，斯科特欠丹尼斯的钱会达到10485.76美元。银行的复利也可以用来说明几何级数。[3]回想一下荷兰人花24美元从印第安人手里买下曼哈顿岛的故事吧。如果印第安人把这笔钱存放到一个复利账户中，他们的后代现在能够支付得起回购该岛的费用，并且包括帝国大厦、林肯中心以及自从17世纪以来在曼哈顿修

建的所有“地面建筑”。

正如我们在下面的案例中所看到的那样，复利也能被曲解。1981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个人退休金账户许可令的提案，实质上是允许人们每年在一只基金中存入接近2000美元，直到退休，而这笔钱是免税的。广告立即出现在了报纸上，讲述只要每年储蓄2000美元，一个25岁的人在退休时会很容易地获得100多万美元的退休金。图表显示，在神奇复利的助推下，美钞堆积如山。但是，这则广告下面一些非常小的印刷字讲述的才是真实的故事。银行假定在以后的40年里利率为12%，但并没有告诉读者，如果12%的年利率保持40年的话，那么通货膨胀也会同样肆虐40年，抵消掉你的大部分收入。设想节俭的雅皮士40年来埋头自己的书桌，与外面的世界很少接触。在2021年，他终于退休了。他颤抖的手里抓着已经泛黄的1981年的广告，拨通了银行的电话，让他们安排一辆武装押运的运钞车以便载运他的财产。银行职员解释说他有近1000万美元外加一台和面机在等着这个雅皮士。这个雅皮士喜极而泣，他可以靠他的和面机来养活自己了。他听到咔嗒一声，话务员插话进来：“过一会儿，请存款40万美元。”

对于马尔萨斯或者其他人来说，《人口原理》的结论不算是十分新鲜的内容，因为富兰克林和詹姆斯·斯图尔特爵士以前都发表过这种预言性的文章。马尔萨斯本人两年以前也在一篇文章中提出过他的担忧，只因找不到出版商而没有发表：“我不同意阿奇迪肯·帕莱所说的在任何国家人口数量都是衡量幸福感的最好尺度……的确人口可能是过去幸福的唯一标志。”尽管不是最早发表此类观点，但依靠精辟的语句和惊人的想象，马尔萨斯的论文展现出了全新的说服技巧。马尔萨斯捕捉到了这一理论，并且用它引起了英国人的注意。

如果地球减半再减半，我们会看到狂乱的人群在东奔西跑。但当吃饭的嘴多于吃饭的汤匙时，究竟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在几何级数的增长一路飙升超出曲线图的边界之前，有两种类型的抑制可以阻断它的发展：“积极的”抑制和“预防性的”抑制。采用“积极的抑制”这个词，很清楚地表明马尔萨斯并不是在表达乐观的概念，因为他所指的这种抑制是提高死亡率。能够“挽救”我们脱离这种几何级数增长的积极力量是什么？是战争、饥荒和瘟疫。黑死病潜伏在每一个小街小巷准备拯救我们，婴儿死亡率则把我们从人口过剩中解放出来，而饥荒总是在我们的身边出没：

> 饥荒似乎是大自然最后，也是最可怕的应对之策。人口的力量要远远大于土地为人类生产生活必需品的能力，因而，死亡必然会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造访人类。人类的恶行成为减少人口的积极且能干的执行者，它们是破坏大军的先锋，而且往往是自行完成这种可怕的使命。如果人类的恶行在这场消灭人口的战争中失败了，疾病流行的季节、流行病、恶性传染病和瘟疫就会排出骇人的队形向前推进，夺走千万人的生命。如果它们还是不能完全取胜，大范围的、无法避免的饥荒就会从背后悄然而至，以强有力的一击，将世界人口和食物的差距抹平。[4]

预防性抑制就是降低出生率，这种方法看起来不是那么剧烈，但可能性也很小。马尔萨斯认为，要是人们控制住他们的情欲并且推迟结婚的话，他们可能会过上更好的日子。毕竟，生育孩子降低了家庭的生活水平。但是，马尔萨斯看不到这有多少希望，因为他这是在缘木求鱼。那些读过他论文的中产阶层和上流社会将会拥护他的观点。但是，他有什么机会去说服总是多子多孙而且生育能力很强的下层社会，让他们克制住不结婚或不生育呢？特别是当《济贫法》鼓励夫妇们生育子女时就更难以克制。马尔萨斯描绘了一个反复发生的周期，在这个循环中，如果人口增长被残酷的自然抑制所控制，工资会保持在勉强维持温饱的水平上。如果工资提升到更高的水平，工人们将会生育更多的孩子，导致食物短缺，并带来生活水平不可避免的下降。

在一个精彩而又含蓄的陈述中，马尔萨斯承认他的设想具有一种“忧郁的色调”。（能把黑色称作一种色调吗？）后来，马尔萨斯感到痛心，“唉！要阻止悲剧一再重演，实在是超出了人的能力范围”。尽管如此，他还是设法保持着笑容和传教士的幽默。生命是“一种神赐，它与未来的状态无关……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世间的罪恶不会超过其绝对必要的限度”。[5]是上帝而不是马尔萨斯提出了“马尔萨斯陷阱”，希望人类能够表现出他们的同情心和美德。

这本匿名出版的小册子——《人口原理》的力量让帕莱和戈德温的派系遭了殃，给他们的绝大部分信徒以毁灭性的打击，并且让这些信徒背离他们的理论，就像是一场知识饥荒在攻击乌托邦一样。帕莱转变了立场，并且开始追随那些和他背道而驰的人。戈德温则进行了反击，但是在马尔萨斯看来，戈德温只是暂时停止了他的乌托邦幻想，并且提出“道德约束能够预先阻止灾祸的发生”。然而，对于马尔萨斯来说，关

键的胜利是说服了总理皮特。虽然在1796年皮特在英国议会以富有雄辩力的口才鼓吹要救济穷人，然而在短短4年以后，他就采纳了马尔萨斯的观点，并且不再支持一项新议案的提出。皮特转而认为，扶贫只会鼓励穷人生孩子，如此一来，济贫只会导致“积极抑制”手段涂炭生灵的日子离我们更近一步。通过增加对就业的刺激和减少对食物供给的索求，可以将扶贫款从公共总支出账户中取消，但它实在是一种“缓兵之计”。

人们不可以把马尔萨斯诋毁为一个铁石心肠、憎恨穷人的人。《人口原理》中到处充满了“当积极的抑制肆虐之时，穷人受苦最深”这样富于同情的陈述。正如凯恩斯后来所强调的那样，对真理的热爱和独具慧眼的公益之心驱使着马尔萨斯得出他的结论。但是，皮特要食言了，他的咽喉肌肉必须足够发达才能吞咽下自1796年以来他说过的那些话：“让我们对（子孙众多）这样一件正确而光荣的事情伸出援手吧……这会给一个大家庭带来恩惠而不是诅咒；我们可以恰当地区分两种人，一种人只是自己劳动挣得自己吃喝，另外一种人则是人丁兴旺，进而给国家带来富足，然后他们就可以要求国家帮助养活他们。”6

即使获得了皮特的支持，马尔萨斯仍然对未来持有怀疑态度。美女和葡萄酒会不可抗拒地激起男人们的性欲。但如一些传道者清楚意识到的那样，如果听众“肾虚”的话，话语常常也无能为力。

当整个国家都在宣扬马尔萨斯的警告之时，他反而开始对自己所用的冷漠的科学方法感到担忧。毕竟，他那令人震惊的普遍结论建立在从原殖民地那里得到的支离破碎的信息基础上。另外，他对自己书中几近宿命论的悲观主义感到不安。对《人口原理》加以修订似乎是合适的。马尔萨斯开始进行彻底的研究，他游历瑞典、挪威、芬兰、俄国，甚至旅行到了在1802年与英国和平相处的法国和瑞士。他研究民事记录和法律，学习奥地利和巴伐利亚仍然实行的17世纪和18世纪禁止乞丐结婚的法令。1801年，英国发表了它第一次全面的人口普查统计数字，这让马尔萨斯大吃一惊，不过对他的论点反倒是一种强化。根据研究，在18世纪晚期，人口显著地增长，而多数人以前相信的是人口增长是非常缓慢的。比那时再早大约100年，即1696年，统计学先驱格雷戈里·金做出了一个错误的预计，他认为在600年内人口总量不会翻一番。

1803年，马尔萨斯向世人呈献了新版的《人口原理》，并用了全新的书名《论人口原理，或人口原理过去和现在对于人类幸福之影响的观察，以及我们期望关于将来消除和缓和由人口原理所产生之弊端的研

究》。戈德温和孔多塞的观点不再大行其道，对于乌托邦预言的探讨也日渐式微。书中所有内容的论述都更加充分，即使不是几何级数的扩充，至少也是在长度、深度和分量方面进行了增容。马尔萨斯利用不计其数的逸闻趣事和事例对理论要点进行了阐述，这些事例来自非洲、西伯利亚、土耳其、波斯和中国，美国的例子被再次引用，此次又包含了美国印第安人的事例。再也没有人攻击他的书没有实际经验的依据了。在语气上，第2版听起来稍微不那么极端了，因为劳动阶层可能会改变他们的习惯，并且在增加生育之前表现出“道德的约束”，所以带来了希望。当然，转变态度需要耗费时间。这样更为温和的语气也影响到了对《济贫法》的讨论。马尔萨斯不希望立即让他们的生活变得艰难，而是建议让“他们逐渐地，并且是非常缓慢地逐渐取消”济贫的做法，不至于让现在活着的人或两年之内出生的人受到伤害（最初的重点）。[7]而且只是取消对四肢健全人的救济。为了增加粮食的供给，马尔萨斯也强烈要求限制粮食的进出口。限制粮食的进出口会提升英国的粮食价格，从而刺激国内的粮食生产。虽然一般来说，马尔萨斯是一个主张自由贸易的人，但他建议粮食可以例外。我们将在讨论大卫·李嘉图时再考察他的贸易主张。

针对新版本的《人口原理》，有名望的作家和政治家再次认可了马尔萨斯基本原理的力量。一流报刊的评论现在开始称赞马尔萨斯的勇敢，或者称赞他的洞察力和勤奋（他的名字现在印到了原先匿名出版的作品上）。不到两年，《月刊》杂志就宣称他在准备推出第3版，并在1806年面市，紧接着第二年又出版了第4版。当然，争议随着每次版本的更新而爆发。对他的学说怀有敌意的学术对手比第1版时更加居心叵测和庸俗地对第2版进行断章取义，因为他们现在有了攻击的靶子（不再是个匿名作者）。诗人罗伯特·骚塞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道：“马尔萨斯是《英国批评家》喜欢抨击的对象，这跟其他每月一次的污物排放口对他的偏爱是一样的。在对这个有危害性的傻瓜进行的定期抨击中，我很高兴能够助一臂之力……我们会用几个晚上完全驳倒他。”[8]几乎不是14行诗，骚塞在无韵诗中使用的恶毒的语言甚至超过了柯勒律治，柯勒律治抨击马尔萨斯的动机起源于耶稣学院，当时马尔萨斯投票赞成驱逐他，因为他未经同意擅自离开学校去参军。虽然有这些尖刻的话，马尔萨斯还是为自己成为一个经济学家赚得了好评，不久他就成为这一专业领域的领导者。詹姆斯·穆勒、大卫·李嘉图以及后来的约翰·穆勒和阿尔弗雷德·马歇尔都接受《人口原理》，尽管有时在他们自己的著作中会忽视《人口原理》所蕴涵的意义。

《人口原理》第2版面市之后不久，马尔萨斯将道德约束丢到了一边，在他38岁这一年娶了哈丽雅特·埃克瑟尔。因为结婚违反了耶稣学院院士必须独身的规定，于是马尔萨斯辞职，并于1805年在黑利伯瑞学院获得了一个职位，这是一家东印度公司的培训学校，而东印度公司又为英国政府管理着印度。因为被称作“通史、政治学、商学和财政学教授”，马尔萨斯成为英国历史上第一位政治经济学教授。尽管他有圣职的职衔，但我们完全可以把马尔萨斯看作第一位职业的经济学家。（顺便说一下，亚当·斯密的信徒把东印度公司视作有害的垄断机构而加以抨击，他们却认为英国作为新成员加入印度的商业之中是对当地人的一种剥削，而功利主义者杰里米·边沁的追随者则为这个公司进行辩护。）

在黑利伯瑞学院，马尔萨斯再次显示出一个能够对凄惨的瘟疫和饥荒加以描述的人也很喜欢开心的生活。一个朋友描述了他的精神状态，称他平时爱开玩笑，他随时准备参加到所有年轻人天真的消遣和娱乐之中，并且鼓励他们学习和研究。在3年之内，马尔萨斯有了自己的3个孩子，可以跟他一起玩耍。批评者爱拿他的子女多这件事奚落他，虽然马尔萨斯一家只有3个孩子，不知怎么回事，人人文库在1958年和1967年版的《人口原理》又另外表明他有8个孩子，而且全是女孩！

被历史抛弃的预言家

马尔萨斯培育了几千个信徒，其中许多人是在20世纪60、70年代涌现的，他们在为马尔萨斯的预言与当代的相关性进行辩护。在对近代的文献进行检查之前，让我们用“事后诸葛亮”的方式来评测一下马尔萨斯的预言准不准。显而易见，预测得很差劲。人口没有继续按几何级数来扩大，粮食供给也没有慢如蜗牛般增加。悲惨的境遇可能拜访过穷人，但却不是出于马尔萨斯所说的原因。相反，在马尔萨斯所关注的英国和欧洲，人们吃得更好，寿命更长，并且在生育问题上表现得比马尔萨斯曾经期待的更有“约束力”。

马尔萨斯并未觉察到某些重要的历史发展趋势，也没有注意到某些明显的统计数字的波动。在细节方面，马尔萨斯忘记了询问本杰明·富兰克林，是否对上升的人口数字按移民和本土出生的美国人进行了区分。换句话说，由于将两种数据混在一起，马尔萨斯实际上假定，遥远村庄里的一个英国血统的母亲正在生育乘船抵达纽约的荷兰孩子。因为看到了正在上升的数字，他便声称英国母亲的生育能力特别强，这真是一个没有分娩之痛的生殖系统，尽管它是一个有缺陷的统计方法。更为关键的是，马尔萨斯没有意识到医学的发展、农业革命以及一场工业革命的开始，所有这一切都会让他的推测像太妃糖一样扭曲成异常的几何形状，而不是呈稳定的几何级数的增长趋势。

当丹尼尔·马尔萨斯与让雅克·卢梭在林中散步，并且对人类的完美加以深思时，18世纪的农民正在完善能够增加产出的有效方法。在18世纪初，欧洲的农业生产率不比17世纪的生产率更高。但是，1700～1800年，英国的粮食产量翻了一番。尽管受到革命和战争的影响，从马尔萨斯出生到《人口原理》第1版问世之间，法国的粮食产量以大约25%的速度增长。这种跳跃式的发展应归功于几项创新，包括轮作制、选种、改进的工具，以及用马代替牛耕作，从而减少了近一半的耕地时间。截至1750年，快速的进步使得英国不但养活了它的国民，而且还额外出口了13%的谷物和面粉。如果一个国家农业发达，就会有更多的国民能够在城市或者非农业领域找到活干。若在1690年有75%的英国人从事农业，到了1840年就只剩下了25%的人待在农村了。[9]在当今的美国，只需要一小部分的人口从事农业，养活所有的美国人，并且向国外出口几

百万吨的粮食。增加的粮食非但没有限制人口的增长，反而让父母能够抚养更多的小孩。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拥有一个较高的生活水平，但却没有导致马尔萨斯《人口原理》所说的生育数量的螺旋式大幅度上升。当观察人口统计数据时，马尔萨斯没有想到，人口的增加也可能来自于死亡率的下降。从1740年以来，由于农业革命使得饮食条件的改进成为可能，再加上良好的医疗保健服务，其结果便是欧洲人的死亡率得以下降。18世纪以前，医生没有救活的人可能要比救活的人还要多；由巫医在一个人偶上进行的巫术可能比拿着手术刀榨取他人钱财的医生所做的外科手术更加有效。在18世纪，人在出生时的预期寿命大约为30岁，到了1850年上升至40岁，到了1900年上升至50岁，而现在已经远远超过了70岁。[10]因为农业革命，农业收成不再大起大落，除了19世纪40年代的爱尔兰出现大饥荒之外，饥荒从西欧也消失了。英国最后一次闹饥荒是在《人口原理》出版之前近一个世纪的时候。

但是，为什么人口数量没有不断地飙升？经济学家指出“人口变迁”有4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前工业化社会，高死亡率抵消了高出生率，确保了人口的稳定。第二个阶段是工业发展的前期，良好的健康状况降低了死亡率，因此，出生率显得过高，人口数量急剧上升。因为马尔萨斯是从这一时代收集的数据，他不能够也不可能看到未来会发生什么。在第三个阶段，城市化和教育促使很多人养育较少的孩子。如此，死亡率继续下降，而出生率也同样降低，这使得人口曲线扁平化。第四个阶段，在一个发展成熟的社会，因为成功的生育控制，再加上夫妻二人常常都要工作，一对配偶似乎只想养育1～3个孩子，因此人口总量得到了稳定。卡尔·马克思曾经说过：每当历史的火车转弯之时，所有的知识分子都会摔出车外。马尔萨斯没有预见到第三个阶段和第四个阶段。当人口数字从他绘制的图表中跌落时，马尔萨斯也从历史的火车上摔出去了。

我们能够责备马尔萨斯吗？毕竟，很少有不争的事实为他所用。确实，他所反驳的主张过于高深莫测和想入非非了，以至于他要付出艰辛的努力进行详细的比较。如果我们应用他之后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陈述的评判标准，他也有过失：“目前，在政治经济学家之间普遍存在的错误和差异的首要原因，对我来说，在于他们急于尝试以简单化处理得出普遍性的结论……而不是通过参考广泛的和综合的事例来充分验证他

们的理论。就算是用来解释如此复杂的一个主题，这些事例也足以佐证其真理和效用”。[11]考虑到他对农业革命的失察，对人口数字上升原因的分析太粗略，且过于简化和概括，以至于不可避免地得出了错误的结论。

马尔萨斯的失误给人最重要的教训在于：如果没有字体加粗、加下划线和字母大写的免责声明，又不会适当地谦虚，那就永远不要从过去的数据中进行推断。要是希腊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生活在当今世界，他可能会就一位杰出的研究人员因为莽撞的推断而受到上帝的惩罚而写一出悲剧。如果埃斯库罗斯想要一位现代的主角，他可能会找马尔萨斯的弟子，他们就像希腊神话中能预言吉凶的卡珊德拉一样，喜欢为末日的来临大声疾呼，但不同的是卡珊德拉总是正确的。

世界末日离我们还有多远？

在20世纪70年代，由于受到对污染、人口和能源价格上涨的忧虑所驱使，一些团体想方设法要规划世界的未来。令人伤心的真实情况再次被提及：假设目前的趋势不变，资源会逐步减少，工业会污染那些不会减少的自然资源；产出会猛跌，人口总量会快速超出食物的供应量。是谁说的这些大实话？最骇人听闻的研究之一是由一家欧洲学术团体罗马俱乐部编制而成，并且以一本畅销书《增长的极限》向世人进行了描述。[12]利用先进的计算机技术，罗马俱乐部对世界趋势进行了推断，并预言除非采取比马尔萨斯的主张还要严厉的措施，否则100年之内必有大的灾难。预防措施包括：立即停止经济增长、制止人口膨胀和循环利用资源。这个预言太让人感到震惊了，于是该俱乐部对它们重新进行了评价，不久便发布了一个让人较为开心的研究报告。一位经济学家描述该俱乐部为"大喊'狼来了'的计算机"。但是，最初的报告仍然引起了大众的注意。1973年，时任世界银行行长的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将"人口爆炸"比作核战争的威胁。1974年，罗伯特·海尔布罗纳出版了《人类未来之探究》，在书中他流露出"生活在当今世界中的人类绝对无可救药"这样的认识。在产业动态预测中，他得出的结论是资源赶不上产业需求的步伐。即使它们能够满足产业需求，我们也会在一个较为温暖的气候中把它们全部耗费掉。他建议说，也许过苦行僧式的生活应算是深谋远虑的。目前，多数人已经对此建议做出了反应，那就是电影巨头塞缪尔·戈德温的劝告："别把我算在内"。

1980年，应吉米·卡特总统早先的要求，美国国务院和环境质量委员会发布了《2000年全球报告》。不过与罗马俱乐部相比，这一报告更加乐观和合理，它宣称："如果目前的趋势继续保持下去，2000年的世界将比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更加拥挤、污染更加严重、生态更不平衡，而且更易受到破坏……除技术上的革命性进步之外，2000年时地球上大多数人的生活要比现在更加不安定……除非世界各国下决心行动起来，改变目前的发展趋势。"[13]《华盛顿邮报》表示赞成，它撰文称"报告的预测明显偏乐观"。

但是，多数经济学家对这些报告持怀疑态度。那些建立模型的人采用了与马尔萨斯用过的同样悲观和静态的假设。有人给这些模型贴上了

一个标签，称它为PIPO，即悲观进，悲观出。有一个关键的假设违反了经济学的一个核心原则，即价格会向经济主体发出何时贮存或何时节约的信号。回想前面对亚当·斯密的讨论和哈耶克讲述的锡的例子。如果锡的需求上升了，它的价格也会上升，人们会尝试着少用锡，企业家会受到激励去寻找锡的替代品，或者获得锡的额外供给。依据罗马俱乐部最初的报告，如果需求增长，除了世界会将锡耗尽之外，什么也不会发生。没错，对于某些产品来说，可能会有固定的供给量，没有替代品，并且需求的增加也不会引致价格的上涨。但这些情况确实是少数例外。1977年，诺贝尔奖获得者瓦西里·里昂惕夫就此问题为美国进行了研究，其出具的报告称："世界上已经探明的金属矿和化石燃料资源一般能够满足20世纪剩余几十年里的世界需求……足以支持世界经济获得相对高速的发展。但是……最大的可能是，这些资源会变得更加昂贵。"[14]

现在再回头去看，甚至可以说里昂惕夫太悲观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能源价格开始缓慢下滑，并且持续到20世纪末（1990年萨达姆·侯赛因的部队入侵科威特时一次短暂的价格暴涨除外）。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扣除物价因素之后，油价要低于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油价，这时离1973年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的石油禁运还有很长的时间。甚至是金价也在跌落，从20世纪70年代每盎司400美元下降到1998年的每盎司不足300美元。1980年，乐观的经济学家朱利安·西蒙对生物学家保罗·埃利希发起了挑战，后者撰写了《人口炸弹》和《富裕的终结》。西蒙问埃利希敢不敢打赌：任意选择一个商品，赌它在过一段时间之后，价格会下跌而不是上升（表明不是一个短期行为）。埃利希购买了价值1000美元的5种金属，到1990年，他们会核对这些金属的价格。如果它们的价格上涨了，西蒙要补偿埃利希的增加值。如果它们下跌了，埃利希要向西蒙支付其差额。果然，埃利希必须付款，因为即使世界经济增长了，世界人口也膨胀了，但资源价格却下降了。西蒙收到了一张576美元的支票。为什么西蒙会赢钱呢？首先，"石油恐慌"模型没有预料到企业家会从北海或墨西哥泵送大量的石油。其次，就像马尔萨斯那样，他们忽略了农业革命这个因素，农业革命显示了农民是如何投入更少而收获更多的。在20世纪50年代，通过解决了如何将抗倒伏的矮秆小麦和穗大的品种杂交，一位叫作诺曼·博洛格的植物遗传学家和病理学家帮助发起了"绿色革命"。他的研究成果使得五谷丰登，为在印度、墨西哥和非洲的几百万人提供了食物。再次，他们低估了为稀缺商品寻找替代品的激励。就在此刻，铝材、钢材和塑料公司正在精力充沛地为能够开发出新的汽车制造材料而展开角逐。在1967年，电影《毕业生》中的一个

中年演员给了年轻的达斯廷·霍夫曼一个热点投资的小道消息：塑料行业。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比《小鸡总动员》中“专业”的小鸡玛德开出来的多数“药方”更聪明的主意。石器时代结束，可不是因为我们再也发现不了更多的岩石。我们停止使用化石燃料，也不是因为我们已经用尽了最后一滴石油。

世界末日的模型是假定技术发展的速度不会超过资源需求的速度。虽然技术可能不是希腊戏剧中值得信赖的天外救星，或者是好莱坞西部片中的救命骑兵，但我们对科技也不能太过轻视。比如说，末日模型因为污染而谴责汽车，并且预示化石燃料如石油的耗竭。根据这些模型，石油和汽车尽管对现代社会至关重要，但它们是有破坏性的。但是它们在20世纪里取代了什么呢？它们替代了用于运输的马匹和作为能源的木材。在靠近美国纽约中央公园的地方，现在只有几十辆四轮马车还在运营。然而，却是气味刺鼻。不难想象，一个世纪以前，在由马匹主宰运输的城市中蔓延着恶臭与疾病！与石油相比，木材的再生能力可能会更强，但事实证明化石燃料更便宜。能源的转换是受价格驱使的，而不是受一个有不祥预感的模型所驱使。核心问题在于，对经济资源和技术进步进行长期预测需要的是天赋，而不是经济学的学位。

这是不是表示经济学家必须面带愚蠢的微笑，并且让看不见的手去处理欠发达国家的污染和饥饿问题呢？不是的。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更充分地讨论污染问题，但是现在的经济学家必须承认，污染问题常常代表了亚当·斯密简单模型的漏洞。可以把污染看作经营的成本，但是，如何区分烟雾污染与劳动力成本、机器成本或租金呢？公司要支付后3项成本，它们是公司运营的“内部”事务，但公司不会为污染付费。这是一个“外部”效应，它由社会来埋单，大众要付出呼吸污浊空气的代价。结果呢？制造商生产的商品大大超过了它应该生产的数量，因为生产成本要比它真实的成本低。为了得到理想的生产数量，除了承担正常的成本外，制造商还要被迫承担污染环境的成本。为达此目的，经济学家通常建议征收污染税。

马尔萨斯陷阱似乎更贴近于欠发达国家的情况，在这些国家，良好的公共医疗保健设施减少了死亡率，但它们的出生率依然居高不下。但是，尽管存在着悲观主义，在过去的20年里，由于教育宣传、节育补贴，以及伴随着经济发展自然实现的“人口变迁”，许多贫穷国家的人口出生率已经下降。在巴西，一些社会科学家将惊人的出生率下降归功于

从电视节目中展现出来的中产阶层的态度，这种出生率下降挫败了20世纪70年代的预言。另一方面，降低出生率的做法在有些社会是备受争议的。在中国，政府降低出生率的政策好像特别严厉，而在其他国家控制生育的政策是蔑视传统和违背宗教戒律的。尽管如此，在斯里兰卡、中国、印度尼西亚和印度的几个邦人口出生率还是获得了大幅的下降。新加坡观察到华裔的出生率骤然下降，且速度太快，以至于开始担心人口负增长的问题。在“两个孩子足矣”这个口号喊了20年之后，新加坡官方宣布：“三个孩子不嫌多，再多也行，只要你能养得起！”

同时，贫穷的国家正在提高它们的农业产量。中国和印度的人口超过世界人口的40%，以及贫困人口的大部分。然而，在最近的15年里，这两个国家都在农业上实现了接近自给自足的水平。1978年，中国开始调整其农业部门的结构，从中央计划的生产单位转变成权力下放的市场主体。随着最终允许浮动，价格成为中国农业生产的经济信号，产量也实现了大发展。

然而，从另一面看形势又很严峻。非洲国家发现，想成功地实现既放慢人口增速又增加产量实在很难。虽然婴儿的出生率相比20世纪50年代已经降低了，但因为预期寿命在显著地增加，因此总体的人口增长速度仍然较高。马尔萨斯的幽灵似乎不喜欢像埃塞俄比亚这样的国家，在这些国家，干旱和战争起到了积极抑制的作用。尽管如此，这些饱受蹂躏的国家仍然具有养活国民的潜力。经济学家指出了两个主要的问题。第一，因为收入偏低，贫穷的国家负担不起在新技术方面的积累和投资，而收入低是因为生产技术效率低下。因此，它们陷入一个恶性循环之中，这也正是外国援助试图要打破的困境。第二，也是更重要的一点，许多缺乏稳定政治基础的政府对城市消费者的安抚政策只能是保持食物低价。但是，人为地压低价格使得农民减少投资，进而又限制了更多的产出。造成的结果是，消费者看到较低价格的标签时很高兴，但看到货架上空空如也又感到很难过。

在过去的10年间，许多学者重新审视了人口增长是否伤害了第三世界国家这一基本问题，得出的结论是：对于某些国家，特别是那些拥有大量宜耕土地的国家，人口的快速增长未必具有破坏性。人口密集会降低向消费者运输商品的成本，并且刺激国内的商品需求。世界银行认为，在保持生活水平不下降的情况下，多数发展中国家能够支撑接近2%的人口增长。[15]非洲国家的人口年均增长3%，而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

的人口年均增长2%。当然，我们还是有理由充满希望。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希望是建立在政府能否制定促进生产的经济政策，如鼓励成人开展贸易，促进儿童的教育。

自从本书在1989年发行第1版以来，一些非洲国家事实上已经将僵化而又执迷不悟的政策抛在了一边，正是这些政策造成它们的国民不断忍饥挨饿。埃塞俄比亚曾经是宣传海报上用来代表干旱和农业绝产形象的国家，最近几年已经在经济政策上发生了惊人的改变，在20世纪90年代实现了粮食产量翻一番。独裁者门格斯图强迫农民加入合作社，之后再付给他们较低的价格进行收购，自1991年以来，他的继任者向农民承诺按市场行情定价，鼓励他们生产更多的谷物并更好地改善、看护好他们的田地。[16]幸运的是，埃塞俄比亚并非一枝独秀，因为加纳和乌干达也开始向饥饿宣战，而不是向农民宣战。唉，津巴布韦的罗伯特·穆加贝却没有加入到这一行列。

移民带来的是威胁还是机遇？

马尔萨斯警示人们整个地球会变得相当拥挤，而现代的抗议者却担心自己的国家会因为过多的移民而造成人口过剩。在法国和德国，新的政党许诺要撵走外国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敞开国门，接纳了700万名外国人，其中许多是土耳其和阿拉伯的外籍务工人员。但在之后的岁月里，他们很少受到客人的待遇，而是更多地被当作讨厌的不速之客。甚至在澳大利亚，盎格鲁裔澳大利亚人也在抗议亚洲人的涌入。要知道，这个国家曾经是英国犯人的移民之地！

在美国这个由移民组成的国家，我们有时会听到人们在指责新移民，特别是在经济增长较慢的期间，失业率上升时更是如此。很少有“本土主义者”（不要与美洲原住民相混淆）担心如马尔萨斯所言，新移民会把他们的食物吃光。相反的是，他们声称由于抢占了那些生于本国之人的工作岗位，移民降低了本土人的生活水平，同时，破坏了美国的“文化完整性”。当然，这些论调可不是新近才有。爱尔兰裔美国人曾经充满怨恨地讲述他们的祖父读过的招工广告，广告的主题句是“爱尔兰人不要申请”。正如1991年的电影《承诺》中一个角色宣称的那样：“爱尔兰人就是欧洲的黑人。所以，大声说出来：我骄傲，我是黑人！”然而，透过当今墨西哥移民的眼睛来看，爱尔兰裔美国人看起来就如同乘坐五月花号与迈尔斯·斯坦迪什一齐渡海而来。《爱尔兰人是如何变成白人的》这本书描写了备受嘲弄的爱尔兰人如何争取他们在美国的社会地位。[17]杰出的爱国赤子如爱尔兰后裔乔治·科汉的成就毫无疑问成为移民的奋斗目标。

但是，本土主义者认为“时代不同了”。首先，过去几十年里的移民并没有像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在欧洲避难者的移民大潮中到达美国的数百万人那样迅速地融入美国。为什么没有？移民潮前期来的人是从通晓多种语言的欧洲国家逃出来的，他们会说超过12种的不同语言。1915～1965年，在1100万名新移民中，欧洲人所占比例约为75%。相比之下，最近的外国移民中大约有50%来自拉丁美洲，多数来自墨西哥（只有约15%来自欧洲）。因为人多势力大，许多家庭得以在生活和工作中用西班牙语交流。西班牙语频道的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已经席卷了佛罗里达州和加利福尼亚州。拜现代技术所赐，外国新移民可以很容易地打

电话、发传真或收发电子邮件，甚至乘坐飞机回到远在家乡的亲戚身边。长途电话费迅速下降到每分钟10美分以下，使得即便是靠最低工资生活的工人也能够享受到给老家打电话的“奢侈”消费。与此相反，在1912年，将邮包从德国运到美国只能通过汉堡航运公司，这是一个女儿与远在家乡的母亲进行交流的唯一方式。“熔炉”这种隐喻的说法已经被束之高阁，取而代之的是“沙拉碗”，暗示每个同种文化的种族应当保持它的同一性，并且要抵制被同化。然而，来自同辈人的压力常常督促着外国移民的孩子学习英语，但是如果华裔的年轻人接受美国生活方式太快的话，很快便会被称为“香蕉”（外黄里白），含有取笑的意味。

经济学家对第二个问题给予了更多的关注。是否像爱尔兰人、德国人、意大利人、波兰人和犹太人最终实现的那样，外国移民的收入赶上了本土人的水平？还是他们落在后面，而且要依赖公众援助计划才得以生存？当多数经济学家非常同情地着手促进颁布宽松的外国移民条例时，最新的数据又给他们带来了烦恼。问题是这样的：经济增长如此依赖于技术发展，以至于技术不熟练的工人想跻身就业市场主流的希望渺茫。在19世纪80年代，艾萨克和约瑟夫·布雷丹可以从推着小车销售奶制品白手起家，最终建立起一家成功的企业。但是，这种小贩推车式的发家方式在当今已经不可能有机会了。没错，一些掌握技术的中国移民已经通过销售和设计计算机设备赚到了大钱，但这样的故事对于出生于墨西哥但生活在南加利福尼亚州的园丁来说，确实是难得一见。近年来的移民在起步时挣到钱的比例要比本土美国人低大约30%，之后他们的收入也没有提高很多。1980年以前移居美国的危地马拉人的工资比例要比20世纪90年代来的人少28%。当华人的平均收入追赶上本土美国人时，老挝人的收入仍然相对低22%。[18]而且，根据一些研究人员的数据，当技术不熟练的外国移民到达美国后，他们会将美国本土非技术工人的工资水平拉低2.5%～5%，对城市中黑人的冲击尤甚。

当然，数据是可以改变的（对美国的学校系统进行一次革命会有帮助）。即使如此，因为数据是加总而成的，它对于移民单个人的贡献情况鲜有反映。假如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留在德国并且被迫帮助第三帝国，情况会怎么样呢？确定无疑的是，他的天才抵得上所有德国移民。无论如何，自由女神像安放在纽约港并不具有经济上的象征意义。尽管偶尔会有强烈的反对移民潮的声浪，但美国欢迎蜂拥而至的外国民众，他们渴望呼吸自由的空气，并且他们的加入让所有美国人变得更加富裕。

还有一个原因让经济学家充满希望。也就是说，当数百万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在接下来的20多年里退休的时候，美国将需要更多的工人来供养这些领取养老金的人。对于劳动力的新成员来说，这将是一个新的机遇。我们会观察他们是否会充分利用它。

全球变暖的结果有多可怕？

大自然是变化无常的。我们现在身处其中进行航行、游泳和喷气式滑水的大海曾一度达到沸点，恐龙化石就埋葬在靠近美国蒙大拿州热带蕨类植物带下面。在一个真正的侏罗纪公园里，热带蕨类植物在靠近南极的地方留下了煤炭矿床。几百万年以后，维京人在一个满目绿色的格陵兰岛上打猎，英国人在英国中部地区茂盛的葡萄园中喝着英国出产的葡萄酒。之后，在文艺复兴时期，一个“小冰河期”接管了地球。严寒的冬天激发了佛兰德斯画家老彼得·勃鲁盖尔的灵感，他创作了一幅对未来有影响的作品《雪中猎人》，画中荷兰人在运河上正享受着滑冰的乐趣，这在今天是件难得的乐事。[19]卡特政府发表的《2000年全球报告》预测会发生环境灾难和能源价格的急剧上升，就在这个报告发表之前不久，美国国会召开了关于气候的听证会。特别是20世纪60、70年代，是一个以暴风雪为特征的严寒10年，一些社会学家警告说要出现一次新的冰河时期，因为20世纪40年代气温已经达到了顶峰。计算机模型提醒人们，地球可能会进入一个长期趋向全球变冷的轨道。毕竟，最近一次冰河时期的温度才比我们现在的温度低10华氏度。温度的一个小小变动可能会导致冰川从两极蔓延开来，就像几百万年前曾经发生的那样，几百英尺厚的淡蓝色冰层会覆盖纽约城。

几乎就在这些警告发出之后，气候马上再次转暖。在1990年前，全球科学家在美国聚集一堂，做出了这样的预测：地球正在非常迅速地变暖，在2100年前，气温将会上升大概9华氏度。不但更多的人会汗流浃背，而且全球变暖会引发可怕的洪灾，以及毁灭性的干旱，进而威胁到食物和水的供给。是什么造成了这些深重的苦难？依据瑞典科学家斯万特·阿累尼乌斯的研究，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进行了理论阐明：化石燃料产生了二氧化碳，从而形成了一个大气隔热层，它允许热辣辣的太阳光线穿透进来，但却不让热量散发出去。在100年的时间里，随着全球汽车数量的成倍增加，全球的二氧化碳水平也在成倍增加。北欧正在消融的冰川，已经让最近一次冰河时期的动物骨骼和化石重见天日。气温升高会使海平面升高，造成冰川和极地大陆冰盖的崩裂，还会加剧风暴。许多地方会变得更加潮湿，从而引发疟疾等热带疾病，并且摧毁全球的农业。[20]总而言之，这就是马尔萨斯所讲的人口增长破坏世界维

持人类生命的力量，是一个毫无希望的故事。

这真的会发生吗？也许是真的。持怀疑态度的人引用了大量否定世界末日预言的论据。例如，地球的温度在最近一个世纪里只是稍稍上升了大约1华氏度，而数据却很模糊（卫星的读数显示上升幅度较小）。一些科学家相信可能是太阳变得更加明亮了，足以解释气温的这一小幅上升。他们也争辩说，云的形成对于计算机来说仍然需要一个过于复杂的程序，以至于无法建立模型。另外，世界各地的冰川实际上是在扩展而不是消退。最后，怀疑者争论说，即使气候变化造成温度上升4.5华氏度（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中期预报），世界许多地方会因植物生长季节的延长和严冬时间的减少而受益。一群乐观的经济学家把他们的分析称作“李嘉图式”的模型，它是以我们下一章的主角命名的。[21]在李嘉图式的分析看来，农民会抓住全球变暖的机会改种适应温暖气候的农作物，比如，他们在麦田里改种棉花。种植葡萄的文化早已在英国的乡村生根发芽，而700年前在这里却根本看不到葡萄的影子。当然，那些气候已经相当炎热和潮湿的国家几乎没有什么新的选择。对堪萨斯州的农民有好处的事情，对季风袭来时在越南照看水稻田的人来说，可能就是非常糟糕的事情。单单全球变暖还不足以证明马尔萨斯观点的正确性。只有当人类必须要应对一个更温暖、更险恶的气候时，真正的考验才会到来。人类会一直向大气中排放二氧化碳，直到自己窒息或者植物灭绝吗？或者发现新的技术方法使得人类能够存活下去？我们的后代也许会揭晓这个答案。

若是马尔萨斯获知，在他去世150多年以后，世界仍然运转得不错，好到足以质疑他的论点，他会感到非常吃惊。

马尔萨斯在伦敦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30年，与杰出人物和接近大师级的人物亲密交往。用塞缪尔·约翰逊的话说，他“擅长在俱乐部里混”，而且也是“俱乐部之王”和“政治经济俱乐部”的成员。他已经准备撰写几本书和小册子，其中以《政治经济学原理》最为著名。更重要的是，就贸易政策和经济萧条问题，他与大卫·李嘉图展开了辩论，不过口气友好却富有说服力，我们将在下一章对此进行讨论。

甚至直到1834年去世，马尔萨斯都感到有必要否认“他是人类的敌人”这一说法。演讲者和作者仍然在对他进行描绘，最好的称他为“阴沉的牧师”，最差的说他是万圣节前夕的“妖怪”。然而，他认为对他吹毛求疵的人都戴上了快乐的面具，从而影响了他们的视野，使他们领会不到

隧道尽头的光明，其实是一辆火车正在向他们驶来。

第四章 大卫·李嘉图：最富裕的经济学奇才

大卫·李嘉图从没上过大学，但在钻研经济理论方面却比任何学者都出色。他从没正式研究过金融市场，却在股票市场上赚了几百万英镑。对于与他唱对台戏的知识分子来说，他那强有力的思维和实战知识是如此有优势，以至于他能够赢得激烈的辩论，之后，他便把对手的主张置之脑后，还说只有大学教授才会傻到相信对手们的那些观点。

有一个大学教授还真“傻”到与李嘉图的意见相左，他的名字就是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但是，批评家对马尔萨斯的诋毁是如此恶毒，以至于马尔萨斯真的很享受李嘉图对他那种深思熟虑的抨击。在雪莱和柯勒律治之后，李嘉图对马尔萨斯的抨击更像是一首小夜曲，至少大卫·李嘉图认同他的《人口原理》。

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的交往是从媒体论战开始的，当时，他们每人都发表了关于货币和贸易问题的评论文章来批评对方。1811年，马尔萨斯终于给李嘉图写了一封信，建议说：“因为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大致是站在同一个立场的，我们应该克制，没有必要在媒体上打一场旷日持久的笔墨官司……应该私下进行一次心平气和的讨论。”几乎在同一时间，李嘉图正在构思几乎相同内容的书信。几天之后，他们见面了，从此开始了两人长达一生的友谊。在1823年李嘉图去世之前，他写信给马尔萨斯，称尽管经历了无数次的辩论，“即使你完全同意我的话，我也不见得会更喜欢你”。只有三个人分享到了李嘉图的遗嘱，马尔萨斯是其中一人。后来，马尔萨斯说过“我从来没有如此深爱过我家人之外的任何人”。

马尔萨斯从来没有像亲近李嘉图那样，亲近“家庭成员”之外的人。李嘉图生于1772年，是一个犹太移民的儿子，而马尔萨斯却出生于一个传统的英国家庭，并且在圣公会做牧师。亚伯拉罕·李嘉图是12个被允许在伦敦从事股票经纪职业的“犹太经纪人”之一。正当马尔萨斯在剑桥大学接受精心的补习和学校教育的时候，14岁的李嘉图却要跟随父亲一起工作，并且开始学习复杂的金融体系以及工作所需的经营策略，而且学得很好。到25岁时，这个犹如财神附体的人已经建立了自己的事业，并且通过股票、债券和不动产投资积聚了财富。马尔萨斯唯一的一次投资获益还是李嘉图帮他赚的。有一件发生在拿破仑统治时期的事，可以体

现出他们两人形成鲜明对照的精明程度。李嘉图已经为自己和马尔萨斯购买了一些英国政府的股票，但在新法国的《宪法》宣布之后，马尔萨斯变得紧张起来，担心对这个法国领导人有利的形势变化会影响到股票收益。如此易受惊吓的心境表明马尔萨斯更适合玩教会的宾果游戏，而不是在股票市场玩“投资游戏”，他要求李嘉图卖出股票，“或许这么做是错的，或许会给你带来不便，但是无论发生什么……我总能觉察到你的好心，无意抱怨”。李嘉图出售了马尔萨斯的股票，但却把自己的股票持有了更长的时间，结果赚的钱几乎是马尔萨斯出售股票获得溢价的两倍。[1]

尽管李嘉图坐拥财富，但他直到27岁时才阅读了《国富论》，而且仅仅出于一次“偶然的机会”。在英国度假胜地巴思的一次无聊假期里，这位未来古典经济学的领袖人物随便翻了翻经济学开山鼻祖的最伟大著作。想当年，亚当·斯密也是在法国一次乏味的逗留期间开始写作《国富论》的。因为经济学似乎比其他任一学科拥有更多乏味的内容，所以，如果教授们偶尔以枯燥回报枯燥，或者用乏味来纪念一下经济学的创立，学生们也大可不必抱怨。

1809年，李嘉图作为一个经济学作家崭露头角，发表了许多报纸文章和小册子，就货币和通货膨胀问题进行疯狂评论。在政治经济学家和哲学家约翰·穆勒的父亲詹姆斯·穆勒的鼓动下，李嘉图踏进了伦敦知识分子的社交圈，之后他成为马尔萨斯政治经济俱乐部和俱乐部之王的成员。作为一个非常健谈的人和俱乐部的主人，李嘉图给小说家玛丽亚·埃奇沃思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她描述说曾经与李嘉图“有过一次愉快的谈话，深刻的问题和浅显的话题都有涉及，李嘉图先生态度非常沉静，思维活跃，连绵不绝，不断地启动新的辩论话题。在与人争论或者讨论一个问题时，我还从来没有碰到一个如此注重公正性，或者说很少是为了争强好胜，而更多地是为了真理辩论的人”。[2]

这位移民的儿子很快变成了典型的英国绅士，对工业革命知之甚多，而且在俱乐部里表现得巧妙机敏。在詹姆斯·穆勒的力促之下，李嘉图于1817年最终撰写了一篇论文《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对亚当·斯密和当代经济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评述。两年之后，再次受到穆勒的鼓励，李嘉图赢得了英国下议院的一个席位，他的大嗓门有了用武之地，他开始为政治自由和贸易自由大声疾呼。

比较优势理论——一人捕鱼，另一人盖房

我们不知道有多少议员真的理解李嘉图，特别是理解他关于贸易的观点。这并不是因为他的观点云遮雾绕，或者是他不善辞令，而是因为李嘉图试图用辩论来证明的也许是最复杂和最违反直觉的经济学原理。有一次，美国杰拉尔德·福特总统就财政预算赤字发表一次电视讲话，并且使用李嘉图的经济模型作为视觉辅助，所有的细节事前都进行了仔细的排演，为的是让他不会做出任何令人窘迫的手势。当代的总统没有人会尝试使用李嘉图的经济模型。不幸的是，这个令人费解的原理却是理解当代经济的关键。一位傲慢无礼的自然科学家曾经要求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为一个既不明显又不重要的经济规律命名，他马上就得到了答复：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遗憾的是，那时或者现在很少有政治家能够遵从这一分析。造成的结果是，配额、关税和贸易战玷污了世界经济的历史。

在考查这一原理之前，让我们先弄明白为什么李嘉图要费劲地解释它。根据亚当·斯密的观察，商人喜欢在扶轮社的聚会上大声谈论自由企业，然而，谋求私利却需要与政客们互通款曲，在美国国会大厦的政治家耳边窃窃私语才会有用。在李嘉图生活的那个时代，地主们在议会里交头接耳，并且晃动着他们的钞票，为的是寻求英法战争之后的贸易保护，以抵制谷物进口。在战争期间，谷物的价格水涨船高，部分原因就是谷物贸易禁令所造成的结果，而且，地主们对和平之日到来时谷物价格的突然跌落担惊受怕。在议会过道的另一端，坐着的是正在崛起的资本家，他们是工业革命产生的新兴企业家。因为资本家雇用劳动力，他们喜欢看到较低的食物价格，如此一来，他们就不必被迫支付较高的工资。在这场影响政策的角逐之中，地主们取得了胜利，1815年议会通过了一个法案，禁止低于某一价格进口谷物，实质上是给佃农授予了谷物市场的垄断权。英国的词典将“谷物”定义为如燕麦、黑麦、小麦和大麦这样的粮食。因此，该法案被称为《谷物法》。

李嘉图看到了英国的两个未来：第一是与世隔绝的岛国，贸易保护主义者的海岛为外国商品的进入设置了屏障。第二是外向型的贸易者，扮演了“世界作坊”的角色。何去何从至关重要。因为如果英国选择前者，自给自足的经济将很快变得虚弱不堪。我们首先了解为什么李嘉图

更喜欢开放政策，随后我们考查李嘉图定义的“停滞状态”这一棘手的问题。

回想一下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贸易模型。猜想他说了下面的话，既支持了他的理论，又侮辱了法国：“我们不喜欢他们。他们吃青蛙。我在图卢兹曾经有过一段乏味的日子。但如果他们能够酿出比我们便宜的葡萄酒，我们应当向他们敬酒，并且喝他们的葡萄酒。如果他们不能酿出更便宜的葡萄酒，那就让我们隔着英吉利海峡对着他们偷笑吧。”这是一个合乎逻辑的、本能式的正确表述。

为了理解李嘉图如何回应亚当·斯密，想象一部老电视连续剧《盖里甘的岛》。运气不好的、无可救药的、笨手笨脚的盖里甘随同能干的、自信的船长一起被冲到了海岸边。他们有两项任务要做：捕鱼和搭建蔽身之处。假设船长能用10个小时捕到一条鱼，并且用20个小时建造一个茅屋，盖里甘通常自己捉鱼，他要用15个小时捕到鱼，并且用45个小时建造一个简陋的小屋。按照亚当·斯密的逻辑，船长应当搬到离盖里甘尽可能远的地方自己建屋和捕鱼，因为他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比盖里甘做得好。但是，当李嘉图阐明船长应当与盖里甘分工协作时，经济学家不禁肃然起敬。

让我们首先计算一下，如果他们用一半的时间捕鱼，另一半的时间建茅屋，他们能够凭自己的力量获得多少条鱼和建造多少个小茅屋。假定在一年内，船长总共工作2000个小时，而他年轻的大副盖里甘被命令工作3600个小时。如果船长花费1000个小时用于捕鱼，他将获得100条鱼，而用1000个小时建造茅屋的话，他将建造出50个小屋。盖里甘用1800个小时捕鱼将得到120条鱼，而1800个小时用于建造茅舍将搭起40个小屋。因此，在该岛上两人合计有220条鱼食用，有90个小茅屋居住。

如果他们进行专业分工，情况又会怎样？如果船长将他的时间全部用在建茅屋上，他将建造100个小屋，如果盖里甘专注于捕鱼，他将带回240条鱼。如此，仅仅通过专业化，该岛的产出就戏剧性地增加了，虽然盖里甘在两个任务上的能力都要小得多。

设想李嘉图说了这样的话，以回应亚当·斯密对法国假设式的侮辱：“我和亚当·斯密一样不喜欢法国人。但我并不仅仅因为他们做的任何东西都不如我们的廉价，而对着他们偷笑。尽管他们的生产能力逊我

们一筹，我还是愿意跟他们做交易。”

接下来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我们如何知道怎么进行专业化分工呢？让我们再次返回到盖里甘的岛。由于船长建起一个茅屋所花费的时间是他捕一条鱼所花费时间的两倍，每建起一个小屋，他要放弃捕两条鱼。但是，盖里甘建造茅舍的时间是他捕一条鱼所需时间的3倍，他每建起一个小屋就要放弃3条鱼。因为对于船长来说，建造茅屋所要做出的牺牲较小，他就应当建造茅屋。李嘉图证明了个人和国家应当专门从事那些损失相对最小的事情，这就是他们的“比较优势”。而且，他们因为不能生产某种商品而做出的牺牲是他们的“机会成本”。因此，专业分工是依据谁有最小的机会成本来决定的。[3]

李嘉图分析的要点在于：不管贸易伙伴的经济是否发达，自由贸易使得家庭得以消费更多的商品。李嘉图对于《谷物法》的观点是：如果法国农民愿意用比我们养活自己的“成本”少的花费养活我们，那就让我们吃法国的食物，并且将我们的时间用于做其他的事情。

自给自足不是发展经济的最好选择

如果圣诞老人驾着驯鹿开始空运蛋糕、饼干和衣服，是否因为这些衣食我们自己可以烘焙和缝制，我们就应当举枪将领头的鹿鲁道夫从天空中击落？摆在李嘉图和所有“自由贸易者”面前的问题是：面包师和裁缝更喜欢政府截住和除掉鲁道夫。他们会声称：工作机会有赖于我们自己为自己烘焙食物。但他们忘记了全国消费者的利益，特别是下层社会消费者的利益，对于下层社会消费者来说，廉价的食物实质上意味着更好的生活。在李嘉图写作和在议会辩论的时期，工人们几乎要花费他们工资的1/2用于购买谷物做成的面包。阻止便宜的谷物进口会损害工人及其雇用者的利益。而且，贸易保护主义者还忘记了工作岗位是通过向其他国家出售商品和服务创造出来的。因为宣称“地主的利益总是与这个社会中所有其他阶层的利益相背”，李嘉图成为上层社会的公敌，也就不足为奇了。

尽管有着出众的才华和辩论能力，李嘉图还是不能说服议会变得心软。《谷物法》一直持续到了1846年。然而，李嘉图确实说服了后来的经济学家，使他们相信，尽管贸易保护对某一特殊利益集团有利，但在总体上几乎总是对经济有害。人们有时会讥讽经济学家，因为他们时常对政策处方各执一词。乔治·萧伯纳预言：“如果所有的经济学家首尾相连，他们也得不出一个结论。”然而，在20世纪期间，有好几次几千名经济学家在请愿书上联合签名，恳求美国政府不要阻止进口。每当国内经济出现停滞，某些政治家就会通过出台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威胁外国经济的办法来安抚选民。当美国和世界处于大萧条期间时，也是它们最需要自由贸易的时候，但美国却征收了它在21世纪的最高关税。当经济转而走向封闭时，国家几乎总是转而走向下坡路。

20世纪80年代，日本汽车制造商开始“自发”限制向美国出口，以避免来自美国国会甚为严厉的制裁措施。因为日本汽车的供应受到了限制，它们的价格上升，美国汽车制造商得以提高他们自己的汽车定价。经济学家估计，美国消费者在第一年就因此多花了3.5亿美元，在贸易限制的前3年里，美国的汽车价格提高了近3000美元。即使最多有10000个工作岗位得以“挽救”，但美国经济却可以为每个坐在家中“赋闲”的工人每年支付3.5万美元了。与之相反的是，能够买得起汽车的消费者不多

了，而且那些买了汽车的人也剩不下多少美元去购买其他的商品了，从而减少了其他行业的就业岗位。布鲁金斯研究所的罗伯特·克兰德尔指责道：“国内的汽车制造商可以降价，或许也应该降价，但是政府却将美国消费者放在他们就餐的盘子里，端给他们，他们忍不住将其切割成小块，而后分而食之。”[4]

1989年，汽车业的说客们恳求美国财政部将进口的小型货车和运动型多用途车划归为卡车类别。如果财政部迫于压力做出了让步，则此类车辆的关税将增加10倍。为了保护罗浮公司的利益，英国政府对这一提议进行了特别的抗议。他们在华盛顿特区的大使告知美国白宫：女王自己驾驶的是一辆路虎揽胜，从来不会驾驶一辆卡车。

亚伯拉罕·林肯简洁有力地表达了一个贸易保护主义者的主张：“我对关税了解得不多，但我确实知道的是，如果我在美国购买了一件大衣，我得到了大衣，而美国赚到了钱；如果我在英国购买了一件大衣，我拥有了大衣，而英国赚到了钱。”林肯说对了，他不太懂关税。就像重商主义者一样，林肯并不理解，国家之所以富有，是因为它消费了大量的商品和服务，而如果这个国家将印有总统肖像的金币或者纸币贮存起来，它是不会致富的。如果林肯购买了他喜欢的伦敦大衣，他要将一些美元兑换成英镑。如此，在伦敦的某个人现在拥有了美元。伦敦人用英镑换取美钞，可不只是为了用美元纸币来为他们的公寓糊墙。这个伦敦人要么购买一件美国产品，要么把美元换成英镑。如果她购买了一件美国产品，林肯就高兴了，因为他喜欢伦敦的大衣，而且这个伦敦人也高兴了，因为她喜欢美国产品。如果她将美元兑换成了英镑，她则是将美元转手给了想购买美国商品的某个人。[5]

假设我们可以用能装满100万个划艇的美元，来交换装满玛丽皇后2号的英国商品，会怎么样呢？那么，美国财政部要印几十亿张面额5美元的钞票。根据林肯的逻辑，我们可以得到漂亮的羊毛衫、茶壶和粗花呢的服装，而英国人得到的却是糊墙纸！但是，我们被捉弄了。林肯没有弄明白的是，英国接受美元是因为他们可以用美元购买美国的商品和金融资产。货币可能不会让地球运转，但货币的确是在世界上流通。阻止货币的流通就是阻止商品的流动，也就是阻止将商品从以最低廉的价格将它们生产出来的地方，运送到最渴望拥有它们的地方。

问题不在于大衣是否在美国生产，而在于当我们使用珍贵的资源时，我们将会生产机会成本较高的商品，还是生产机会成本较低的商

品。通过允许开展自由贸易，国家使公民将资源从低生产率的行业转移至高生产率的行业，家庭就能用较少的代价享受到更多的商品。

然而，资源转移肯定会给低生产率行业的工人和所有者带来痛苦。但是，贸易保护通常让消费者付出的代价更大，一个更好的选择是，由政府直接补偿遭淘汰的工人，并出资对他们进行新技能的培训。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替一个钢铁工人保住饭碗的成本超过了10万美元，而“挽救”一个鞋匠的就业岗位，则要花费7.7万美元。[6]最近，2002～2006年，美国对加拿大木材征收的惩罚性关税将美国新建住房的成本抬高了大约1000美元。[7]此外，贸易保护的逻辑指向了经济停滞。大多数提高我们生活水平的产业和发明已经迫使其他人失去了工作。几年前，施乐公司制作了一则电视广告，描述的是一个在寺院中以抄写经文为职业的僧侣正在小心翼翼地抄写很多页的文件和祈祷文。某一天，这个僧侣的上级主管交给他一个需要抄写的厚厚的经卷。这个之前因为抄写经文受尽了折磨的僧侣这一次大摇大摆地快速走到角落中的一台复印机前，只用很短的时间就把活儿干完了。僧侣充满喜悦地凝视着天空，连连称赞“神奇”。你能想象一个组织严密的僧侣政治行动委员会多么需要保护吗？想象一下有数千名僧侣朝着华盛顿行进会是怎样的情景。有多少僧侣会被复印机所取代呢？

自由市场不是一个没有痛苦的市场。“看不见的手”并不会像母亲呵护她的孩子那样来保护我们。如果人们偏爱更加稳定的经济生活，或许他们应当选择贸易保护。但是，当政府阻止从希腊运来的货物和商品进入港口的时候，那些蜷缩在角落里、受到贸易保护的人通常也享受不到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成果。

这个世界并不欣赏经济学家的幽默感。但是，社会科学类讽刺作品的最精彩篇章却是出自经济学小册子的作者弗雷德里克·巴师夏之手，时值19世纪40年代，当时法国正在就进口关税展开争论：

> 从蜡烛、烛芯、提灯、烛台、路灯、烛花剪刀和熄烛器的制造商，从石油、油脂、树脂、酒精以及与照明有关的所有产品的生产者，直到尊敬的下议院的成员。
>
> 先生们：
>
> ……我们正在经受一个外来竞争者的破坏性竞争，很明显，这

个外来竞争者生产照明产品的工作条件远比我们的优越，因此，外来产品以令人难以置信的低价潮水般地涌进国内市场……这个竞争者……不是别人，正是太阳……

我们要求你们通过一条法令，要求关闭所有的窗户、屋顶窗、天窗、内部和外部的护窗板、窗帘、窗扉、舷窗、舷窗内盖和百叶窗，总之，封堵所有的开口、孔洞、裂口和裂缝……

如果你们尽可能多地关闭了所有自然光线进入屋内的途径，就创造出了对人工照明的需求，那么，还有什么样的法国行业不会最终受到鼓励呢？

如果法国消费更多的油脂，必须要有更多的牛和羊……

它同样适用于航运业。[8]

李嘉图的分析表明，富裕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造成了较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停滞，这在我们的时代更加严重。提供几百万美元的外国援助和贷款，同时又在接受援助的国家面前设置贸易障碍，这似乎自相矛盾。例如，迫于国内糖生产者的压力，美国国会将糖的进口配额收紧，1977年大约为600万吨，到1998年就只有120万吨。南美洲的许多农场主发现古柯（可用于提取咖啡因制成毒品）是一种更有利可图的农作物，而且美国的地下毒品业更是一个心甘情愿的贸易伙伴，对此我们应当感到吃惊吗？

有时，缩小范围有助于我们具体细微地揣摩贸易保护主义者的主张。一个富人会因为与一个穷人做交易，而受到伤害吗？石油巨富约翰·保罗·格蒂应当自己做鞋还是买鞋？如果富人没有受到伤害，如果保罗·格蒂应当买鞋，那为什么美国人会因为从马来西亚购买鞋子而受到伤害呢？如果所有的人都是自给自足，国家是不是会更富裕？如果所有的邻居都是自给自足，又会如何呢？每一个单独的县也应当设置贸易边界吗？几乎没有人会回答“是的”，当然，《宪法》也会阻止这样做。但是，为什么一个国家将在国外生产的较便宜的商品拒之门外，反倒会变得富足起来呢？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许多国家加入了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它是为促进自由贸易而设立的一个组织，是当今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前身。随后，多国贸易谈判开始进行，减少了世界关税壁垒。然而，严重孤立主义者死灰复燃的威胁仍然存在，而且，在接下

来的几年里，这一方面的不确定性还会出现。

李嘉图的解释和我们的讨论并不是要证明关税总是错误的，只是表明关税有抑制经济增长的作用，因此，多数贸易保护的托词，诸如有益于消费者，增加就业机会，或者刺激经济繁荣等，都是不可信的。不过，一个国家可以慎重地运用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以达到实现国防安全的目的，或者满足在一个政局严重动荡的时期确保政治稳定的需要。

经济的未来——向左走还是向右走？

前面我们提过李嘉图看到了英国的两个未来：一是做外向型贸易商，前途光明；二是做孤立主义者，前途暗淡。通过比较优势分析，李嘉图预见到英国会成为世界工厂。他兴高采烈地在国会议员面前宣称："如果我们能够摆脱两大弊病——国债和《谷物法》，英国将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它所取得的繁荣要超乎我们的想象。"李嘉图没有预测那种在劫难逃的厄运，而是引导他的听众看到国家的进步："人的成长是从青春年少到成熟，然后衰老、死亡，但这不是国家的发展进程。每当国家达到一个充满活力的状态，实际上它们的进一步发展可能已经受到了阻碍，但它们的发展趋势却会持久不衰，以维持它们的财富不损失，保持它们的人口不减少。"[9]

尽管对于贸易如此心醉神迷，有些作者还是固执地把李嘉图描绘成一个悲观的分析家，说他和那个"万圣节的妖怪"马尔萨斯一样对前途感到悲观失望，只不过他比马尔萨斯更聪明。事实上，李嘉图确实花费了很多时间用于分析一个情绪低落的孤立主义者的未来。但是，我们不能忘记这个未来是被用来当作"兽迹"的，告诉大家这条道路有野兽出没，为的是恐吓政治家选择更为自由的经济政策。

那么，第二条道路是什么？在转入分析之前，让我们先列出一个递进的步骤作为开始。接受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之后，李嘉图看到了：增加的人口导致对食物的需求增加，继而导致扩大对不太肥沃土地的耕种，继而导致农业的成本增加，继而导致粮食价格提高，继而导致向工人支付更多的工资，继而导致企业家的利润降低，继而导致拥有最优质土地的地主获得更高的地租。

要想弄明白李嘉图的游戏策略，我们必须要运行游戏程序，并且确认玩家。首先，也是人数最多的玩家是工人，与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相符合的是，当工资上升时，工人的数量就会增加，反过来又使他们的工资水平降低。因此，按照当时的惯例和预期来说，经过漫长的游戏之后，工资将停留在足以维持工人生活的水平上。对于他们四处搜寻食物和穿着破衣烂衫赤足而行这种赤裸裸的生物性生存方式，李嘉图并没有加以谴责：

> 劳动的自然价格实际上是根据食物和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估计出来的，它保持绝对固定和持久不变是不可理喻的。它在同一个国家的不同时期都有变化，并且在不同的国家也会有极大的差异。它基本上取决于人们的习惯和风俗。一个英国工人会认为他的工资低于国家经济的自然增长率，如果他只能购买土豆这样的食物，并且只能生活在小泥屋这样的住处，那就太不够了，以至于不能养活一个家庭。[10]

其次，我们还有佃农这个玩家。但要注意的是，佃农并不拥有他们所耕种土地的所有权。李嘉图将他们描述成租赁土地、雇用工人和赚取利润的资本家。佃农拥有耕地的犁，而不是拥有工厂里的生产工具。李嘉图同意亚当·斯密的看法，那就是资本家型佃农会追随着市场信号，将资源和投资转移到最有利可图的项目上，在这方面他们具有“无休无止的欲望”。因此，他们为社会完成了非常重要的任务，但却未必是因为他们热爱这个社会。

再次，也是最有权势的玩家，李嘉图刻画了租地给佃农的富裕地主。他们过着悠闲的生活，然而最终却比其他玩家赚到了更多的财富。

李嘉图修改了经济惯例和“租金”的定义。回顾一下《谷物法》的争论，有人声称谷物成本较高是因为地主向佃农收取了较高的租金。李嘉图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谷物价格提高是因为战争时期的粮食短缺，短缺引诱企业家加入了农业生产。随着他们进入市场，地主发现有更多的资本家在敲他们家的门，并且竞相抬高土地的租赁价格。因此，是因为谷物的价格高才造成土地租金高，而不是地租先涨价然后带动了谷物价格的攀升。当促使谷物价格升高的贸易禁令被解除之后，谷物的价格随之暴跌，地主也不得不收取较低的租金。用现代的经济术语来讲，租赁土地的欲望是“派生需求”，它取决于谷物的供给和需求。

李嘉图下一个要争论的是，只有对地主的土地财产存在需求的时候，他们才能收取租金。某些地主的土地会比其他地主的土地肥沃，地租等级将会建立在这种土地肥力差异的基础之上。如果阿尔拥有一块能出产1000吨谷物的土地，而在其附近，琼拥有一块只能出产500吨谷物的土地，阿尔就能够向资本家佃农收取较高的租金。

租金的出现是因为所有的土地并非都一样：

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二等肥力的土地也被拿来耕种，地租随即开始依据头等肥力土地的租金加以征收，这一租金的数量将取决于这两部分土地质量的差异。当三等肥力的土地被拿来耕种时，租金就会立即根据二等土地的租金来收取，而且跟以前一样根据它们生产能力的差异来加以调节。同时，剩余的一等土地的租金将会进一步提高。[11]

李嘉图是正确的，租金是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出现的。当只有数量很少的人需要食物时，他们只需耕种最好的土地就能够养活自己。随着吃饭的嘴成倍地增加，农民开始耕种次优的土地。因为二等土地产量较少，较好土地的所有者现在可以收取租金了。工人工资和在二等土地上获得的正常利润一起决定谷物的价格。因为在较好土地上的耕种成本较低，于是产生了盈余。地主得到了这个盈余。

为什么李嘉图的洞察力激起了人们的厌恶和恐惧？按照他的说法，不论是从字面上理解，还是言外之意，经济增长之路会中止于一条沟渠。在短时间内，资本家佃农会扩大他的工业化生产，甚至会给工人支付更高的工资。但不久，快乐的工人就会添加人口，养育出更多的工人，从而竞相压低工资。英国要如何养活嗷嗷待哺的民众？当然是通过耕种更多的土地。但是要记住，新开垦的土地生产能力较低，并且耕种成本较高，因为佃农会先从开发最优质的土地开始。

谷物的价格会上升。但是，资本家佃农不会受惠，因为他必须支付给工人更多的工资，以便工人能够存活下去。如果资源“在佃农和雇农之间进行分配，较大的部分归了后者，较小的部分留给了前者”；[12]而且，当佃农耕种较差的土地时，拥有最好土地的地主收取了较高的地租。谁赢了？是地主。谁输了？是资本家佃农。谁保持不变？劳动者。当佃农把土地开垦殆尽时，饥饿最终还是会袭来。李嘉图称这种严峻的困境为“停滞状态”。从字面上理解，饥饿迫使社会在沟渠里面也要耕种。形象地说，资本家佃农和劳动者被困在了同一个沟渠内，挥舞着手臂，并且喊叫着救命。

为什么李嘉图与亚当·斯密的美梦有着如此大的反差？亚当·斯密一般假定农业不会衰变成低生产率的行业，而工业会持续增长，生产率也会不断提高。若用现代术语表达的话，亚当·斯密看到的是农业的收益不变，而工业的收益递增，并且这种收益递增使得参与各方兴旺发达。李

嘉图描述的却是工业的收益不变，而农业的收益递增。当然，李嘉图确实对技术会周期性地拯救经济抱有一定希望。利润下降的趋势“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被快乐地遏制住，之所以是快乐地遏制，是因为机器得到了改进，它与生活必需品的生产相关联，还有就是因为农业科学上的发明，它使得我们能够将原来所需的一部分劳动力舍弃不用，并且因此也降低了雇农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价格”。[13]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能自以为是，不能指望技术总是能够救我们于水火。

但是，要记住狄更斯的《圣诞颂歌》。幽灵讲述了即将到来的圣诞节将会发生阴森可怕的故事，这是被饥饿、恐惧和绝望糟蹋了的圣诞节。斯克鲁奇胆怯地问道：圣诞节一定会变成这样子吗？在不祥的叮当声和令人不安的、恼人的喘息声中，精灵将明天留给了斯克鲁奇。

李嘉图不是某些人描述的那种妖怪，而更像是《圣诞颂歌》中走出来的幽灵，他警告英国，封闭的、贪婪的政策将会带来更艰难和更贪婪的时代，而一个开放的、外向型的贸易立场能够让人有指望过上更幸福的日子。他写道：“我争取谷物的自由贸易，是基于这样的理由：当贸易自由时，谷物就便宜，不管资本的积累如何巨大，利润也不会下降。”经济增长就不会遇到沟壑。尽管阻碍仍会源于“稀缺，以及随之发生的食物和其他初级产品的高价……假如这些由外国供给，以换取我们的工业制品，很难说财富积累的极限会在何处”。[14]

李嘉图的分析收获了广泛的批评和引用。跟马尔萨斯一样，他低估了工人的“约束力”，工人并没有像他担心的那样快速地繁衍子嗣。如前所述，米尔顿·弗里德曼手持一支铅笔，作为他主张自由经济的象征。有时，古典经济学家好像抓住了兔子的脚，但这可不是能带来好运的标志。跟马尔萨斯一样，李嘉图也极力反对《济贫法》，因为济贫最终带来的是饥饿，李嘉图坚持认为“每一个关心穷人的朋友必须热切地希望此法的消失”。

1879年，亨利·乔治的《进步与贫穷》出版，李嘉图对地主的猛烈抨击和对地租的描述借此传到美国，语言朴实而热情洋溢。亨利·乔治是一位记者，却有着救世主般的洞察力，他发起了“单一税运动”。由于被地主的不当得利所激怒，亨利·乔治谴责地主只是坐地收租，而其他人却要拼命地创造财富。亨利·乔治建议对土地实行大规模征税以吸纳地租，他以比《旧约全书》中的先知还要大的热情预言：这样的政策将会消除贫穷，驯服冷酷的贪欲，枯竭恶习和悲惨的源泉，点亮黑暗之地的知识明

灯，带给发明以新的活力，带给发现以新的冲动，赋予政治弱势群体以政治权力，并且让专制统治和无政府状态成为不可能。[15]

这一建议存在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经济学家将地租区分为李嘉图探讨的“经济租金”和佃农付给地主的普通地租。根据李嘉图的说法，经济租金是维持现在使用中的土地、劳动或资本投入所必需支付的费用之外的部分。因为在李嘉图的分析中，土地只用作生产谷物，所以，把土地当作农田使用不存在任何的费用需要支付，而地主也没有其他的选择，只能用它来生产谷物。因此，向地主支付的任何地租都是经济租金。棒球明星威利·梅斯过去常说他会免费参加比赛。如果他是免费打球，那他收到的任何报酬都是经济租金，因为这超出了他参加比赛的所需和所求。

电影明星也在收取经济租金。假定西尔维斯特·史泰龙要不断地在当演员和当专业裁缝之间做出选择。如果他当演员，拍一部电影的报酬少于3万美元，他就会转行去给衣服和袖口缝边。因此，如果一部3D版的新电影《洛奇遇到兰博II》给他的报酬是500万美元，我们会说3万美元是“转移收入”，497万美元是经济租金。或许亨利·乔治应该胆子大一点，拿走所有的租金。

问题的关键在于，维持土地、劳动或资本投入的费用不是经济租金，而是转移收入。超过转移收入的报酬才是经济租金。因此，如果每个月不能从佃农那里收到1000美元的租金，财产所有人或许会将他的土地转而用作狂欢节搭帐篷的场所，他因此收到的第一笔1000美元就不是经济租金。要谨防语言的歧义。除非租金超过了所需支付的必要额度，否则，公寓租户通常所称的租金就不是经济租金。但是，亨利·乔治又如何知道总报酬中的哪一部分是应当征税的经济租金呢？为此，他需要上天的启示，这已经超出了他表现出来的天赋。

单一税运动同样也面临着道德羁绊，需要人们去跨越或者超越。如果对经济租金的征税需要公平，那么，对土地、劳动和资本的经济租金征税也要公平。亨利·乔治又如何将史泰龙的转移收入和经济租金区分开来呢？在议员和著名经济学家的薪酬中，又如何将二者加以区分呢？并不是每个人都像威利·梅斯一样诚实。

虽然亨利·乔治从没有完成他的使命，他却在美国和英国出了名，在这两个国家里，他的追随者们成立了单一税社团以传播他的主张，而

《进步与贫穷》这本好书的传播速度也超过了劳动力的繁育速度。尽管这一运动最终销声匿迹，但亨利·乔治的追随者们还是踌躇满志地将矛头指向了作为州和地方财政收入来源的财产税，只不过他们不如60年前那样信誓旦旦了。亨利·乔治高估了租金和转移收入未来的重要性。在最近一个世纪里，各级政府已经变得臃肿。即使政府在不引起反抗的情况下收取了所有的租金，也不够支付财政开支。1929年，财产税占国民收入的比例约为6%。这个比例稳定地下降，直到今天已经远远低于1%。如果说财产税曾经占到了州和地方财政预算的65%，那么它们现在只能占到大约17%。

如果亨利·乔治接到了李嘉图的投球，并且开始拼命跑动，而与李嘉图同时代的马尔萨斯则试图用球棒将球击回。在《谷物法》的问题上，马尔萨斯接受了大部分李嘉图关于租金和农业收益递减的分析。但他提出了4点反驳意见：第一，他主张，因为《谷物法》提高了谷物价格，实际上导致国内谷物产量的增加。第二，马尔萨斯认为，谷物这种商品太重要了，以至于不能将它交由外国生产者来供给。第三，他得出的结论是：因为工人的报酬是根据谷物的价格来支付的，所以较高的谷物价格确实会增加工人的工资。马尔萨斯因此声称，较高的工资在很大的程度上弥补了较高的食物价格。李嘉图不同意这种说法。用现代的术语来讲，他认为较高的“名义”工资未必就是较高的“实际”收入，也就是说，高工资让劳动者购买到的东西不一定会比原来低工资时买到的多。对李嘉图来说，马尔萨斯的理由听起来就像是一个独裁者的承诺，他微笑着面对群众，眨着眼睛，承诺要将工资翻一番。群众为之欢呼喝彩。他们向这个专制君主5层楼高的海报致敬，并且感到欢欣鼓舞。第二天，他们来到商店购物，发现商店的雇员用了整整一个晚上更改了价格标签，提价100%。第四，通过恭维李嘉图，马尔萨斯温和地为地主进行了辩护。

> 因为他的才能和勤奋，（李嘉图）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引人关注的地主，变成了一个更受尊敬和更优秀的人，对于具有这样品质、头脑和心智的人，他应当赚到这些钱……[16]

也许除了有一次受邀去李嘉图的乡村寓所做客之外，恭维话并没有给马尔萨斯带来任何的好处。李嘉图从来没有说过地主蓄意吸食国家的血液。就像吸血鬼一样，他们受到了一种外在力量的驱使。不无讽刺的

是，李嘉图这个大手大脚的地主惹恼了其他地主，而马尔萨斯这个谦和的教士却激怒了卑微的老百姓。

永远供过于求的商品是不存在的

然而，李嘉图和马尔萨斯两人的抬杠不仅限于关于地主的争论。两个经济学家对经济萧条的看法也不一致。马尔萨斯相信存在“一般性的供过于求”，意思是有时商人供应的商品和服务会超过人们想购买的数量，这是一句听起来让人感觉不舒服的话。李嘉图宁可相信戈德温的乌托邦，也不相信存在“一般性的供过于求”。李嘉图接受了“萨伊定律”，它是以法国人让·巴蒂斯特·萨伊的名字命名的，他用逻辑证明了一般性的供过于求是不切实际的想法。科学家喜欢发现定律和创造图形、曲线，也许是因为习惯上人们会以发现者的名字来命名该定律和曲线。在经济学里，就有洛伦兹曲线、奥肯定律和哈伯格三角形。

萨伊定律讲的是什么？工人、土地的所有者和资本家分别得到了工资、租金和利润，这些报酬加起来就是产品的销售价格。生产制造的每一项成本变成了某个人的收入。消费者只不过就是劳动者、资本家和地主，这些人在下班回到家之后，他们也就变成了消费者，因此，消费者能够买得起所有已经生产出来的产品。萨伊定律为人所知的通常是这样一句标志性的话：“供给自创需求”。

萨伊从来没有说过“部分的供过于求”不可能发生，当消费者决定少买某一特定产品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最终，销售者将会通过降低价格来消除部分供过于求。但是，对于萨伊、亚当·斯密、大卫·休谟和李嘉图来说，普遍的供过于求仍然是不可能的，因为消费者必定会用他们的钱来做些什么事情，而且人们对于拥有更多的物质财富有着无穷的欲望。

马尔萨斯大声反对。首先，他注意到在1818年英法战争之后的萧条中，失业率看起来非常高。但是，他该从何处着手打破萨伊描绘的并受到李嘉图支持的这个严密循环呢？他开始追溯这一循环，并且同意消费者“能够”购买生产者提供的所有商品，但是，如果消费者并不喜欢花掉他们所有的钱，又会怎么样呢？如果他们偏好储蓄或贮藏货币，又会怎么样呢？难道这些钱不会从萨伊的购买循环中流出，使得商人无奈地坐在没有售出的商品上面吗？

李嘉图迅速反击。如果消费者存钱，他们会把钱储蓄在银行里，然

后银行会将这些钱借贷给那些确实想花钱消费或投资的人。无论哪种方式，总会有人花钱。即使亚当·斯密也知道："每年所储蓄的钱就像每年所消费的钱那样被有规律地花掉，并且几乎就在同时，但……是由不同的人花的。"[17]李嘉图然后斥责他的朋友"马尔萨斯先生"，马尔萨斯"似乎永远记不住"这一简单的事实。

虽然已经说服了少数几个经济学家，马尔萨斯还是认为储蓄和投资之间存在着差额。为了消除一般性的供过于求，他建议"在道路和市政工程上雇用穷人，在地主和置办产业的人中间有一种倾向……雇用工人和卑微的仆人"，这些都是"我们最力所能及的方法，也是最直接的拯救邪恶的方法"。[18]

但是，李嘉图做出了回应，他认为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几乎没有哪一页"找不到"某些谬误"。

即使李嘉图当时赢得了胜利，一个世纪之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又重新唤起了对失败者的记忆。凯恩斯用他的萧条经济学理论这一首华丽的颂歌向"首位剑桥经济学家"表达了敬意，同时公然抨击了李嘉图。"如果不是李嘉图而是马尔萨斯成为19世纪经济学产生的源头，今天的世界将会是一个更加明智、更加富裕的社会。"[19]在这一点上，凯恩斯既夸大了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的分量（他"征服了英国，完全像是宗教裁判所控制了西班牙"），也夸大了他自己的分析和马尔萨斯的分析之间存在的相似性。尽管凯恩斯和马尔萨斯都否定了萨伊定律，但马尔萨斯在关于为投资而储蓄方面取得了少许的进展，并且强烈要求开展公共工程，以减缓投资，而不是像凯恩斯提倡的那样刺激商品的销售。但是，如果凯恩斯说是马尔萨斯给了他启示的话，那我们会同意谁的看法呢？

马尔萨斯和李嘉图之间真正的分歧并不是围绕着供过于求、租金或者贸易保护展开的，而是围绕着方法论展开的。他们两个人都生活在倡导科学的时代，都在寻求因果之间的联系，都依据这些因果联系而对要发生的事情做出了预言。但是，李嘉图更强烈地关注错综复杂的步骤次序，而马尔萨斯似乎满足于发现一个普遍原理，之后将它应用到现实世界中。回想一下李嘉图通向停滞状态的细致到分七步走的道路。无论是亚当·斯密还是马尔萨斯，都没有建立起如此严谨的模型。在詹姆斯·穆勒的指导下，李嘉图尝试完成长长的推理链的演绎。他想推导出像欧几里得几何学或牛顿力学那样确定无疑的定理。有时他的假设或第一前提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在这些前提条件下，他的理论是驳不倒的。驳不

倒？是的，用处呢？也许没有。凯恩斯和约瑟夫·熊彼特都指责李嘉图选择那些特定的假设或事例，只是为了确保能够得到他想要的结果，熊彼特称这种做法为“李嘉图恶习”。熊彼特还指责过别的什么人患上了李嘉图恶习吗？那就是凯恩斯。

李嘉图和蔼地论述了他与马尔萨斯的方法论之间的差异：“我认为，在某些方面，我们的区别可能被人描述成了：你认为我的书比我打算要做的更现实。我的目标是说明原理，而为了做到这一点，我设想出了理由充分的论据。”李嘉图更偏好长期分析，而不是短期描述，他告诉马尔萨斯“你总是记得特殊变量的直接影响和短暂效应，我会将这些……撇开不管，而将我的全部注意力集中于因它们而产生之事的持久状态上”。[20]有信件显示李嘉图拒不同意马尔萨斯的实证观察，这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它们要么不适合李嘉图有力的论据，要么显得转瞬即逝。但是，因为马尔萨斯从来没有构建复杂的分析模型，他有了变化无常的名声。马尔萨斯的同时代人罗伯特·托伦斯写道：“在经济学的主要问题上，马尔萨斯先生从来都是欣然接受一个原理，随后就加以抛弃。”[21]后来，凯恩斯得到了同样的名声，使得对他最为尖刻的批评家也赞扬他的折中主义是“在最好的里面选择最差的”。

尽管受到凯恩斯和熊彼特的攻击，包括马克思、瓦尔拉斯、马歇尔和维克塞尔在内拥有较高声誉的经济学家都公开宣称李嘉图是出类拔萃的。一位著名的经济学方法论者最近声称：“如果经济学本质上是一个分析工具，一种思维方式，而不是大量实际效果的话，李嘉图实际上发明了经济学的技术。”[22]

有人得到了这样的印象：当马尔萨斯去世时，有些人来到他的葬礼表示哀悼，而其他人是为了确认他是真的死了。李嘉图因为自己的才学、仁慈及性格受到了更多的尊重。李嘉图是一个有钱人，他本可以在田园风光中尽情享受，打发时间，也能够周游全世界。相反，他把自己的闲暇时间用于研究令人费解的问题，并且得出抽象和深奥的答案，当然他认为这是正确的结论。在对世界进行研究的基础上，他又用书籍、报纸评论和议会演讲来教导其他人。他的比较优势法则和“经济租金”理论仍然出现在教科书中，与往昔一样，还是那么具有说服力，那么重要。

虽然李嘉图的理论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却只有欧洲国家可能最适合实践李嘉图的理论遗产。这些国家已经履行了他们在1992年立下的誓

约，拆除了它们之间剩余的所有贸易壁垒，使得李嘉图取得了部分胜利。为了获得全面胜利，欧盟国家还必须信守第二个誓言：不要在它们的海岸线上竖起壁垒，以阻止像美国和日本这样的国家参加到它们追求经济繁荣的、充满活力的规划之中。迄今为止，结果喜忧参半。尽管美国的金融公司已经强势进入（经常借助与欧洲公司的合并），不知怎么回事，法国农民一如既往地讨厌美国和澳大利亚农业在法国给他们带来的烦忧。尽管对纳尔逊·曼德拉大加称赞，并且使用了神圣的词汇加以形容，但荷兰人正在排斥南非的鲜花，德国的马铃薯种植园主正在抗议进口南非的土豆，而法国的葡萄酒酿造者正在阻止南非夏敦埃白葡萄酒的进入。最具争议的问题可能是香蕉了，欧洲继续保护它在非洲的前殖民地免受加勒比海和拉丁美洲香蕉种植者的冲击。到目前为止，香蕉俨然成为对抗自由贸易的一个强有力的武器。李嘉图可能会感到失望，但却充满希望。

第五章 约翰·穆勒：大多数人的幸福捍卫者

自亚当·斯密以来，几乎所有著名的英国经济学家都因彼此间的亲密关系联系在一起。要知道，亚当·斯密的好友大卫·休谟是托马斯·马尔萨斯的“教父”，马尔萨斯是大卫·李嘉图的挚友，李嘉图的莫逆之交詹姆斯·穆勒对李嘉图研究经济学又起到了鼓励的作用，詹姆斯·穆勒是约翰·穆勒的生父。然而，约翰·穆勒对他的继任者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并不以友相待，自此这条“亲友链”才出现了小小的断裂。不过，马歇尔还是研读了穆勒的著作，并且师从李嘉图的朋友玛丽亚·埃奇沃思的侄子、经济学家弗朗西斯·伊西德罗·埃奇沃思，之后又将衣钵传给凯恩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凯恩斯主导了英国的经济学发展，并且培养出了许多著名的学生。

约翰·穆勒的人生呈现给人们一个由思想的力量塑造的生平故事。通过他这个人，我们看到了隐含在古典经济学中的哲学冲突。尽管经济学家有时会对他在经济理论的建设性贡献方面存在争议，但是大家一致公认，约翰·穆勒探究了有关经济学和资本主义伦理基础那些令人困扰的问题。

喜剧演员吉米·杜兰特最著名的台词之一是：“每个人都想插手”。艾萨克·牛顿之后，几乎每一个知识分子都想插手科学研究领域，并且为他们提出的问题找到准确的答案。亚当·斯密、李嘉图和马尔萨斯希望通过发现自然法则从而成为经济学界的艾萨克·牛顿。比较优势理论、萨伊定律和人口原理全都是在这一时期创立的。差不多与此同时，杰里米·边沁力求成为伦理世界的牛顿，成为一个伦理学科学家。詹姆斯·穆勒被伦理科学家与经济科学家调制的“神奇药水”迷住了。因为喜欢边沁思想的“味道”，詹姆斯·穆勒强迫他的儿子也要品尝。

约翰·穆勒于1806年生于伦敦，当他还是在妈妈怀里吃奶的孩子时，就开始接受严格的教育了。在他3岁时，詹姆斯·穆勒就教他希腊语。年方8岁，这个男孩就已经可以用希腊文阅读柏拉图、色诺芬和第欧根尼的著作，并且开始学习拉丁文。他的母亲并不是一个和蔼的人，她的冷淡再加上幼小的约翰·穆勒对古典知识尚不成熟的认知，可能让他错误地把她当作“米罗的维纳斯”了。8～12岁之间，约翰·穆勒埋头于藏书丰富

的图书馆，阅读了亚里士多德和阿里斯托芬的著作，并且掌握了微积分和几何学。闲暇之余，他又被要求教他的兄弟姐妹们学习拉丁语。他有什么业余爱好吗？阅读历史书籍。有朋友吗？一个也没有。

到14岁时，约翰·穆勒的父亲开始与他在林中散步，同时讲授李嘉图的经济学理论，“他每天会详细讲解这一学科的一个部分，第二天我会交给他一份前一天所讲内容的文字记录，他会让我一次又一次地重写，直到这个记录变得内容清晰、准确和相当完整。”[1]你能想象吗，当他的父亲领着他沿着林荫大道散步之时，这个可怜的男孩却在努力地对李嘉图复杂的理论做着潦草的笔记。

就因为这种严格的要求，约翰·穆勒变成了“一匹智识上受过严格训练的野马”，而在情感上却成了“呆板的木马”，他保持着谦虚低调，不承认自己具有与众不同的敏捷思维、准确的记忆力或者充沛的精力。在“所有这些天赋中，我比众人的平均能力还要低很多，我所做的，肯定可以被任何具有普通能力的男孩或者女孩做到”。关于自己比其他孩子知道得更多这一点，直到他的父亲带着他步行穿过英国伦敦的海德公园，并且让他相信他的确如此时，他才相信。但是，这并没有让他感到骄傲，詹姆斯·穆勒告诫他，“假如有一个像我一样的父亲，任何人都能做到你这样。”约翰·穆勒既是这样一个父亲的受益者，也是这样一个父亲的牺牲品，这个父亲使他的儿子相比同代人具有了“领先1/4世纪的优势”。[2]

但是，这一优势填充了他的大脑，却夺走了他的童心。还有什么比他说的“我从来就不是一个小男孩”[3]更让人感到可怜的呢？他与他父亲的朋友进行交往，而这些人中不会有人玩捉迷藏或者其他儿童玩的游戏，反而像是选举日的失败者那样表情严肃。时值1822年的春天，其他与他年龄相当的男孩都把注意力转移到了草坪上的女孩，春暖花开却只是激发了约翰·穆勒的智慧，因为就是在那时，他在三卷本的《立法论》中发现了杰里米·边沁的功利主义。

> 当我放下最后一卷……我已经变了一个人。边沁所理解和应用的“功利主义”，我也同样了解并加以应用……确切地说，（它）清清楚楚地变成了（我的）理论基石，这一基本原则将我那些孤立的、片断的知识与信仰融合在一起。它统一了我看待事物的视角。现在我有了见解，那是一个信条、一种学说、一门哲学，或者说得更明白一点，它是一种信仰。教授和传播功利主义可以被当作人生主要的外在目标。一个宏大的理念展现在我的面前，我要秉持这个主

义，实现人类生存条件的改变。[4]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约翰·穆勒与他儿时的朋友詹姆斯·穆勒和大卫·李嘉图一起通过《威斯敏斯特评论》传播边沁的功利主义学说。

> 《威斯敏斯特评论》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轩然大波，在舆论和讨论的竞技场上给予边沁式激进主义一个明确的地位，这与其追随者的数量完全不成比例……在其他人对（将其）确立为一个主义的信心似乎没有那么强烈时，他们所写文章表现出来的坚定信念……使得所谓哲学和政治学上的边沁学派相比以前在大众心目中占据了更高的位置。[5]

功利主义与幸福的计算公式

边沁的信条吸引了一群人，这群人既有被说服的人，也有很有说服力的人，这个边沁信条是什么？边沁说过，就像自然将地球置于重力之下一样，自然“将人类置于两个主宰——痛苦和快乐的统治之下”。[6]从这些法则之中，边沁既发现了叙述性的信仰，也发现了规范性的信仰。由于所有的人喜欢快乐而厌恶痛苦（受虐狂除外，他们偏好痛苦，只是因为痛苦给他们带来了快乐），他们选择去做那些给他们带来快乐的事情。在其论述规范性的章节中，这个学说恳求人们选择快乐之道。它听起来十分有趣，正如古希腊亚里斯提卜的享乐主义。但边沁增添了一条道德告诫：当个人所作的选择影响其他人时，我们应当选择让所有人的总体快乐值达到最大化的替代性方案。“为最多的人谋求最大的幸福”是功利主义运动发出的呐喊，有责任感的政府理应让立法者将此理念铭记于心。

边沁认为，在幸福面前，所有人都应该被平等对待，这样的观点让民主人士热泪盈眶。假定国王碰伤了一个脚趾，这种痛苦相当于他的女仆简碰伤两个脚趾的一半。如果将包扎用的绷带给简，对她的帮助将大于此举带给国王的痛苦，那她就应该得到绷带。毫不奇怪，贵族们都祈祷着，在传播他的信条之前，边沁的舌头能够齐根断掉。

然而，对于道德世界的“牛顿”来说，这个公式在数学上还不够准确。边沁设计了一个量化快乐和痛苦的方法，叫作“幸福计算”。众所周知，有些体验相比其他体验会更让人快乐或痛苦。为什么？任何单一的体验都可以用以下4个因素来衡量：强度、持续时间、确定性和邻近程度。所以，与周末有可能休假相比，人们更喜爱明确的长假。非常滑稽的喜剧演员要比温和有趣的喜剧演员带给观众更多的愉悦。

显然边沁在设计这一算法时给自己带来了很多的快乐，所以他将这一算法扩大化，增加了三个要素：额外收益、道德污点和延及他人。有些快乐会引致更多的快乐。如果通过参加夏令营，马克增加了认识新朋友的机会，那么，夏令营则代表了第5个幸福要素“额外收益”。如果因为马克亲近了某位足球队员的妻子，夏令营给人带来了痛苦，则就证明了第6个因素“道德污点”（它所具有的产生相反感觉的作用）的存在。

最后，如果当足球队队员朝着马克的脸痛扁令众人开怀大笑的话，我们必须要考虑到他们的快乐。

针对这些方法，边沁又增添了复杂的说明。乍看之下，它们让人想起某种日本家用电器附带的安装说明书，而且可能是用日语写的，因为用难懂的日语打比方至少比莫名其妙的英文更恰当。不过，进一步想想，边沁其实还是言之有理的：

> 从任何一个人开始……并且要计算：
>
> 1.显然，首先由其产生的每一个可辨识的快乐值。
>
> 2.显然，首先由其产生的每一个可辨识的痛苦值。
>
> 3.显然，随后由其产生的每一个快乐值。这构成了初次快乐的额外收益和初次痛苦的道德污点。
>
> 4.显然，随后由其产生的每一个痛苦值。这构成了初次痛苦的额外收益和初次快乐的道德污点。
>
> 5.在（等式的）一边将所有的快乐值进行加总，在另一边将全部痛苦值进行加总。如果是快乐值大于痛苦值，表明这一行动在总体上是趋利的；如果是痛苦值大于快乐值，表明这一行动在总体上是趋害的。
>
> 6.计算与此利害关系明显相关的人的数量，对每一个人重复进行上述步骤。将表达趋利程度的数字加总……再对每一个人的趋害程度进行加总……加以比较，如果快乐值大于痛苦值，则表明这一行为总体上是趋利的……如果是痛苦值大于快乐值，则表明对同一群人来说这一行为总体上是趋害的。[7]

边沁肯定很严肃地采取了第三个步骤——长期快乐。他将自己的遗体留给了伦敦大学，有重要的行政会议时就会用带轮子的车推出来。他那经过处理的遗体仍然躺在那里，但不幸的是，几个玩世不恭、淘气的学生把他的头偷走了，由此可见，对额外收益和道德污点进行计量有多么困难。

阅读边沁的著作满足了约翰·穆勒对科学精确性的渴望，并且带给他对于社会交往的新见解。他很快就加入为维护边沁及其哲学激进主义而战的阵营之中，这个派别的成员包括一些知名的国会议员和作家。不无讽刺的是，这些快乐的捍卫者可能只跟悲观的奥地利小说家卡夫卡一

样“快乐”。

在政治上，边沁的激进主义勇敢地为民主和言论自由而斗争。他们宣称真理产生于言论自由。他们抗议对报纸杂志征税的《印花税法案》，也反对针对集会的各种限制。（约翰·穆勒在晚年将会高举争取妇女投票权的旗帜。）基于李嘉图的立场，他们反对《谷物法》。杰里米·边沁也谴责野蛮的英国监狱系统，主张惩罚应当只用作制止报复的工具，而不是假借正义之名来泄愤的手段。边沁认为，毕竟罪犯是那些认为值得一做才决定去犯罪的人。真正的答案是调整犯罪的成本。虽然边沁曾经提出政府的座右铭就是“保持安静”，但激进主义随时准备要在收益超过成本之时放弃自由放任的立场。“过去、现在或是将来，我都不会对政府的那只手怀有任何的恐惧感或持有无政府主义态度。我把它留给亚当·斯密……去谈论对天赋自由的侵犯。”[8]他们所崇拜的神是功利，而不是看不见的手，即使他们的神常常是通过看不见的手来发挥作用。

顺便提一下，他们的神确实与教堂、犹太教堂和清真寺没有关系。詹姆斯·穆勒完全不能在罪恶的世界和善良的造物主之间找到平衡点。约翰·穆勒清晰地想起了他父亲无神论的戏谑言语：

> 我听他说过上百次了，任何时代和所有的民族都把他们的神描绘成邪恶的，在持续不断的发展中，人类为之添加一个又一个特征，直到它们达到人类思维能够设计出的最为理想的邪恶程度，并且称之为神，然后拜倒在它们的面前。[9]

在19世纪20、30年代，激进主义赢得了许多政治角逐和小型争论的胜利，大大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也超出了约翰·穆勒的预期。为了维持生活，他在1823年投靠在东印度公司任职的父亲。与后来都为政府的印度办事处工作的马尔萨斯和凯恩斯一样，穆勒从没有去过印度。同年，穆勒入职东印度公司，发现了一个功利主义社团，在那里，其他年轻的边沁的学生和他得以就强度和远近程度这两个因素在很长的时间里定期地进行争论和研究。他们的主要对手是浪漫主义者、乌托邦的空想者和社会主义者，这些人似乎全都像柯勒律治诗歌中的云彩一样高高地飘在天上，以至于不能实实在在地赢得辩论。

当推理机器出现故障

在此期间，约翰·穆勒可能对边沁学派的精确性过于着迷，完全忘记了其最终目标是快乐："边沁学派常被描述为仅仅是一部推理机器，虽然这对大多数人来说极端不适用……对我来说，并非完全是假的。"[10]

在20岁时，他产生了中年危机。他这部推理机器坏了，弹簧、密封垫和电线飞落得到处都是。有好几年的时间，他都在问"生命中可以真正被称为目标的是什么"，答案是要成为一名改革者。但是，在1826年的一个冬天，他"神情阴郁……那些之前的快乐心情变得枯燥乏味和无关紧要"。他向自己问了一个性命攸关的问题，并得到了让人泄气的答案：

> 假设你生命中的所有目标都实现了，你所期待的制度和舆论的所有变革此时此刻得以全部实施，对你来说，这会是极大的快乐和幸福吗？压抑不住的自我意识明白地答道："不是"。听到此，我变得心灰意冷，我的人生所赖以构建的整个基础垮掉了。我所有的快乐被证实是在不断地追求这样一个结果。这种结局不再有什么诱惑力，怎么还会再有任何方法上的兴趣可言呢？我好像没有活下去的理由了。[11]

在长达6个月的时间里，他感到绝望，常常想要自杀。他压根儿就没有培养起对任何人的感情。欣赏花，他只看见花中的叶脉。当浪漫主义者戴着玫瑰色的眼镜看世界时，约翰·穆勒的眼里却全然看不到色彩缤纷，而是像松脂一样没有颜色。几年以后，尼采宣称"上帝死了"。对于约翰·穆勒来说，从缺乏情感的父亲那里得不到爱，除了理性之外一无所有，这个人就如同行尸走肉。他这样描写父亲詹姆斯·穆勒："对于各种类型的热烈情绪，对于任何可以提升热情的语言表达和文字表达，他都公开表示了最大的轻蔑，并且将它们看作疯狂的举动。"[12]

在那充满理性的年龄，约翰·穆勒渴望热情。与其说他是理性主义哲学家的欺骗对象，倒不如说他是他们的受害者。其中之一就是大卫·休谟，他坚持认为理性永远是"热情的奴隶"。实际上，即使边沁在介绍理性时也只是将它当作比较热情程度的方法，而不是取代热情。

在心理分析出现之前，心理分析家就有了一个相当好的案例。也许约翰·穆勒受到了罪恶感的折磨，它源自受到压抑的死亡愿望，矛头直指他那暴虐的、如影随形的父亲。但是，约翰·穆勒比希腊英雄的处境更糟。至少俄狄浦斯还有一个慈爱的母亲。在其300页的自传中，约翰·穆勒甚至都没有提到过母亲。他早期的草稿解释了其中的缘由：

> 首先，一位真正热心体贴的母亲会让我的父亲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其次，她会让孩子们在爱心和被关怀中成长。但是，我的母亲只知道如何努力工作以度过她的一生，这是她最大的愿望……以至于我是在缺乏爱和充满恐惧的环境中长大成人的。[13]

他的母亲并没有留下自传。没有人知道是不是因为与詹姆斯·穆勒的婚姻耗尽了她付出爱的能力？我们能说的只是，约翰·穆勒的家并不是一个可以串串门、喝碗鸡汤，并且得到温暖和陪伴的地方。

“不做吃饱喝足的猪”

正当约翰·穆勒在被称作理性主义的知识大潮里折腾之时，他却被叫作浪漫主义的浪花救了一命。在其著作《悲剧的诞生》中，尼采描述了两个冲击人类灵魂的强大力量：日神和酒神。日神代表的是理性、次序以及莫扎特的交响曲，而酒神则象征着反复无常、情感和普契尼的歌剧。当18世纪的理性主义将约翰·穆勒推向绝望的边缘时，他转而阅读华兹华斯甚至是柯勒律治的诗歌。华兹华斯对自然美景丰富的描写最终使其感受到了愉快，激发了他的想象力。终于，他可以产生感官上的感受了。通过对美的拥抱，约翰·穆勒得以努力将自己狭窄的心智扩展开来，并且走出他父亲高压管制的阴影。

就像柯勒律治作品中的古代水手一样，约翰·穆勒开始了他的游学之旅，拜访了卡莱尔和法国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后者对经验主义的强调影响了他。有时，这个水手对他的新“教父”赞美有加，并且否定了原来的“教父”。在对约翰·穆勒以友相待之后，妄自尊大的孔德要求穆勒给他金钱上的资助。约翰·穆勒默默地顺从了，甚至要求朋友也要出钱给孔德。大约一年后，这种慈善“捐款”停止了。孔德对他的资助人非但没有表达谢意，反而寄给穆勒一封让人感到难堪的信教训他，要他承担起资助贫穷博学者的责任。尽管约翰·穆勒有时被称为“理性主义之圣”，但生命中的这一段插曲必定使他被冠以“傻瓜之圣”的称号。[14]

在父亲于1836年去世之后，约翰·穆勒开始发表文章，表明他已经远离了哲学激进主义。1838年，他写文章猛烈地抨击边沁主义，指责其使灵魂更加贫瘠。精神完美应当是个人凭借自身的力量追求的目标，不论其结果是痛苦还是快乐。约翰·穆勒谦虚地补充说，当坚守法律而不是个人道德的时候，边沁表现得更好。两年之后，约翰·穆勒毫无道理地赞美柯勒律治。[15]

也许父亲的去世对约翰·穆勒来说既是一种解脱，也是一种困扰。格特鲁德·希默尔法尔布描写道，在他父亲死亡之时，约翰·穆勒患上了“脑膜炎”，导致他的一只眼发生抽搐。如果将这个儿子再进行一次精神分析的话，这样的抽搐是不是因为控制他的人过世所带来的释放造成的？[16]

这段漂泊之旅不只是让他获得了知识，而且也获得了审美的情趣。约翰·穆勒生平第一次陷入爱河，可以说从鸡蛋般光秃秃的脑袋到土豆般滑溜溜的脚后跟都沉浸其中。不幸的是，他所爱慕的哈丽雅特·泰勒已是有夫之妇，并且育有子女。但这并没有挡住约翰·穆勒，他仍然按照边沁学派的方式追求快乐。他们的“婚外恋”采取了无性的三角家庭形式。哈丽雅特与她的丈夫同住，但是，泰勒先生出门时，约翰·穆勒就会造访，哈丽雅特与他共度了许多夏日周末。这种关系从1830年一直持续到1851年穆勒和哈丽雅特结婚为止。哈丽雅特的丈夫在他们结婚前两年过世，但是约翰·穆勒认为等久一点可以洗脱私通的罪名。他几乎将自己全部的知名著作都归功于哈丽雅特的智慧，她是穆勒的女神。他渴望从冷若冰霜的母亲那里得到的所有温暖和力量，现在都从他的爱人身上得到了：

> 她的心智同样是能够直刺事物的核心和精髓的完美工具，总是能把握基本的思想或原理。思维的精准和敏捷，还有她无所不在的敏感和智力，再加上与生俱来的情感和想象力，使她适于成为无与伦比的艺术家，这一点同样表现在她热情和温柔的心灵以及雄辩的口才上，足以让她成为一名演说家。另外，她对人性的深刻认识和对现实生活的洞察和睿智，如果是在此类职业向妇女开放的时代，她会跻身于杰出统治者之列。在其品德的助力下，她的智力天赋同时与其情感达到最高尚和最佳的平衡，这是我此生从未见过的。[17]

许多约翰·穆勒的朋友认为他有幻觉。在评价哈丽雅特的贡献上，历史学家之间仍然存在争议。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约翰·穆勒对于如此一个美人选择爱上他感到受宠若惊，而她最终给了他不可估量的影响。

美人相伴，浪漫充盈内心，我们可能以为约翰·穆勒会像济慈创作《希腊古瓮颂》那样将自己的一生用来吟诗作赋了。在经过现实与心灵的漂泊之旅后，我们的浪漫英雄回家了，而且比以前更加亲近，这个“家”就是边沁主义。但是，他要对它加以修正和改进。在剩下来的时间里，他的写作和政治生涯表现出了开明的功利主义。约翰·穆勒坚持认为，最大的幸福并不仅仅取决于快乐。领会贝多芬的交响乐或米开朗基罗的杰作所带来的喜悦，并不单纯是感官的欢愉。伟大的作品和功绩通过心灵的升华而带来快乐。边沁曾经说过，只要扑克牌和诗歌能给人带来同样的快乐，它们实际上就是等价物。约翰·穆勒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转而使用隐喻的说法反驳道，他宁愿当节衣缩食的苏格拉底，也不做吃

饱喝足的猪。通过唤醒关于荣誉、尊严和自我发展的柏拉图式的美德，约翰·穆勒提升了功利主义的内涵。出于这个原因，他热心于提倡公共教育。对他来说，经世济国必须要从塑造灵魂开始。

1848年，约翰·穆勒出版了他最主要的经济学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就像他在书中所探讨的垄断厂商一样，这本书长销几十年。牛津大学一直拿这本书当教材，一直到1919年才采用马歇尔的书，这或许是因为马歇尔是剑桥大学毕业的缘故。的确，所有伟大经济学家的著作都是漫漫长路的明灯。1776～1976年，只有5本书盛行于经济学界，它们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约翰·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和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它们的书名缺乏想象力，但却经久不衰。

以归纳法与演绎法来探讨生产与分配问题

当探讨经济学方法时，在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之间挣扎的约翰·穆勒，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找到了出路。追随霍布斯的詹姆斯·穆勒认为，社会科学要像人们进行几何证明一般精确，他从一般性的前提演绎出特定的结论和政策。这些一般性前提通常是以如“自利的人性法则”为中心的。推理是毋庸置疑的，就好像任何人都不能否定三角形有三个角和三个边一样。约翰·穆勒从其父亲那里按照三段论或理性主义的方式来学习经济学。

在他遭遇危机和重塑自我的岁月里，约翰·穆勒学习了不太精确的方法——归纳法。在许多情况下，社会科学家只能透过他们研究的学科来进行观察，并且提出行为模式或趋势的假说，而不是公布无可辩驳的定理。归纳法有两个并不高的目标：发现行为模式，基于那些实证模式做出预测。归纳法不太精确，但并不表示一定比演绎法差。有些学科不适用演绎法。社会科学并不具有演绎性和精确性，因为人们的行为并不总是严格和一致的。演绎法可能更适合于预测僵尸的行为。约翰·穆勒告诫说，一个“明智的实践者”不会“从假定的一般实践准则中演绎出适合于特定情况的行动路线，却忽略了始终如一地回顾思辨科学之原则的必要性”[18]，这些话是向他已经去世的父亲含蓄地打出的一记重拳。

接受归纳法作为一个适当的科学工具的同时，约翰·穆勒也没有放弃演绎法。显然，他具有所罗门王的智慧，他为每一种方法选定一个角色，彼此相互平衡。如果有些经济学家从有缺陷的先验原则开始演绎，经验论者会将观察到的相反例证甩到他们脸上。例如，马尔萨斯人口定律是作为第一个演绎出来的真理而呈现给世人的，我们可以通过观察琳琅满目的超市货架来否定这一定律。另一方面，演绎理论家可以检查经验论者的研究成果是否保持了逻辑上的一致性。举例说明，一个傻乎乎的经验论者认为，因为白鹳的迁徙与纽约市的人口出生率高度相关，因此，控制人口的良策就是将白鹳射落下来。从逻辑角度看，理性主义者可以证明这种有缺陷的观察毫无意义。（当然，一旦一个头脑清醒的经验论者开始射杀白鹳和计算婴儿数量时，他会发现两件事情是相互独立的。）

约翰·穆勒并不总是混用两种方法。事实上，《政治经济学原理》建议用精神分裂的方法看待生产和分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固定法则控制着生产："没有选择的余地，对于生产也不能随心所欲"。因此，要应用演绎法。但是，"财富的分配可不是这样。它仅仅是人类制度的问题。一旦物品摆在那里，不论是个体还是集体，人们会按照他们喜欢的方式处置它们"。[19]

在准确界定地主、工人和资本家所扮演的角色的基础上，李嘉图开始进行生产和分配的分析，然而，约翰·穆勒拒绝在分配过程中进行这种永久划分。没错，在李嘉图的分析中，地主会收取租金，但是，约翰·穆勒坚持认为，社会可以决定让不让他们收取。

约翰·穆勒一分为二的体系似乎错了，原因有二。第一，生产法则并非一成不变。例如，技术进步就无法预测，也无法断言。约翰·穆勒的确暗示了这一缺陷的存在。第二，分配并不能与生产彻底地分离。

并不是一个降低税率的狂热分子才可以对"没收性税率可能会改变个人的行为"表示怀疑。鲍里斯·贝克尔是一位有钱的德国网球明星。在德国，有钱的人被课以重税。贝克尔要从他那百万美元的钱包中掏出多少钱，向波恩市政府缴税呢？一毛钱也不用拿，因为他搬到摩纳哥去了。由于财富分配政策的原因，他转移了自己的生产地。当然，税收并不能说明所有的事情。只有傻瓜才会从贝克尔的故事中得出结论，认为舞蹈家米哈伊尔·巴里什尼科夫是因为税率的问题才离开苏联的。2006年，为避开爱尔兰较高的税收，爱尔兰摇滚明星博诺和他U2乐队的同事悄悄地将他们的音乐工作室从都柏林迁到了荷兰。因为在都柏林音乐节上，博诺责备爱尔兰总理没有将更多的税款用于第三世界的扶贫，这让他的有些崇拜者感到失望。

在《政治经济学原理》后来的章节和版本中，约翰·穆勒的态度趋于温和，不再主张生产和分配之间要有明确的方法论上的区分。

对《政治经济学原理》中提及的所有重要模型加以概述要比原著占用更多的篇幅，因为约翰·穆勒试图把经济学原理作一番全面考察，并增补若干内容。在公司管理、供给和需求是等式关系而非比例关系、萨伊定律，以及在李嘉图比较优势法则中作为主要因素的需求等方面，他的论述具有说服力。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斯蒂格勒的观察，约翰·穆勒对经济学原理的改进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名单：它们彼此之间只有些

模糊的关联。[20]约翰·穆勒只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在不同层面上更换了很多脆弱的“石头”，而不是建立了一个新的基础。

因为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对约翰·穆勒的著作作了类似的修补，我们利用本章检视一下约翰·穆勒和政治经济学或许更好。除马克思之外，约翰·穆勒可能是最后一名“政治经济学家”，他的政治小册子《论自由》与他的经济学著作《功利主义》同样知名。直到19世纪末期，作为一个学科的经济学已经发展得如此专业，以至于很少有人能够同时掌握它和哲学。到20世纪中叶，已经鲜有人能够在经济学领域之内精通两三个或者更多论题。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斯隆说过，当今时代，我们只能有一个选择，要么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探讨越来越少的问题，要么在越来越窄的范围内探讨越来越多的问题。

在约翰·穆勒早期的著作《论逻辑》中，他对实证性和规范性的著作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区分方法。实证经济学描述并预测的是这个世界实际发生的事情，规范经济学主张的是基于一个人的道德哲学所应当发生的事。作为改革者的约翰·穆勒是一个规范性的角色。在其5卷本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前3卷倾向于叙述性，而后2卷则展现了约翰·穆勒的规范性角色，他热诚地推进在更大程度上实现财富均衡、妇女权力与教育，以增进人类的福祉。

任何人都可以举着标语牌并且高呼要求平等和幸福的口号，也可以要求在巴尔的摩驻扎一支全美橄榄球联盟（NFL）的球队。但是，结果不会简单到打出横幅就会产生，好比是把西伯利亚的城镇仅仅改名为“天堂”，好天气也不会从天而降一样。约翰·穆勒的过人之处在于他将规范性的目标与现实分析结合在一起。

以实证法和规范法来确立税收和社会福利制度

在论述税收的章节中，约翰·穆勒精心地平衡着实证性分析和规范性分析。事实上，他在所得税上的立场反映了1986年《美国税改法案》的精神，这个法案尝试“拉平”累进所得税。与亚当·斯密一样，约翰·穆勒提倡比例所得税，即无论所得人的收入高低都课征相同比例的所得税。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累进所得税的税率是随着收入的增加而提高的。约翰·穆勒的分析正好印证了我们前面提到的鲍里斯·贝克尔的例子，因为约翰·穆勒担心累进所得税可能会挫伤工作意愿：

> 相对比较少的收入来说，对较多的收入采用较高的税率，无异于对勤俭节约征税，无异于处罚那些工作比邻居更努力、生活比邻居更节俭的人。[21]

虽然比例税率适用于大部分人，但约翰·穆勒认为穷人可以免税。

在21世纪的大半时间里，美国政府拒绝了约翰·穆勒的建议，而是采取了累进税率。纳税人被划为14个等级，税率在11%～50%的范围内。如果有人得到提拔，升职后她可能会进入税率的更高等级。但是，美国国会最终采纳了约翰·穆勒的建议，并且通过了1986年的《税改法案》。此法案只设立了两个等级的税率，分别是15%和28%。尽管它并不是一个“扁平”的税制，但法案呈现出两个高原的形状，而不是逐渐升高的陡峭山峰。法案也与约翰·穆勒取得了一致，让更多的穷人免于纳税。虽然国会多次修订1986年的税改法案，并且又设立了几个“高原”，但基本原理仍在延续，也就是说，相比20世纪60、70年代，漏洞更少且税率更低。

尽管是部分地和并非刻意地采用，美国国会最终还是采纳了约翰·穆勒的意见，为什么？对于委员会的行动可以有一大堆充分的和蹩脚的理由来解释。正如某人所说，世界的混乱不堪证明了“上帝毫无争议是一个委员会”。比例税率的提倡者认为，累进税率扭曲了对人们努力工作以增加收入的激励。而且，累进的税则鼓励人们在收入所得提高的时候设法逃税。人们可以通过合理避税合法地达到目的，或者通过做假账非法地达到目的。即使公布的税则是累进税率，如果人们逃税的办法足够好，

结果仍然不是累进的税收。实际情况是，在1986年《税改法案》之前，向美国国内收入署（IRS）申报的真实所得税申报单表明是一个相对的比例税率。人们利用税法的漏洞可以让累进税制受到挫败和变形。得到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支持的1986年《税改法案》消除了许多漏洞，并且让逃税不再那么具有诱惑力。该法案已经较为严苛，然而，还是有一些离奇的“钻空子”的方式，包括引诱爱斯基摩人把亏损的生意卖给公司，然后，公司就可以在纳税申报表中将爱斯基摩人的亏损列为税收扣除项。

当然，仍有批评者认为比例税率根本就不如累进税率公平。尽管受到如此的攻击，很显然约翰·穆勒的在天之灵还是赢了，至少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是如此。

如果说约翰·穆勒放了富人一马，减轻了他们的所得税负的话，他却拧紧了遗产税的螺丝。在其哲学和经济学的著作中，约翰·穆勒极力主张“机会均等”，而不是“结果平等”。如果有些子女从父母那里继承了大笔的遗产，他们就拥有了超越其他人的不公平的优势。那么，这些出身富贵的人可能会躺在父母的财产之上养尊处优，而不会费力地创造更多财富。为什么约翰·穆勒对所得税如此审慎，对遗产税反而要求严苛？他的洞察力在于，高额遗产税不会像累进税率一样降低人们的工作意愿。他写道：“为了公共利益而要加以限制的不是赚来的财富，而是不劳而获的财产。”22

不过，他的分析并不是无可辩驳的。在现实生活中，遗产税也会变得难以处理，因为父母在他们去世之前很简单地就可以将财产进行转让。因此，设立赠与税及相关的稽查员制度成为必需。再者，高额的遗产税可能会降低年长者的工作意愿，或者鼓励他们将钱花在奢侈品上，而不是储蓄或者投资于生产企业。总之，遗产税并不是无懈可击的。

小布什总统在遗产税上与约翰·穆勒的观点不同。2001年，小布什说服国会削减房地产遗产税，到2010年降到零税率。然而，该项立法在2010年12月31日到期。因此，2011年1月1日，遗产税的最高税率又反弹回原先的55%。有人称2001年的法案为（逼着人们）“把妈妈扔出火车的法案”。

约翰·穆勒对有钱人的征税并没有停顿在遗产税上。尽管谈了恋爱，也受到边沁主义的熏陶，约翰·穆勒还是反对有钱人过着纯粹骄奢淫逸的

生活。他强烈要求对狂欢派对和炫耀身份地位的奢侈品征税。远在索尔斯坦·凡勃伦之前，约翰·穆勒就宣称："将金钱浪费在这样的物品上……根据某种观点"，它是"最适合征税的物品"。[23]有时，约翰·穆勒给人的感觉是，他可以从向富人征税中获得与富人变富同样多的快乐。考虑到这其中有他认识的富人，也有他所关心的穷人，我们不能责备约翰·穆勒。他对于助他形成主张的社会环境，总是心存感激。

对于社会如何做到向穷人发放救济，却不会成为穷人找工作的阻力，约翰·穆勒也感到疑惑不解。没有明确的答案呈现在他面前。约翰·穆勒把身体健全的人和残障人士、老年人与小孩子区别对待。约翰·穆勒论证得没错，社会不能因为担心影响残疾人的工作意愿就切断对他们的救济。约翰·穆勒接受济贫法改革皇家委员会的决定，并且反对取消对残障人士的补助。然而，约翰·穆勒觉得对身体健全的人不能这么宽松仁慈。他主张福利接受者要用劳动来换取政府的福利支付。在忽视约翰·穆勒的呼吁几十年之后，1988年，美国联邦政府和一些州政府才正式通过"工作福利"方案，在这个方案中，接受健康福利的人必须接受雇用或者职业培训。联邦立法之父、参议员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努力争取了许多年，为的是将福利重新定义为通向最终就业的过渡。虽然1988年的工作福利方案漏洞百出，它却激起了针对这一问题的全国性的热议。美国人已经习惯于保守派对福利国家的严词苛责，正如里根总统发起的旨在反对为了拿福利而生孩子的"福利女王"运动一样，这些人是开着凯迪拉克到银行兑现政府支票的。1985年出版的《好心办坏事》备受争议，由于坚持认为福利支付制度事实上拆散了黑人家庭，它既赢得了喝彩，也受到了谴责。虽然，1992年阿肯色州州长比尔·克林顿宣布，如果他当选美国总统，他会朝着"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改革工作福利制度，"保守派"的工作福利主张还是大行其道。出乎意料的是，自由主义的政客们得以毫不害臊地跳到反对工作福利制度的战车上。在与国会争论了几年之后，1996年克林顿总统签署了《个人负担与工作机会调和法》，该法对公共援助规定了时间限制，并且对于成功协助福利领取者就业的州给予奖励。当共和党人称赞是由他们协助拟定了这项法案时，一些白宫顾问却要以辞职抗议，他们认为这样的法案对福利领取者过于严苛。在极为健康的就业市场的联合作用下，失业率降到了3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在2000年4月达到3.9%），并且将福利名单上的人数减少了几百万人，这项新的工作福利制度超出了人们的预期。当然，如此强劲的就业市场无论如何都会吸引一些人脱离失业救济金，但毫无疑问，新法对他们的就业提供了额外的推动力。

威斯康星州的先导模式领先了联邦法律许多年。该州考虑让原先领取救济金的人经历一个过渡期，根据需要，给他们提供“尝试性的工作”、托儿服务和医疗服务。纽约市仿效威斯康星州的模式，从1993年以来，福利名单上的人数得以减少了34%。（1960～1993年间，纽约市的福利名单上的人数从25万人猛增至120万人。）即使领取福利的母亲又生了一个孩子，新泽西州的新福利方案也没有给她任何额外的补助。美国罗格斯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这一严格的法令促使更多贫穷的妇女采取节育措施，因此抑制了她们的生育率。社会福利改革是一场经济变革，同样也是一场文化革命。马萨诸塞州的公共福利部将其门口的牌子更换成了“过渡援助部”。佛罗里达州将其福利方案定名为“工作与获得经济自足方案”。对于批评者来说，这等于是打了英国作家乔治·奥韦尔一巴掌。对于支持者来说，这样做是让失业者进入一种体面的心境之中，从而得到自尊。

然而，约翰·穆勒的计划方案更为严格，因为他认为这些工作必定与那些最不幸的独立工人获得的岗位一样艰难费力。以现代观点来看，真的是找不到理由阻止领取社会福利的人为谋求更有价值的工作而接受培训。虽然如此，约翰·穆勒还是又一次展现出其非凡的先见之明。

约翰·穆勒担心如果社会福利随意发放，穷人子弟将会出生于缺乏勤奋工作这一道德原则的家庭。甚至更要命的是，他认为较高的福利支付只能促进较高的出生率。因此，约翰·穆勒不接受社会主义和浪漫主义关于提高救济福利金或工资的建议。这些规范性的努力忽略了关于人类天性的实证性信息。约翰·穆勒需要将其规范性的政策牢固地建立在成熟、理性的模式基础上。

凭借其幼年的记忆，约翰·穆勒回忆起教育的力量。他支持为靠救济度日者提供公共教育。但是，教育可不只是包含读、写和算。他不认为反复灌输资本主义的价值观有什么错。资本主义社会有责任教育其公民如何在商业社会中取得成功。马克斯·韦伯后来所称的“清教徒式的工作伦理”并不是生物学的特征。假定它剥夺了穷人走出贫民窟的唯一希望：“对我来说显然是不可能的，但是，劳工阶层中间对知识的增加、教育的提高和对独立性热爱程度的上升，必须伴随解决实际问题的智慧的相应增长，这种智慧要用节俭的行为习惯来加以证明。”[24]约翰·穆勒想把道德教育和经济激励结合在一起，比如他建议，政府要向穷人提供我们现在所称的“住房改善贷款”。

关于约翰·穆勒对自由放任政策和政府干预的态度，可能要写好几本书。简而言之，他选择走中间道路。他拒绝空谈理论的自由放任的立场，仅仅接受了自由放任的假定。也就是说，政府的支持者有责任证明要想获得更大的幸福需要政府的干预："对（自由放任政策）的每一次背离必定是邪恶的，除非是因为有莫大的好处要求这样做。"[25]很明显，国家应当征税、铸币、抗敌、成立法庭，诸如此类。但是，像消费者保护、教育和商业管制这样的"可选"功能应当本着"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态度加以对待。比如说，相对国家福利而言，约翰·穆勒更偏爱私人慈善，但他知道慈善救济也只能是成功的一部分而已。穷人会很开心地接受任何的捐助，但有钱人未必愿意捐款（部分原因源自"搭便车"效应——人们会想当然地认为其他人会承担起这个责任）。所以，国家应该利用税收来养活穷人。

约翰·穆勒的方法再次显得现代味十足。如果活在今天，他会认同许多当今的政府机构，这也的确是他当初所预想的。然而，他确信所有的提议都会通过严格的假设测试，因为"缺乏耐心的改革者认为，从政府下手要比从大众的理解力和倾向性入手来得更容易和更迅速，他们不断地受到诱惑，要让政府逾越正当的职权范围"。[26]阅读亚利西斯·德·托克维尔的经典著作《论美国的民主》让他认识到局部规划要优于集中计划。

在许多方面，约翰·穆勒的立场反映了当时政府的立场。英国在许多重要的方面都迈向了自由市场经济，但也建立起了防范剥削的机制。威廉·格莱斯顿领导着英国议会终于在1846年废弃了《谷物法》，并且降低了所得税。即使当自由市场拉响了警报并最终震撼了欧洲之际，在1802年、1819年和1833年，英国议会还是通过《工厂法》来限制雇用童工，这种对童工的保护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约翰·穆勒对两者都表示赞同，不是出于不假思索的意识形态，而是出于审慎的推论。

战胜了风车的勇士

多数经济学家忍不住要预测长远的未来。如同亚当·斯密、马尔萨斯、李嘉图、马克思和凯恩斯一样，约翰·穆勒糅合了李嘉图和圣西门社会主义的论调，为未来描绘了一幅印象派风格的愿景，而圣西门社会主义是推崇产业工人的乌托邦运动。从李嘉图那里，约翰·穆勒洞悉了停滞状态的可能性。从圣西门那里，约翰·穆勒又增添了令人愉悦的色彩——停滞状态可以是快乐的。李嘉图构建了一个理论模型以便追踪收益递减、市场封闭和利润下滑的结果，约翰·穆勒却描绘了一个几近人间天堂的神学模型。在遥远的将来也许有一天，为钱财而发生的纷争可能会停止，而且人类会提升自我而不是炫耀财富。在大萧条时期，凯恩斯也表达过类似的愿景。

前面讲过，约翰·穆勒给人以启迪的功利主义在微积分中为柏拉图留了一席之地。他向往着有朝一日人类更在乎的是尊严、诚实和公正，而不是加班和透支：

> 我无法……以一种坚定的厌恶态度来看待资本和财富的停滞状态，尽管老派的政治经济学家对待它的态度是普遍的反感。我倾向于认为，就整体而言，这对我们现在的境况是一个相当大的改进。我承认，我没有被生活的理想所迷惑，那些坚持生活理想的人认为人类的正常状态是拼命地出人头地，以及人与人之间相互蹂躏、压榨、排挤和践踏，这些构成了社会生活的现存形态，是很多人最渴望的，而绝不是工业进步其中一个阶段令人讨厌的病症。[27]

与马克思一样，约翰·穆勒认为人类终究会超越“必然的王国”，步入这样一个时代，到那时，人们可以选择不再为生计争斗，而是为了增加他们的人性光辉而奋斗。约翰·穆勒认为，只有“世界上的落后国家”才真正需要经济的更快增长，发达国家只需要一个较合理的财富分配机制，或者至少要有一个良好的社会风气。他公开谴责美国，并且认为美国的贫困虽已消除，但“男人的生活却是专心致力于狩猎美元，女人的生活则是孕育美元猎手”。[28]人们想知道约翰·穆勒是否喜欢我们的新世界，所有人可以在这里自由地求财逐利，机会均等。

我们要给约翰·穆勒描绘一幅什么样的肖像呢？它太印象派了，以至于我们无法演绎或者归纳出任何确切的结论。随着新版《政治经济学原理》的问世，它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更同情社会主义。然而，约翰·穆勒从来没有表现出同情心。他可以体谅空想社会主义者，但从没有在他们的请愿书上签名，或者与他们一起游行示威。正如拜伦勋爵所说："我站在他们当中，却不属于他们。"约翰·穆勒从没有放弃对竞争的信仰，以及对中央集权的托克维尔式的恐惧："我完全不同意（社会主义者）所宣讲的学说中最显著和暴力的部分，以及他们反对竞争的雄辩……他们忘记了，无论在哪里，竞争不存在了，垄断就会取而代之。"[29]

在我们中间，几乎没有人会放弃对天堂的向往。有钱的人可以在某些热带岛屿上寻找到他们的乐土，善男信女寄希望于来世，乐观之人期待明天。而约翰·穆勒则是为今日而奋斗，并且希望在明天之后能够过上一段田园诗般的日子。

19世纪60年代，约翰·穆勒在其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和在英国议会上都在为捍卫其"原则"而斗争。作为一个一以贯之的人权斗士，约翰·穆勒支持妇女的选举权和穷人的投票权，并且拥护美国内战时期的北方联邦军。按照鲍尔弗勋爵的说法："穆勒在英国的大学里深具威望……堪比中世纪时期亚里士多德所造成的影响。"[30]

他的自传描述了一个与传统政治家大不相同的穆勒。当第一次被要求参选公职时，他"确信"的是，几乎任何人都"不会真心希望被持有他这样观点的人代表"。他公开拒绝参加竞选活动或为竞选花费钱财。他只是做出一个承诺：如果当选，他绝不会将时间花在争取地方利益上。当时的一位著名作家就声称："发表此类的声明，再神通广大，他也没有机会赢得选举。"在"竞选活动"的最后关头，他参加了一场工人的公众集会。竞选对手冷不丁打出了横幅，上面引用了约翰·穆勒评价英国工人阶级是"骗子"这样直言不讳的话。他的话被继续引用道：美国的工人阶级要好于外国的工人阶级，因为他们有愧疚感。此时此刻，任何其他的政治家都被"浑身涂满柏油并被粘上羽毛"了，难以全身而退。约翰·穆勒回忆道："我被问及是否写过并发表过这样的话，我立刻回答'是的'。"他的支持者们惊慌失措，开始担心自己的小命不保。"这两个字刚说出口，热烈的掌声就响彻了整个会场"。工人们终于发现了一个他们可以信任的人。31

约翰·穆勒于1873年辞世。虽然他没有在战争中打过仗，也很少提高

嗓门说话，或者接受挑战，他的一生却一直在斗争。他与顽固者、精英人士、理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抗争。他向在幼年时期深深印刻在他大脑中的信仰发起了挑战。18世纪英国政论家埃德蒙·伯克曾经哀叹“骑士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诡辩家、经济学家和精于计算的人成功了，欧洲的荣耀永远地消失了”。[32]骑士精神仍然激励着约翰·穆勒。他最勇敢的决斗和征服是战胜了他心中的风车。

第六章 卡尔·马克思：愤怒的神谕

小时候，亚当·斯密曾经被几个狡猾的吉卜赛人绑架，在挟持了几个小时之后，这伙人把他扔在了路边，他才得以回家。一位传记作家说，这个天真而又心不在焉的经济学家不是当吉卜赛人的好材料。或许有人会说，卡尔·马克思从来没有被资本家绑架不失为一件幸事。他不是做资本家的料，也不是一个好的消费者，因为马克思总是负债度日。

在对资本主义的法则以及控制文明进步的隐含密码进行深入探究之后，马克思以强有力的言辞和颇具煽动性的方式，预言了资本主义的崩溃。

马克思在经济思想史中的位置难以确定。当今有些主流经济学家把马克思贬抑成中产阶级鸡尾酒会上的话题。但是，仍有10亿人声称是在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制度下生活。除弗洛伊德和达尔文之外，马克思对20世纪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在有生之年，马克思并不出名，也没有多少追随者。即使是他那个时代最为饱学之士约翰·穆勒也从没有听说过他。

在德国莱茵兰的特里尔，马克思的人生从一开始就享受着中产阶级的生活。马克思生于1818年，他周旋在特里尔中上层人士之间。后来，马克思表达了他对于父亲的自豪感，他的父亲海因里希是一名出色的律师，并拥有一座葡萄园。马克思童年的朋友也是未来的妻子燕妮就住在他家附近。燕妮的父亲冯·威斯特法伦男爵就像是年轻马克思的叔叔一样。

当他的哥哥在4岁早夭之后，马克思承继了长兄的角色，并且开始对不如他聪明的妹妹们施行“恐怖统治”。他最喜爱的游戏包括像骑马一样赶着妹妹们全速穿行在特里尔的大街小巷。除这种骑马比赛之外，马克思也强迫他的妹妹们参加品尝蛋糕的“锦标赛”，去吃他用未洗的手和脏面团烘烤出的蛋糕。不过，他的妹妹们还是很钦佩马克思的才华和逗趣的故事。马克思的同学对他也是又爱又怕，这个男孩搞完恶作剧可以面带微笑，做出讽刺诗却又耸耸肩不以为然。

马克思的一生有进行尖刻批评的倾向和癖好。他把一些最激烈的字眼留给了犹太人。马克思的父母都出身于犹太拉比的名门望族，他的叔叔担任特里尔城的首席拉比。然而，反犹太的法令驱使他的父亲改信基督教，虽然他仍然称犹太人是他的“信仰伙伴”。然而，他的儿子对犹太祖宗的排斥已经成为一种乖张的乐趣。学者们可能对他是否真的反犹太教存在争议，但卡尔·马克思对犹太人恶语攻讦是勿庸置疑的。[1]

如约翰·穆勒一样，马克思既接受了理性主义，又喝下了浪漫主义的“药水”。他的父亲向他提供了因英国经验主义而变得芳醇的18世纪法国理性主义，建议他的儿子“服膺”于“牛顿、洛克和莱布尼兹的信仰”。[2]同时，在田园风光般的林间散步之时，文化修养很高的威斯特法伦男爵讲述了莎士比亚、荷马和浪漫主义者的故事，这让年轻的马克思十分着迷。不无讽刺的是，正是这个贵族男爵第一个向马克思介绍了无阶级差别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若不是父亲敏锐的洞察力，马克思或许早就相信了乌托邦主义者模糊而又热切的见解。但是，在乌托邦主义者看到无限幸福的地方，马克思看到了斗争。

在波恩大学时，马克思所面对的最大的斗争是克制自己饮酒的欲望和忍住不要花父亲的钱。马克思败下阵来，海因里希因此失去了很多钱。马克思研修法律，并且在因为酗酒被关进监狱时获得了法律的某些实践经验。因为大学里有自己的酒鬼禁闭室，所以对他的关押处罚算不上有多严重，探监的人可以与“囚犯”一起打牌，还可以继续喝酒。这样的恣意妄为证明是有用的。马克思在政治上取得的第一次胜利就是赢得了特里尔酒馆协会的会长一职。

马克思在波恩大学搞了一年的派对之后，便被父亲海因里希转学到了柏林大学，他希望这是一个能让他儿子清醒的地方。不过，海因里希很快就心灰意冷了：“就好像我们是金子做成的，我们的绅士儿子仅一年就花了差不多700泰勒，违反了我们所有的协议和用途，而最有钱的人也不会花费超过500泰勒。”[3]债主起诉了马克思好几次，在柏林生活的5年间，他被迫搬过至少10次家。

海因里希不只是抱怨他的肆意挥霍，卡尔·马克思还是一个邋遢之人，是蓬头垢面大学生的守护神。黝黑的肤色为其赢得了“摩尔人”的外号，后来，他的孩子和朋友们也这样亲切地称呼他。有着黝黑皮肤和纠结纷乱长发的他成为学生们不修边幅的借口。

海因里希也反对马克思在哲学和法律学术上的漫不经心。如果马克思闲逛，那他一定是在教室的外面。大学生涯的最后几年，他只选修了几门课，并且成为“放荡不羁的学生，仅仅是把大学当成了他的露营地”。[4]然而，马克思自学了哲学，而且加入了青年黑格尔派，他们是激烈的宗教批评者，并且是黑格尔折中主义的追随者。黑格尔是柏林的哲学家，在马克思开始大学生活的前几年去世。马克思巧妙地采用了黑格尔的方法，向世人证明逃课有时是值得的（虽然经济上并不划算）。

不幸的是，马克思从来没有向他父亲证明这一点，他的父亲死于1838年。马克思对他的父亲仍然保留着很深的感情，总是随身携带着父亲的照片。顺便说一句，马克思从来没有对母亲表达过这样的感情，只是把她看作是一个小气的资金来源。他既没有参加她的葬礼，也没有在她过世时掉一滴眼泪。

在他父亲死后，马克思认为结束自己的学业是精明的决定。突然之间，他急切地离开大学校园，并且拒绝将他论述希腊哲学的论文提交进入柏林大学严格的学位申请程序。相反，他把论文寄给了吉恩大学，这是一个以滥发文凭而闻名的大学。6周的函授课程时间太长了。仅仅几天，吉恩大学就拿出磨损得十分破旧的橡皮图章，授予了马克思博士学位。

年轻的记者

手持文凭，马克思漫步进入新闻界，开始写作，之后编辑一份自由主义中产阶级的报纸《莱茵河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阻止了倾向于共产主义的更为激进的供稿者。对舆论实行压制的普鲁士政府对批评的审查十分卖力，马克思要经常与几近低能的政府官员打交道。一位新闻审查官员要禁止一则但丁《神曲》的翻译版本广告。什么原因呢？在普鲁士，你不可以用喜剧来嘲弄神圣的东西。

马克思在报纸任职时期的一位观察家留下了一段文字，让人们对这位年轻的编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 来自特里尔的卡尔·马克思是一位24岁的健壮青年，浓密的黑发从他的脸颊、手臂、鼻子和耳朵里冒出来。他盛气凌人、冲动、热情，并且内心充满了无比的自信，但与此同时他又非常热诚和好学，他还是一个烦躁不安的辩论高手，有着犹太人永不休止的洞察力，据此他将青年黑格尔派学说的每一个命题都推出了最终的结论。当时他对经济学的潜心研究已经为他向共产主义的转变作好了准备。在马克思的领导下，这份年轻的报纸很快开始不计后果地发表言论。[5]

对于马克思的这种莽撞无礼，普鲁士政府做出了反应，提出了两种选择：要么报纸关门，要么马克思走人。马克思只好离职。

他丢了工作，但与此同时娶了燕妮·冯·威斯特法伦做他的妻子。她的亲友认为这位高贵人家的女儿是在委身下嫁，但是他们却想不到她的屈尊会低到什么程度。

1843年，马克思一家搬到了巴黎，他在当地编辑一份政治评论杂志，并不是很认真地开始考虑共产主义，并且与其他年轻而傲慢的激进分子混在一起，海因里希·海涅将这些激进分子描述为“不信神且自封为神的一群人”。[6]在马克思和他新认识的共产主义的朋友与联合编辑阿诺尔德·鲁格决裂之后，该杂志就只出版了一期。鲁格也学着鄙视这群无神论者：“他们希望解放人民……但目前他们却赋予资产尤其是金钱以极大

的重要性……为了使无产阶级从智力和身体上摆脱悲惨命运的重负，他们向往有一个组织，但这个组织却会让这种悲惨更普及，并且让所有人生活在它的重压之下。”[7]

同样是这群人中的一员，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却成为马克思维持生活和生计的关键。作为富裕工厂主的儿子，恩格斯过着双重生活。白天，他在父亲的企业里上班，作为一个资本家赚取丰厚的薪水。晚上，他阅读黑格尔的著作和共产主义的文献。虽然是一名德国人，恩格斯在英国却居住了多年，经营自家的纺织企业。在曼彻斯特工作过一段时间之后，他写出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毫不客气地揭露了英国的贫穷。但是，恩格斯并不情愿将他作为资本家的所得捐给穷人，或者宣布放弃他那资产阶级的习惯。事实上，他似乎并不因为过着双重生活而受到精神的煎熬。他仍然相当惬意地享受着猎狐、抿着嘴品尝雪莉酒和击剑。他可以举着一杯最上等的香槟，优雅地向无产阶级敬酒。

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开始形成改变世界的学说。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赞同他。通过宣判他的叛国罪，普鲁士政府表明了它对马克思著作的态度。一年后，法国将其驱逐出境，他逃到了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

到底是哪些背信弃义的著作迫使马克思及其家人在欧洲国家之间搬来搬去？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为他的资本主义研究打下了历史的和哲学的基础。这些理论又证明了什么呢？它证明了资本主义的根基正在迅速地崩溃，民众很快就要爆发革命，撼动着资本家的基座，直到他们从上面滚翻下来。

唯物主义史学家

马克思的哲学和历史沿用了黑格尔的术语，但他并不是机械地人云亦云。马克思可能使用了相同的词汇，但他改变了顺序。为了弄明白他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让我们先仔细考察一下他导师的主要学说。

黑格尔教导人们说，哲学是旨在展露思想的知识。人类的精神和思想观念引导历史。物质世界、我们看到和触摸到的物质和社会制度是步思想后尘的。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其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也采用了这一论点。简而言之，韦伯宣称新教的兴起导致了资本主义，也就是说，对上帝的信仰改变了经济制度的性质。

根据黑格尔的观点，我们可以从占主导地位的民族主义来追溯历史的进程：埃及时代、希腊时代、罗马时代等等。作为一名爱国者，黑格尔认为普鲁士是当时的领导国家。

马克思反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追随着德国哲学家路德维希·费尔巴哈，马克思注意到了历史中唯物主义者所具有的力量。按照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一书中的观点，神只是人类欲望、需求和特质的投射。人创造神，而不是神创造人。是人这个真实的物质带来了神的概念。（费尔巴哈的著作使得马克思后来宣称宗教是“人类的鸦片”。[8]当人们将他们的憧憬寄托给上帝和来生的时候，他们就会消极地接受现实世界中的物质条件和不公平。）

到目前为止，马克思听起来更像是一名半途而废的黑格尔派哲学家，而不是一位青年黑格尔派成员。但是，马克思保留着打开黑格尔派哲学方法的钥匙：辩证法。黑格尔坚持认为：就像现实一样，历史并不遵循一个平滑的、渐进的模式，它也不是由一系列独立事件组成。历史是由敌对力量之间的斗争所组成。每一种思想都包含着它的对立面。哲学家通常如此概述黑格尔的辩证法：每一个正题或思想都会遭受其反题的对抗。思想之间的相争产生了合题，这是一个新的命题。新命题然后再面对其反题。虽然夸夸其谈的历史学家可能会重复自己所说的话，但世界永远都在变化，历史从来不会重复。

辩证法堪比经济学中的牛顿方法，这个方法观察的是不变的因果关

系。在黑格尔的视野之中只有一件事情永远不变，那就是永远存在着改变。

马克思将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融合起来。恩格斯后来将这种结合称为辩证唯物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如果说黑格尔的头脑是高耸入云端的话，马克思则把我们拉回了地面。他说过历史是发生在地上的。把研究宗教、伦理或民族主义的事忘记吧。瞧一瞧窗外，看看人们是如何在为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而拼命。没有人类就没有历史，而没有食物就没有人类。因此，“第一件历史行为是……满足这些需要的生产资料的生产。”[9]唯心主义历史学家可能也会写出《绿野仙踪》中奥兹国的历史。

马克思将历史进程分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这个轨迹不取决于星星或者法律，而是由生产决定的，更明确地说，是由人和生产的关系决定的。每一个生产体系都创造出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每个时代都有其为统治者榨取收入的独特方式作为标志。在罗马时代，谁拥有奴隶谁就拥有其产出的索取权。在封建时期，地主拥有农奴劳动产物的索取权。在资本主义社会，工厂老板和地主拥有雇用工人生产产品的索取权。主人阶层的生存要依赖仆人阶层的劳动。但这样给工人们增加了谈判的筹码了吗？没有。工人必须与统治阶级合作，因为统治者控制了生产资料。工人不能“把他们的大理石拿回家”。因为他们并不拥有大理石。

因此，彼此之间相互依赖。然而，统治者努力表现得好像他们需要工人并不如工人需要他们那样多。如果他们成功地表现出了这一点，就等于增强了他们的主导地位。

统治者如何确保他们的地位呢？在这一点上，黑格尔对伦理、民族主义和思想的担忧就派上了用场。统治阶级开发出支持生产过程的信念、法律、文化、宗教、道德和爱国主义。一个有爱国心的工人在工作时会加快步伐，并且不会多次借喝咖啡的时间休息来欺骗雇主。当今，美国汽车制造商和酿酒厂喜欢将美国与“一天愉快而实实在在的工作”联系起来。就像雪佛兰汽车的广告语“棒球、热狗、苹果派和雪佛兰”突然之间就变成了一种美国人的生活方式。雪佛兰汽车事实上取代了母亲。（美国人的恋母情结之梦会包括对父亲车子的欲望吗？）

我们的道德与法律体系教导我们若逃避工作应当感到愧疚。为什么工厂主和地主有权得到我们用血汗创造的利润呢？因为他们拥有资产，

我们只能如此回答。但为什么我们要接受这个法律体系呢？马克思问道。

根据马克思的认识，与私有财产系统有利害关系的统治者会对大众施催眠术。建议、游说的力量引领着美国人去梦想股票、债券和宝马汽车。当然，个人会认为那是自己的梦想，并将这样的建议藏在心底。马克思称这些支持性的思想观念、法律和道德观为上层建筑。

马克思的经典论述出现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导言中：“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了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知识生活……并不是人的意识决定了他们的存在，而是相反，他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他们的意识。”[10]

农奴向封建领主鞠躬以表达自己的忠诚。学徒期满后的工人为能给大师傅打下手而引以为荣。受雇的工人努力工作以寻求升迁。在这种统治体系之中，他们全都在辛勤劳动，为的是谋求更好的生活。

马克思并没有说统治阶级心照不宣地共谋建立上层建筑。所有者可能是真的信仰他们的宗教，而不是机械地看待它。上层建筑的出现是因为生产过程扭曲，并且塑造了人们的思想认识。对马克思来说，“人类创造了自己的历史，但是却不能依据他们的喜好来创造历史。他们不是在自己所选择的环境里创造历史，而是在直接遭遇过的、给定的和从过去承接下来的环境中创造历史的。所有先人们的传统就如噩梦般重重地压在活着之人的心头。”[11]（顺便说一下，恩格斯后来承认马克思和他有时过于强调生产对上层建筑的因果关系。信念偶尔才会有实质性的结果。）

如果道德风气和文化自动产生以支撑阶级体系的话，为什么马克思会在《共产党宣言》中宣称“迄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12]为什么什么人都要斗争？有人知道如何首先开展斗争吗？所有者只是压榨工人，而工人心甘情愿地接受压榨，就像洗过脑的统一教信徒在机场发放雏菊一样心满意足。只要是统一教信徒或工人得到一点象征性的好处，经济就会继续运转下去，利润就会滚滚地流进所有者的银行账户。

当生产过程的技术发生变化时，反抗就会爆发。新技术或新方法改变了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的数量或质量。通过发现、发明、教育和人口

增长，生产的物质力量是动态的。随着新物质力量的加入，旧的生产过程变得过时。例如，当土地相对于劳动力的比率较高时，奴隶制度就会产生利润。但如果拖拉机和收割机的作业比奴隶更有效率，或者如果工人的人口增加，奴隶制度创造的利润就会比较少了。未来取决于新的生产过程。

但是，不要忘记，整个的政治、伦理和法律体系都是建立在旧生产方式之上的。牧师鼓吹说奴隶身份会引领人们进入神的国度。这是刻在人们大脑中和中世纪天主教堂石板上的永恒真理。因此，上层建筑似乎是静止不变的。

当旧的统治阶级紧抱旧思想观念，并且阻碍新的经济发展，借此将自身封闭起来，置身于历史的动态过程之外时，斗争就发生了。马克思写道，手动磨坊产生了封建领主，而蒸汽磨坊则宣告了工业资本家的来临。但是，封建领主要与他的继任者实业家作战。之后，行会会长与工厂主又发生争吵。把圆桌武士兰斯洛特爵士和加勒哈德的故事忘了吧。手持最尖锐长矛的真正比武不是发生在骑士之间，而是发生在封建领主和商业力量之间。

当土地、劳动力、资本或者技术转移之时，统治阶级总要面临着威胁。他们可能会从“纸牌搭成的房子”的阁楼上滚翻下来，与此同时，还尖声叫喊着他们哲学中的“永恒真理”。历史会重新洗牌，手持王牌的人可能会被砍头。

有一个故事可能会有助于理解。从前，有个机敏的哨兵向一位虔诚的封建领主发出警告，说是要有洪水发生。这个领主急忙跑进教堂，祈求上帝的拯救。当大水淹到这座神圣殿堂的台阶时，一个农奴划着一只小船来到台阶，要求领主上船。“不，谢谢。我相信上帝。我也相信正义。上帝会救我的。”因为水面上涨，这个领主走到了布道坛。这一次一艘汽艇朝着他冲过来。就在大水拍打泼溅着教堂里的长凳时，驾船人大叫：“我来救你，跳上来吧！”这个贵族领主再次答道：“不必担心。我相信上帝。他会救我。我不需要这种嘈杂的机器。”最后，洪水淹没了教堂。领主抓住了教堂最高尖顶的最高处，身体被浪头拍打着，这时一架直升机飞临他的头顶。驾驶员叫喊着：“求你了，我的领主，抓住这个梯子吧。”领主再次回答道：“不用担心。我相信上帝，他会救我的。”过了一会儿，水面升得更高了，领主淹死了。

在天堂之上（毕竟他是个好领主），他面见上帝。“上帝，”他说，“我毕生都在相信你。我遵行了神父告诉我的每一条圣喻。当其他人怀疑并且求助于机器时，我相信你会救我。但你却让我淹死了……”

“笨蛋！”上帝打断了他的话，“你以为是谁会派划船、汽艇和直升飞机去呢！”

不与历史唯物主义一起随波逐流的人，会被淹死在这个潮流中。马克思对这个潮流进行了描述：

> 在它们发展的某个阶段，社会中生产的物质力量与现存的关系产生冲突……这些关系会变成它们的束缚。之后便进入社会革命的阶段。随着经济基础的改变，整个庞大的上层建筑或多或少地要进行快速变革。在考虑此类变革时，总要将可以利用自然科学的精准性加以确定的生产经济条件的物质变革和法律、政治、宗教、美学或哲学—简言之，即意识形态的变革加以区分。在这种意识形态中，人们会觉察到这种冲突，并且斗争到底。[13]

因为资本主义建立在阶级体系之上，工人闹革命并取得胜利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的杰作《资本论》描述了“与刚性需求共同作用导致不可避免之结果的潮流趋势”。[14]只有无阶级的社会才能避免革命。在马克思的憧憬之中，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终会来临。腐朽堕落的资本家终将被消灭。在遭受几个世纪的剥削之后，劳动者最终必获自由。

如果资本主义因为“刚性需求”而瓦解成社会主义，是不是封建主义必然要瓦解成资本主义呢？会不会资本主义是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上必然要停靠的一站呢？如果是的话，资本主义就不像许多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看到的那样，只是一场没有酬劳的大屠杀，或者是人类的飞来横祸。马克思被无科学知识的浪漫主义者所排斥，这些人把资本主义描述成是由邪恶之人谋划的恶意事故。事实上，马克思为资本家谱写了某些最动人的赞歌，因为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将人类从更恶劣的环境中解放出来。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向昏头昏脑散布怀旧之情的人表示了轻视：

> 凭借所有生产工具的快速进步和交通工具的极大便利，资产阶级将包括最野蛮民族在内的所有民族都拉进了文明。其商品的廉价犹如重炮，用它轰倒了所有难以逾越的壁垒，也用它迫使未开化的

> 民族怀着对外国人强烈而又难以消除的仇恨有条件地投降……资产阶级在其不到100年的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以前世世代代加在一起创造的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5]

马克思可能批评过资产阶级，但他把最尖锐的攻击都留给了背离自己理念的那些信仰社会主义的同道中人。他不是一个同盟的营造者，即使是在他最易相处的时候，他也是一条盘绕起来的巨蟒。如果活到现在，马克思可能会痛恨德国的绿党，幻想着它的成员被他们（吃葡萄时不吐的）葡萄籽噎住。他写道，资本主义“将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从乡村生活的极端愚蠢中拯救了出来”。[16]如果可能，他会将“回到自然”活动的倡导者送回到他们的历史书中，让他们知道工业化之前的生活有多么可怕。马克思用《哲学的贫困》言辞尖刻地回应了皮埃尔·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有智慧的人不会试图抹掉或“召回”历史阶段，再把它们送回到上帝的小工厂里加以修理。

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必要的前提条件。因为资本主义的产量如此巨大，它允许驱动系统较弱的社会主义接踵而至。资本主义以前的国家不存在希望进行共产主义革命进而推翻封建领主或沙皇的企业。马克思没有指望苏联，他也没有预料到共产主义这么早来到德国，因为当时只有4%的男性劳动力在工厂里做工。资本主义的枷锁应该首先在英国和法国被猛然打开才对，它们可是发达资本主义的大本营。法国应当在德国的共产主义成熟之后再发出信号：“当所有的内部条件达成之际，将由法兰西雄鸡的报晓宣告德国复兴之日的来临。”[17]

资本与资本主义的崩溃

马克思并不只是骄傲地静候公鸡报晓。相反，他骄傲地将自己对资本主义的权威解剖写成了《资本论》。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埋首于伦敦大英博物馆成堆的经济学藏书之中。当他抽象地分析无产阶级所遭受的痛苦之时，他的家人正在挨饿。马克思一家住在一间简陋的公寓里，位于伦敦其中一个最贫穷的区域。一位调查马克思的警探对他的家庭所忍受的肮脏作了极为生动的描写：

> 进入马克思的房间，就会看到煤烟和烟草的烟雾云遮雾绕，视线如此模糊不清，以至于刚开始那一会儿，你要摸索着走，像在洞中……所有物品都是脏的，全都布满灰尘，坐下来成为一件十分危险的事。这边立着一只三条腿的椅子，那边孩子们在另一只椅子上玩耍和准备食物，碰巧那只椅子还算完整。

至于马克思本人，“他是一个很不修边幅又愤世嫉俗的人，贫穷的一家之主。他过的可是真正的吉卜赛生活方式。洗澡、装扮和更换内衣对他来说是稀罕事。他很容易喝醉，经常整天地闲逛，但要是有活做，他就会不知疲倦地夜以继日地工作。”虽然是吃贵族家的饭长大的，燕妮却“对这样的不幸处之泰然”。[18]

在伦敦五年的凄惨岁月里，因为肺炎、支气管炎和结核病，马克思失去了三个孩子。更让人震惊的是，丧事承办人不让他们赊账。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燕妮曾经不得不为一个孩子的棺材乞讨了2英镑。虽然马克思常常被外人所嫌恶，他的孩子还是让他性格中人性的一面显示了出来。当孩子们离世的时候，他也身心俱碎：

> 培根说过，真正了不起的人物与自然和世界之间有许多的联系，可以感兴趣的目标如此之多，以至于他们很容易就可以从任何的失落中恢复过来。我不在这些了不起的人物之列。我孩子的死亡重重地击碎了我的心智，我感觉失落，这种感受就像孩子死亡第一天那样鲜活。[19]

当然，马克思将自己的困境归咎于资产阶级，并且发誓要让他们为他家庭的不幸和自己的小病小疮付出代价。

马克思应当自责，但他很少这样做。对于家庭理财他如婴儿般幼稚。有人曾经将婴儿描述成一条管道，一端是大声嚷嚷，另一端则是不负责任。如果将燕妮家和恩格斯送的礼物，以及《纽约每日论坛报》的稿酬计算在内，马克思一家“赚的钱”足够维持一个中产阶级下层家庭的生活了。在他们最穷的岁月里，他们享受的收入大约是非熟练工人的三倍。一位激进的德国诗人也被他的祖国放逐在此，他披露说，与马克思家差不多的那种收入总能给他带来“给流放者的香喷喷的牛排”。[20]

但是，马克思没有像通常那样养家，相反他把钱用在政治期刊上，花钱让他的孩子们上钢琴课、音乐课和舞蹈课。身为一名革命家之妻，燕妮继续印刷漂亮的信纸信封，称自己为“威斯特法伦男爵之女”。

马克思的女佣（她是威斯特法伦家的陪嫁）怀孕了，这让问题变得更加复杂。马克思告诉燕妮说恩格斯才是孩子的父亲。女佣离开了一会，然后返回，带来一个肤色黝黑、毛发浓密的小孩，这孩子后来送给了养父母。

考虑到有这样的家庭生活，1850年至1851年期间，马克思待在大英博物馆里的时间比待在家里的时间还长就不会让人吃惊了。他几乎读遍了所有可能找到的经济学书籍。他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将大约80位作者的长篇大论抄满了笔记本。恩格斯试着催促他赶快写，但马克思继续迈着极其缓慢的学究式的步伐。在寻找愿意按照他建议的格式出版《资本论》的出版商时，马克思也经历了一段难熬的时光。恩格斯劝告这位顽固的共产主义者：“这次显示一点商业头脑吧。”[21]

当马克思完成研究、写作和编辑，并且从几次疾病中康复之时，日历已经翻到了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终于问世。另外的三卷则在他死后出版。

要评述《资本论》，还不如从罗杰特的辞典里挑出一页并且将随机看到的形容词大声读出来的要好。《资本论》包含引证的页数达2500页，来自1500多篇作品。有些内容是文学杰作，有些内容闪耀着清晰逻辑的光芒，有些内容技术性太强、琐碎和无聊，让人回想起杜鲁门·卡波特对作家杰克·凯鲁亚克说过的尖刻之词：“这不是写作，只是在打字。”

让我们分三步来理解《资本论》。首先，我们将发现资本主义的关键所在，即马克思关于劳动剥削的思想。其次，我们将留意资本主义运动的法则，这些法则不可避免地导致资本主义的衰败。最后，我们会关注资本主义的心理成本。

马克思所走之路并不轻松。他不是简单地指着专横跋扈的企业，并且声称企业家和完美的、亚当·斯密式竞争的时代结束了。请记住，他是黑格尔派哲学家，他想要呈现的是：即便是资本主义的理想形态也必定毁于其自身。他从古典的方法开始着手。

与亚当·斯密特别是李嘉图一样，马克思证明了商品的价值取决于生产它所需要的劳动数量。机器只是以金属的形式储存起来的过去的劳动。花费10小时制作出来的立体声音响，其价值比花5个小时制作出来的音响多一倍。

那么，除非劳动被剥削，否则不会有利润。以下简单的三段式推论是合理的：

1.商品的价值（价格）决定于劳动量。

2.工人们得到他们贡献给商品的全部价值。

3.因此，商品的价值与工人们得到的数量相等。

但是，商品的售价并不只是在工人之间分割。所有者也要夺取一份，这是他的利润。忘掉“看不见的手”吧。资本家那只看得见的手侵入进来，从中分得了一杯羹。利润从何而来？上面的前提2肯定错了。工人们肯定没有得到他们贡献给商品的全部价值。他们一定受到了剥削。（当然，有人认为前提1是有缺陷的。）

资本家是如何欺骗工人的？资本家只是付给了他们“基本生活所需”的数量，让他们维持生计和工作，而不是支付给他们增强资本家的企业所需要的价值量。资本家就像是购买其他任何商品一样购买劳动力，然后将之投入作业，每天工作10小时。

让我们用马克思的术语来表述。马克思认为资本家提供了工厂和设备，这些称为不变资本。他们也付给劳动力报酬，称为可变资本。生产进行之时，资本家必须要确保最终产品的价值要超过不变资本和可变资

本的总和。额外的价值（利润）产生自给工人支付的报酬少于工人所生产的价值。换句话说，工人给产品增添的价值超过了他们得到的报酬——可变资本。马克思称这种从劳动者手里抢劫来的“战利品”为剩余价值。

举例说明，贾丝明的工作是纽约无线电城音乐厅舞台秀的女裁缝。观众一般不喜欢看破损的戏服。所以，她的缝纫工作将表演的价值提高了10美元。但是她只领到6美元的工资。老板从每一次的日常表演中都压榨贾丝明4美元的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相对工资的比率（4/6）就是剥削率。

为什么贾丝明不索价10美元以得到她创造的价值？资本主义造成失业，如果她要求更高的工资，有一个劳动力储备大军随时会取代她的位置。她也不拥有缝纫机器、服装或舞台，而这些归老板所有。通过控制生产工具，老板们主导了劳动力市场。

老板是如何将贾丝明的工资设定为6美元的？老板只需要付给工人足够他们生存下去的工资。贾丝明得到6美元工资是因为6美元可以让她活下去。她得到的是维持基本生活所需的工资。如果她每小时领取1美元的工资，工作6小时就会满足这个基本生活所需。但是，老板们不会让她在工作6小时就停下来，他们强迫她工作更长的时间，修补更多破损的戏服。比如，他们将6美元工资的工作时间延长到10小时。结果是：她有6小时的时间为自己工作，额外的4小时她是在为老板工作。4小时的剩余价值直接进入了老板的口袋，而他们连顶针都不会动一下。

为什么工人们只能拿到维持生计的工资呢？之前我们谈过，商品的价值取决于投入其中的劳动量。劳动力供给也是一种商品。因此，劳动力的价格就是生产和维持一个人生存所需的金额：维持生计的水平。

通常，老板付给工人的工资不足以购买他们生产的商品。工人只是为了能够吃上一份饭而奋斗。在我们举的例子中，即使贾丝明为表演增加了10美元的价值，但她却买不起10美元的门票去看表演。如果她承诺只是观看演员腰部以上的表演，或许老板会让她用5美元购买一张门票。

如果利润来自对劳动力的剥削，我们可以将利润率定义为剩余价值与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总和的比值，公式为S/（V+C）。如果资本家从

其雇工身上榨取了更长的工作时间，他便提高了利润。或者在压榨男性工人之外，通过剥削女工和童工来提高利润。在马克思从事写作的日子里，工作时间确实增加了，妇女和儿童也已经加入了工业生产的劳动大军。

现在我们看到了利润是如何依靠剥削而产生的。但是，为什么这种情况不会持续下去呢？这是什么样的资本主义法则，可以让工人们最后从绝望中解脱出来，并且驱使着资本家就此屈服？马克思不仅宣告了一场社会革命的爆发，他更仔细地描述了资本主义的经济矛盾。我们将检视指向经济内部矛盾的5个“法则”或“趋势”。“看不见的手”非但不会为资本主义鼓掌，反而在最后将其打碎。

1.利润率和资本积累的下降。与亚当·斯密一样，马克思也看到了资本家面临着竞争。如果一个公司扩大了生产规模，它的生产会更有效率。创新的公司迫使其竞争者扩张。他们雇用更多的工人，但如此一来，就促使维持基本生活的工资上涨。老板们会做什么？他们会用机器设备取代劳动力。如果他们不这样做，利润就会突降。因为较高的工资妨碍了他们的剥削。竞争逼迫他们要选择替代方案。

但在这里，老板们聪明反被聪明误，他们陷入了一个窘境。剩余价值只能从人的身上榨取。资本家机器的卖主可以索取机器所产产品的全部合理价值。（如果快速冲洗胶卷的设备每小时能够冲洗更多的照片，从而增加了公司的收入，那么设备的制造商可能会按适当的比例向摄影公司收取费用。）再次观察一下马克思的利润率公式S/（V+C）。通过增加机器（C），资本家压低了利润。但如果他们拒绝增加机器设备，没有人会购买他们生产的缺乏竞争力的产品，这让他们再次进退两难：

> 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使得在一个既定的工业企业中，有计划地安排持续增加资本存量成为一种不断的需求，竞争使得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法则能够被每一个资本家感觉到，就像感觉外部强制性的法律一样。这个内在的法则强迫资本家要不断地扩充他的资本，目的是要保住他的资本……
>
> 积累，积累！这就是摩西和先知！……因此，储蓄，储蓄，比如，在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中尽最大可能拿出一部分再转变成资本！[22]

若一个资本家改进了机器，也会产生同样的结果。为了获得市场的准入，制造出较好缝纫机的工厂主可以调低价格。因为老板们相互之间肯定要追赶，以免落后，竞争者必须要将从劳动力身上榨取来的剩余价值储存起来，并且投资于新的缝纫设备。

资本家的贪得无厌促进了他们的毁灭。为了减缓利润的损失，老板们会试图加重剥削。怎么剥削呢？他们要让工人加快工作步伐，并且进一步地延长工作时间。当然，这些花招只能将劳动力的耐心绷紧到更加危险的程度。

2.经济实力集中度的增加。随着资本家被迫扩张和发展，竞争之战变得激烈起来。生产成本较低的最大公司笑到了最后。血腥的竞争之战“总是以许多小资本家的毁灭宣告结束，小资本家的资本部分落入他们的征服者手中，部分资本消失不见了”。[23]生存下来的企业很快就会让落败的企业萎缩下去。

3.危机和萧条的加深。“幼稚的咿呀学语……花言巧语……鬼话连篇。”马克思使用了这些字眼来描述萨伊对资本主义稳定性的论证。当资本家用机器替代劳动力时，失业率就会上升。当老板们增加产出时，谁来购买这些商品呢？没有人买，商品被搁置一边。破产难以遏止，恐慌席卷而来。金融家抛售持股，投资需求急剧下降，投资者从他们的阳台上纵身跳下。

当然，价格下挫之后，循环再度开始。幸存者重新收拾企业的残局，并且雇用绝望的劳动者。剩余价值和利润重新出现。只不过下一次跌落时会更快，也更深。

4.工业劳动力的储备大军。经历了机器替代和经济萧条，资本家把越来越多的人从工厂赶到了大街上。这个“大军”不如救世军那般好战——只是在开始的时候。只要是这个部队保持着平和的状态，它就会是低成本劳动力的上好来源。充足的劳动力资源有利于资本家保持控制力——只是在最初的时候。

5.无产阶级苦难的加剧。随着“夺取并垄断所有优势资源的资本巨头在数量上的不断减少……大众受到的苦难、压迫、奴役、堕落和剥削在加重”。[24]更长的工作时间和更短的休假带给备受蹂躏的劳动者更多的苦难。马克思在前期的作品中指出，劳动者绝对的生活品质下降。

但在《资本论》中，面对工人们过得比原来更好这一无可争辩的证据，马克思退却了，只是声称工人们相比以前分享到的财富份额更小了。

最后，在经历了失业、利润暴跌、无情的绝望和苦难之后，无产阶级看到的却是他们的困境。上层建筑的面具被猛地扯掉。被称作资本主义的怪物露出了它那丑恶的面目。受压迫的一群人起而造反："资本家私有财产的丧钟响起。剥夺者反遭剥夺。"[25]

无产阶级获得的比工厂给予的还要多。他们重新做回了人。资本家也不只掠夺了无产阶级的口袋，也掠夺了他们的心智。对马克思而言，工作在人类生活中扮演着特别的角色。通过自然以及与其他人的关系，人类被迫去创造并改善他们的生活。没有创造性的工作，人类的个性便无法发展。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力只是变成了另一种商品。人们被迫接受日复一日的单调无趣的工作，沦落为活的工具。他们感到远离了自我，感到与世界格格不入，并彼此疏远。冷漠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评论的显著主题，也是存在主义者对现代社会所作批评的主题。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极力主张无产阶级要掌握经济命脉，从而解放自己：

>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
>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26]

在《资本论》出版近20年之后，无产阶级可以用清晰的分析来支持这个简洁有力的口号了。

但是在革命之后会发生什么呢？每个人只是亲吻并且沉溺于新发现的人性吗？还是每个人围着营火坐成一圈，手拉手，唱着歌曲"来这里吧"？一些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可能会让人这么想。

确实，马克思蔑视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并讥讽这种质朴的单纯。他不是多愁善感的人。他鄙视对于所得进行"公平"分配或者大规模财富分配的渴望。即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人们也不会得到他们工作的全部价值。剩余价值会经由公共服务而流向人民。

马克思暗示，最终国家会“逐渐消失”。与此同时，无产阶级专政将大行其道。《共产党宣言》包含了一个10点计划，这个计划会造成“对财产权专横的侵袭”：

1.废除土地所有权，把所有的地租用于公共目的。

2.征收高额累进所得税。

3.废除所有的继承权。

4.没收所有侨民和叛乱分子的财产。

5.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

6.把通讯和交通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

7.增加国有的工厂和生产工具，按照共同的计划开垦荒地和改良土壤。

8.所有工作的义务均等，建立产业大军，尤其是农业。

9.把农业和制造业结合起来，通过在全国范围内较平稳地分配人口逐渐消除城乡差别。

10．在公立学校对一切儿童提供免费教育。取消现有形式的工厂童工。把教育同工业生产结合起来，等等。[27]

未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找到如何实施这一计划的办法。由于对欧洲四分五裂的社会主义运动并不十分乐观，马克思曾经宣称他不再是个马克思主义者。

在圣经里，上帝不让摩西进入应许之地。但是，与以色列人不同，在马克思于1883年去世后，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一位约书亚带领他们继续前进。

评价马克思

我们对马克思具有独创性的分析如何进行全面的评判呢？这个任务让人望而生畏。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知识分子撰写的赞美、攻讦和胡扯达几百万页之多。这里有一份评价马克思的谦虚的议题：（1）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如何局限了剩余劳动的概念？（2）对苦难、失业和资本主义的堕落有什么样的预言？（3）他对现代经济学有什么贡献？

1.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如何扭曲了剩余劳动的概念？在维克多·雨果的《悲惨世界》里，冉·阿让不断地遭遇到同一个强硬的对手：警探沙威。文学上的辩证法为两人创造了戏剧性的斗争，缺少了对手戏，两人的生活都会变得太简单。

马克思历史观的麻烦之处在于这位辩证大师忽视了最引人注目的辩证：唯心主义的动机和唯物主义的动机之间的辩证。在很大程度上，马克思将物质因素描述成是因果的，这些物质因素建立并定期地改变一个社会的思潮或上层建筑。但是，在假设这一关系时，马克思很多时候轻视唯心主义的力量。正是这一倾向影响了他的经济学。

剩余劳动的概念支撑着整个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架构。回想一下简单的三段论。为什么劳动必定会受到剥削？因为马克思抱持着“劳动价值理论”，认为资本家就是凭借这一理论聚敛钱财的。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没有一粒原子”的价值出自资本家之手。[28]马克思只是简单地想到了女裁缝贾丝明或锤击铁砧的铁匠，认为是他们创造了价值。

马克思遗漏了什么吗？他忽视了创意和企业家精神。要创造财富可不只是需要看得见摸得着的投入。影像录放机的开发并不需要新型的原材料或剥削劳动的更激烈的方法。影视产业需要两样东西：创新和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就是愿意承担投资风险的精神。为什么生活在共产主义体制下的俄罗斯需求美国制造的粗斜纹棉布牛仔裤？不是因为苏联缺乏棉花或生产高品质布料的工人，而是因为他们缺乏想象力、积极性和方法指导。这些无形的因素使得成功的公司和国家脱颖而出。

马克思轻视任何形式的资本，包括人力资本，人力资本就是对于创造利润至关重要的知识、熟练的技术或管理技巧。劳动价值理论当如何

解释下述实例中那样闪现的灵感或突如其来的洞察力呢？

几年前，当某个人走路穿过树林时，有一种植物的刺钩住了他的羊毛袜。这位先生的银行账户现在可真是“通货膨胀”，因为他发明了维可牢牌尼龙搭扣。这人的所有利润是从工人那里偷来的吗？

在下一章，我们将看到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对马克思的抨击，因为马克思忽视了冒险和“等待”对社会的价值。因为要投资，资本家放弃了购买物品所能带来的即时满足。他的投资回报就是等待，也就是将他的快乐延迟。如果现在每一个人消费了所有的东西，社会就生产不出新东西了。因此，利润扮演了一个决定性的却又十分合理的角色。（附带一提，马歇尔帮助领导的边际主义“革命”已经证明，价值来自需求，也来自生产和供给。在马克思去世后出版的《资本论》第二卷问世时，边际主义学派已经对马克思和古典经济学单独强调供给的做法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由于劳动价值论的假设，马克思冷落了太多动态的和唯心的因素。因为看到劳动价值论只是一种近似表达的工具，而不是价值最全面的成因，李嘉图避开了马克思的这一问题。

2.对苦难、失业和资本主义的堕落有什么样的预言？马克思并不打算做出预言。他一心想要进行的是科学预测，即基于可辨别之趋势的基础之上，对历史的成因做出推断。但是，他身后的追随者从他的著作中创造出了伪宗教。法则经过塑造之后，他的信徒得以宣称其预言的正确性。虽然开始于无神论的科学，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就如同彩色玻璃窗，有选择地接受阳光的照射，却简直不允许错误的评价。一旦这些法则变成了宗教典籍，用科学来检验马克思主义的努力就白费力气了。

在其有生之年，马克思有幸看到了某些他的支持者的活动，他们在对他提出的法则加以塑形和提升，给他树立神坛，并且对他顶礼膜拜。无政府主义者普鲁东告诫马克思不要向世人提供教义问答书：

> 看在上帝的分上，在我们消灭了先前所有的教条主义之后，不用做所有的尝试，反过头来，让我们向人民灌输另外一种类型的教条……让我们适当而诚恳地辩论……但仅仅是因为我们处于运动的风口浪尖，让我们不要成为新偏执行动的带头人，让我们不要假装

新宗教的最初布道者，即使这个宗教是有逻辑的宗教，是有理性的宗教。[29]

就算我们驳不倒马克思的预测，我们总可以观察到自他那个时代以来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些发展。首先，工人们的生活水平在过去的100年里得到极大的提高，因为房屋拥有率和汽车拥有率在大幅攀升。按照今天对贫穷的定义，马克思时代新兴的资产阶级是极其贫困的，用马克思的术语来说就是“赤贫”的。使用马克思时代普遍的定义，今天的工人拥有值得炫耀的财富。没有人否定工人生活水平的“绝对”提高。

然而，《共产党宣言》向工人事先发出警告：“现代的工人却相反，他们并不是随着工业的进步而上升，反而越来越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以下。工人变成赤贫者。”但是，马克思很快就注意到工人们的钱夹子变厚实了。他甚至承认，在《共产党宣言》发表后的10年里，农业工人的工资猛涨了40%。[30]

出于这个原因，马克思改变了定义，警告说工人会相对于资本家变得较为贫穷。工人的可怕困境在消失：富人变得更富了，而穷人也变富了。但是，富者愈富的速度更快。[31]

通过声称“基本生活所需”是相对概念，取决于当时的生活方式，马克思将这个新定义硬塞进了《资本论》。据此推测，20世纪单单基本生活所需就需要一台彩色电视机，因为在制造行业的普通“领薪水的奴隶”都能买得起一台。因为退回到了相对论者的观点，马克思屈从了自己对工人苦难生活的热情和绝望。只要是穷人不断地变富，这种方案甚至能够通过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的社会公正测试（罗尔斯的社会公正是：如果穷人也受益的话，则允许富人获利）。[32]

因此，现代马克思主义者强调心理上的苦难和疏离。他们或许是对的，工人们可能经常感到无聊和厌恶。但是，马克思没有告诉我们，比如社会主义如何将清理垃圾变得令人兴奋。如果快乐的工人可以工作得更好，那么至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有者会有强烈的动机来满足他们的员工。

此外，我们应当如何定义工人的快乐？如果工资是一个相对因素，快乐为什么就不是相对的？我们是不是要问一个绝对性的问题：今天的工人比100年前的工人更快乐吗？或者我们应该问一个相对性的问题：

他们是不是与资本家在变得更快乐的速度上是一样的？试想：富人变得更快乐了，穷人也变得更快乐了。但是，富人变得更快乐的速度比较快。一旦我们开始解释快乐，对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就成了伤心之日。

马克思也预言了资本主义的崩溃，因为它是一个为自己提供了“掘墓人”的制度。但是，资本主义似乎还没有灭亡。失业率比20世纪初时略有升高，但如果我们将工作人口的比例考虑进来，特别是妇女加入到劳动大军这一因素，就业率还是较高的。

此外，资本主义常常培养出一个中产阶级，这些中产阶级利用股票市场间接地拥有了一些生产工具。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几百万中产阶级下层的英国人购买了“私有化的”公司股票，例如英国电信、英国钢铁和英国航空。在美国，多数工会的养老金基金都是大量投资于公司股票。

一些马克思的捍卫者指出，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成长出人意料地成为资本主义的救世主。社会福利开支防止了资本主义陷入更严重的萧条和革命。马克思的捍卫者可能是对的。但要记住，马克思曾做出预言，政治体制和上层建筑会保持静态，拒绝改变。僵化将造成它的毁灭。回顾一下，如果上层建筑屈身拯救资本主义，那么，马克思的预言就需要修正。

最后，马克思主义者通过把原因指向外国来解释资本主义惊人的成功。他们说，资本主义开始在较不发达的国家的劳动力身上进行剥削，这些受剥削的外国工人支撑起了国内的经济。话又说回来了，即使这种理由站得住脚，它也会让我们大大偏离对资本主义内在的、辩证毁灭的分析。

总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设计了一个科学的体系。他自信地预测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有些人用油嘴滑舌对其进行解释并且宽宏大量地对待它。但是有一件事情是确定无疑的：马克思非常鄙视宗教式多愁善感的人，他会愤怒地拒绝通过智力上的施舍赢得辩论的努力。

3.他对现代经济学有什么贡献？在讥笑一个同事所提理论的关联性时，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常说的一句话是：“想象有一条狗追逐着一只狐狸穿过草地。狗沿着狐狸的逃跑路线追，我同事的理论就是那狗背

上的一只跳蚤。”

对于大多数英美主流经济学家来说，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就是跳蚤。在主流经济学界，不论是左倾人士还是右倾人士对马克思的轻视都一样强烈。保罗·萨缪尔森将劳动价值论形容为是定义上的狡辩，或者是形而上学的强词夺理。

在大萧条期间，萧伯纳试图说服凯恩斯相信马克思的长处。凯恩斯拒绝了：

> 我对《资本论》的感觉和我对《可兰经》的感觉一样。我知道它有历史性的意义，并且我也知道有许多人发觉它是一种万古磐石，充满了启示，这些人也不全是白痴。然而，当我阅读这本书时，很费解的是它怎么能有如此的影响。它枯燥、过时、学术上有争议，看起来普普通通不适合此目的。然而，就像我刚才说的，它给我的感觉就像是《可兰经》。这两本书中的一个是如何带着火与剑传遍了半个地球的？这问倒我了。很明显，我的理解有些缺陷。你相信《资本论》又相信《可兰经》？还是只相信《资本论》？不论后者的社会学价值是什么，我确信的是，它对当代经济的价值是零（那些偶尔发生，但却没有建设性，且不连续的灵光乍现除外）。若我愿意再读一遍，你会答应重读一次吗？

萧伯纳重读了，凯恩斯重读了。凯恩斯看到光明或者圣地了吗？他没有看到：

> 在两人当中我比较喜欢恩格斯。我能够看到他们发明了某种滔滔不绝的方法和微不足道的写作态度，他们的继承者照搬照抄了这两点。但如果你要是告诉我他们发现了解决经济难题的线索，那我还是认输吧。[33]

既然天才的凯恩斯都被打败，多数现代经济学家也放弃了论战，不再研究马克思。根据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著名评论家弗兰克·哈恩的说法，“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甚至从来没有读过马克思的书。不过，你真的不能怪他们。”

马克思仍然躲在数千名激进主义经济学家的论战之后，这些经济学家出版了《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并且把马萨诸塞大学安姆斯特分校

当成了他们的舆论阵地。“激进”的词源字根是radic，也就是“根”的意思，比如radish（萝卜）一词就是取了它是一种植物的根这个本意。激进派经济学家和马克思一样都相信现代经济理论的根基在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中已经腐烂了。虽然如此，激进派学者并不愿意为马克思所说的每一句话或者做出的每一个预测承担责任。

少数激进主义者仍然信奉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尽管所有的激进主义者强调的主题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控制问题，但老板们却力求“分而治之”，想在工作场所和投票站都保持他们的控制力。波兰的马克思主义者米哈乌·卡莱茨基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政府要故意地引发通货膨胀和衰退，以此来抑制工人的需求。当代的激进主义者斯蒂芬·马格林声称企业通常是喜欢衰退的。如果马格林是正确的话，那相当多的人就是在马克思“错误意识”的指导下经营企业。仔细琢磨一下马格林对1980年的总统选举所做的解读：罗纳德·里根承诺没有衰退的低通货膨胀。傻瓜，他以为老板们讨厌衰退。但是，老板们还是把票投给了里根。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他做不到，而且会引发衰退，只是并非里根故意而为。不出马格林所料，里根真的食言了，他们很高兴地看见他们的股票价格下跌了。[34]

现代激进主义者发起了很多论战，反对同是经济学家的同事的模型，反对政府政策，反对资本主义，有时也对抗他们对导师卡尔·马克思的记忆。到目前为止，他们的胜负还难下定论。

第七章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经济学有自己独特的时间表

下述三个小人物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他们是从文学作品和娱乐节目中搜集来的：

> 在伊夫琳·沃的小说《独家新闻》中，一位英国报社的老板遇到一位编辑，这位编辑回答问题的词汇只有两种：如果老板说对了什么事情，编辑的回答是“正是如此”；如果老板说的事情不正确，编辑的回答是“在某种程度上是的”。
>
> “让我想想，我要说的那个地方叫什么来着？日本的首都？是不是横滨？”
>
> “在某种程度上是的，科珀阁下。”
>
> “香港属于我们[注]，是不是？”
>
> “正是如此，科珀阁下。”

歌舞杂耍喜剧老演员亨尼·扬曼的笑话比食物中毒更能引起人们的痛苦呻吟，他说出了许多经典妙语，富有哲理，包括：

> “你老婆好吗？”
>
> “跟什么比？”

在一部特别邪典的电影《天生爱神》中，男主角用形而上学的类似于前两段对话的方式反复提醒他的朋友：

> “无论你身处何处——你就在那里。”

“在某种程度上”、“跟什么比”和“无论何处……”可以说象征着19世纪末经济思想的重大变化，这个变化被称为边际主义。在我们仔细观察卓越的边际主义者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影响之前，让我们看看这些小人

物如何能够解释这个新方法。

想象你正在欧洲旅游。首站是希腊，你玩得很过瘾。在去意大利的途中，你在科孚岛停下了脚步，你租了一辆助力车，并且绕着这个迷人的岛转了一圈。在意大利，你欣赏着无与伦比的佛罗伦萨风光。你在意大利观光的花费为800美元，但它给你带来的快乐却价值几千美元。你抵达了威尼斯，然后考虑过境去往奥地利。你担心奥地利不如意大利那样能让你感到满意。与维也纳的炸小牛排相比，你更爱吃意大利的炸鱿鱼。是继续往前走，还是回家，你如何决策？

首先，你要考虑电影的建议：无论你身处何处——你就在那里。你现在站在奥地利的边境上。忘记你曾经去过哪里吧，你在意大利的快乐时光已经不重要了。边际学派声称“过去就在你身后”。问题在于是否向前进，以及你的起点是你现在所处的位置。

其次，想想扬曼的玩笑话。当你对是否去奥地利进行决策时，你和什么作比较？你会把过去在意大利的快乐放在一边，并且问道：去奥地利的收获会大于去奥地利的花费吗？如果在奥地利一天要花费50美元，而给你的快乐价值75美元，那就去。就算在意大利的收获是你在意大利花费的10倍，那又怎么样呢？你马上要考虑的问题是是否继续前进，即使与以前相比，收获大于花费的差额（边际）变小了也无所谓。[1]

再次，想想《独家新闻》中的编辑。你要继续前进到什么时候呢？只要你一个行程的收获大于该行程的成本，你就会继续旅行，直到你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为止。当在奥地利一天花费50美元只能给你带来50美元的快乐时，你就止步不前了。你不应当被向前进搞得失去了理智。许多企业失败的原因，就是它们不知道何时停止扩张。当人民快线航空公司看到自身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成功之后，它忽视了很多顾问的提醒，快速地增加航线，添加自有飞机。几年下来，这个野心太大的航空公司就不能展翅翱翔了。在20世纪90年代晚期，波士顿市场快餐店也陷入了相似的困境。

边际主义的精髓是随着探究的焦点持续增加、逐渐移动。公司如何决定生产多少辆汽车？它们会持续生产，直到它们从再生产一辆汽车中得到的收益与生产这辆额外汽车的成本相等。在经济学领域内外，边际收益或边际成本法则有诸多应用。有些学生为了备考而通宵学习。但是，如果在半夜额外熬1小时的成本（以第二天的疲劳为计量单位）超

过了这个小时死记硬背收获的一点收益，最好还是上床睡觉，而不是继续扎在书堆里。

马歇尔并没有发明或发现边际主义。在他之前10～20年，法国人奥古斯丁·古诺、德国人冯·杜能和戈森开始探索边际分析。英国人威廉·斯坦利·杰文斯贡献了许多重要的概念，马歇尔又进一步地将其发展，就像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创始人卡尔·门格尔所做的一样。但是，在此有4个相互联系的原因使得马歇尔应该得到首要关注：第一，他对边际分析的应用最清楚，也最全面；第二，他建立了当今微观经济学中占主导地位的边际主义传统；第三，他给20世纪最著名的一些经济学家教过课，包括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以及他的父亲）、庇古和琼·罗宾逊；第四，他的一生与穆勒的一生截然相反，并且反映了他所处时代的知识运动和边际主义精神。

---

1. 伊夫琳·沃（Evelyn Waugh）的小说《独家法闻》（Scoop）出版于1938年，当时香港主权属于英国。——译者注

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课程的开始

1842年，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出生于英国的柏孟赛。他的父亲是英格兰银行的一位职员，也是一个强势人物，当然与詹姆斯·穆勒或罗马皇帝卡利古拉相比要略逊一筹。威廉·马歇尔是一个严厉的、脾气不好的专横之人，有着突出的下巴，生活简朴，信守新教福音派的信条。他会借助学校布置的作业训练阿尔弗雷德到深夜11点，经常是些希伯来文的课程。因为与和蔼的姑姑一起度过了长长的暑假，这让阿尔弗雷德的心智得以放松。姑姑对希伯来文并不是很关心，而是给他买了一只小船、一把枪和一匹小矮马。

不久，他就放下枪，跳下马，由牛仔阿尔弗雷德摇身一变成为剑桥阿尔弗雷德。这是一次反抗之举，威廉想让儿子接受牛津大学的奖学金，以便学习拉丁文，并准备成为牧师。但是阿尔弗雷德鬼迷心窍，当他的父亲认为他在自己的房间里研习宗教时，性格叛逆的他却常常是在研究数学，这是他父亲理解不了的科学，因此他的父亲鄙视数学。对于阿尔弗雷德来说，数学是一种解放的象征（或许是出于潜意识的愧疚感，以至于他在日后将数理经济学隐藏到了脚注和旁注之中）。正如凯恩斯在评述马歇尔的长篇大论中所说的那样："不！他不会接受那个奖学金，从而将自己埋葬在牛津大学死气沉沉的拉丁文语言里；他会逃离，去剑桥大学这艘船上做服务生，攀爬几何学的素具，并且仰视天空。"[2]

在剑桥大学的圣约翰学院，马歇尔获得了数学学术荣誉奖，然后他便通过辅导其他数学专业的学生赚零花钱。在1856年毕业前夕，马歇尔打算研究分子物理学，但形而上学挡住了他的去路。1868年，他艰苦跋涉来到德国，开始研究哲学家康德的原著。很快，他又跟随剑桥大学的同事亨利·西季威克踏入了不可知论。西季威克有时会从事政治经济学的写作，他认同基督教的伦理和思想，除了信仰之外，他表现出了所有基督徒的美德。有一位崇拜者曾经说过，在所有形式的邪恶之中，西季威克是最不邪恶的。按照凯恩斯的说法，西季威克用了半生的时间证明上帝并不存在，并且用后半生的时间希望自己是错的。虽然马歇尔没有经历过西季威克那种折磨人的内心挣扎，他却展示出与西季威克相似的高贵的道德品质。

让他父亲感到失望的是，马歇尔没有听从上帝的召唤而走上布道坛，但他真切地听到了穷人的哭声，敦促他开始研究经济学：

> 我从形而上学转到了伦理学，认为证明社会现实的公正并不容易。有一位朋友，他阅读了大量现在被称为道德科学的书籍，经常说："啊！如果你明白政治经济学就不会那么说了"。于是，我阅读了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它让我感到兴奋。我对机会不平等这种提法是否适当表示怀疑，而不是对物质的满意度表示怀疑。然后，我利用假期参观了几个城市最贫穷的区，走过一条又一条的街道，看着那些最贫穷之人的脸。接下来，我下决心尽我所能研究政治经济学。[3]

一旦马歇尔选择了研究经济学作为他的职业，他便对它表现出牧师般的虔诚。在中世纪时代，盛行着三大学科：神学，旨在实现灵魂的完美；法学，旨在实现正义；医学，旨在实现身体健康。马歇尔提供了第四大学科：经济学，旨在实现所有人的物质性福利。虽然许多经济学家相互攻击，但马歇尔对他所选职业的尊重从没有减少，对改变人类生存条件的决心也从没有动摇。

终其一生，马歇尔都在为经济学从历史和伦理科学中分离出来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奋斗。在试着从课程表中为经济学挤出上课时间的同时，他也尝试联合其他从事经济学研究的人。对于马歇尔来说，经济学是一个需要合作的职业。他对同室操戈不耐烦（当其他人批评他的作品时，他特别容易生气）。他说过，只要是做出恰当地阐释，几乎古典经济学传授的所有内容都是正确的，但他们相互批判时除外。经济学家必须超越政治上圆滑的效忠，成为理性和真理的捍卫者。

> 读社会科学的学生要对普遍认可怀有敬畏之心……如果有一系列的主张，通过提倡它们可以让报纸增加销量的话，那么，希望让整个世界和他的国家比他还没有出生时变得更加美好的学生，一定要仔细考虑这些主张的局限性、缺陷和错误，如果在这一系列主张中存在着这些不足，就永远不要无条件地提倡它们。[4]

事实证明，剑桥大学的惯性是能量巨大的。一直到1903年马歇尔才说服这个大学开设了独立的经济学课程。

但是，从马歇尔在20世纪60年代初次接触经济学开始，他就开始为

它建立一套体系。他将形而上学的书籍留做假期的轻松读物，并且选择在阿尔卑斯山度假。

> 每年夏天他都带着一个背包，大部分时间都在阿尔卑斯山徒步旅行……他在6月上旬离开剑桥大学，劳累过度且疲惫不堪，10月返回学校，皮肤晒得黝黑，身体健壮，腰板笔直……在阿尔卑斯山步行之时，他6点钟起床……背着背包步行2～3个小时，或席地而坐，有时会坐在冰川之上，沉浸在书中良久——歌德、黑格尔、康德或赫伯特·斯宾塞……这是他的哲学驿站。他从中为他的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理论找到了答案。一大箱子书被从一个驿站送到另外一个驿站，但他可能会只带着一个背包走上一周或更长的时间。他会拿着他的衬衫在水流湍急的溪流中清洗，再搭到扛在肩头的登山杖上晒干。在这些孤独的阿尔卑斯山步行路途中，他完成了自己大多数深刻的理性思考。[5]

在圣约翰学院教了9年书之后，马歇尔结婚了，与马尔萨斯一样，他因此失去了他的教职。妻子玛丽·佩利是马尔萨斯的主要论战对象、副主教威廉·佩利的曾孙女，她之前是马歇尔的学生，后来成为政治经济学的讲师。马歇尔一家搬到布里斯托大学学院，之后是牛津大学，并于1885年接受政治经济学教授的职位返回剑桥大学。

尽管有点古怪，马歇尔的外貌却很吸引人，他有着令人愉快的蓝眼睛。他的学生无数次地谈到在他家中喝茶闲聊的情景。作为教师，他强调例证和时事，而不是整齐划一的教科书中的方法。马歇尔几乎在任何地方都能发现经济学的案例，有时是在古代史中，有时是在剑桥大学上演的现代戏剧里面。他说话会带有轻微的笑声，经常是用快乐的假声结束每句话。有时他会显得有点傻。这里还有一个著名的故事，讲的是一位研究生为了论文开题而拜访马歇尔的家：

> “进来，进来，”他说着话，从小走廊里跑进来，我跟着他上楼。他问我：“对于要做什么选题，你有何想法？”我答说：“没有。”“好吧，那么听着，”他边说边拿出一本小的黑皮书，开始念一串题目，在这之前还要求我在他念到我喜欢的题目时就举手示意。紧张的我，在他念第一个题目时我就试着接受，但马歇尔没有注意到，他一直读下去。

马歇尔又拒绝了这个学生发出的第二个和第三个信号。

他又读了5分钟的题目。最后，马歇尔停下问道：“发现了你喜欢的题目了吗？”我开始讲话，“我不知道”。他说：“不知道？不过这就是我的方法。”[6]

除了这样的傻里傻气外，马歇尔可算是绝顶聪明。据剑桥大学的传闻，每当一篇难以理解的数学论文发表，马歇尔会只读第一节和最后一节。然后，他会站在壁炉前面，想出其他的部分。

当经济学遭遇进化论

也许在经济学家“名人堂”中没有人能比得上约翰·穆勒狂风暴雨般的心智，也没有人比卡尔·马克思的愿景更有煽动性。马歇尔的生活和思想像是一只矮腿长耳的老猎犬在周日下午追逐猎物一样疯狂。有趣的是，他内心和外在的平静反映了他的经济学观点，实际上是他看待世界的观点。他已经阅读了足够多的德国哲学，他知道他有自己的世界观。他是一个从不耍花招的人，当我们翻开1890年初版的《经济学原理》时，马歇尔立刻就会告诉我们他的信条：大自然不会突然地跃进。

日神和酒神的力量在穆勒的思绪中交战，革命在马克思的头脑中爆发，马歇尔则显得像阿尔卑斯山一样沉稳。就像他的前辈一样，马歇尔对于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抱持着理想主义的愿景。但他从没有傻到放弃认真的分析：

> 在文明的每一个阶段，在经济方面的压力被感受到之前，诗人们用诗和散文快乐地描述着以往的某个“黄金时代”。它们那田园风光般的景象十分美丽，激起人们对它们的宏伟想象，并决心实现之；它们基本上没有历史的真实性……但在对所做之事采取负责任的行为方面，它比愚昧地忽视仍然依附在人性上的缺陷要更糟糕。[7]

尽管如此，马歇尔认为世界能够进步，而且是逐渐地进步。虽然古典经济学家都采用牛顿式的科学方法寻找自然法则，马歇尔却转而更多地采用进化论的方法。查尔斯·达尔文和生物学取代了艾萨克·牛顿和物理学。“数学物理”科学研究的是不变的自然现象，盛行于18世纪，经济学紧随其后。然而，随着19世纪的结束，专注于有机和演化现象的生物学研究成为显学。最初由约翰·穆勒带队的经济学家一路跟随，马歇尔则带着他们走得更远。

马歇尔的边际主义是应用于经济学的进化论。商人和消费者不会大步前进，而是一步一步地试着改善他们的境况。个人、公司和政府全都要适应变动的价格。适应力最强的公司得以存活，低利润将最不适应竞争的公司淘汰出局。竞争压力迫使公司要削减成本。虽然最终的结果与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相似，但马歇尔教会了我们如何用这一方法仔细观察

个体的决策。边际主义为微观经济学的发展铺好了路。微观经济学让我们相信：行为人会考虑他们所处的位置，并且在收益大于成本之时决定迈开新的步伐。除非收益和成本停滞不前，否则，我们绝不会采取不变的、牛顿式的行为模式：

> 经济学关心的主要对象是人，无论是出于善还是恶，人都会被迫改变和进步。零散的静态假设是暂时用来对动态（更确切地说是生态）概念提供辅助的，但经济学的中心思想必定是活力和动态的，即使它的基本原则尚无定论。[8]

在生活中，马歇尔秉持渐进主义的信条，他极为谨慎，有时会显得过于缓慢。虽然在19世纪70年代早期马歇尔已经将他的许多思想进行了阐述，但因为《经济学原理》的出版晚了，而且迟了很多年，以至于批评者轻视其主张的原创性。虽然越来越多的现代学者证明，书中的很多内容，确实在它们印刷出版之前几十年里就出现在了他的讲义中。

幸运的是，《经济学原理》历久弥新。1890年出版第一版，之后这本书的销量逐年递增，最终在20世纪20年代达到了销售量的顶峰。马歇尔在有生之年看到了它的8个版本，现代微观经济学仍然以它为基础。不过，《经济学原理》在几个方面区别于现代经济学著作。首先，马歇尔也无法避免道德上的陈词滥调。偶尔马歇尔也会无意中说出建议，不过这些建议可能更适合于爱情信箱“艾比专栏”为读者解答问题；有时他听起来又像是调解艾比和她妹妹安·兰德斯之间矛盾的正确人选，但要让他解决棘手的商业纠纷却是错误之选。让人高兴的是，马歇尔并不总是让人感觉他正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教师会议上致辞。

其次，与针对学生和专家的现代教科书相比，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常常直接讲给外行人听。经济学家不能躲藏在纯理论之后，而是必须观察世界，并且试着用他们开发出来的工具改善世界。马歇尔开发出了复杂的模型，但是他把复杂性留给了脚注和附录。在正文中，他使用简单易懂的文字。马歇尔告诫说，那些拥有“冗长而精致推理的”一流模型可能会变成“科学的玩具，而不是用于实际工作的马达”。[9]如果马歇尔要的是玩具，他大可待在姑姑身边做牛仔和印第安人。相反，他找到了一个高尚的职业，并且力劝其他人跟他一起做。虽然他有时抱怨他早期的学生，但他们也确实这样做了。到《经济学原理》第一版出版时，英国超过半数的经济学教授是由他的学生担任的。随着经济学教授人数

的增加，更多的马歇尔派学者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虽然被当作一位数学家接受过训练，但马歇尔担心经济学家会把计算变成画蛇添足。李嘉图永远是马歇尔所崇拜的对象，因为李嘉图如数学家那样思考，却没有诉诸于晦涩的符号和神秘的公式。马歇尔把李嘉图和约翰·穆勒的观点用微积分的形式表达出来，但从来没有让他的经济学论证完全建立在数学证明之上。在一封饶有情趣的信中，马歇尔提出了他的经济学体系：

> （1）把数学用作速记语言，而不是探索的工具。（2）继续使用数学，直到你完成分析。（3）用文字表达出来。（4）然后，用真实生活中的重要案例进行说明。（5）把数学部分烧掉。（6）如果你做不到第4点，则烧掉第3点。最后一步是我常做的。[10]

难怪庇古爆料说马歇尔在壁炉前面读数学论文。也许马歇尔的这种行为方式会减轻他的内疚，因为小时候的他偷偷地将所绘的数学曲线藏在他的床下面，而其他男孩子却是以这种方式来藏各种形式的涂鸦。

马歇尔的经济方法，并不像他前面信中所提议的那般鲁莽。和约翰·穆勒一样，马歇尔避免使自己陷入“对严格的经济法则做出断言”这个古典经济学的陷阱。历史在经济学和演绎理论中占有一席之地：“在20世纪初，英国经济学家的主要错误并不是他们忽视了历史和统计学，而是他们把人看作（比如说）一个常数……我没有指出经济信条的任何普遍性。这不是具体真理的主体，而是发现具体真理的引擎。”[11]马歇尔也明白了，事实本身不会教给我们什么东西。根据约翰·内维尔·凯恩斯的说法，马歇尔采用“受观察指导的演绎政治经济学”。[12]通过在象牙塔和酒吧之间，以及纯理论和人间现实之间找到一条中庸之道，马歇尔使经济学免于社会学家和伦理学家辛辣的攻击。

马歇尔力求成为经济学领域的达尔文，而不是经济学领域的牛顿。他会观察公司，看他们如何应对环境的改变。他宣称“经济学家的圣地在于经济生物学”。[13]

经济时间不同于物理时间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人也不是一周之内就从猴子进化而来。自相矛盾的是，达尔文教导人们说，虽然从生物学的角度看一千年都微不足道，但变异体的短暂生命却可以决定一个物种的未来。马歇尔意识到“经济时间”和生物时间一样，并不与伦敦的大本钟保持同步。十年并不能让企业获得十倍于它在一年里的效益。对于某些交易来说，一年的时间就很长了。而对于其他的活动而言，一年只能勉强作好准备。

在经济分析的每个阶段，钟表都在滴答作响。在1973年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第一次石油禁运期间，政治家们抓住经济学家的脖子，前后摇晃，直到他们对关键问题给出答案：消费者何时会节约用油以应对较高的油价？通用、福特和克莱斯勒何时才会生产小排量的汽车来做出应对？石油公司何时会到别处开采石油以做出回应？这些问题最终都发生了，只不过不是同时发生而已。

马歇尔试着将特殊的趋势和它们产生影响的时间段分离开来。时间是“这些难题的主要原因……这使得人们用有限的力量逐步推进成为必要。将复杂的问题分解开来，一次研究一点，至少能够将部分方案结合成解决整个难题的大致完整的方案”。马歇尔发明了一个独创性的分析系统，在观察某一因素时，他会把其他因素先用一个“牲畜栏”圈起来，当他像兽医一样对某个因素进行“诊疗”时，其他因素就等在那里。他称这个“牲畜栏”为“其他条件不变”，意思是说“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不否定其他因素的存在，但要暂时忽略掉它们的干扰所造成的影响。议题的涉及面越窄，它得到的分析就会越精确”。[14]

之前的经济学家已经提出过假设“其他条件不变”的建议。但是，马歇尔由此推导出一个明确的方法，构建了严谨的理论。当今的经济学教科书都是以马歇尔的方法为基础的。

马歇尔的方法与19世纪法国人里昂·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分析形成鲜明的对照，后者的理论性和数学化都很强。尽管瓦尔拉斯的这种抽象分析在大学的教科书中没有受到多大的关注，但在现代，他的著作被一些才华出众的理论家加以推广，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肯尼思·阿罗

和热拉尔·德布鲁，以及剑桥大学的弗兰克·哈恩。说一个离题的趣事：虽然瓦尔拉斯的分析以让人眼花缭乱的数学作为支撑，但他大学入学考试的数学成绩却有两次不及格。

举一个例子有助于我们理解马歇尔的理论体系。假设要开发一个叫作“雅皮士酸奶”的新产品，显然它对某个市场具有吸引力，部分原因在于它确实是在华尔街生产的。让人感觉更好的是，制作工人在酸奶培养菌生长时滴进了几滴歌帝梵牌巧克力。“吃出聪明，告别肥臀”这句简短醒目的广告语驱使着雅皮士疯狂地向它奔去。在任何特殊的日子里，雅皮士酸奶的供应量都是固定不变的。如果电脑瘫痪了，跑出来吃点心休息的雅皮士的数量超过平时人数的话，有些人就买不到了。在生产厂商听说需求量大增时，他就会生产更多的酸奶送出工厂，但雅皮士已经下班了。因此，在一天的时间范围内，只有需求是波动的。

因为需求增加，生产厂商可以增加供给。马歇尔称为“短期”的第二个时间段持续的时间长，长到足够生产厂商改变其供给量。为了增加供给，他们要雇用更多的工人，并购买更多的原材料。但他们却不能过度扩张。马歇尔所指的“短期”可不会长到建立新的生产工厂。如果雅皮士酸奶的生产厂商在电视上做广告又如何，这会导致需求猛增吗？在短期，他们可以购买更多的牛奶来制作酸奶，也可以雇用更多的工人添加巧克力。如果需求下降，他们可以裁员，并减少牛奶的采购。

因为在短期内工厂的产能是固定的，生产厂商确实面临着收益递减，也就是说在一个车间里挤了太多的工人，反而降低了他们的生产率。当然，生产厂商仍然可以利用边际递减规律来生产酸奶，直到他们接受的价格等于最后一品脱酸奶的成本。

在第三个时间段，也就是“长期”，生产厂商有足够的时间建设新工厂，以及改变劳动力和原材料的数量。如果雅皮士酸奶的需求持续旺盛，他们可以从华尔街扩张到纽约港，或者到港口对面建立工厂。他们甚至可以用机器人取代工人。

从长期来看，新的生产厂商可以进入这个行业，赔钱的生产厂商会离开，生存下来的生产厂商则赚取正常的利润。因此，在长期中供给的作用就显现出来了。

长期和短期的时间有多长？因行业而异，它被定义为“改变资本和产

能所需要的时间”。很明显，马歇尔并没有讨论雅皮士酸奶，而是讨论了渔业。在捕鱼业，马歇尔推测需要1～2年的时间才会增加新船，然而，随着技术的改进，这个“长期”（市场的反应时间）会缩短。

马歇尔对公司规模进行了更多的讨论。古典经济学家通常认为，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它的平均成本保持不变。成长对于一个公司来说，既没有帮助，也没有损害。在马歇尔所处的时代，多数经济学家谈到了报酬递减：在某种程度上，规模大多会导致无效率运营。在他所举的渔业案例中，马歇尔注意到过度捕捞会使资源枯竭，并且最终迫使渔民航行到离海岸更远的地方去捕鱼。尽管如此，马歇尔问道，如果规模大到使得某一行业更有效率又会怎么样呢？较大的公司常常能够获得更便宜的贷款和更有效率的机器设备。如今，福特汽车公司能够获得比你的贷款利率还要低的贷款，而且，它也能买得起比你的装配线更先进的装配线。

马歇尔确定了带来规模效益递增的两个来源。内部经济产生自劳动分工、大规模采购和使用大型专用机器，后者是小规模生产厂商负担不起的。设想有一个叫“查克横渡”的小公司，它的业务是用豪华的小艇运送贵族横渡大西洋。每名乘客的运送成本是3000美元。如果查克公司能够吸引1000人愿意乘坐它的船，它可能就会用玛丽皇后2号来代替小艇。船上有1000人，每位乘客的成本却只有2000美元。因此，如果查克公司的销售势头高涨，它会放弃小艇，而且船票更加便宜。最终，如果查克公司持续扩大规模，由于存在着管理上的低效率和市场销售问题，成本将可能上升。

在过去的40年里，表面上不景气的货物航运业已经发生了彻底和激动人心的改变。20世纪50年代，当一艘船驶进港口，100个装卸工辛苦一周才能卸完。现在，货物被装进了集装箱，7个码头工人只用一天就可以卸完一艘大型货轮上的货。这些集装箱从船上直接运到了火车和卡车上，效率高得几乎像是在变魔术。这种运输上的革命大大降低了物流成本，使得美国人从斐济进口瓶装水都是划算的。

外部经济是随某公司外部所发生之事而产生的。如果一个公司打算将厂址选定在某一地区，当地的社区会提供一个技术熟练的劳动力市场，有序而且持续不断。周边随之兴起的依附性企业给这个公司提供了低成本的供应，这个公司因此得到了一个额外的推动力：

良好的工作得到了正确的评价，企业在机器、流程和一般性组织上的发明和改进具有它们的优点，这些优点我们马上就要讨论到。如果一个人突然冒出一个新构想，被别人接受并且与他们自己的意见结合起来，如此一来，它就变成进一步产生新构想的源泉。近来，依附性的企业开始在邻近地区成长起来，为这个公司提供了工具和原材料，而且在许多方面都有利于这个公司买到经济实用的原材料。[15]

想要了解一个企业与其供应商之间的重要联系，我们只需要考虑一下剑桥大学与位于硅沼的高科技公司之间相当紧密的关系就可以了。在一个比较老的例子中，宾夕法尼亚的矿工开采出煤炭，煤炭被炼成焦炭，然后被送入附近钢铁企业的熔炉中。

美国北达科他州的法戈市曾经是人们的笑柄，它和一部讽刺电影重名，但现在它变成了一个快速成长的软件市场，以成为全美失业率最低的城市之一而自豪。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法戈市看起来就像是另一个在大平原上逐渐消失的城镇，刺骨的冬日寒风吹过断垣残壁的市中心。但是，一些有创业精神的人断定现代通讯技术使得他们可以在任何地方设计和销售软件，包括在北达科他州的这个遥远之地。微软公司购买了大平原软件有限公司以扩大生产，引领今天的法戈市成为一个繁忙喧闹的技术知识汇聚之地。为了改变法戈市尘土飞扬、经济落后的名声，北达科他州大力投资于科研和开发，这部分的投资占收入的比重几乎比任何一个州都要大。

如果马歇尔的报酬递增是正确的，那么大即是美。如果大即是美，竞争就不能长期持续，因为大公司总是会打败小公司。查克横渡公司总是会被丘纳德海运公司击败。最终，每一个行业都会出现一个处于主导地位的垄断者。马歇尔这位竞争的主要支持者如何从理论上解释它的寓意呢？

他可以接受，因为他认为这种公司是不会永远存活下去的。马歇尔再次求助于生物学，并且借用了一个象征隐喻。企业家能够怀胎和分娩出一个健康的婴儿级公司，他们也可以把它养育到成年，但不久企业家死去，而接班的管理者常常天分不高。在公司被其他企业家接手后，新公司重新兴旺起来。

通过对创始人的寿命给予限制，以及将企业充满着活力且创始人也仍然健在的这一段时间限制到更短，自然因素仍然在给私营企业施加压力。如果情况果真如此，不久之后，企业的领导权就落入了活力不足且创新天赋不够的人手中，或者是落入那种对企业的茁壮成长不那么积极关注的人手中。如果企业改制为股份公司，它可能还会保持在劳动分工、专有技术和机器设备方面的优势，甚至可以通过进一步增加资本投入来增强这些优势，在有利的条件下，这种优势还会保证企业在生产作业中获得永久和显著的地位。但也可能会丧失太多的弹性和前进的动力，以至于在与更年轻而规模较小的对手开展竞争时，不再绝对地占有优势。[16]

按照马歇尔的观点，瘦人和饥民会啃蚀胖子和懒汉的利润。虽然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美国来说，随着跨国企业集团的崛起，马歇尔的理论似乎过时了，但现在看来，它们却十分适合当代。20世纪70年代的那些稳定庞大的企业集团，例如海湾和西方公司、国际电话电报公司（ITT）、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和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等，它们全都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徒劳地挣扎在水深火热的竞争市场上。在老板戴维·萨尔诺夫的长期领导下，美国无线电公司（RCA）主导着美国的媒体和电子产品市场，在萨尔诺夫退休之后，该公司很快就散架了。[17]后来，甚至在洛克菲勒中心总部大楼上的那个醒目的用红色霓虹灯勾勒出的RCA也被拆除了，曾经有几百万纽约人生活在这三个不断闪烁的字母之下。

新创业者付出了努力，他们要比必须满足股东要求的成熟公司承担更大的风险。即使创业投资常常以受挫而告终（或许承担了愚蠢的风险），但只要是从车库中传出一个成功的创业故事，它就可以让许多在闪闪发亮的玻璃大楼里上班的、供职于长期战略规划的副总裁丢掉饭碗。在最近的30年里，很明显，多数的新就业岗位是由员工少于500人的公司创造的。

近些年来，在创造“更灵活、更高效”企业这一欲望的驱使下，许多公司通过廉价出售业务单元达到瘦身的目的。国家酿酒公司不再生产酒精饮料，并且把公司名称改为量子化学公司。1989年3月，美国《商业周刊》的封面故事提出这个问题：“你的公司是不是太大了？”[18]朗讯科技公司是一家制造精密电话设备的公司，AT＆T在20世纪90年代做得最成功的事情就是将朗讯剥离出去。当AT＆T活力不再时，朗讯的股票价

格冲上了云霄，直到2000年赶上“科技股崩盘”才跌落下来。与此同时，许多公司如时代公司和华纳通信公司进行了合并，希望借此富有成效地分享知识和资产。随后，时代华纳公司与美国在线服务公司（AOL）于2000年进行了合并，但时机选择得很糟糕，而且执行得也很糟糕。自从100年前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出版以来，商人们不断地力求实现灵活性和规模经济之间的平衡，为的就是找到他们企业的最优规模。

消费者的购买决策是如何做出的？

截至目前，我们已经讨论了公司，但还没有检视消费者。对于这种片面性，马歇尔不会感到高兴，因为他反对李嘉图和约翰·穆勒随声附和的古典经济学主张，即产品的价值反映了生产这个产品所花费的时间。利用一个著名的隐喻，马歇尔声称供给和需求具有同样的力量："我们对将纸剪开的是剪刀的上刀片还是下刀片理智地进行争论，这其实和争论产品的价值是由效用决定的还是生产成本决定的是同样的问题"。[19]那么，在马歇尔的鼓励下，让我们利用边际的分析工具将供给和需求结合起来。

上次当我们离开华尔街的朋友时，他们正对酸奶垂涎欲滴。雅皮士黛比对酸奶的需求是基于每一客酸奶带给她的额外满足，马歇尔称它为"边际效用"。杰文斯则坚持称它为"最终效用"。所幸，他们从来没有一起讲过课，要不然一场无聊的辩论将随之展开。

马歇尔和杰文斯都主张，黛比的边际效用会随着每一客酸奶而减少。也就是说，第一客酸奶可能给她带来的快乐价值为1美元，第二客酸奶带来的价值则为0.9美元，第三客酸奶或许成了0.7美元，第四客酸奶为0.64美元，依此类推。最后，再多吃一匙酸奶就会让她感到反胃。在决定是否购买酸奶时，黛比会将售价和她的边际效用作比较。如果每一客酸奶的售价为1美元，黛比只会买一客（因为第二客她要花1美元，而给她带来的快乐只有0.9美元）。如果价格到了每客0.65美元，黛比会买3客。这3客酸奶每客她花费0.65美元，却给她带来0.7美元的效用。但是，如果她继续购买第四客，那只能给她带来0.64美元的快乐。经济学家画出一条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来描述边际效用递减。在每一种情况下，黛比都会把酸奶的边际效用（收益）与边际成本（价格）作比较。

马歇尔之后明确表达了"需求规律——卖出的数量越大，价格一定越低……随着价格的下降，需求数量增加，而随着价格的上升，需求数量减少"。[20]

当然，马歇尔知道单单价格本身是不能决定需求的。他列举了几个其他因素，并把它们放到"其他条件不变"这个栏里。其中，他讨论的最

重要的因素如下：（1）消费者的品位、习惯和偏好；（2）消费者的收入；（3）竞争产品的价格。如果黛比在读《华尔街日报》时看到说吃雅皮士酸奶有助于一个人打好壁球，她会立即流出口水，她的喜好会发生改变。即使价格保持不变，她也会购买更多的酸奶。但是，在解释需求规律时，马歇尔要求我们假定品味、收入和商品的价格保持不变。如果是这样的话，需求规律通常会成立（任何一个暂时不被考虑的因素发生变动就会改变需求曲线）。

于是，马歇尔再次对边际主义原则展开论述，并且向边际主义者以及亨尼·扬曼提出了问题：黛比会在何时停止购买酸奶？理性的消费者会继续判断，把从一个商品那里可能得到的额外满足与从另外一个商品那里得到的加以比较。如果花在酸奶上的1美元产生了价值1美元的快乐，但同样的钱花在寿司上能够带来1.2美元的快乐，黛比应该会购买寿司。她要持续购买寿司到什么时候呢？别忘了，根据边际效用递减规律，随着她购买越来越多的寿司，寿司对于她来说价值会越来越小。因此，她会持续购买寿司，一直到她从寿司上得到的快乐等于她从酸奶上得到的快乐为止。当1美元花在所有的商品上都产生了同样数量的快乐时，则处于均衡状态。如果1美元花在产品A上得到的快乐比花在产品B上得到的快乐更多，消费者应该会消费更多的产品A，更少地消费产品B，直到它们的边际效应相等。用马歇尔的话来说，消费者“不断地留心观察，以判断是不是他花在某种物品上的钱太多了，以至于他要通过减少这种物品的消费，转而购买一些其他商品，继而获得更大的效用”。[21]

马歇尔也为厂商开发了类似的分析框架。随着生产厂商的供应量增加，生产成本会上升。供给规律与需求规律正好相反：只要是消费者能接受的价格上升，供给就会上升。生产厂商会将额外生产一单位商品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即价格）作比较。（供给曲线是向上倾斜的，而需求曲线是向下倾斜的。）

消费者会不断地比较花在各种商品上的1美元所带来的边际效用，以同样的方式，生产厂商会不断地将1美元花在资本（机器设备）上的边际效用和花在劳动力上的边际效用进行比较。如果与1美元花在一个新员工身上相比，l美元花在新机器上产生了更多的边际效用，则管理者就会投资机器，并减少使用劳动力。当从每单位资本上获得的边际收益等于从每单位劳动力上获得的边际收益时，即达到均衡状态。

假定公司处于均衡状态，组装工人得到了加薪，结果会怎么样？与

从资本上获得的边际回报率相比，从劳动力身上获得的边际回报率（工资除以边际产出）下降了。管理者会用机器替代人工组装，直至边际回报率再次相等。基于这样的理由，马歇尔严厉地批评工会支持的为创造工作岗位而开发的项目和限产超雇，因为这只能对他们的工会成员造成伤害。

有时价格也会引领管理者放弃机器设备，转而雇用装配工人，例如，出现了电力成本上升和工资水平下降的情况。这种不断保持平衡的行为并不仅仅发生在资本和劳动力之间，还要在土地、新机器、旧机器、技术熟练的工人和技术不熟练的工人之间进行平衡。如果地价上升，管理者会在车间上加盖另一层，而不是水平地扩建。

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并没有主张所有的生产厂商都会按照边际思维或理性思维采取行动，但如果有一个生产厂商不这么做，那它的竞争对手获得成功的可能性就增大了，经济进化规律就会眷顾这些对手。最终，不理性的生产厂商将会倒闭。

不论是消费者还是生产厂商，多数经济主体是依据亨尼·扬曼、伊夫琳·沃和《天生爱神》的话生存着，对所迈出的每一步都进行着边际比较，永不停止。

是消费者或生产厂商决定了价格吗？是由双方决定的。就像剪刀的两片刀刃，供给和需求的相互作用决定了价格。古典经济学家过于强调供给，杰文斯过于强调需求，马歇尔“供求平衡点”的概念更有说服力，“它得到了扩展，以便领悟整个哥白尼体系，在这种体系中，经济宇宙中的所有组成元素通过相互对立和相互作用得以各就各位”。[22]

马歇尔也花时间反驳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他开宗明义地指出，人不能创造身外之物，人只能重新安排物质，以便更好地满足其他人的需要。资本家通过贡献出他们的金钱来使他人满足，他们获得的回报是作为等待的报酬，是因为他们没有在今天将钱用于购买消费品。马歇尔的说法如此具有说服力，因此，在这里直接引用以作依据。

> （马克思和其他人）认为劳动总能生产出一种“剩余”，即超过劳动力的工资，再加上用作辅助劳动的资本折旧的那部分价值，对劳动力不公平之处在于这一剩余价值被资本家剥削了。但是，“剩余价值全部是由劳动生产的”这一假设已经说明，他们把借助这一假设要

证明的结论视为理所当然了。他们没有试图证明这个假设，而且这个假设也不正确，这是因为他们认为在去除了机器的折旧之后，工厂中纺出的纱是纺纱机操作者劳动的产物。然而，其实它应是企业的劳动力和雇主及其下属管理人员，还有所使用资本的共同产物，而资本本身又是劳动和等待的产物，因此，纺纱就是各种类型的劳动和等待的产物。如果我们承认产品只是劳动的产物，而不是劳动和等待的产物，毫无疑问的是，我们会迫于一种必然的逻辑而不得不承认找不到利润存在的正当理由，不过其实利润是因为等待而得到的报酬，因为结论已经暗含在前提中了……

如果这是真的，延期满足通常需要决定延期之人做出牺牲，正如劳动者要付出额外的努力一样。如果这也是真的，这种满足的延期使得人们能够使用初始成本较大的生产方法，但因此总快乐得到了增加，就像通过增加劳动能确定无疑地增加总快乐一样。那这就不能信以为真了，一件东西的价值只是由消耗在其上面的劳动决定的。树立这一前提只需要进行暗含的假定：由资本所提供的服务是一个“免费”商品，是没有牺牲的给予，因此不需要利润作为补偿以利诱资本的继续投放。而这正是他们希望这一前提所要证明的结论。洛贝尔图斯和马克思伴随着痛苦的同情心所具有的道德力量，肯定值得我们时刻尊敬。但他们看作可行的科学理论显得只不过是一系列的循环论证，所要达到的效果只是“找不到利润存在的经济合理性”，而这一结果自始至终就隐藏在他们的前提之中。不过，至于马克思，这个前提又被他用神秘的黑格尔术语包裹起来，正如他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序言中告诉我们的那样。[23]

需求弹性就是我们对商品价格的敏感度

在发展需求理论的同时，马歇尔重新定义了经济学中最重要的工具之一——弹性。无论是宏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当今几乎每一类经济学的辩论都要面对弹性问题。每个政府政策肯定会或明或暗地涉及弹性。这个无法摆脱的、四处游荡的幽灵是什么？弹性是价格敏感度的另外一个叫法。人们对价格的变动是如何做出反应的？当价格上涨或下跌时，人们会对他们的购买做出调整吗？或者他们继续购买相同的数量？当然，答案取决于产品。

如果产品价格上升而人们减少购买，我们说需求是有弹性的。如果人们继续购买相同的数量，则需求是无弹性的。更确切地说，弹性是价格变动的百分数除以需求变动的百分数。如果价格变动10%导致购买量变化为11%，则需求是富有弹性的；如果它导致购买量的变化小于10%，则需求是缺乏弹性的。如果它导致购买量的变化为10%，则需求为“单一弹性”。（如果需求是高弹性的，我们看到的应是一条接近水平的需求曲线，表明人们非常容易调整他们的购买量。如果需求是低弹性的，我们看到的会是一条接近垂直的需求曲线，表明不管价格如何变化，人们还是购买相同的数量。）

弹性为什么重要？让我们看几个简单的例子。在几乎每一部詹姆斯·邦德的影片中，邦德说的下述台词都会出现：“伏特加马提尼，要摇的，不要搅的”。如果邦德只喝一杯，而且是一杯伏特加马提尼酒，并且不能用一杯杜松子马提尼酒或一杯牛奶来代替，他的需求即是缺乏弹性的。无论价格高低，他都要喝一杯伏特加马提尼。那酒吧的调酒师就处在了有利位置，他们可以为喝一杯伏特加马提尼收费100万美元。幸运的是，其他酒吧会为邦德的光顾而展开竞争。

然而，当垄断厂商遇到需求弹性低的消费者时，问题就产生了，比如说，如果只有一家公司供应胰岛素，它就可以漫天要价。当垄断厂商面对需求弹性低的消费者时，政府管制机构通常就要介入了。因此，制药公司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是不稳定的。政府希望制药公司开展研究以治疗疾病。但制药公司需要获得一个保证，那就是政府不能夺走它们的神奇发现，而让它们陷于破产的境地。另一方面，政府又必须要确保贫穷

的、绝望的病人不被敲竹杠。

因为这个缘故，多数经济学家听从马歇尔的建议，主张对许多垄断性事业应当加以管制，比如说供水和供电等公用事业单位。因为它们是“自然垄断”（在一条街道上有几家供水公司铺设管道是没有效率的），马歇尔建议政府应通过补贴或至少保证它们有利可图来鼓励它们增加产出。

通常情况下，对商品的需求是高弹性的。如果冰山形状的卷心莴苣价格上升，人们会改吃波士顿莴苣、长叶的罗蔓生菜，或者房前草坪上的杂草。

是什么因素决定了弹性的大小？首先，也是最明显的一点是可获得的替代品数量。可选择性越多，消费者越容易改变。对罗伯特·德尼罗的需求可能是缺乏弹性的。唯一一个可替代他的人物似乎是阿尔·帕西诺，尽管有些人说他是一个几乎完美的替代品。好莱坞最初想让罗纳德·里根，而不是亨弗莱·鲍嘉担任《卡萨布兰卡》中里克一角。这两人都算不上恰当的替代人选，但马歇尔从来没有说过所有的人都是理性的。

其次，我们花在寻找替代品上的时间越多，需求弹性就会越大。从1973年秋季到1974年夏季，汽油价格上涨了45%。在这一年的时间里，需求只下降了8%。不过在几年之后，消费者显示出了较大的需求弹性。他们购买小型汽车，乘坐公共交通运输工具，而且对住宅进行隔热保护。航空公司通过减少枕头、毯子和杂志的数量以减少飞机的重量。它们也减少了所携带食物和燃油的数量，甚至减少了飞机外部的涂漆厚度。

再次，马歇尔认为在家庭预算中不占重要位置的产品可能是缺乏弹性的。如果牙签的价格急剧上涨，很少有人会减少牙签的使用。牙签在家庭预算中占有的比例太低，不值得为涨价担忧。

弹性问题如何悄悄地进入政府的政策之中？几个例子有助于回答这一问题：

1.每隔几年，纽约市的大都会运输署（MTA）就会提高地铁的票价，它认为较高的票价意味着有更多的收入来平衡预算。这种做法其实是假定人们对地铁的需求是相对缺乏弹性的。但如果有太多的人选择乘坐公交车、出租车或马车，地铁的总收入是会下降的。

2.1998年，为了减少青少年烟民，克林顿和戈尔当政时的美国政府提议提高对香烟的征税。美国副总统戈尔宣称香烟价格每提高10%，青少年吸烟的数量就会减少7%。利用这些弹性的估算值，白宫建议每包香烟提价1.5美元，认为这样会在5年内减少42%的青少年烟民。反对者认为，因为下层社会的美国吸烟者并不与这一比例相符，所以税负将会由他们承担。就在美国政治家对此问题展开辩论的同时，瑞典却降低了烟草税收，目的是让从邻国走私烟草的黑市变得不再具有吸引力。

3.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直到现在，美国陷入大幅外贸赤字。1985年，许多经济学家指责美元太贵，即美国的商品看起来对外国人来说价格昂贵，反而外国商品对美国人来说价格低廉。这些经济学家建议通过购买外国货币迫使美元价格走低，这样就可以使得美国商品显得便宜，从而刺激外国人购买更多的美国货（并且，使得外国商品对美国人来说显得较贵）。这种主张是假定美国人对外国商品的需求是富有弹性的。从1985年春天到1987年秋天，相对其他工业化国家的货币，美元价格下跌了40%。但直到1987年底，美国的贸易赤字才开始下降。贸易赤字下降的时间拖延这么长，表明美国国内的需求弹性要比预期的小。经济学家也低估了外国公司宁可丢失利润也要保住市场份额的决心，所以，进口到美国的商品价格，并没有高到足以完全反映出美元价格下跌所产生的影响。[24]

弹性几乎是每一个现实经济问题辩论的基础。马歇尔常常提醒说，经济学家必须要面对真实的世界。一个一目了然的理论模型可能在纸上谈兵时具有说服力，但当把真实的弹性考虑进去之后，它就被证明毫无用处。通过澄清这一概念，马歇尔向经济学家表明：他们必须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贫困是一个长期的问题

在宏观经济学的问题上，马歇尔并没有冒险走得太远。他抱持着萨伊定律和货币数量论，并且把两者都传授给了凯恩斯。凯恩斯也抱持了多年，继而开始抨击马歇尔，并且将它们抛弃，就此我们将在本书后面进行探讨。

虽然马歇尔认为经济会独自运行得相当平稳，他也承认经济周期带来了兴衰沉浮。企业界的乐观情绪和悲观情绪会加速或放大这种上涨和下跌。在市场景气时，银行放贷的胆子越来越大，甚至敢贷给做生意的新手。但当经济最终放缓时，这些投资人就会抽回资金，从而使经济衰落得更快。“一根引燃了的火柴掉落下来……常常引起拥挤剧院里的灾难性的恐慌”，凯恩斯用类比来说明这一问题。[25]幸运的是，马歇尔的老朋友“时间”会治愈所有的伤口，经济形势再次好转。虽然凯恩斯同意情绪会带来经济的剧变，但他后来指出，在大火被扑灭之后，剧院的废墟在很长的时间里仍然会是瓦砾一片。经济萧条可能会有长期的影响。

由马歇尔和耶鲁大学教授欧文·费雪提出来的一个宏观经济特征现在仍然不被政治家们接受。经济学家将利率区分为实际利率和名义利率。名义利率是平常在银行窗口公开张贴出来的借贷利率。真实利率则是从名义利率中扣除了通货膨胀率：如果债券的利率为10%，而通货膨胀率为7%，那么真实的利率为3%。

政治家们所认为的“真实利率”的定义是：去银行贷款时，你“实际”支付的利率。

尽管《经济学原理》中理论的篇幅非常大，马歇尔还是坚持认为经济学家必须务实。他经常要为皇家委员会提供服务，并且要在国会面前作证。他研究经济学是为了帮助穷人。几年以后，他曾经对老年穷人皇家委员会说：“最近25年我致力于研究贫穷问题，我的工作很少不是与对此问题的探究有关系。”[26]他支持公共教育和对财富适度的再分配，因为这会提高生产力和社会福祉。

马歇尔在离社会主义相去甚远的地点停了下来，这个点被称为“最大的燃眉之急”。与远在亚里士多德时期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一样，马歇尔

担心集体所有制会“扼杀人类的活力，妨碍经济进步，除非是在它被引入之前，全体人类已经学会对待公共物品的无私奉献”。马歇尔评论道，“从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条件的突然而猛烈的重组中，有耐心的经济学学生一般会期待结果是善少恶多”，这再次揭示了他渐进主义和进化论的世界观。[27]

对马歇尔来说，“缺乏耐心”几乎与“不诚实”一样是一种很恶毒的侮辱。

马歇尔认为，古典经济学的悲观主义与充满希望的马克思主义都是错误的。停滞状态还远没有到来，人口的增速没有超过食物的增速，地主并没有主宰这个社会，尽管贫穷仍然让一部分公民丧失了尊严。

> 贫穷和愚昧可能会逐渐灭绝，这一希望的确从19世纪工人阶级稳定的进步中得到很大的支持。蒸汽机帮助他们减轻了许多费力和有害身体的工作，工资提高了，教育得到了改善，并且更加普及。铁路和印刷机使得国内各地同一行业的人相互沟通更加容易，可以承担和实施广泛而富有远见的政策。同时，对脑力劳动日益增长的需求已经引起技工阶层的增加，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他们现在的人数已经超过了非技术工人的数量。从“下层社会”这个术语最初的含义来讲，大部分的技术工人已经不再属于这一阶层；他们中有些人所过的生活已经比100年前大多数上层社会所过的生活更高雅，也更体面。[28]

只有马克思写过比这一段更加热情洋溢的资本主义赞歌。

但是，马歇尔不是无赖，他知道工作还是得做。他请求他的学生帮助他，让经济学成为促进人类福祉的工具。他对自己看到的贫穷深恶痛绝，但他拒绝让这种憎恶支配自己的经济学逻辑。在消除贫困上，大自然是不会快速跃进的。

马歇尔活到82岁，一直是剑桥大学元老级的教授。凯恩斯称赞马歇尔是罕见的集各种天赋于一身的人。经济学大师必须要像马歇尔一样，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数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家和哲学家。“他必须为了实现将来的目标，借鉴过去的经验来研究现在。”[29]

有一个与卡尔·马克思同姓，但更有幽默感的人曾经被人指责：“先

生，你在考验我的耐性。”格鲁乔·马克思回答说：“如果我是在折磨你的话，我不介意这样做。有时间你一定要前来考验一下我的耐性。”

所有经济学家最好都“试试”马歇尔的耐心。他不是等待答案，而是寻找答案。他不是等着他的理论被采用，而是积极地宣传它们。但是，不经过深思熟虑，他从来不固守自己的观念。不经过缜密反思，他也从来不排斥其他人的观点。他想把古典经济学和边际主义经济学整合起来，他想理解斜坡和高原、变化和均衡，以及演化与稳定。最后，他成就斐然，并且在他身上也和谐地体现出了高尚纯洁的心灵和犹如宝石般敏锐、明亮的才智。

第八章 从凡勃伦到科斯：事关社会与法律制度的经济学

在经济学上，区分观念的“旧”和“新”没有太大的意义。正如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告诉人们的那样，经济学有自己与众不同的时钟。一家经营85年的公司可能会因为采用不当的新技术而倒闭。那么，它是一家老公司，还是一家新公司？

我们又当如何解释将制度学派区分为“旧派”和“新派”呢？对二者进行明确的定义和区分是不可能的。通常，制度学派对一般经济学所探讨的范畴是避而不谈的：地租、利润、收入、资本、劳动力、成本，诸如此类。相反，他们关注社会的法律、风气和制度，以获得独到的见解。旧制度学派兴起于20世纪初，他们批评马歇尔那些渴望求知的学生只会坐在办公室里，关闭百叶窗，摆弄着不相关的数学曲线，而不是按照他们的老师要求他们的那样去仔细观察现实世界。旧制度学派指责说，在那些放弃马歇尔理论并追随其他经济思想的人手里，马歇尔的抽象理论被忽略掉了太多的东西。当马歇尔的弟子们沿着他们的需求曲线天真而快乐地滑动时，制度正在演化，经济理论正在逐渐过时。

新制度学派与旧制度学派截然不同。和旧制度学派一样，他们观察社会制度，但他们使用的正是备受旧制度学派抨击的马歇尔的分析工具。

穷小子和旧制度学派

让我们首先考察一下旧制度学派，但要从了解索尔斯坦·凡勃伦这位卓越超群的成员入手。除马克思之外，截至目前我们所讨论的经济学家都还算是温文尔雅的。他们大概会成为好邻居，我们也可以将亚当·斯密和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想象成快活的童子军队长。凡勃伦是个例外，他是一个让人精神一振的凶神恶煞。按着一个恶作剧式的人物表顺序，凡勃伦对经济思想史给予了尖刻的批评。

凡勃伦的制度方法抨击的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两大支柱：（1）马歇尔的需求规律，该规律认为，当价格下降时，人们会更多地购买某种商品；（2）关于工作的假设，劳动者只是为了得到报酬而工作，并非“为了工作而工作”。

对边际学派“存在一条平稳渐进的抵达均衡点的路径”的假设，凡勃伦也进行了抨击。旧制度学派指责道，均衡并不存在，经济永远在变化。均衡是那些没有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的经济学家的白日梦。

凡勃伦可能是一个较好的批评家，但不是一个有建设性的理论研究者。他不确定该如何重建经济学，但他可以确定马歇尔及其追随者把经济学搞得一团糟。凡勃伦认为，如果经济学家想发展更好的理论，他们应当淡化“地盘”意识，更乐意融合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的观点。[1]

这个如此尖锐地批评新古典经济学的索尔斯坦·凡勃伦是何方神圣？1857年，他生于美国威斯康星州的一个农场，是挪威移民之子。8岁时，他家移居到明尼苏达州，这里的奶酪不太好吃，但农作物比较丰饶。

就像其他美国移民一样，凡勃伦家境贫穷。但是，小孩子们并不懂得这些。他们有足够的东西可吃，而且他们的邻居也过着类似的生活，简朴而卑微。

评论者几乎总是把凡勃伦爱批评的态度，与他穷困的移民家庭地位联系起来。在把凡勃伦摁到精神分析师的沙发上之后，他们从精神分析

的角度把他描述成是一个在美国社会受到鄙视的人。在威斯康星和明尼苏达关系紧密的移民社区里，英语是第二语言。这种理论认为，凡勃伦的这种局外人身份使得他能够对美国的经济生活发表独特而没有偏见的观点。因为他的眼光可以刺穿表面，能够看到资本主义制度基础上的裂痕。凡勃伦自己也在他的文章《现代欧洲犹太人的卓越智慧》中采纳了与之相似的看法。

不可否认的是，事出皆有因，但用环境决定论来解释似乎又扯远了。毕竟，他的11个兄弟姐妹同为挪威人，却从来没有展示出他这种非凡的洞察力。实际上，尽管很聪明，但凡勃伦总是有点古怪。就算是在挪威长大，他也仍然是一个性情乖僻、言辞犀利的人。作为一个早熟的孩子，凡勃伦巧妙地说服父母，把在阁楼读书包含在他要做的家务活中，而这时他略显愚钝的兄弟姐妹却要在田里辛苦劳作。17岁时，凡勃伦进入离家近的卡尔顿高等专科学院学习。因为卡尔顿学院不是路德教会的事业机构，而路德教会的教学机构会比较迎合凡勃伦的斯堪的那维亚文化，所以凡勃伦粗劣的社交技巧在卡尔顿就出现了问题。他会戴着一顶浣熊皮的帽子现身正式场合，而且在一次课堂练习时，凡勃伦发表了一个清醒的演讲，却大声叫喊着要一醉方休。在这种教派学院里，他的这些做法不受欢迎，他那提倡吃人肉的严肃演讲也不会引起共鸣。毫不奇怪，学院催促这个异教徒赶在其他学生之前完成学业。

但是，凡勃伦以最高的成绩H毕业。

凡勃伦没能将卡尔顿学院鼓吹得转而信仰酗酒主义或食人主义。不过，在他读书的这段时间，后来成为美国著名边际学派经济学家的约翰·贝茨·克拉克说服他要阅读经济学。凡勃伦发觉经济学很有趣，但还是决定转到耶鲁大学去修一个哲学学位。他应该是从希腊暴君西绪福斯的神话开始研究的。在他完成博士论文之后，他有好几年的时间沮丧地四处游荡，当他兄弟姐妹辛苦干活时，他却在家庭农场里游手好闲，一边找着工作，一边等待着被拒绝。

最终，耶鲁大学的博士学位让凡勃伦在康奈尔大学获得一个教授经济学的职位。他未来的导师詹姆斯·劳伦斯·劳克林“在伊萨卡的这所大学里坐着，当凡勃伦进来时，他看到凡勃伦就像个贫血之人，头戴一顶浣熊皮帽，身穿灯心绒长裤，尽可能地用一种柔和的音调报告了他的到来：‘我叫索尔斯坦·凡勃伦’。”[2]两年之后，劳克林转到芝加哥大学任教，一同前往的还有他的这个门生。

凡勃伦此时已经30多岁了，与卡尔顿学院院长的侄女结婚也有好几年了，他从事着写作、教书，也忙着拈花惹草。三个女人里面有两个会让他轻易得手。

让我们先谈谈他的写作。这涉及许多奇怪主题的评论和文章，比如“女人服饰的经济理论”，以及“女性的野蛮人地位”。他的教学则充斥着喃喃自语、讥笑和辱骂，并且用话刺激他的学生放弃选修他的课程。对于大多数学生的退出，他感到很愉快。他在黑板上写满书目，然后宣布下周的测试会涉及所有这些书，这位明显有虐待狂且傲慢无礼的人会以这种方式开始他的新学期。他几乎总是将学生的成绩评定为C，对于那些渴望加入美国大学优等生全国性荣誉组织ΦBK联谊会的学生来说，他这是在挫伤他们的自信心。至于说到他的拈花惹草，他的风流韵事至今仍然是个谜。

炫富心理与凡勃伦效应

且不管凡勃伦做人的态度和他的私生活，有一件事情是确定无疑的：他的第一本书《有闲阶级论》于1899年问世，证明这个说话嘟嘟囔囔的人也能写出质朴的文章。本书的副标题是“制度的经济研究”，凡勃伦的这本书痛击了新古典经济学的需求模型。按照凡勃伦所说，新古典经济学家是假定每一个消费者独立地权衡所购商品的成本和收益。在其先前的一篇文章中，凡勃伦用更耸人听闻的、混杂着隐喻的语言指出了这一点：“享乐主义关于个体的概念是，将人视做闪电般计算快乐和痛苦的计算器，他就像是渴望幸福的同质小球，在刺激物的驱使下不停地摆动，这个刺激物使他的方向改来变去，他却还是原封未动。”[3]

这个模型明显的错误在哪里？单个人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小球。每一个人会在决定向何处去之前观察其他的人。除少数引领潮流的人和反社会者之外，多数人还是希望不落后于跟自己社会地位相等的人，至少也要隔着篱笆看看他们正在干什么。个人对效用的评价部分取决于她的邻居对购买的想法。有一位最讲究的主人在聚会上用鱼子酱招待客人，有一位最缺乏自信的客人开口称赞这种咸鱼卵的光泽。但是，相比于冰激凌或巧克力碎片饼干，有多少客人更愿意吃鱼子酱呢？

凡勃伦犀利的观察也适用于时尚界。可怜一下穿着涤纶休闲服在华尔街上溜达的那个人吧。“做这件衣服要耗费多少聚酯纤维？”爱打趣的人开始取笑。但是，休闲服可是曾经风行一时啊。是休闲服变了吗？不，是时尚变了。

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中对人类学进行了大篇幅的研究，略微提到了居住在日本北部的阿伊努人、印度南部尼尔吉里丘陵的托达人和澳大利亚的布须曼人。凡勃伦发现人有一种“攀比的本能”，部分内容要仰仗于美国人类学家刘易斯·摩根和弗朗兹·博厄斯的研究，博厄斯是玛格丽特·米德的导师。凡勃伦说，毫无疑问，灌木丛另一边的草总是更绿，而托达人正在努力做到不落在其他托达人之后。

当然，自我防卫是原始的本能。不过很快，在进化过程将黑猩猩与人类区分开以后，人类开始根据财产所有权判定他们的社会地位，掠夺

者在聚敛财富的同时，也积累了社会对他们的尊重。

到最后，如何获得财产变成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一个人通过辛苦和汗水积攒财富，他是不会受到夸赞的。按照凡勃伦的说法，不流一滴汗就能赚进财产的家庭才会受到钦佩，并引起社区里其他家庭的效仿。有闲阶级因此产生。

今天，凡勃伦被一家生产除臭剂的公司所纪念，这个公司做的下述广告等于是在告诉人们提升社会地位的黄金法则：永远不要让他们看到你流汗。汗流浃背努力工作的人违背了人的本性，毫不费力的优雅才是目标。就像一个做蛋奶酥的厨师在听到门砰地关上会浑身颤抖一样，贵族们一想到流汗就会不寒而栗。

凡勃伦提供了两个引人注目的例子，说明了有闲阶级努力奋斗，就是为了维持他们不必做工的社会地位。第一个例子，“我们被告知，某些波利尼西亚的酋长，在保持合乎礼仪举止的压力下，宁可挨饿，也不用自己的手将食物送到自己的嘴里。”第二个例子，这是一个“更恰当的例子，至少是一个更加不会被人误解的例子，这是由某个法国国王所为。据说他丢掉性命的原因是在遵守礼仪要求时表现出来的超强的精神忍耐力。在负责移动主人座位的官员不在场时，国王坐在火前忍受着痛苦，使得他被烘烤至死”。[4]

除“炫耀性休闲”之外，凡勃伦也讥笑“炫耀性消费”。在我们现代文化中充满了这样的例子。衣服的商标过去常常是缝在里面，人从外面是看不到的。今天，设计师的标识则显示在衬衫、领带、女衫和裤子的明显位置。当然，对设计师来说，这是免费的广告。更重要的是，它是由消费者付钱的广告。拉夫·劳伦的名字告诉世界的是，穿他的衣服表明你有能力买得起昂贵的衣服。（有人想知道，要是设计师的本名拉夫·列夫席兹显现在昂贵的运动衫上会如何。）在电影《回到未来》中，20世纪50年代的女学生想当然地认为她那位来自未来的朋友叫“卡尔文”，因为他穿的牛仔裤上印着那个名字。

显然，汽车不只是提供了交通工具。根据喜剧演员杰基·梅森说的，全美国都认为凯迪拉克是最好的汽车之一，贝弗利山庄和纽约长岛的赛达赫斯特除外。在这两个小村庄，所有受人尊重的居民都拥有奔驰汽车。凯迪拉克是让人反感的汽车，人们会因为停在自己车道上的凯迪拉克而受人责备：“噢，这不是我的……我不知道是谁的……可能是我俗不

可耐的邻居的……肯定是有人在昨天晚上扔在那里的……我现在要叫运垃圾的人来把它弄走。”为什么他们喜爱奔驰？他们坚持说是因为喜好“工程技术”。但这些工程技术的狂热爱好者甚至可能都不知道一个烤面包机是如何工作的，更不用说一辆7万美元的汽车了。

根据华盛顿的一个传闻，参议员埃弗雷特·德克森是华盛顿第一个在他的汽车中装电话的人，他很享受打电话给他的竞争对手，提醒说他的车上装着电话这件事。其中一位竞争对手参议员林登·约翰逊勃然大怒，他给自己的车安装了一套更好的电话系统。一装好，他就马上打电话给德克森。他们交谈了一分钟，然后约翰逊厉声说道：“对不起，埃弗雷特，我不得不让你待机了，我的另外一条线上打来了电话！”

起初，凡勃伦锐利的观察比较容易找到通往社会学，而不是通往经济学的道路。然而1950年，哈维·莱本施泰因教授发表了一篇文章，将凡勃伦的理论应用到了经济学中，题目是“消费需求理论中的从众效应、虚荣效应和凡勃伦效应”[5]。文章指出，通常马歇尔的需求法则较为盛行，它说的是低价会导致更多的需求。但对于某些商品来说，即所谓的“凡勃伦商品”，消费者对它的需求取决于“它的效应”，而且消费者认为这个价格是其他人买不起的价格，是消费者所期待的炫耀性价格。最近，宾夕法尼亚州的乌尔辛纳斯学院将其学费提高了约18%。什么原因？它想提升自己的声誉。令人吃惊的是，这样做使得申请入学的学生人数提高了35%。该学院院长说：“这是想不到的，让人为难。”[6]如果古驰手提包的市场价格下降，以至于在任何一家百货商场都能买到，我们很快就会看到古驰包的销售量减少了。它们丧失了凡勃伦效应。如果你穿着在廉价超市凯马特买来的衣服出现在乡村俱乐部，你是不会受到重视的。如果你在贝弗利山庄开着一辆凯迪拉克来到代客泊车的服务生面前，同样也没有人拿你当回事。

工程师和商人，孰优孰劣

生产商知道，嫉妒心和来自同等地位之人的压力，会迫使消费者采取行动。根据凡勃伦及其学生的说法，商人在增强产品的预期炫耀性价格上花的时间，比在增加产品有用性上花的时间要多很多。制度学派认为这样做是可耻的，既浪费时间又浪费才能，造成的结果是为劣质产品制作出花言巧语的广告。

这也是对天性使然的内驱力的误用。像马克思一样，凡勃伦相信创造的欲望，它是一种工艺的本能。不幸的是，因为炫耀性的休闲和炫耀性的消费已经腐蚀了社会，创造的欲望受到了损害。

凡勃伦避开了马克思那种对阶级斗争的分析。[7]在他看来，敌人不是资本家，主角也不是劳动者。他写了一个不同的演员表：坏蛋是商人（不管他们是否拥有公司），好人是工程师。在现代社会里，只有工程师才拥有创造、改进和生产的动力。对工程师颐指气使的商人会扼杀创造力。提起炫耀性的商品，商人会激动得浑身发抖，他们只为一个目的而生产，就是赚钱。如果说一个产品也不用做就能挣到钱的话，他们会再快乐不过了。把工程师和商人的梦想作一下对比吧。每天晚上，工程师都要带着口袋里的笔和腰上挂的计算器上床睡觉，梦想着发明完美的、更有效率的发动机。商人则穿着细条纹的睡衣上床睡觉，梦想着大众突然发现他的老产品流行起来。如此一来，他不用在新技术或产品创新上投入一分钱，就可以赚到几百万美元。

IBM的发展过程中充满了激烈的斗争，在其创立者老托马斯·沃森和他的儿子小托马斯之间发生了近乎激烈的争吵。20世纪50年代，老沃森希望公司坚持出售打卡机，而他那位雇用了新生代工程师的儿子却极力主张公司要开发电子计算机。父亲担心计算机会使IBM有利可图的打卡机业务被淘汰，而作为总裁的儿子几乎将公司所有的资产都投到了计算机的开发上。IBM在激烈的转型中幸存下来，但爷俩变得几乎形同路人。[8]教训就是：最好是自我淘汰，而不是等着你的竞争对手替你做这件事。

凡勃伦认为，20世纪科学工程师的兴起会导致资本主义哲学基础的

垮台。凡勃伦期待着机器能够训练出人的现代思维，并对资本主义的迷信和教义产生怀疑。因为工程师，甚至连基层的机器操作工都看清了自己与科学的关系，凡勃伦认为他们可能会起而反抗对上帝、国家和私有财产的象征主义、虚伪礼节和抽象的集体信仰：

> 因此，机械工业的训练在工人生活习惯和思想中反复灌输的内容，是有序的规律性和机械的精确性，而表现在智力上的成果就是，习惯性地求助于可测量的因果条件，以及相对忽视和贬低那些不是运用此类方法的心智能力练习。[9]

凡勃伦预测道，工程师和经理人之间的冲突毁坏的可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的哲学基础，资本主义经济也会被消耗乃至削弱。工业巨头们拼命地获取高额利润，有两条路可以达此目的：第一条道路是采用独占的方式限制产出，第二条道路则需要降低生产成本。因为商人对机械学所知甚少，所以他们忽视效率。凡勃伦严厉地批评这种“尽职尽责的效率退步”。在经理人投资于旧技术之后，他会抑制生产，并且徘徊不前。与之相反的是，工程师渴望进步。经理人偏好便宜又能锦上添花的特性，而工程师想的是满足需求。工程师想制造更好的捕鼠器，而经理人想的则是如何诱骗消费者。由于强调短期的财务回报，商人和金融投资家对长期的经济增长起到了破坏作用。

凡勃伦对于政府会控制这些强盗式的大商巨贾，只抱着一丝微弱的希望。事实上，已经太迟了，因为商人们已经将政府官员套牢，并且将他们关进了“牲口棚”里：“简单地说，代表政府就是代表着商业利益”。[10]尽管凡勃伦批评新古典经济学，他有时也会附和亚当·斯密，特别是在贸易限制问题上：

> 在文明国家的情况总是这样的，政府因为对国家的商业利益关心程度不高而受到控告，它产生自以下理由：国家的立法者和行政机关在某种程度上参与实施了必然有一些破坏性的管理，而破坏经常是按照商业方法和出于商业目的渗透进工业管理的日常工作中。对于这种无节制的……交易，政府是能够加以处罚的。[11]

就像他早就蔑视政府一样，凡勃伦也鄙视工会及其领导人。他说，工会和商人一样，也阻碍了效率的提高，妨害了经济的发展。工会不但不帮助一般的工人，反而是以践踏非工会成员的利益来提高工资。

> 普通工会成员……对于维护自己在组织中的特权和额外补贴方面的既得利益方面采取防守姿态。他们显然受到一种情感的驱使，那就是只要既定的利益得以维持，他们就会比普通工人多得到一些。[12]

在《工程师与价格体系》一书中，凡勃伦推测说，工程师可能会对浪费和怀有恶意的破坏厌恶至极，以至于他们会推翻老板，占领生产现场和会议室。毕竟管理者更需要他们，而不是他们更需要管理者。技术专家只代表了人口的1%，而且一分政治学学分也没有修过，他们可能会以凡勃伦派系中“哲学王”的身份出现：“……挣脱那些背道而驰、只知追求私利的商人之手，或者将持久的管理托付给其他人，而不是托付给受过适当训练的技术专家，即生产工程师，肯定是再也行不通了。”[13]

和马克思一样，凡勃伦对新的管理者要做什么并不太了解，但他确信他们不会做得更差。

凡勃伦将工程师和商人描述得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种，但随着岁月的流转，这种区别似乎越来越模糊。根据《财富》杂志的调查，从工程师起步开始往上爬的首席执行官占有很大的比例，[14]而且工程师在当今读MBA的学生中也占有较大的比重。凡勃伦也想当然地认为，握有权力的工程师不会向自我利益屈服，但凭什么他们的行为就不会像他们所取代的市场垄断者那样恶劣呢？工程师真的会更加慈善，而且永远投身于创造的欲望中吗？

凡勃伦并没有拼凑起一个精致的经济模型，他也不认为他或者任何其他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因此，他花了大量的时间用来驳倒他的前辈留下的一目了然的理论。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将非货币因素放到了叫作“其他条件不变”的“牲畜栏”里。凡勃伦鼓起勇气，进入这个“牲畜栏”，对马歇尔假设的会保持不变的那些因素（例如口味）加以检查。凡勃伦偷偷地讥笑那些对经济学中不可预测的人性视而不见的经济学家。霍华德·休斯回想起见过洛克菲勒一面，“当我看到他那张脸时，我就知道是什么成就了标准石油公司了”。没有人可以把一张脸加以量化，或者预测老板的一张臭脸如何可以改变生产现场的效率。

理解凡勃伦或阅读他的文章依然有趣。他的一位最杰出的学生用这样的句子描写他的作品：“（他）用一只眼盯着他所分析的科学的优点，另一只眼则注视着局促不安的读者。”向凡勃伦学习，就像是做一次不施

麻醉的活体解剖。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15]但却没有人能够忘记它。凡勃伦仍然阴魂不散地缠着我们。每当某个有头有脸的执行官坐在深色车窗、加长型豪华轿车里飞快地驶过，而我们这些贫穷的粗人却要在雨中等待公共汽车时，索尔斯坦·凡勃伦就会无所顾忌地发出幸灾乐祸的笑声。

加尔布雷思对广告的严厉批判

凡勃伦启发了许多优秀的学生，包括韦斯利·米切尔、约翰·康芒斯以及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但是，传承凡勃伦冷嘲热讽衣钵的最著名的是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在漫长的职业生涯里，加尔布雷思担任了许多具有争议的经济职位。他的同事承认，他在两个方面是无人企及的：身高和幽默感。由于他是在加拿大农村呱呱坠地的，所以他诙谐地承认他与凡勃伦有相同的农村背景。他写道，一个好农夫需要的是强壮的身体和平庸的头脑。在他的回忆录中，加尔布雷思回想起某些激发青少年分泌荷尔蒙的夏日时光。当与他的梦中情人——一位金发少女——在果园里散步时，他指向一片草木茂盛的田野，他家的奶牛正在那里啃食牧草。正当他们快活地盯着看时，他们注意到一头白色的公牛正在为一头处于发情期的小母牛“服务”。因为小姑娘看得饶有兴趣，加尔布雷思鼓起勇气对她说：“我觉得做那事应该很棒。”

对于这种微妙的暗示，小姑娘的眼睛眨都没眨。她答道：“嗯，那是你家的母牛。”[16]

加尔布雷思在2006年去世，享年97岁，漫长职业生涯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美国度过的，当过哈佛大学教授、总统顾问、小说家和社会评论家，而且同时兼有许多头衔。因为这个缘故，许多经济学家嘲笑他的著作是肤浅又业余的经济学。要身兼数职，一个人既需要有一个大脑袋，又需要很大的脑容量。他们含沙射影，暗示只有天才的凯恩斯才能侥幸地取得成功。

并非加尔布雷思具有超乎常人的才能。当总统杜鲁门打电话给他，请他协助工资和物价管制工作时，据说年轻的加尔布雷思畏缩了，“想必起码有10位经济学家比我更能胜任，总统先生。”

“那有什么用！他们没有一个人愿意干这活！”

加尔布雷思接下了这个工作，发展出有利于样样都管的大政府的政治和经济哲学。在其3本主要著作《富裕社会》（1958）、《新工业国家》（1967）和《经济学与公共目标》（1973）中，加尔布雷思激烈地抨击了当代资本主义及其主要的辩护人，也就是那些新古典经济学

家。加尔布雷思的作品所嘲笑的对象，也正是凡勃伦所嘲笑的人。面对着无数贪婪的企业，人们怎么还能相信亚当·斯密的竞争理论？对他来说，马歇尔的竞争理论比小仙女、圣诞老人和白雪公主的故事还要荒诞离奇。加尔布雷思坚称，只有那些看不到窗台以上的智残人士才会否认福特汽车公司的可怕力量。

还有谁仍然相信所谓的"消费者主权"神话，即消费者决定厂商应该生产什么？加尔布雷思坚持说，因果关系应当是反向的，应该是厂商塑造了满足他们销售需求的消费者。

让我们想象以下情节。你步入一个超市要买可可松饼，你就像是广告里大叫大嚷"要吃可可松饼的布谷鸟"。加尔布雷思大步走进来，他要买普通的、健康的、无糖也没有甜味剂的麦麸粉饼来补充身体能量。在排队付款时，你转身对加尔布雷思说：

"我每天早晨都要吃可可松饼，我真的喜欢吃。"

加尔布雷思大声反对。他把需要（needs）和欲望（wants）区分开来。你不可能需要可可松饼，所有的需要都是从你体内发出的，但并没有非吃可可松饼不可的本能的动力。你只是有吃这种谷类食物的欲望，但有欲望吃与需要吃相比，并没有那么重要。再者，加尔布雷思否定了是个人决定了想吃可可松饼的渴望（desire），而是麦迪逊大道上的广告商引诱你产生了想吃可可松饼的欲望。广告和推销"与'自主决定的渴望'这一观念是抵触的，因为它们的核心功能是创造渴望，即给人带来原先并不存在的欲望"。[17]

加尔布雷思认为，他推翻了马歇尔的"需求的边际效用"法则。因为市场读不懂消费者对商品的真正需求（demand），因为那形成于消费者的内心深处；市场读懂的是花言巧语的广告商灌输给消费者的人造欲望。加尔布雷思称它为"依赖效应"。

加尔布雷思并没有只是说出这一主张就止步不前了。他也推断出了一个有力的结论：因为厂商发明并灌输了"想要"，而"想要"并不急迫，所以政府应当对私人的消费加以限制，而将资源用来改善公共设施。加尔布雷思痛斥从破烂不堪的公园和贫民窟中间呼啸而过的豪华轿车，他指出，从私人角度看，美国在令人讨厌的、自私的富裕中兴旺起来，而从公共角度看，美国却极为匮乏。美国人并不真的想要这种失衡，是公

司迷惑了他们。

加尔布雷思预见到了一个更加应予以藐视的未来，除非政府采纳民主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的原则。他预测随着技术替代工人会出现更多的失业、更多的污染，更多的家庭会堆满“新改进的”毫无用处的小玩意。无论如何，有谁会真的需要泵式牙膏管呢？挤压式牙膏管就那么不好用吗？

加尔布雷思的一番扫射，击中了古典经济学的神经中枢。如果他揭穿了边际效用分析，让大家了解到它就像奥兹国里的女巫一样不起作用的话，那马歇尔就被证明是没有头脑的稻草人了。

但是，是谁扮演了好女巫的角色，并且对加尔布雷思的所有理论浇了一盆凉水呢？是弗里德里希·哈耶克。

在《依赖效应之不合逻辑的推论》一文中，哈耶克反驳了加尔布雷思关于所有重要的“欲望”都来自于内心的主张。[18]他同意只有少数需要是真正自然产生的。难道加尔布雷思认为只有食和性才是生活的重要内容，所有其他的事物都是微不足道的渴望吗？哈耶克质问：为什么要否定环境对渴望的重要影响。

如果加尔布雷思的逻辑是正确的，那文化就是不重要的。在18世纪，从来没有人一觉醒来，说“老兄，我好想听莫扎特的交响曲”。于是莫扎特作曲，然后激发了其他人想听他的音乐的渴望。但他的音乐仅仅是富人的专宠吗？或是对人类有意义、有价值的贡献？

有好几年的时间，美国公共电视网（PBS）一直在宣传朱莉娅·蔡尔德的节目《法国大厨》。在她的节目推出之前，是否有任何的观众会在半夜爬起床来，渴望看一个高个子的傻大姐用一种滑稽的腔调教他们做菜吗？当然没有（做噩梦的时候不算）。

我们所谓的文明，主要是指外部因素在争夺大脑的注意力和情感时产生的一种反应。

加尔布雷思呼吁要设立更多的公立学校。大概这些学校会花大量的时间教授“不重要的”、“外部因素创造的”东西，比如文学和音乐。

毋庸置疑，现代的家庭里面塞满了无聊的玩具、用具和“易引起话题

的东西”。但是，加尔布雷思能够提供什么可能的解决办法，既不显得专横又避免了适得其反呢？

简单地禁止消费品是专横的做法。相反，加尔布雷思极力主张对消费品的广告进行取缔。要是听从加尔布雷思的建议，政府可能会恳求大众更聪明地花钱，而不是更多地进行炫耀性消费，政府可以说服人民将私人财富贡献出来用于发展公共事业。但这样的建议却有违于加尔布雷思自己的原则。通过促进更谨慎的消费和增进更多的公共物品，政府可以逐渐灌输新的“外部因素创造”、“不急迫”的欲望。不管是政治家做的还是商人做的，广告就是广告。

加尔布雷思的这一批评，并非暗指政治家不应提倡公立学校。但是，在没有承认他的“依赖效应”理论存在缺陷之前，加尔布雷思不应该催促政治家追求这一目标。

加尔布雷思可能夸大了广告的能量，广告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毫无疑问，同质产品之间的广告战是一种资源的浪费，此类广告只是以小段的音乐和撩拨人的方式为特色。然而，在吸引眼球的同时，许多广告也传递了许多有用的信息。在信息确实促销了产品的同时，这种广告受到观众的注意了吗？

一个关于眼镜广告的著名研究显示，在美国允许眼镜制造商做广告的州，眼镜的售价要比禁止做广告的州低25%～30%。[19]

人们会听信只是看起来很炫目的广告吗？美国的营销史就充斥着许多失败的案例，例如爱泽尔牌汽车、电影《伊师塔》和帕米亚牌“无烟香烟”。公司的营销部门一味地努力追赶美国大众一时的喜好，谈不上引导潮流。《华尔街日报》报道说，运动鞋生产商在内陆城市试销他们的商品，因为城市青年经常会引领文化时尚。1986年，一种英国骑士牌（BK’s）的运动鞋突然流行起来，销售量节节攀升，直到当地的街霸黑帮根据它的标识给它起了个绰号叫夺命兄弟（Brother Killers），从那时起，销售量开始直线下降。[20]

即使一个轰动一时的商业广告说得消费者心动，去购买了某个品牌的洗发露，在发现洗发露让她的头发变得脆弱后，消费者还会第二次购买吗？大多数电视和杂志广告展示的产品都是靠回头客、顾客忠诚等幸存下来的。商品可不是“一锤子买卖”的捞钱机器。如果产品只卖一次，

然后让他们的顾客变成了秃头，或者造成消费者其他的不满意，生产商是难以承受的。另外，为高档商品比如汽车所做的广告，常常喊叫着消费者去试驾他们的产品，世上只有最傻的笨蛋才会刚看到电视上的广告，就去购买一辆庞蒂亚克。

这些观点并非在为不诚实的广告辩护，或者是否定它的存在。但大部分广告商不是那种“一夜蒸发”的企业，并不是一伙热切地希望用欺骗的手法快速致富的人。加尔布雷思自己也写过，公司更重视市场份额而不是快速获利。劣质产品很快就会丧失市场占有率。

很多人像加尔布雷思一样，对现代资本主义给现代消费者提供的选择不甚满意。许多人对于他们拥有如此宽泛的选择范围而感到心里不舒服。伴随一个人所作的选择产生了选择的责任以及“存在焦虑”。我们会选择佳洁士、水清凉、皓清、优特白、高露洁还是格利姆？我们可以将我们的最终选择归功于广告商。当然，牙膏还无关紧要。让我们考虑关乎重要原则的选择。如果加尔布雷思是正确的，人们会把重大抉择的功劳归功于自己吗？比如，选择了丘吉尔而不是戈培尔，或者是选择了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而不是三K党。加尔布雷思的批评表面看来关乎广告，但更重要的是，它关乎人究竟是什么。我们会比巴甫洛夫的实验狗更自由吗？如果我们不是更自由，加尔布雷思就对了，新古典经济学就错了。

加尔布雷思很高兴自己能与索尔斯坦·凡勃伦相提并论。他与凡勃伦共有很多特点，包括对当代文化和资本主义的讥讽。但他俩也有另一个共同点：含糊。他们都没有建立一个供经济学家进行仔细检测，甚至效仿的理论框架或方法。制度学派似乎满足于观察与批评。他们的论文仍然见于今天的《美国经济学与社会学杂志》和《后凯恩斯经济学杂志》。给后者的投稿人以深刻影响的是意大利经济学家皮耶罗·斯拉法、波兰马克思主义者米哈乌·卡莱茨基，以及后来的剑桥经济学家琼·罗宾逊论述“不完全竞争”的著作。

新制度学派与法律经济学的兴起

加尔布雷思在生前就已经看到了旧制度学派的鼎盛时期和新制度学派的兴起。他当然更喜欢老派的那些人。他们批评自由市场经济学忽略了制度因素，并且严厉指责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盲目地学习马歇尔关于人类行为的假设。

已经变节的新制度学派，几乎将凡勃伦和加尔布雷思打算做的每一件事都反过来。他们不是宣布制度与马歇尔的经济学相抵触，相反地，他们运用马歇尔解剖刀和剪刀式的分析工具来解剖制度。他们并非是一个准确划定了范围的圈子。他们中多数人是经济学家，有些是受过经济学教育的律师。他们是凭着对社会制度的好奇心，以及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信心而结合在一起的。

新制度学派的方法已经渗透到了法律领域。虽然反垄断法总是会牵涉经济学，但经济学家却强迫律师和法官从马歇尔及其追随者的视角来检视几乎所有的法律裁决。没有哪一个法律领域能够躲避得了经济分析，今天也没有任何法律学教授在不具备经济学素养的情况下胜任得了法律教学。法律期刊和法庭判决充满了边际效益和边际成本的讨论，这样的讨论可不只是学术性的。几位法律和经济学界的知名专家就职于联邦法院，他们影响着几百万人的生活。没有人可以避开经济学家。就算是囚犯也一定会担心某些研究生正在对牢房进行经济分析，或许他们正在尝试证明这样的结论：有一种面包和水组成的特定饮食会使罪犯的改造成功率达到最大。

1915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路易斯·布兰迪斯写道：一个“没有学习过经济学的律师……非常容易成为人民的公敌。”[21]很不幸的是，美国每年都在培养数以千计的人民公敌。

让我们考察4个非常重要的领域：过失赔偿法、财产权、犯罪行为和公司治理，在这些领域中，经济学家已经显著地改变了传统的法律分析。

过失赔偿法

多数事故都属于过失赔偿法的范畴，过失赔偿法又称侵权法。每当有人踩到扔在超市地板上的香蕉皮而滑倒时，律师就希望以过失为由打官司。“超市不应当将香蕉皮扔在地板上”，一个穿花呢服的诉讼律师会如此争辩，而他很有可能会打赢官司。

是不是总要有人或者企业，对发生在其经营场所的每一个事故负法律责任呢？我们试看另外一个例子。一场风暴毁坏了船只，把米诺号船上的乘客和船长留在了有很多棕榈树的荒岛上。虽然只有两个人生活在该岛上，但他们却与200只猴子共同分享着这个岛屿。这202个“居民”生产香蕉利口酒，用来出口。猴子负责剥香蕉皮并榨取香蕉汁。在加工过程中，猴子将香蕉皮扔得满岛到处都是。假定盖里甘在岛上四外闲逛，并且踩到香蕉皮滑倒了。这个香蕉酒厂有过失吗？大多数法庭都会说没有。

超市和荒岛的主要区别在哪里？首先，一个人走过超市中水果区过道的可能性大，而一个船难幸存者在岛上到处转悠的机会小。其次，监控超市的成本低，而监控岛上猴子的成本高。

利用这些概念，在1947年的一个案子中，勒尼德·汉德法官针对过失赔偿法提出了一个精彩的经济学分析方法。[22]汉德法官确认了3个关键因素：受伤的可能性（P）、伤害或损失的程度（L）和预防意外事故的成本（C）。根据汉德法官的说法，如果受害者可能受到的伤害大于避免此类事故的成本，则有人存在过失。用代数式来表示的话，如果$P \times L > C$，则被告有过失。

在超市里，有人踩到地板上的香蕉皮滑倒的可能性大，比如说20%。这个人伤势严重，比如说医药费、误工费和生活不便带来的损失共计20000美元。那么，$P \times L = 4000$美元。如果超市以低于4000美元的成本就可以防止此类事故的发生，则超市有过失。一个管货品陈列的小伙子手中的一把价值3美元的扫帚就能完成这个任务。

在温和宜人的荒岛上，一个遇到海难幸存的闲逛之人踩到香蕉皮滑倒的可能性不大，或许只有1%。即使伤害造成的损失为20000美元，则可能的损失或预期损失只有200美元（$0.01 \times 20000 = 200$）。如果利口酒生产商花费不到200美元就能防止事故的发生，他们才算有过失。当然，他们可以采用在整个岛上筑篱笆、安放警告标示和架设安全监控设备来预防事故的发生。但这样做，成本很高。而且，猴子可能会因为篱

笆而伤到自己。按照汉德法官的意见，生产商不应该在防止一个极不可能发生的事故上浪费钱。如果法官宣布他们有过失，他就是在鼓励他们浪费有价值的资源。

为了让社会福利最大化，只有当边际收益超过边际成本时，法庭才应鼓励人们在安全保障上投资。因此，汉德法官的公式将马歇尔的逻辑带进了法律。

我们可以试着避免所有意外事故。我们可以把自己包裹在泡膜里，从不离开家门，或者从不点燃炉灶。但我们中多数人同意冒一点风险。汉德法官帮助我们认识到风险何时高得离谱，或何时低得无关紧要。在听从汉德法官意见之后的50年里，律师和经济学家改进了他那个原始的公式，尽管如此，那个最初的公式仍然正确地传达着现代过失赔偿法的立法精神。

财产权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法律和经济学者已经迫使法官认识到他们的法律裁决对不动产的影响。无视经济学的法官有时要求人们采取行动，却导致了与法官的意图恰恰相反的结果。让我们看两个例子，其中学者们已经强迫律师、法官和立法人员重新思考他们的分析：科斯定理和租金管制。

1960年，芝加哥大学教授罗纳德·科斯提出了一个经济分析的有力工具。[23]简而言之，科斯阐明了财产权的初始安排可能无法决定财产最终如何被使用。让我们将科斯定理应用于妨害法。假定弗兰克·西纳特拉拥有一家夜总会。爱睡觉的西蒙就住在隔壁。每当西纳特拉扯着嗓门唱高音时，就会把西蒙从床上震醒。西蒙将西纳特拉告上了法庭，主张自己酣睡的权利。西纳特拉则声称他有引吭高歌的权利。法官支持西蒙，关闭了西纳特拉的酒吧。按照科斯的说法，故事并没有至此结束。科斯定理预言，只要西纳特拉认为他对酒吧的估价大于西蒙对自己睡觉的估价，他就能继续唱歌。如果西纳特拉为他的酒吧估价100万美元，而西蒙对自己睡觉的估价为10万美元，西纳特拉就会收买西蒙，使其撤诉。如果西纳特拉的出价超过10万美元，西蒙会接受。利用这10万美元，西蒙可以安装隔音墙，或者购买高档的耳塞。科斯定理声称，一旦财产权被明确定义，财产将会得到最有价值的利用。一旦法官明确地将熟睡的权利判给西蒙，西纳特拉就能购买这一权利，或者收买西蒙使其放弃睡

觉或迁居他处。即使法官赋予西蒙有权要求西纳特拉保持安静，只要西纳特拉珍视他放声高歌的权利，他还是有可能再度歌唱。

所以，西纳特拉和西蒙将要在10万美元和100万美元之间确定一个价格。如果西蒙坚持非要100万美元以上不可，西纳特拉将不会付款，并且不再唱歌。如果西纳特拉出价少于10万美元，西蒙也不会答应。

如果法官裁定西纳特拉胜诉，认为他有权利可以不顾及邻居的睡眠而放声高歌，又会怎么样呢？有没有可能即使赢了官司，西纳特拉也不会唱歌了呢？有可能。如果西蒙看待他睡眠的价值超过西纳特拉看待他唱歌的价值，西蒙就会掏钱让西纳特拉安静下来。那么，按照科斯的说法，法官的判决并不会决定最终发生之事。它只是决定了谁可以购买权利，谁可以出售权利。当崇拜他的歌迷愿意付钱让西纳特拉唱歌时，他的邻居就要花钱让他闭嘴。

科斯把相同的分析应用到了污染问题上。毕竟，在某些人看来噪音只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污染。排放浓烟的工厂可能会激怒周围的居民。但是，如果工厂对其污染权的价值评估大于周围居民对清洁空气价值的评估，或者如果工厂愿意向邻居们付钱，让他们搬到别处居住，工厂就会继续制造污染。结论就是：如果法官假定通过让渡一种权利，就可以决定最终将会发生什么的话，那法官的行为就是愚蠢之举。

有时可能事先需要知道一个邻居的行为是正“外部性”，还是负“外部性”。2003年，洛杉矶声势浩大地为迪士尼音乐厅揭幕，该音乐厅由表面陡斜的不锈钢制成，由著名的弗兰克·盖瑞设计。起初，周围居民设想这个投资达2.74亿美元的奇特景观会提升他们的财产价值。然而当太阳出来之后，音乐厅表面的不锈钢将激光般的光线反射进公寓，提升了室内温度，阳光照射还使得人行道的温度达到140华氏度，灼烧着行人的皮肤，使得行人就像是在放大镜下的蚂蚁一样。音乐厅的职员观察到发生了垃圾箱燃烧和锥形交通路标熔化的事件。管理人员对音乐厅反光的外表面进行了喷砂处理，尝试着将它们的负外部性转变成正外部性。

就像汉德法官的过失赔偿理论一样，科斯定理也受到了批评与修正。批评的要点是，人们可以相互收买，从而避免高昂的交易成本这一假设。特别是在数量庞大的家庭受到影响的污染案例中，众多的家庭不太可能为了与污染者进行讨价还价，而有效地组织起来。尽管存在这些复杂性，对于法律裁决会如何影响个人的行为方式而言，科斯定理似乎

是一个卓越而又有创新的洞见。

经济学家对另一个不动产问题，即地方出台的租金管制法，也进行了仔细分析。知道如何获得选票却不知道如何谨慎管理的立法者，常常会通过有违经济常理的管制措施。20世纪70年代，被乌托邦愿景迷惑的政府官员制定了租金法，目的在于通过限制房东的涨价能力，从而提供可以让人租得起的住房。有人称这种做法是目标高尚，但方法拙劣。

理由很简单，租金法几乎总是要造成住房的短缺。在租金低时，人们对住房的需求会增加。但是，租金管制法却在说服房东减少供给。开始时，你会认为一旦房东建好了房子，他就别无选择地要出租。事实上，房东是可以减少供给的。他们可以在房子的维护和修理上马虎从事，或者将出租房改造成住户自有公寓、合作公寓、康复之家或商业办公场所。拆迁吊车的破碎锤是不会关心历史成本或沉没成本的。一项对美国城市的经济研究估计，供给的长期价格弹性为0.20，它表明如果政府强制降低租金10%，房东就会让2%的出租房退出租赁市场。[24]从长期看，房东确实会改变出租房的数量，以此应对价格的改变。

1979年，加利福尼亚州的圣莫尼卡市正式通过了美国最为严格的租金管制法。为了防止房东减少租房供给，该法强制规定：如果房东将出租单元改做他用或拆除，则每减少一个单元，房东就要支付一笔款项，用来建设一个新的出租单元。结果是房地产价格变得非常离谱。一个空停车位卖到了60万美元，而一个相同面积的邻近公寓却要价不到20万美元。

难怪《福布斯》杂志如此报道：

> （一个）被遗弃的小公寓楼，孤独地坐落在价值50万美元或更值钱的房屋旁边。破旧的出租单元与时髦的商店同在一条街上，而这些商店是为富人和名人服务的，出售的东西从高档时装到汽车应有尽有。[25]

即使房东不减少供给，他们也会通过向租户特别是新租户索要贿赂或“设施费”而变相提高房租。房东说：“公寓每月租金是400美元，但是百叶窗的费用为1万美元，是你必须支付的。”

有人会从租金管制中受益吗？在短期内，它对两个人群有利。第一

群人是政治家，他们听起来就像是扼制了邪恶房东的英雄。第二群人是在租金管制得到实施时已经租到房子的房客，会因此继续享受低廉的租金。造成的结果是，这些房客很少再搬家，减少了流动性，对城市的新居民产生了排斥。作为1980年颁布租金管制法的结果，很大一部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生迁到了邻近城镇，再乘车往返上课。（1995年通过的一项州法案放宽了某些地方法规。）纽约市则因拥有许多大型公寓而引以为荣，这些公寓住着年老的夫妇，他们曾经与他们的孩子们同住。当他们的孩子们搬出去之后，他们并没有搬到较小的公寓，而是继续住在那里。所以，有很多子女的大家庭在搬到这个城市之后就没有了机会。大多数人都知道，在曼哈顿找到一套公寓的方式是翻看报纸的讣告版，而不是房地产版。

最终，随着维修费的下降和供给的减少，租金管制倾向于造成住房的贬值。通常情况是，如此的租金控制成了帮助穷人的一个烂招，却成了破坏一座城市的好办法。

犯罪行为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了解了经济学家如何剖析过失赔偿法案和财产权。对于野心勃勃的经济学家来说，没有什么法律领域是不能触及的。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已经将马歇尔的经济学应用到了家庭法和刑法中。这样的议题是非常吸引人的。贝克尔的犯罪模型是基于这样的假设：罪犯显然权衡了作案的成本和收益。贝克尔暗示，如果有人犯罪，那是因为犯罪是有利可图的。经济学家试着推断威慑犯罪的因素。有两个变量看起来最重要：逮捕率和惩罚的严重性。威慑效果因犯罪形式的不同而不同。对于有些犯罪，警察应当集中精力抓住罪犯。对于其他犯罪，逮捕率是不会吓住犯罪分子的，相反只有严厉的处罚才会让他们恐惧，并因此打消犯罪的念头。[26]贝克尔的分析还没有获得一致性的认同，许多统计数字相互矛盾。尽管如此，他的分析还是比伊夫琳·沃的愚蠢理论更为可取，而沃认为几乎“所有的犯罪皆起因于对美学表达的渴望受到了压抑”。

罪犯常常认为犯罪是值得的，因为他们很少关心自己的未来。他们情愿躲闪子弹、逃避警察和抢劫钱财，而不愿意为未来（上学、工作培训）投资。犯罪学家和研究犯罪的经济学家，没有给予“时间跨度”足够的关注。我于20世纪80年代开发了一个经济模型，据此得出的结论是：当时间跨度缩小时，诚实行为的价值减少，导致经济崩溃。[27]如果你的

目标是付出最少的努力而致富的话，诚实并不总是最好的办法。有两种力量通常会劝阻人们犯罪，即使是不道德的自我主义者也不会欺骗和偷盗，在商界更是如此：第一，对于惩罚的恐惧。第二，害怕坏名声会让别人厌恶，从而拒绝在将来与他做生意。但是，如果他不在意将来又会怎么样呢？那犯罪率就会上升。同样可以生动地解释，与正规饭店的老主顾相比，为什么过路的游客给女侍者的小费较少。有时社会减少了这种时间跨度，使得犯罪对更多的人显得更有吸引力。这会在怎样的情况下发生？

社会减少时间跨度的另一个方式是提高利率。较高的利率迫使我们更多地折现将来。也就是说，如果利率上升，次年的1美元就不如今天的值钱了。“布赫霍尔茨假设”间接地指出，较高的利率会导致人们更多地犯罪，因为它减少了他们未来的价值。在大萧条期间，名义利率下降，这揭开了为什么在经济困难时期，犯罪率实际上不升反降的谜团。20世纪60、70年代，利率开始稳步攀升，相伴而生的是较高的犯罪率。暴力犯罪在1980年前后达到高峰，而利率此时也达到了峰值，只有在20世纪80年代末才再次攀升。在20世纪90年代，利率快速下降，利率的下降为暴力犯罪的急剧下降铺就了道路，犯罪率和美国财政部的税收，也同时降到了30年来的最低点。

可以肯定的是，利率下降不是犯罪率下降的唯一原因。人口统计数据、警察所做的工作和惩罚力度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当社会向潜在的重罪犯发出“明天已经无足轻重”的信号时，他们便会充分利用今天，对此我们不应感到震惊。

调查毒品交易的经济学家向被误导的政府政策提出了批评，称它们没能解决这个可怕的问题。在最近的20年里，联邦政府试着通过毁坏制毒作物和封锁美国边界来削减毒品的供应。虽然每年美国缉毒局（DEA）都会缴获好几吨的毒品，但是出于种种原因，这种从供给方下手的做法很少奏效。

首先，像可卡因这样的毒品是从植物中提取的，而这种植物在世界许多地方都可以很容易地种植。肥沃的田地如此之多以至于无法完全焚烧或监管。其次，因为可卡因的街头黑市价远远超过了贩卖到国内的价格，比如说高达10倍，提高迈阿密码头的毒品价格对于芝加哥街头的毒品价格影响非常小。再次，即使禁毒和焚烧作物确实提高了毒品的街头黑市价格，可经常食用可卡因的人是不会太在乎成本的。用马歇尔的术

语来说，瘾君子对毒品的需求是缺乏弹性的。而且事与愿违，更高的价格可能会刺激瘾君子为了有钱满足毒瘾而更多地行凶抢劫。新的毒品吸食者可能会对较高的价格较敏感。

为了赢得禁毒之战的胜利，或者至少将毒品买卖控制在一定水平之内，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必须重点关注毒品的需求方，这意味着要严厉惩罚吸毒者。吸毒之人可能对价格不敏感，但他们可能对坐牢的时间长短较敏感。当然，更好地咨询辅导和治疗应当也有效。这些措施应当与侵扰和惩罚街头的毒贩相互配合。在美国人放弃对吸毒的渴望之前，这场禁毒的战争是不会在美国边境以南的田野或南部边境的码头取得胜利的，它只能是在美国城镇的大街小巷取得胜利。

没有人可以否认经济学家丰富和深化了法律的学术研究。然而，批评家会问：那些被经济学家所迷惑的律师们是不是已经走火入魔了？毕竟，法律旨在公正。效率会等于公正吗？我们应当废除那些虽然公正，但却没有效率的法律吗？那要是鞭打囚犯有效率，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极端主义者确实主张公正等于效率，这让我们想起精神崩溃之前的约翰·穆勒。在理查德·波斯纳的《法律的经济分析》一书的早期版本中，他宣称效率“或许是最普通”的公正之含义：“我们可以看到当人们将不经审判就给人定罪、未经合理补偿就夺取财产描述成‘不公正’时……上述（所谓不公正的）行为可以这样解释：除浪费资源外，更多的是狂妄，除此之外毫无意义。”然而，这个由一位聪明人所作的相当悲观的评论已经在《法律的经济分析》第三版中有所缓和，波斯纳承认“公正的范畴远大于经济学”。[28]

更为合理的反驳分为两部分。第一，在许多法律裁决中，特别是涉及商业法时，法官确实会努力谋求效率。法律和经济学方面的知识对他们有帮助。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法官努力做到有效率地工作，但无知模糊了他们的双眼。第二，在涉及公正话题的案件中，一个符合道德准则的司法制度至少应当知道案件裁决可能带来的结果。从道德的角度看，我们应当区分公正的行为和公正的行为人。一个公正的人是在思考之后做出正确选择的人。一只实验鼠可以选择正确的行动，但除非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否则它的行动不会是公正的。一位完全忽视了判决结果的法官，不会比一只实验室的小白鼠更公正。即使一位法官拒绝强制实施一个有效率的决议，他也应当知道他正在忽视效率。为避免我们高谈阔论扯得太远，让我们把与波斯纳和康德相关的争论先放到一边，转到公司

治理这一引人关注的话题上来。

公司治理

法律和经济学者引领的新制度学派与旧制度学派形成鲜明的对照，因为前者用马歇尔的分析工具研究制度。然而，在一个狭窄的领域里，新旧两个学派口气很像。1932年，法学教授阿道夫·伯利和经济学家加德纳·米恩斯在哥伦比亚大学分别发表了同一个观点：公司所有人和经理人之间存在着致命的两权分离。[29]因为所有人（包括股东）不再参与公司的运营，而是将经营管理权授予他们花钱请来的经理人，公司的运作也就不再有效率。加尔布雷思后来坚持认为，经理人会追求他们自己的目标，比如扩大公司规模，以提升他们自己的声望。

虽然对这种可怕的后果持否定态度，但新制度学派承认，公司所有人必须监管他们的经理人。监管就要花钱，这部分支出有时被称为“代理成本”。

为了降低代理成本，所有人经常会给经理人奖励，以此来提高公司利润。大多数公司高管得到的薪酬中有一部分是以股票的形式给予的。如果他们提高了公司利润，股票就会升值，他们得到的也会更多。另外，公司执行官也经常得到“股票增值权”，就是说当股票价格上涨之后，公司会给他们发放现金红利。越来越多的公司也向非执行官层级的雇员承诺股票激励。然而，20世纪90年代发生在安然、泰科和房利美公司的丑闻确实表明，靠不住的执行官可能会将期权的日期提前，或者为了短期利益，通过造假来提升股票价格，以此操纵股票激励，根本不顾及公司的长期兴旺。[30]公司中有太多的余地，可以用来精细地调控股东对经理人的激励。股票期权、不诚实的执行官和懒惰的董事会成员是股东所要面对的三大危险因素。

随着杠杆收购（LBO）的日益热门，更给力的激励措施也在20世纪80年代兴起。在很多的杠杆收购中，管理层借钱买下全部的公司股票，自己接管公司的所有权。新的债务促使他们削减成本，并且将生产效率不高的资产廉价出售。副总裁交出了公司喷气式飞机的钥匙。因此，致命的两权分离得以修复。代理成本骤然下降，因为经理人与公司之间已经产生了极大的利害关系。赫兹租车、李维斯牛仔裤和黑人娱乐电视台已经全部“被私人买断”。总是有对杠杆收购吹毛求疵的人。虽然将他们的股份卖给经理人的股东，通常会得到一个大幅的溢价，远远超过杠杆

收购之前的市场价格，但批评家还是质疑收购价格是否以公正的方式来决定的。也许经理人拥有他们还没有披露的内幕消息，而这些内幕消息本应使得卖价抬得更高。[31]此外，批评家指出，庞大的债务负担极大地增加了公司在经济不景气时遭遇破产的风险。当这一担心变成事实时，这些公司的新债权人通常都是些富有经验的保险公司和审慎评估风险的投资机构。

许多戏剧和电影现在也是通过筹措资金获得经费的，如此一来，制片人便可以将只是偿付了成本之后的毛收入，按照一定比例发给电影明星和导演。因此，每一个人都有降低成本的积极性，而没有在额外的开销上进行挥霍和炫耀的诱因。好莱坞的投资家称这些做法为“有条件的递延”。

在公司治理领域，旧制度学派提出了问题，50年之后，新制度学派提出了解决方案。

几乎每一个制度或社会现象都有其经济学意义。根据1988年的一项研究，历史上对战俘的待遇与杀死或宽恕被征服之敌的成本和收益密切相关。此研究的作者得出结论，中世纪时期并不总是可怕地对待战俘，因为俘获者常常善待俘虏，以便能够索要高额的赎金。[32]对于中世纪时期被逮住的战俘来说，坏消息就是：如果对他们的需求或对他们劳动的需求减少，他们的脑袋就要“搬家”。

即使是时间的存在，也有其经济含义。如果知道明天就是世界末日，人们将会如何行动？如果一个不会强制执行合同或惩罚罪犯的新司法体系将在下周启动的话，人们又将如何行动？

人们会相互以礼相待，可能出于很多理由。一个理由是他们想要值得信任的声誉，这在商界尤其重要。但是，如果时间很短，而其在即将到来的管理体制中的声誉又不以现在的行为为基础，有些人可能就不会信守诺言，并且对别人实施欺诈。一个健康的市场经济需要某种程度的文明礼仪和视承诺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态度。一个感知不到未来的社会，就会面临经济崩溃。[33]

很明显，经济学不仅仅只是价格、利润、租金和成本。法律、道德、时尚和哲学全都会对经济产生作用，可能支持经济发展，或者将经济毁掉。凡勃伦和加尔布雷思扩展了经济学的定义，迫使从事研究的同

事们睁开眼睛去观察更广泛的现象。经济学不再像马歇尔让它看起来的那样容易了。

新制度学派承认，经济学并不简单。但是，他们证明了马歇尔的分析工具非常坚实耐用，因为他们使用了马歇尔的方法才明白了帮助塑造经济的复杂的制度。

布兰代斯警告说，忽视经济学的律师构成了对社会的威胁。新旧制度学派留下了什么样的遗产？他们最后解释道：社会有多大，经济学就有多广。

第九章 梅纳德·凯恩斯：带领人们走出大萧条的救世主

剑桥大学或许是全世界最美丽的大学。每年有成千上万名的游客会在它中世纪风格的庭院中漫步、在剑河上撑篙划船和拍照，学生们则在如茵的草地上打着板球和槌球。有时，学生们会放下球拍，耍弄一下游客。几年前，几个爱恶作剧的小伙子在一个厚纸板做的球上涂上颜料，使其看起来像是在剑河众多桥上可以发现的某种沉重的水泥装饰物。当一艘满载日本观光客的船快速驶过时，他们将纸球推下桥，并且尖声惊叫，游客也尖声叫喊，纷纷跳下船去，相机还抓在他们手里。剑桥大学还堪称是一座充满了田园风光的校园。穿着长袍的研究生和大学生仍然穿梭在16世纪的厅堂里，在亨利八世、伊丽莎白一世，以及牛顿、达尔文和华兹华斯等校友的画像下用餐。

就是在这里，考克饶夫跑着穿过整条大街，抱住路人，大叫道："我们让原子裂变了！我们让原子裂变了！"就是在这里，詹姆士·沃森和弗朗西斯·克里克利用他们的DNA模型揭示了生命的密码。

没有人比梅纳德·凯恩斯更能将文化、快乐和公共责任的剑桥精神集于一身了。没有人比他更才华横溢或更有魅力。没有哪个经济学家在20世纪能比他对政治家和经济学的进程产生更大的影响。英国最杰出的哲学家之一伯特兰·罗素宣称，凯恩斯是他所认识的"最敏锐和最清醒"的知识分子，"当我与他辩论时，我感觉我是在冒险玩命，很少觉得自己不是笨蛋"。[1]有人对凯恩斯的同学查尔斯·雷·费伊表示同情。费伊抵达剑桥之后碰到的第一个同学就是凯恩斯，致使可怜的费伊认为他的同班同学一律比他优秀。他后来回想起来才知道，他在大学碰到的第一个人是他终其一生所遇到的最聪明的人。顺便说一句，凯恩斯聪明得很，知道自己聪明。几乎没有人指责他的谦虚。事实上，对于费伊的赞赏，凯恩斯并没有投桃报李，后来他写道，他的这位朋友不合适做一个游伴，因为"他太丑了。脸、手、身体、衣服和举止都丑，而且我发现，这些丑完全不能被他的开朗快活、善良和智力平平所压倒"。[2]

虽然凯恩斯起步于剑桥大学这样的象牙塔，但是他的名字和思想却

响遍世界。如果说罗纳德·里根戴的是象征亚当·斯密的领结，那么，以弗兰克林·罗斯福到理查德·尼克松的历任总统戴的都是象征凯恩斯的领带，肯尼迪和约翰逊更是如此。不无讽刺的是，在尼克松宣称“我们现在都是凯恩斯学派”之后，凯恩斯的影响便开始式微。批判凯恩斯学派最为猛烈的米尔顿·弗里德曼承认：“在某种意义上，现在我们都是凯恩斯学派；但从另一种意义上讲，再也没有人是凯恩斯学派了。”[3]

成为一个凯恩斯主义者意味着什么？在此表明它的两个基本主张足矣：私人经济可能无法实现充分就业，政府支出可以刺激经济发展，从而填补未充分就业这个缺口。每当一位政治家热情地鼓吹启动建设项目和政府计划来推动国家经济再度发展，或者降低税收以促进消费时，他都是在颂扬凯恩斯。

然而，凯恩斯并不只是关注就业。他的文集册数超过了24卷，涉及了许多主题，包括货币问题、贸易限制和战后重建，以及关于爱因斯坦、牛顿等人的优美散文。牛津大学著名的史学家休·特雷弗罗伯提名凯恩斯为历史学方法的主要贡献者之一。

放荡不羁的通才

1883年，凯恩斯生于一个清教徒的维多利亚式家庭。他的父亲约翰·内维尔·凯恩斯是众所周知的逻辑学家、经济学家和剑桥大学的注册主任，他富有魅力的妈妈弗洛伦丝·埃达后来当了剑桥市长。虽然凯恩斯喜欢他的父母，但他生活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逃避他们在伦理和哲学上对他的影响。凯恩斯喜欢玩得开心，不大在乎清教徒式的生活态度，而这种生活态度在他的朋友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祖父詹姆斯·斯蒂芬爵士身上有着具体的表现，据说他曾经抽过一支雪茄，发现它让人感到如此快乐，以至于他再也不抽了。不过，凯恩斯对于自己成为高智商的中产阶级的一员感到满意。利用英文wet（含义为“选择中间道路或自由主义立场的政治家”，表示不稳固的政治忠诚）所表达的双关含义，列宁意指凯恩斯是一个“水分最大的中产阶级”。而凯恩斯则开玩笑说，当共产主义革命来临之时，人们会在中产阶级的旗帜旁边找到他。

在伊顿公学，他赢得了无数的数学奖项，在剧场也有不俗的表现，但作为板球投手则成绩很差。进入剑桥的国王学院后，他的进步更是神速。更重要的是，无论是在思维上，还是在身体上，他与其他自诩知识水平高的人发展了友谊，建立了联系，而且受邀加入了大学里成员选择最严格的秘密社团——使徒。该社团的成员被称为“天使”，包括出色的老成员，比如罗素、乔治·爱德华·摩尔和艾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以及凯恩斯的同辈人，例如利顿·斯特雷奇、爱德华·摩根·福斯特和伦纳德·伍尔夫，他们中有许多人日后在文学和艺术上颇有名气。一般情况下，使徒社团讨论的主题有三个：哲学、美学和他们自己。从美学的角度看，他们都算不上特别地讨人喜欢，包括凯恩斯在内的多数人缺少弗吉尼亚·伍尔夫女士所说的“相貌堂堂”。对凯恩斯的外表最为刻薄的评论来自于伊顿公学的一位助理教员，他形容凯恩斯“第一眼看上去就极其丑陋，嘴唇突出，似乎顶到了端正的鼻子，浓密的眉毛略呈类人猿的模样”。[4]伊顿公学里的朋友都叫他“大猪鼻子”。虽然凯恩斯并非貌似猿人，他还是深信自己是丑陋的。

使徒社团也培养出了一种虽然丑陋，但很傲慢的心态。他们不仅认为自己比普通大众优秀，也觉得他们的才气凌驾于剑桥和牛津两所大学之上。凯恩斯给斯特雷奇写信说道：“我感觉其他的大多数人根本就悟不

到什么东西，因为他们太笨或者太顽劣。”[5]然而，没有人能够否定“使徒”是一个令人敬畏的社团，他们常常发起才华横溢的对话。在这个社团以及剑桥联合会里，凯恩斯学会了做一个无人匹敌的辩论家和健谈者，使得后来他在学术研讨会和高峰论坛上的表现超越了他的同事、竞争对手和政治家。

包括凯恩斯在内的许多使徒社团的成员后来都以成为布卢姆斯伯里文化圈的一员而崭露头角，这个圈子反维多利亚的、放荡不羁的态度强烈地影响了英国文化的发展。除了在经济学上取得了成就外，凯恩斯几乎花了同样多的时间收集书籍、创办剑桥艺术剧院，并担任国家画廊的受托人，也就是做当代艺术协会的买主，而且任职皇家歌剧院理事会主席。有人可能会认真地发问，在当今更趋于专业化的学术界，倘若他只是个玩票的业余文艺爱好者，凯恩斯还会选择研究经济学吗？

凯恩斯来到剑桥并没有学习经济学，而是学习数学。尽管他的表现令人满意，但还是有些吃力。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他写道，“我正在伤害我的头脑，损毁我的智力，而且脾气变得暴躁。”[6]在通过数学考试之后，他阅读了第一本经济学著作——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他开始撰写经济学文章，而马歇尔则在其论文的空白处潦草地写下一些鼓励的话。亚当·斯密是为了“消磨时间”而写书，其实是最为过谦的一种说法，而凯恩斯在描写自己研究经济学时却说：“我认为我相当地驾轻就熟。”他补充道，“我想管理一条铁路，或运营一家信托公司，至少也要骗骗投资的大众。”几天之后他又汇报说，“马歇尔不断地纠缠我，让我成为一名专业经济学家……你认为这有什么意义吗？我对他深表怀疑。”[7]

凯恩斯师从马歇尔的研究只持续了8周，也没有得到经济学的学位。然而，事后证明他非常擅长边干边学。

1905年，凯恩斯开始用功学习，准备国家公务人员的考试。当他复习数学、哲学和心理学等科目时，他的偏见再次产生。在读完一本非剑桥大学哲学家写的书后，他悲叹道：“牛津大学真是一个病态思想的老巢啊。”在104个候选考生中，凯恩斯排第二，不无讽刺的是，经济学和数学是他成绩最差的科目！他在信中说，“真知灼见似乎是成功的绝对障碍。”关于经济学，凯恩斯认定考试官知道得不多，他想教教他们。[8]

1906年，凯恩斯前往伦敦，坐到了印度事务部的一张办公桌后面，

但他却从没去过印度。他的第一项任务是将10只公牛犊用船运到印度的孟买。凯恩斯很快就感到无聊透顶，更确切地说，他变成了一个无聊的传话者，给斯特雷奇的汇报说：他正在写关于印度道德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年度报告，并且搞了个“特别策划”，在“今年的版本中……有一个关于鸡奸的带插图的附录”。[9]

出于对这种单调乏味的不胜其烦，再加上受马歇尔提供的讲师职位的吸引，凯恩斯返回了剑桥大学国王学院。作为一名经济学教师，凯恩斯所依赖的是他真正读过的少数教科书中的一本——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在刚开始的几年里，他讲授的经济学并没有冒险远离马歇尔和古典经济学的传统内容。然而，随着他阅读的书籍越来越多，他的洞见和思想为他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名声，他也被任命为颇具影响力的《经济学杂志》的联合编辑。凯恩斯担任此职一直到1945年，由于认真细心的编辑能力和良好的幽默感，他树立起极佳的声誉。有一次，他告诉一位外国投稿人，虽然拉丁语exempligratia（例如）可以缩略成e.g.，但他不能将for instance（比如）缩略成f.i.。两年之后的1913年，他出版了《印度货币与财政》，这是他在印度事务部工作期间不多的成果之一。约瑟夫·熊彼特称这本书是“论述金汇兑本位制的最好的英文著作”。[10]当然，有时熊彼特似乎十分嫉妒凯恩斯，所以他对本书的称赞几乎等于是在侮辱英国的经济学家。

战争与和平的经济代价

第一次世界大战将凯恩斯送回到政府的财政部门。战争考验了布卢姆斯伯里文化圈，以及他们冷淡的、打破旧习的和缺乏爱国情怀的信念。包括凯恩斯在内的所有男性成员都要求作为“基于伦理或宗教信仰原因拒服兵役者”而免除兵役。利顿·斯特雷奇一如往常地为这个严肃的事件注入了幽默的元素。虽然他声称所有身体强健的知识分子都应当随时准备防卫英国的海岸线，他却增加了一条限制性条款：没有哪个知识分子的身体是强健的。一段时间后，斯特雷奇为战时努力作了最值得自豪的贡献：他为自己渴望当的水兵织了一条海军蓝的羊毛围巾。最后，当他被强行带到军事法庭去验证他“基于伦理或宗教信仰原因拒服兵役者”的资格时，官员问了一个经典的问题：如果你看到一个德国军官企图强暴你妹妹时，你会做什么？斯特雷奇犹豫了一会儿，“我会尝试用我的身体挤到他俩之间”，说这话时他的眼在眨。[11]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凯恩斯代表美国财政部出席凡尔赛会议。他再一次对政府产生厌恶，但这次并不是因为无聊。凯恩斯亲眼目睹了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被英国首相劳埃德·乔治和法国总理克列蒙梭欺骗，除了要求德国不能进入可怕的交战状态之外，对战败的德国还提出了不合理的、会削弱德国重振能力的压榨性赔款。据此，凯恩斯几乎可以预言下一次世界大战了。因为无法忍受他所目睹的外交噩梦，他辞去公职，并且很快写出了《和平的经济后果》，即使依据布卢姆斯伯里文化圈的标准来判断，这也是当时最为尖刻的驳斥之一。除了揭露各国领导人的冷酷无情之外，凯恩斯细致地提出理由，说明德国负担不起各国向它索求的赔款。该书大卖，打破了英国和美国的售书纪录，同样扶摇直上的还有凯恩斯的名声和他的自负。在一首模仿嘲弄诗中，某杂志对“凯恩斯的直率”发表评论：“我们依然觉得……可能还有一些终极之事不被国王的随从所知”。[12]

但不见得不被凯恩斯所知。在接下来的10年里，他继续教学、编辑、写作、向政府建言，并在一家人寿保险公司担任董事长。他与当时最著名的政治人物、学术界人士和艺术家通信。1925年，他娶了一位女芭蕾舞演员莉迪亚·洛普科娃为妻。凭着好运气和对技巧的良好把握，凯恩斯从商品贸易和股票买卖中赚得盆满钵满。有些批评家曾经向经济学

家发出挑战，让他们“要么表现出来，要么闭嘴”，也就是说，如果他们懂得理财，他们为什么不富裕？如果用这一标准来衡量经济学家，凯恩斯只名落大卫·李嘉图之后，位居第二。许多经济学家携手并列最后一名，因为人数众多，在此就不一一提及了。

1929年大萧条和古典经济学的落幕

在经济学领域，凯恩斯将其关注点大部分放在了货币政策上，1923年他写出了《论货币改革》，1930年出版了两卷本的《货币论》，后一本书将凯恩斯关于投资的很多早期作品，以及他对储蓄和投资之间关系的新见解结合在一起。纵使《货币论》包罗万象，然而1930年大萧条给经济学带来的挑战是如此的令人费解，以至于凯恩斯不能在他出版的著作和迷人的魅力上高枕无忧了。虽然凯恩斯的幸运之河似乎从没断流，但世界的幸运之河干涸了，各个国家在债务和对大萧条的绝望中随波逐流。

回想一下马尔萨斯描述过的骇人情景，整个世界似乎正在分裂，受苦受难的人们为了能够幸存下来而你抢我夺。就在离“从前”并不遥远的时刻，以及在一个我们所熟悉的地方，这种情景正在发生。1929～1933年的美国，自由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朝着“繁荣”的脸上狠狠地扇了一巴掌。失业率从3%剧增到25%，国民收入直降一半，住宅建设停工，许多人失去了他们的房屋和事业。1929年股市崩盘，经纪人跳楼自杀，这些又都变成了经济进一步衰退的象征和原因。兴盛的20世纪20年代在喧嚣声中戛然而止，导致1933年的国民收入比1922年的还要低。工人们则争抢为数不多的工作机会，给穷人施粥的地方在迅速增加。与经济萧条相伴而生的是心理的沮丧。

流行歌曲的词作者伊普·哈伯格后来在歌曲《飞越彩虹》中向朱迪·嘉兰承诺了一个光明之境，他用经典歌曲《老兄，赏个子儿吧》对大萧条带给人们的挫败和沮丧做出了回应。这首歌曲记述了从拓荒时期就开始劳作，从而帮助美国创造了繁荣文明的几代人。然而现在，这个争分夺秒帮助修建了一条铁路的歌者没有了工作。一个有着自豪和尊严的人，能乞求别人的施舍吗？当然能。他不是因为任何个人的过失才丢掉了工作，而是扭曲的经济剥夺了他的工作。

经济史学家对大萧条的“成因”争论已久。更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原因将衰退转变成了一场噩梦？美国之前曾经历过经济放缓和萎缩，但从来没有如此严重。大部分经济学家都强调原因是几件坏事的同时发生：投资机会在20世纪20年代激增之后逐渐枯竭，消费者决定减少花费并归

还贷款，各国出于恐慌而采取了贸易保护措施，以及美国联邦储备体系的应对政策偏紧而不是偏松。[13]

当罗纳德·里根在1980年与总统吉米·卡特为竞选总统展开角逐时，他机智地定义了一些经济术语：“当你的邻居失去工作的时候是经济衰退，当你失去工作的时候是经济大萧条，而经济复苏则要等到吉米·卡特失去工作。”

梅纳德·凯恩斯可能会同意，但他会稍微修改一下最后一个经济术语的定义：当英国财政部（和美国政府）中那些老古板失去工作时，经济才会从大萧条中复苏过来。对凯恩斯来说，英国财政部的老头们被古典经济学家酿的老酒灌醉了，在他看来，这些老酒已经变成了醋。美国财政部开出的方子是耐心等待，并且承诺从长远来看经济终究会复苏的，凯恩斯对他们的观点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要一个这样的政府，还有什么意义呢？“从长远看，我们终究全都要死”，他在《论货币改革》中这样写道。

凯恩斯用1936年出版的杰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为他向政治家提出的建议进行辩护，这本书打碎了美国财政部的观点，并且为宏观经济分析提出了一个新的框架。按照凯恩斯在序言中的预测，传统的经济学家会在“我完全错误和我所说的毫无新意两种判断之间”摇摆不定。保罗·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入门教材已经将凯恩斯经济学传给了几代人，他聪明地对《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模棱两可进行了总结：“这本书写得很糟糕，篇章结构不清，任何一个购买本书的门外汉都是受作者原先的名声所惑，结果是被骗了5先令……其致谢词中只有傲慢、脾气暴躁和争强好胜，而且也不十分慷慨大方。这本书充满了无稽之谈……简言之，这是一本天才的著作。”[14]

凯恩斯开始毫不留情地抨击他的前辈和剑桥大学的同事（特别是庇古），有时直言不讳，有时借助讽刺漫画。在大萧条之前的经济繁荣时期，庇古习惯于自信地说，“一切全在马歇尔的掌握中”，好像没有几个经济问题留待解决了。庇古与凯恩斯不一样，他在放下粉笔离开教室之后不喜欢探讨有争议的经济问题。凯恩斯的朋友、剑桥大学杰出的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更奇怪，下课之后，他就撒腿跑去电影院，他特别喜欢卡门·米兰达主演的片子，卡门以顶着一头热带水果跳舞，并且唱着“金吉达香蕉之歌”而知名。是否维特根斯坦在这种影片中发现了更深层的含义，我们不得而知。

对于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对知识分子的讽刺和恐吓性攻击，哈里·约翰森有很好的描述：“它设定了一群没有名字、没有面孔、信守正统的笨蛋，其中有几个人的脸孔尚依稀可辨，然后对他们所发表的、所假定的或已归咎的观点的牵强附会进行嘲弄奚落。”[15]最白痴的一个信条就是，100多年前马尔萨斯就已经抨击过的萨伊定律。回想一下前面章节中对萨伊定律的描述：所生产的商品给工人和生产商带来了足够的收入，使得所有的商品被他们购买。因此，一般性的供过于求是不会发生的。人们有足够的钱买下已经生产出来的每一件商品。（当然，有的商人可能会过多地生产了某种特殊商品。但这不是一般性的供过于求。因为价格会下跌，以消除这种过多的供给。）然而，如果有人相信萨伊定律，那就一定不会相信长期失业和大萧条的存在，只有精神分裂症患者才会全都相信。凯恩斯并没有挑他同事的毛病，讽刺他们患有精神分裂症，在没有得到确凿证据前，他宁可相信他们没有得这种病，他只是骂他们愚蠢。

这群笨蛋忽略了从生产者消费者生产者的貌似顺畅的周期性循环中的一个重要漏洞。当一个家庭在储蓄时会发生什么？当他们建立了自己的银行账户时，难道商人们不是发现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堆卖不出去的商品吗？凯恩斯认为是这样的。这些傻瓜们有一个答案，它是正确的吗？凯恩斯可不这样认为。他驳斥了以下两个观点：

> 1.根据古典经济学者的说法，家庭只是消费了他们收入的一部分，并且将剩余的钱储存了起来。如果消费者决定更多地储蓄，对于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就会下降，但商人只要加大投入，这种需求的减少就会被抵消。为什么商人会更多地投资呢？当人们储蓄时，他们通常不会把钞票塞进床垫里面，而是把钱存入银行。银行则会把钱贷给商人。现在，如果人们把更多的钱存入了银行，银行就会降低贷款利率。如果银行降低了贷款利率，商人们就会借更多的钱用于投资，因为与借款成本相比较，会有更多的投资计划显得有利可图。因此，无论何时，只要消费者增加储蓄和减少消费，商人们都会受到利诱去增加投资。在马歇尔的智慧之光照耀下，灵活的利率将投资与储蓄捆绑在一起。我们可以说是消费者提供了储蓄的供给（供给量随利率的上升而上升，因为储蓄的吸引力增大了），而商人则提供了对这些储蓄的需求（需求量随利率的上升而下降）。
>
> 如果因为人们减少了购买并增加了储蓄造成一轮经济衰退近在咫尺，该模型预测利率会下降，这会刺激商人加大投资，而投资又

将钱放入人们的钱包，从而维持了资金的流动。

2.弹性工资和物价支持萨伊定律。假定所有的商人都是瘸腿，当消费者增加他们的储蓄时，商人们不会像消费者那样快速地走向银行。因此，商人的投资就不会迅速到足以弥补消费量的下降。轻微的经济衰退可能会发生。但是，作为对商品和服务需求量下降的反应，工资和物价也会下降。随着工资的下降，失业的工人重新得到雇用。而随着物价的下降，剩余商品将会被卖出。经济衰退很快会结束。

身为艺术的狂热爱好者，凯恩斯拒绝承认这样一幅整洁的、合乎逻辑和具有古典美的画卷属于现实主义画派。它可能是采用印象派的绘画方式，是对真实情况的模糊回忆。但世界并没有如此优美，尤其是在1936年。

凯恩斯双管齐下，对古典经济学发起了进攻。首先，他否定了储蓄和投资的自动关联，他认为家庭和商家进行储蓄和投资，出于截然不同的理由。家庭储蓄可能是出于一种习惯，或者是为了一个特定的目的，比如养老或购买汽车。商家可能会基于政治、信心、技术、外币汇率，或者谁赢了美国年度棒球冠军联赛而改变投资计划。期盼利率能带来和谐是荒唐的。如果家庭储蓄额超过了商家投资额，则会出现供过于求，老板将会解雇员工，导致消费进一步减少。1997～1998年，即使日本央行将短期利率大幅削减到了只有0.5%，日本民众还是减少了他们的开支。随着收入的减少，储蓄会下降到与投资一样低，但社会未必就会处于充分就业的状态。

其次，凯恩斯嘲笑流动性、弹性工资和价格。当政治家预言价格会浮动到适当的水平时，他们听起来就像是魔法师在念念有词，说着“天灵灵将升起，地灵灵将落下”。垄断和工会合同确实会阻碍工资调整。根据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在经济衰退期间实际工资应当下降。但凯恩斯认为，工人通常会拒不接受较低的名义工资。

凯恩斯认为，在经济衰退时期商家会大幅减少投资。没错，储蓄最终会等于投资。但是，为什么呢？不是因为投资增加了（如古典经济学家所言），而是因为失业人员没有钱可供储蓄了。此外，因为工资和价格要用很长的时间加以调整，所以经济衰退和萧条持续一段很长的时间是可能的。

毫无疑问，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储蓄确实等于投资，因为储蓄方和投资方中的任何一方都是一无所有。古典经济学的表演结束了。

用乘数效应撬动经济复苏

该是新的表演上场的时候了，聚光灯投射在总需求上，戏院门口的招牌上写着："萧条发生在商品和服务的总需求小于总收入时"。（这需要一个大招牌，但要记住，萧条时期空座会增多。）透过分析，凯恩斯对家庭和商家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不足发出了警告。如果他们的购买量不足，商人会解雇员工并且减少产出。这是凯恩斯对萧条的简要介绍。

让我们一步一步地建立这个简单的凯恩斯模型，首先讨论家庭，然后再讨论商家。因为产品更多的是由家庭购买的，家庭就成为总需求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什么决定了家庭支出的多寡？虽然家庭的大小、品位与预期都很重要，但凯恩斯指定收入是首要的决定因素。如果收入增加，人们将会购买得更多。如果收入减少，他们的购买量就会减少。这似乎是合乎逻辑的。事实上，凯恩斯假设，当一个人每次额外多得1美元时，他会花掉那1美元的大部分，并且将剩余部分储存起来。凯恩斯将消费掉的那部分称作边际消费倾向（MPC）。假定有1美元从天而降，落进了你的口袋，你用80美分买了一块长条糖，又把剩下的钱存进了银行，你的边际消费倾向为0.80（用代数式表示的话，则为消费的增量除以收入的增量），你的边际储蓄倾向（MPS）为0.20。

商家也购买产品和服务。通过投资于设备和库存，他们构成了总需求的另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投资又取决于什么呢？凯恩斯认为投资比家庭消费更加易变。预期、利率、信心、天气与政治全都会影响投资计划。在这个最简单的凯恩斯模型中，我们假设，因为有太多的因素需要考虑，商家还不能为了应对短期收入的变化而改变投资计划。（要知道，在短期内家庭的确会改变他们的消费。）

这个模型有什么样的含义呢？为了得到一个充分就业的、健康运行的经济，家庭必须要有足够的消费，商家必须要有足够的投资，以实现商品的销售等于所生产的商品数量。如果人们把他们的全部收入都用来消费（MPC＝1），萨伊定律会产生充分就业。但是，因为人们要储蓄，商家投资必须要弥补这部分储蓄。如果不能弥补，则产出量就会超过销售量，库存增加，雇主就会解雇员工。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不足便成了问题之所在。因此，经济衰退的罪魁祸首在于储蓄。

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发表的前几年，凯恩斯极力主张人们要尽可能多地消费。美国的《红皮书》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是“美国能够依靠消费迈上经济复苏之路吗？”在此文中，凯恩斯宣称，“为什么不能，毫无疑问！”但几乎没有人听。当他为《听众》撰文时还是没有人听。

> 不管是作为个人、州议会或是政府部门，当无论什么人削减开支时，第二天早晨就一定会有人发现他的收入也被切掉了一块，但这还不是故事的结局。早上醒来发现自己的钱包缩水或者已经丢掉了饭碗的那位老兄……又轮到他被迫削减开支了，不管他是否愿意……衰退一旦开始，就难以停止。[16]

过去，批评资本主义的人会急切地伸出瘦骨嶙峋的手指，控告企业巨头和利欲熏心的奸商为邪恶的劫掠者，凯恩斯则不同，他心平气和地指出：善意的储蓄者造成的伤害比任何邪恶的实业家都要多，其中包括并不邪恶的老太太。

不过，这样的伤害或“衰退”会自行恶化，这就是非同一般的凯恩斯“乘数”（实际上是从他的同事理查德·卡恩那里借用的）。乘数的要点在于，一个人的任何消费变化都会引发滚雪球效应，整个国家消费量的最终变化会远远超过个人消费量的初始变化。

让我们假设梅纳德公司决定增加投资100美元新建一个男厕所，则总消费增加了100美元。但梅纳德公司必须要给水管工人、建筑工人和室内装修人员发放工资。这些人下班之后回到家里，会用他们的薪水干什么呢？他们会花费一些，并且把剩余的钱存起来。他们所花费的那部分钱可能会流向杂货商、电视机销售员，以及给女童子军买饼干。现在这些“货币的接受者”有了更多的收入，他们要花掉其中的一部分。连锁反应持续进行下去。虽然初始投入只有100美元，但总收入可以增加300美元。若如此，则乘数为3。

凯恩斯提供了一个计算乘数的简单公式。因为他强调消费的作用，所以，一点也不奇怪，公式中的关键因素是消费的边际倾向：

乘数＝1/（1-MPC）或＝1/MPS

消费倾向越大，乘数就越大。如果“货币的接受者”消费更多，则连锁反应会进行得更快。而储蓄会再次减缓这个反应过程。

随之而来的是令人吃惊的结论。首先，或许是出于阴沉的天气、情绪低落的公司经理等原因，投资小幅下降，这会对整个经济造成巨大的压力。如果人们将他们额外收入的1/3储存起来，则其乘数为3。因此，如果商家减少5000万美元的投资，则国民收入会急剧下降1.5亿美元。商家的悲观是一个可以自我实现的预言。让人闷闷不乐的梦，变成了自取灭亡的梦魇。难怪美国总统和副总统会花费那么多的时间担当经济的拉拉队长。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沉默寡言，以至于有人称白宫为“知名战士之墓”，但即使沉默如他，也会在1958年经济衰退时呼吁民众购物。买什么呢？“任何东西！”1982年，罗纳德·里根的顾问将经济下滑贴上了“增长型衰退”的标签。他们声称经济是在为将来的增长作准备而放慢了前进的步伐。通过称呼里根的宠物狗为“增长型马”，批评家对此大加嘲笑。在1991年的经济衰退时，老布什总统尝试着激励购物者赶赴购物中心，并且购买短袜。

然而，凯恩斯所提建议并非全是坏事。事实上，有些建议近乎神奇。如果需求不足引发了经济衰退，那么解药必定是刺激更多的消费。而且，如果我们了解了边际消费倾向，我们就了解了乘数。因此，我们可以在经济活动中扩大消费，让它到处产生乘数效应，借助弥补产出量和销售量之间的缺口来治愈经济衰退。

那谁是“我们”呢？是政府。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私营部门漂流到险恶的海峡、在海里沉没，而被抛下海的劳动者则要忍受暴风雨的蹂躏。但国民政府是可以通过减税或者直接消费来拯救这条船的。如果需求不足带来的衰退缺口为120亿美元，而边际消费倾向为2/3，则乘数为3，那么，40亿美元的政府支出计划就可以填补上这一缺口。[17]

事实上，凯恩斯估计美国的乘数大约是2.5，他在给罗斯福总统的信中以及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都在鼓动大型的公共支出计划。在1933年的一封信中，他建议：“一个在政府保护下的大量国债支出。至于选择哪些特定的支出计划已经超出了我的职权范围。但是，应该优先考虑那些能够快速成熟且规模较大的项目，例如……铁路。目的是让雪球滚动起来。”[18]

凯恩斯知道，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会攻击他的积极财政政策。英国和

美国的财政官员都喜欢一个平衡的预算，如果政府采纳了凯恩斯的建议，就会产生赤字，那又怎么样？凯恩斯回应道：在经济衰退期间，平衡的预算是愚蠢的，因为预算有两方面：税收和支出。在经济衰退期间收入下降，政府收到的税就会减少。如果政府拘泥于一个平衡的预算，它必须要么减少支出，要么增加税收。但是，任何一方都会借助乘数的作用进一步地加剧经济紧缩。凯恩斯极力主张，预算应当是在整个经济循环过程中保持平衡。在繁荣时期，人们缴纳了更多的税收，理应产生预算结余。但是，在经济衰退时期，政府应当允许赤字。美国财政部的那些蠢材过了很长时间才明白这一点。

在罗纳德·里根整个美国总统任期内，他都在精力充沛地催促通过一个要求预算平衡的宪法修正案，而不顾及当时已经存在的2000亿美元的赤字。里根费心尽力地迫使减少政府消费，而不是提高税收。多数还记得凯恩斯建议的经济学家都反对这一提议，但已经到了要求法律保证在经济低迷时期也要平衡预算的程度。然而，到了1997年，在没有宪法修正案的情况下，公众对挥霍无度的政治家的强烈反对，再加上经济的蓬勃发展，的确实现了平衡预算。（关于这一点的进一步讨论，将留到公共选择学派对凯恩斯的批评那部分进行。）

凯恩斯也知道，他会面临哲学上的声讨。毕竟，过多的政府介入意味着更少的自由，这是自由放任政策让人们明白的道理。但是，凯恩斯认为自己正在试着拯救资本主义，而不是埋葬它。

> 我（为政府的扩张）辩护……一方面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可以让现有经济实体免于全军覆灭，另一方面它是必要条件，能够让主观能动性成功地发挥作用……因为如果有效需求不足，不仅人们会不堪忍受资源浪费而产生公愤，而且寻求利用这些资源的单个企业家将会在对他非常不利的条件下经营。[19]

有时候，重要的是把原则放到一边而去做正确的事。凯恩斯经常要用挖苦的方式回应哲学上的异议：

> 如果财政部在旧瓶子里塞满钞票，选择适合的深度，把它们埋在已废弃不用的煤矿井中，再用城市垃圾把矿井填平，然后听任民营企业依据充分证明了的自由放任原则把钞票再挖出来……不必再有那么多的失业存在，而且在这种影响的助推下，社会的真实所得

和资本财富很可能要比现在多出很多。确实，建造房屋或做类似的事会更有意义，但如果这样做会遇到政治阻力和实际困难的话，则上述做法总比什么都不做要好。[20]

虽然在罗斯福总统的领导下，政府的支出从来没有达到凯恩斯所建议的水平，或者说从来没有达到凯恩斯的批评者最为担心的水平，从1936年《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发表到尼克松时期，凯恩斯的影响力不断增加。保罗·萨缪尔森回想道："这本书让多数35岁以下的经济学家感染了一种预料不到的病毒，这种病毒首先攻击和大批杀死的是南海群岛中一个与世隔绝的部落居民。事实证明，50多岁的经济学家对这种小病小灾具有相当强的免疫力。"[21]

由于受到阿尔文·汉森教授主持的凯恩斯研讨会的影响，哈佛大学变成了凯恩斯学派在美国的基地，培育出了比如萨缪尔森、詹姆斯·托宾和罗伯特·索洛这些著名的经济学家。在肯尼迪和约翰逊执政时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为凯恩斯学派成员的前沿阵地。这些经济学家与其欧洲的同行一起发展了凯恩斯经济学，让凯恩斯的直觉和顿悟之处更加严谨。

在理解了凯恩斯经济学之后，政治家就可以亵渎那只看不见的手了，并且与经济周期展开抗争。当经济增长放缓，他们可以增加联邦开支或减税，造成暂时的财政赤字，直到经济复苏。如果需求增长过快，超过了商品供给的步伐，从而迫使物价攀升，他们可以增税或削减联邦开支以抑制需求，这是一个美妙的对称。如果显得不真实的话，它就一定是魔术了。政府对于利用财政手段调控经济的信心增强了。政治家们欢欣鼓舞地通过了1946年的就业法案，大胆地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措施，宣告国会的责任是"促进就业、生产和使购买力达到最大化"。

1964年是凯恩斯学派最为星光灿烂的一年，当时肯尼迪与约翰逊的顾问觉察到了经济萧条，信心满满地开出了处方，即打一针提振经济的"肾上腺素"。因为估计紧缩缺口大约为300亿美元，而且乘数为2.3，他们便减征了大约130亿美元的个人和企业税收。没有哪个相机抉择的经济政策比它运行得更有效果。所有的"生命体征"都做出了积极的反应。较高的需求推动着产出不断增加，创造了成千上万的就业岗位。看来经济学终于可以抖掉卡莱尔给它贴上的"沉闷的学科"这个侮辱性的标签了。

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凯恩斯学派的政策似乎变得软弱无力，卡莱尔的轻蔑之词又开始神出鬼没，而乘数的表现也变得“一瘸一拐”的了。（在下一章我们会看到。）

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依赖于政治人物的智慧。因为很少有人只仰仗着这样一种稀缺资源就可以酣然入睡了，所以，经济配备了自动工具，以抑制经济周期的波动。像累进税率和失业保险这样的自动稳定机制，会对经济低迷和通货膨胀的加速产生反作用。如果经济发展速度放缓且收入开始减少，人们会自动地归属到较低的纳税等级（虽然自1987年开始这些纳税等级的间距增大了）。当工人们被解雇时，失业保险使得他们可以维持开销，等他们重新被雇用时，失业保险金停止支付。这些稳定机制是与经济周期反向运行的，可以抑制经济的波动。

如果情况不是如此，凯恩斯则怀疑投资的波动最终会导致政府对国内投资的水平产生更大的影响。在一些令人困惑的段落里，他有时会提到投资的“社会化”，在其他时候他会表扬现有的经济结构，难怪他获得了“经济两面派”的名声。在他的某些文章中，几乎每一个单词都是模棱两可的。他的同事讲了许多他有点像潮汐一样立场不定的故事。有一个笑话是这样讲的，“当皇家委员会向5位经济学家征求意见时，他们得到了6个答案，因为有两个来自凯恩斯”。如果哈里·杜鲁门想找一位“独臂”经济学家的话，他肯定不想要凯恩斯，因为在政策事务上他就是一只八爪的章鱼。

不过，这样评价他有些不公平。凯恩斯可能比其他经济学家写了更多的文章，而且对更多的听众讲了更多的话。因为环境不同，处方也就应当不同。凯恩斯曾经说过经济学家应像牙医一样务实。如果一个牙医不管患者的疼痛情况总是钻同一个牙齿的话，还会有多少人让他看牙呢？每当牙医不小心划了一下或者切了一刀，他们都会平静地说出一个词“漱口”，就好像如此就能治愈所有的口腔创伤似的。在宏观经济中是没有“漱口”的（尽管熊彼特认为衰退就像是一次有益健康的冷水浴，最终会通过企业家的新思想和承担的风险重新使经济充满活力）。当有人拿他变化无常的名声取笑他时，凯恩斯回应说：“当我获得的信息改变时，我就会改变我的结论。换了你会怎么做呢，先生？”

不过，善变可能是做学问不扎实的一种体现。所有的经济学家都知道，时间是一种稀缺的资源。凯恩斯可能比本书中其他经济学家中的任何一位投入到经济理论上的时间都少。另一方面，他获得的投资回报可

能最高。与阅读另一位经济学家的理论著作相比，他常常更喜欢去剧院观看戏剧。考虑到剑桥艺术剧院的成功和多数学术活动的枯燥无味，我们不能责备于他。显然，凯恩斯没有指望从经济理论中发现与其他学科知识相同的魅力。考虑到他的这些癖性，他很可能牺牲了一个更完整且一致的分析框架。

正如批评家发现凯恩斯捉摸不定一样，凯恩斯发现股票市场也是变化无常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第12章“长期预期状态”是很重要的内容，理由有二：第一，凯恩斯解释了为什么期望在经济学里达到数学的精确是荒谬的；第二，他描述了投资天生具有的不稳定性。凯恩斯强调大量的投资是因为“精力旺盛”所致，是非理性的力量在驱使着企业家和投机商向前进。但是这些力量并非前后一致：

> 传统的定价被证实是乌合之众的心理产物，在群意发生突变时，它易于发生剧烈波动……市场常常会因乐观情绪和悲观情绪发生起伏，这种似海浪般的变化是缺乏理性的，但在某种意义上，它又是合乎逻辑的，因为这时并不存在理性计算的坚实基础。[22]

凯恩斯聪明地推测出，在股票市场上赚钱的办法并不是把公司运营分析做得最好，而是要把猜测别人认为哪只股票有钱赚做到极致。凯恩斯将专业投资巧妙地比喻成选美：

> 在那些报纸举办的选美竞赛中，参赛者必须从100张照片中选出6张最漂亮的脸孔，其选择最接近于全体参赛者平均喜好的就是获胜者。因此，每一个参赛者要挑选的并不是他自己认为最漂亮的那些脸蛋，而是选择那些他认为最受其他参赛者青睐的脸蛋，所有的参赛者都要从这一相同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23]

这段话让人回想起伍迪·艾伦的台词，说的是在他的形而上学的测验中，他通过看透邻座学生的心思而作弊。

由此，凯恩斯并没有将理性演绎到绝望，只是因为他在经济学上异乎寻常的谦虚：

> 我们不能下结论……认为一切都取决于非理性心理。相反，长期预期状态常常是稳定的……我们只是要提醒我们自己，人们所做

出的影响未来的决策，不论是个人的、政治的还是经济的决策，都不可能依赖严格的数学期望值，因为做出这种计算的基础是不存在的。是我们与生俱来要采取行动的强烈渴望在推动着社会车轮的运转，我们理性的自我会在各种可能性当中尽其所能地做出最好的选择，并且尽力算计，但为了达此目的，我们又往往转而依靠心血来潮、多愁善感和机缘侥幸。[24]

物质的充裕会让我们一直幸福下去吗？

1946年，凯恩斯辞世，要是能看到自己的思想取得的成功，他会激动不已，但不会感到惊讶。凯恩斯热诚地坚信真理会带给人们自由。由于花了许多时间向政府建言，所以他见证了思想的力量。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著名的结尾段落中，他热情地肯定了这一点：

> 不论他们是对还是错，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力量的强大，不是常人所能理解的。事实上，世界是由少数几个人的思想统治的。许多实践家自以为不受任何知识分子的影响，却往往成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当政的狂人自以为听到的是上天的启示，实则其狂想正是从若干年以前的某个拙劣的学术作家那里拿来的……但或早或迟，无论好坏都会处于险境的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25]

公共选择学派现在要挑战凯恩斯的论点，警告说特殊利益集团实际上俘获了好主意和好政策，并把它们当作人质。

尽管他说过“从长远看，我们终究全都要死”那句著名的挖苦话，但凯恩斯却是相当认真地思考着未来。1930年，在酷似穆勒风格的短文《我们孙辈的经济可能性》中，凯恩斯擦亮了他的水晶球，[26]他说这是个好消息，因为马尔萨斯错了。在接下来的100年里，人们可以解决经济学之所以存在的那个理由了：稀缺性。因为每一代人都是站在父母的肩膀上，完善他们的成就，实现他们的梦想，我们的孙子和重孙会取得更高的成就，足以满足他们所有的物质欲望，包括奢侈品在内。大街小巷可能很快就会铺上金砖。尽管存在着经济周期的波动和悲惨的战争，毕竟西方经济在长达200年的时间里已经获得了迅速增长。

更惊人的是，随着人们的生存条件变得更加宽松，人们的内心会变得和善。凯恩斯声称，我们需要理性经济人实现经济的进化。在充分满足物质欲望之后，人们可能会提升对仁慈和感情的渴望。

然而，不见得从此以后我们的生活会一直快乐无忧。凯恩斯问：当食橱满当当、汽车闪闪亮时，我们还会做什么？今天，退休人员常常想

念工作，抱怨生活无聊。那要是全世界的人都退休了呢？需要有多少波尔卡之王劳伦斯·韦尔克来娱乐一个完全靠养老金过日子的人？存在性焦虑可能已经在一个吃饱喝足的世界里弥漫开了。快乐常常源于为实现目标而拼搏，而非实现目标。

或许这可以解释凯恩斯为什么是一个艺术的业余爱好者，解释他为什么是一个艺术收藏家、艺术投资人、艺术赞助人和艺术馆馆长。也许他将自己的活动组合多元化，为的是让他在经济学方面不至于表现得太过杰出，从而使我们太靠近天堂。他希望有些事情必须通过长期的努力才能做到。

第十章 米尔顿·弗里德曼：向凯恩斯宣战的货币主义者

面对一个乞丐的乞讨，美国著名喜剧演员菲尔茨的回应是一句风凉话：“对不起，老兄，只是我所有的资金都被现金套牢了。”对于凯恩斯来说，这并不是一个仅仅针对乞丐的问题，他想说的是：由于现金或活期存款“捆绑”住了财富，菲尔茨正在推动大萧条的加剧。

吝啬的守财奴会使大萧条持续下去，秉持着这一观点，凯恩斯提倡扩大政府支出以增加消费。对于凯恩斯主义者来说，国民经济就好比是一辆汽车，踏板上标有“较高政府支出或较低税率”的是油门，踏板上标着“较低政府支出或较高税率”的是刹车。熟练且细心驾驶这辆车的政府，能够带来经济的增长和稳定的物价。

本章讲述的故事是关于攻击凯恩斯模型的一场思想运动，攻击者主张政府通常是技术低劣的驾驶员，并认为经济的刹车和油门与财政政策关系不大。引领这场运动的货币学派承认经济确实有一个油门和刹车，但他们却坚持认为油门上应当标着“较高的货币供给”，而刹车上应当标着“较低的货币供给”。货币学派也不同意凯恩斯关于谁坐在驾驶座上的说法。按照凯恩斯的观点，有权核准政府开支和税收的美国国会是驾驶员。与此相反，货币主义者让监管银行业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扮演驾驶员。

20世纪50年代～70年代，凯恩斯学派和货币学派打得不可开交。米尔顿·弗里德曼、卡尔·布伦纳和艾伦·梅尔策领导着货币学派，即使这些货币主义者在学术上的祖师爷包括了约翰·洛克、休默、约翰·穆勒和李嘉图，刚开始时他们照样受到了嘲笑。但随着不断地发表有说服力的研究论文，并教导出有胆识的研究生，他们削弱了凯恩斯学派的势力，赢得了更多的尊重和声望，终于在卡特执政时期，美国国会要求美联储认真地考虑货币学派的论点，而且当时的美联储主席也决定遵循货币学派的建议。

这场较量，现今胜负如何？双方打成了平手。我们将会看到的是，政府把国民经济当成了有4个踏板的汽车——两个油门和两个刹车。还

记得可怜的哈里·杜鲁门恳求给他一位“独臂”经济学家吧。今天的领导人似乎要被迫接受有4只脚的经济学家了。更糟糕的是，这些踏板好像不如严格的货币学派和正统的凯恩斯学派所承诺的那样有效。

货币供给量与货币流通

要了解当今的宏观经济学，我们必须回溯凯恩斯学派和货币学派论战的缘由，而且要搞清楚货币主义模型是如何运作的。这就要求我们学习一点银行业和美联储的有关知识。有些概念可能开始时不是很好理解，但费些必要的工夫弄懂它们是值得的，因为货币学派理论如何受到尊重的故事，是当代思想史中迷人的史诗之一。

货币主义者指责凯恩斯忽略了货币和货币供给，这种吹毛求疵听起来很荒唐。毕竟，一个在股票和商品贸易上挣了大钱的人，一个使宏观经济学产生了革命性变化的人怎么能够忽略货币呢？这就像是责怪《白鲸记》的作者赫尔曼·梅尔维尔忽略了鲸鱼一样。当然，货币主义者心中所想的货币，并不同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货币概念。

什么是货币呢？任何东西都可以成为货币，包括贝壳和珠子，在监狱里，香烟常常被当作货币使用。用当今宏观经济学的行话来说，我们遵循的是美联储关于货币供给的定义。最普遍的量度叫作Ml，它等于在银行以外被持有的货币，加上商业银行支票账户中的资金数量（“活期存款”）。（注意，公司股票和债券不被当作货币。更宽泛的货币供给包括流动性较差的资产，比如储蓄存款和货币市场共同基金。）

为什么会有人愚蠢到争论什么是货币供给？钱越多，快乐越多，不是吗？错了。在低俗的闹剧电影中，笨手笨脚的歹徒将装满钞票的手提箱掉在了地上，钱撒得到处都是，旁边的人争相扑过去，希望能抢到一些散落在地上的钞票。这些路人常常是面带微笑，而歹徒则是号啕大哭。为什么经济学家会与歹徒一起痛哭？当只是几个手提箱突然打开时，问题还不会产生。但如果大量的行李箱携带着钞票突然流向一个城镇，通货膨胀可能就会随之而来。如果货币的数量大大地超过了商品生产的能力，拥有更多的钱可以花销的消费者就会竞相抬高价格。该城镇不会比过去更富；如果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薪水数后面添两个零的话，更多的钞票不会使生活水平更高。请记住，财富是以所能购买的商品和服务来衡量的，而不是用金钱的数字来衡量的。因为1美元可以购买数千比索，一个墨西哥的百万富翁可能跟一个低收入的美国人一样穷。即使所有的墨西哥手提箱都装满钞票也不会有什么用，更多的欢乐并不必然

随之而至。

什么是恰当的货币供给水平？简单的答案是：足以购买所有已生产出来的商品，如此充分就业得以实现，却不会造成物价的上涨。但这个简单的答案，却对关键的问题避而不谈。为了实现充分就业和稳定的物价，流通过程中需要多少货币？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了解人们以多快的速度花掉他们得到的钱。人们是倾向于在花掉之前持有较长的时间，还是快速地花掉？货币易手和在经济体系中流通的速度有多快？如果货币流通速度很快，一个国家就不需要那么多的货币，相比人们在花掉之前把货币放在装袜子的抽屉里闲置好几个月的情况，货币需求量会少得多。学术事业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就取决于这个简单的问题。货币存量在一年之内转手的速率称作货币流通速度。经济学家把这一速度与国内生产总值相比较，并且提到了收入性货币流速。收入性货币流速等于国内生产总值水平除以货币供给。

例如，如果国内生产总值为36000亿美元，而货币供给为6000亿美元，则收入性货币流速必定等于6。如果货币在一年内转手6次，在任一特定的日期，人们就相当于持有大约两个月的收入（以现金或活期存款的形式）。

货币流通速度为什么重要？为什么经济学家就不能风度翩翩地、漫不经心地争论这一问题？如果货币流通速度是稳定的，并且如果中央银行能够控制货币供给，那么政府就会有一个强有力的工具可以用来加速经济成长或减缓经济成长，标识着“货币供给”的油门踏板或刹车踏板就可以直接控制经济引擎。如果货币流通速度不稳定，又或者人们对大量持有与少量持有现金和活期存款形式的资金犹豫不决的话，控制货币供给并不是非常有用的经济手段，油门也就会出现失控的状况。

为了简化说明论战双方的观点，我们说货币学派相信货币流通速度是稳定的，而凯恩斯学派则认为是不稳定的。难怪货币学派会选择货币供给作为政府这辆汽车上最有力的踏板，而凯恩斯学派则吹捧财政政策，并且一部分凯恩斯学派的死忠成员认为，货币政策的重要性不会比一个雨刷对于引擎的重要性更大。

在探讨货币主义的历史以及支持和反对它的证据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概述美联储是如何调控货币供给量的。最重要的工具有3个。第一，美联储控制商业银行用于放贷的存款比例（存款准备金率）。假设美联

储将存款准备金率设定为20%，则银行只能将它们吸收的80%的货币存款借贷出去。再假设我们的朋友克丽丝在活期账户中存款10美元，则这个额度要计入货币供给。（要记住货币供给＝活期存款＋现金。）如果琳恩现在从银行中借款8美元，那么货币供给就增加了8美元。如果她将8美元存入了活期账户，而且布雷德借出了6.4美元，则货币供给又进一步增加了6.4美元。现在，如果美联储通知银行它们只可以借贷其存款的75%，而不是80%的话，银行必须要收回一部分贷款，如此就减少了货币供给。银行借出的钱越多，则货币供给量越大。

第二，美联储有时会给银行贷款。通过提高这些贷款的利率（贴现率），美联储抑制银行发放贷款，从而控制货币供给。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美联储购买和出售政府债券（公开市场操作）。包括公司和个人在内的大众持有大约10亿美元的政府债券，政府每年向持有者支付利息。弄明白这一工具要求全神贯注，而使用视觉辅助会对理解有帮助。请拿出一美元钞票和一张白纸。在纸上标记上“债券”二字，将桌子的一端设定为“大众”，另一端设定为“美联储”。请记住，美联储手中持有的钞票不被当作货币供给的一部分。如果美联储想扩大货币供给，它可以从大众手中收购债券。通过收购，美联储得到了债券（它并不算货币供给的一部分），作为交换，美联储给出售方支票（或是现金）。当支票兑现或将现金储存到活期账户中时，它就变成了货币供给。（当它被美联储持有时，它不被当作货币供给。）相反地，如果美联储向个人或者机构出售债券，它就会收到购买方签发的从其个人账户中支付的支票（或美元现金）。因为购买方所得到的债券不是货币，而美联储收到的资金在它一旦被美联储拥有之后也就不再是货币，于是货币供给减少。

凯恩斯让货币学派黯然失色

甚至在美国联邦储备体系于1913年设立之前，古典经济学家与新古典经济学家就已经概述了货币供给的变化所带来的影响。1911年，耶鲁大学的欧文·费雪教授从约翰·穆勒的分析中推导出了一个简单的数学框架，从而向前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表达“货币数量理论”的一个最流行的公式是：MV＝PQ。这一个简单的等式，可以让我们理解货币学派的许多批评。V为货币流通速度，M为货币供给，PQ代表名义国内生产总值（P是价格水平，Q是已生产的商品和服务数量，它是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没有人对这个公式提出异议。据此定义，货币的数量乘以货币的转手次数，就等于所购买的商品和服务的名义价值。但是，关于这些变量的作用模式，经济学家会永无休止地争论下去。

如果对货币主义的主张作一个最粗略的勾勒，则如以下所述：货币流通速度是持续不变的，短期能够生产出来的商品和服务的数量是固定的；因此，如果美联储增加5%的货币供给，我们就会看到物价上涨5%。得出的结论是：货币供给M的任何改变只取决于物价水平P的改变。

虽然简单，但即便草图也有它的优点，特别是在解释恶性通货膨胀时更加明显。1919～1933年建立的德国魏玛共和国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1921～1924年，德国的印钞机全速运转，使得货币供给量激增，已经不只是两倍、三倍或四倍的问题了，货币供给的增长超过了25000000000%。物价指数也跟着飙升，在一年半之内从1上升到200000000。每一个人都成了亿万富翁。但几乎所有的百万富翁都是食不果腹。衣柜里塞满了钞票，但食物橱中却空空如也。在美国，好莱坞影业巨头塞缪尔·戈尔德温说过“一个口头承诺要是印在纸上还不值打印纸的钱”。而在德国，货币不值印刷这张钞票的纸钱，德国经济遭受重创。

现代货币数量理论研究者即货币主义者声称，他们的学术思想前辈对于货币的作用过于看轻了，在短期内货币不仅影响物价，同时影响经济活动。在长期内，货币供给的变化只影响物价。货币主义者也增添了一条反凯恩斯主义的信条：除非货币供给也发生改变，否则政府开支将

不会影响物价或产出。只有货币才是重要的。

在此，我们有3个重要的任务：首先，我们必须弄明白为什么听起来货币学派对于货币的作用充满了如此傲慢的自信。其次，我们必须理解为什么凯恩斯学派如此轻率地对待货币。再次，我们必须弄明白为什么货币学派在谈到政府开支时会不以为然。在此之后，我们才能检视这场争论在今天的结局如何。

让我们看一下直接将货币供给和国内生产总值连接起来的传导机制。假设货币主义者是正确的：货币流通速度是稳定的。如果美联储通过购买债券增加货币供给，它就将更多的货币放到了债券出售人的口袋中。但是，人们想保持一个稳定的货币持有量。根据货币主义者的说法，人们持有的货币大多是用于日常开销。由于他们现在拥有了多余的货币，他们会用它购买大宗商品、服务和不动产。因此，国内生产总值上升。

反之，如果美联储踩下货币供给的刹车，并且出售债券，人们手中的货币就会减少。因为他们想保持一个稳定的货币持有量，他们就会减少消费，于是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放缓。

从本质上讲，货币政策是在调控大众的货币资产的流动性。假如人们保持货币资产流动性稳定的渴望是持久的，货币政策就可以依据这一假设强有力地影响国内生产总值，美联储就能够将大众玩弄于股掌之间，以促成不同的消费水平。

凯恩斯及其追随者怎么可以不同意这个模型呢？不无讽刺的是，凯恩斯曾经相信过这个模型。甚至更有讽刺性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重要的货币主义者米尔顿·弗里德曼一度不相信这个模型。凯恩斯开始时是一位货币主义者，后来其思想发展成为凯恩斯学派。弗里德曼开始时是凯恩斯学派，而后发展成为一个货币主义者。当凯恩斯年轻时，他的朋友可能会戏称他为“大猪鼻子”，但他和弗里德曼都不是天生的一根筋。

让我们追溯一下凯恩斯从货币主义到凯恩斯学派的转变过程。凯恩斯接受的剑桥大学教授的内容是“剑桥方程式”，这是马歇尔讲授的。这个方程式所起的作用与费雪模型相类似。根据凯恩斯所说，马歇尔“总是教导”人们，对货币的需求是由“商品的平均存量来衡量的，每个人都会

关心商品会保持何种既定的数量”。[1]在德国恶性通货膨胀期间，凯恩斯在其《论货币改革》中强调了货币数量理论的影响力，论证了通货膨胀如何鼓励人们以更快的流通速度来花钱，因而迫使物价更进一步地上涨。然而，到了写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时期，大萧条让凯恩斯相信货币政策是无能为力的。

凯恩斯批评的主要对象是货币的流通速度。为什么要假设货币流通速度是稳定的？要是中央银行增加了货币供给量和流动性，那又会怎么样呢？为什么假设人们会将额外的钱花掉？或许他们会把这些钱藏在他们的床垫里也说不定。如果他们这样做的话，较低的货币流通速度会抵消掉过多的货币供给。国内生产总值仍然会在低处挣扎。凯恩斯认为，这种情况特别有可能在萧条时期发生。当货币数量理论研究者主张人们持有货币是为了日常开销或以备不时之需时，凯恩斯引入了第三个动机，就是“投机”。人们可能仅仅因为想在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进行投机，而持有额外的货币流动资产。如果利率起起伏伏，对货币的投机需求也会忽高忽低。因此，即使货币供给增加了，囤积货币的欲望也会上升。

在给罗斯福总统的一封信中，凯恩斯提出了一个聪明的比喻，同时对货币的力量嘲笑了一番：“有些人似乎在推论……产出和收入可以通过增加货币数量而增加。但这就像是试图购买一条较大码的腰带来增肥一样。在今天的美国，对于你的肚子来说，你的腰带已经够宽松的了”。[2]

凯恩斯不仅贬低了货币的力量，他及其追随者也描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货币传导机制。他们提出，货币政策不是直接通过消费，而是通过利率和投资来发挥作用的。如果经济要从这种货币调控政策中感知什么东西的话，需要实现两个时间长且危险的跳跃。如果美联储增加货币供给，人们不可以囤积货币（第一步）。即使人们真的要花掉这些钱，按照凯恩斯的说法，人们可能会购买股票和债券这些金融资产，而不是不动产。这样的选择会导致利率降低。只有当企业或家庭从银行借到钱之后去购买商品和服务，才会让国内生产总值略微增加（第二步）。然而，在等待这两个风险较大的步骤时，许多货币主义者就已经跌落到了谷底。

向反方向迈进同样是漫长而危险的。如果美联储缩减货币供给，人们可能不会在意他们放袜子的抽屉里的现金减少了。即使他们真的通过廉价抛售金融性资产来作为回应（利率因此而升高），借款人也会因较

高的借贷成本而打消念头（比如，如果他们有义务继续进行一项建设工程的话）。国内生产总值得以继续在隆隆声中一路向前。

总而言之，当货币流通速度或货币需求变化无常时，以及借款人不在乎利率高低时，凯恩斯学派的批评就切中了货币学派的要害。

弗里德曼悲叹，凯恩斯“导致货币数量理论一时间黯然失色，或许也会导致专注于货币理论和分析的经济研究与写作跌入前所未有的低谷……货币无关紧要，或者至少货币不是非常地重要，这种观点已经被广泛接受了”。[3]

货币理论的失势甚至也影响了弗里德曼的观点。芝加哥大学作为批判凯恩斯的发源地由来已久，尽管是在芝加哥大学读的研究生，但在1942年，年轻的弗里德曼撰写了一篇论述通货膨胀的文章，几乎没有提及货币的力量。10年之后，他的《实证经济学论文集》收录了该文，但增加了7段文字。对于这一补充，弗里德曼作了如下解释：“正如我相信新增内容表达得很清楚，忽略关于货币效应的描述是一个严重的失误，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或许这可以解释成我受到了当时盛行的凯恩斯学派情绪的影响。”[4]

幸运之神站在了弗里德曼一边

不论从性格上还是智力上，没有人比弗里德曼更适合领导货币学派的反击了。他是一个凶狠的辩手，所提出的论据如此有力，以至于让他的学术对手们丧失了勇气，传统观点是威胁不了弗里德曼的。然而在反击的前夕，他的专业水准与他矮小的身材相匹配。加尔布雷思回忆道，在20世纪50、60年代，任何“太过固执地细细思考”货币供给角色的人都会被当成“怪人”。凭着他的勇气和才华，弗里德曼的学术地位得以提高，1976年他赢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加尔布雷思也承认他“或许是20世纪下半叶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5]

弗里德曼认为自己是一个幸运的人，并且为他和妻子罗丝的自传取名《两个幸运的人》。1912年，他出生在布鲁克林的一个贫寒之家，奥匈移民的父母在血汗工厂里辛苦劳作。几年以后，他们搬到河对面新泽西的拉威市，这个地方以国家监狱最为知名。他的母亲莎拉开了一间小洗衣房，而他的父亲耶诺则沿街叫卖货物，或在镇上到处打零工。年轻的米尔顿·弗里德曼和他的3个姐姐在并不舒适的环境里长大成人，米尔顿·弗里德曼在读高三时，父亲的离世让他们家的境况变得更加艰难。那他又为何把自己看作一个幸运的人呢？因为他生在一个自由的国度。在通过了罗格斯大学的入学考试之后，他去餐馆打工、做商店职员，同时还获得了奖学金。在罗格斯大学，他开始学习的是数学和会计学。通过比较勾股定理与济慈的《希腊古瓮颂》，有一位中学老师启发了弗里德曼，让他看到了数学之美。不久，弗里德曼发现了经济学，这个发现来得正是时候。这时的经济学需要有人施以援手，因为1929年米尔顿·弗里德曼考进大学时，时值股票市场的崩盘正在促使现代资本主义的解体，资本主义就像一个在高高的搁物架上摇摇欲坠的古董花瓶一样。

罗格斯大学教授阿瑟·伯恩斯后来成为美联储主席，在他的指导下，米尔顿·弗里德曼学习了古典经济学家的正统理论。后来他考入芝加哥大学的研究生院，他的运气很好，他的教授按照字母表顺序给学生安排座位。由于他的姓是以字母F开头的，他坐在了一位名叫罗丝·迪莱克特的年轻姑娘身旁。虽然他们的婚姻持续了68年，不过米尔顿·弗里德曼似乎在暗示说，假使他生下来叫米尔顿·朱克曼，他就不会找到他的新娘了。

作为一名研究生，米尔顿·弗里德曼发起了他的第一次挑战，在他写的一本书中指出，美国医学会因为排斥竞争，从而推高了医生的工资。该医学会发现了这本书的后期校样，于是提出抗议，要求出版商取消出版，但遭到拒绝，弗里德曼作为一名无所畏惧的分析家的名声由此确立。弗里德曼认为，在“所有的职业中……贵族的或者至少是限制性的职业根深蒂固”，伤害了消费者，为新竞争者的加入设置了障碍。1900年，只有4%的劳动力做着“专业的”工作，但到了20世纪中期，国家已经通过了1200多条有关执业许可的法规，诸如针对内科医生和入殓师的法规。[6]从摇篮到坟墓，美国人都是被有执业资格的专业人士服务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弗里德曼为政府工作，任职统计学家，他尝试着将数学应用到金属的测试中。他了解到理论模型必须与实证分析相联系。他曾一度在纸上设计出了一种用于武器制造的超强合金。弗里德曼带着他自认为成功的方程式径直走进化学家的实验室，他们按照他的配方生产出了一种金属，这种金属拥有成熟香蕉的所有优点。他认识到不进行真正的测试，就不能相信理论性的统计。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戴上眼镜的弗里德曼开始在芝加哥大学教书，他钦佩凯恩斯的著作。即使在粉碎了许多凯恩斯的思想之后，弗里德曼仍然继续慷慨地称赞这个英国人，称他既是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也是一个伟大的人。弗里德曼这种学术上的慷慨成为一个持久不变的标志，就像他在争论中会毫不留情一样为世人所知。

在一系列开创式的研究中，弗里德曼从凯恩斯的攻击中将货币数量理论抢救了出来。凯恩斯只剩下一条满是灰尘、破烂不堪的逃生之路还没有关闭：弗里德曼必须证明私营部门是稳定的。若要证明货币学派言之有理的话，货币流通速度和消费一定不能像夏威夷草裙舞娘的屁股一样不停地摆动。

1956年，当时凯恩斯学派还主导着学术界，弗里德曼发表了一组改进和测试货币数量理论的论文。他没有只是将货币与物价挂钩，相反地，他的目标是重新定义货币需求（货币流通速度的倒数）。他提出，货币需求是稳定的，因为货币需求取决于长期因素，比如健康、教育和收入这些个人终其一生都在期待的东西。因为这些因素不会胡乱地变动，货币流通速度也不会剧烈变动。凯恩斯忽略了长期的影响。[7]

翌年，弗里德曼转而研究消费。简单的凯恩斯模型假设，随着当前

收入的升降，消费也在波动。如果收入在某一年下降了，人们会减少支出。乍看起来，这似乎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弗里德曼再次提倡要把眼光放远些。毕竟一个在每周五收到薪资支票的人不会在周末大摆宴席，而在接下来的整个星期里挨饿。相反，他会保持一个稳定的消费水平，因为他对长期所得有预期。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设想了一条平滑的路径，只有在对未来收入流的预期发生改变时，消费水平才会改变。消费者不会因一周、一个月或一年收入不好就要改变他们的消费模式。他们仅仅会花掉自己的部分储蓄。如果预期有一年收入不错，他们只会储蓄得更多一些。除非他们觉察到收入的重大变化，否则绝不会改变他们正常的生活秩序。[8]

弗里德曼并不是唯一表明关注长期的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兰克·莫迪利安尼是一位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家，他在此时对生命周期假说也进行了相似的研究，并且得出了相似的结论。[9]

弗里德曼所作研究的主要结论是什么？消费是极其稳定的。

如果弗里德曼和莫迪利安尼是正确的，政府的临时性政策对私营部门的作用就微乎其微。我们如何来证明这一点呢？1964年一个非常成功的减税方案刺激了消费，使得经济强劲增长。这个方案大幅削减薪资税率，消费者认为这个政策是永久性的。1968年，林登·约翰逊政府担心越南战争的开支和迅速增长的社会支出会导致通货膨胀和预算赤字，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明确的临时性附加税法案，以减缓经济发展速度。果然，消费者做出的反应不是减少开支，而是提取了更多的储蓄存款以维持他们的高消费。1975年，一项临时的退税方案也被证明无效。到了2001年，每对夫妇需缴纳600美元的附加税法案再次证明其作用远远不如削减税率。

临时性的政策在美国之外的国家，也同样遭遇了失败。20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大藏省试图用暂时性的减税方案来刺激消费者购买，但一点效果也没有，反而惹恼了政策的受众。日本家庭对政府永久性地提高营业税率非常生气，以至于他们认为收入所得税的暂时性减少是政府很小气的让步。他们非但没有将钱花掉，反而存进了银行。在20世纪90年代长期持续的经济衰退期间，日本走马灯式地更换了超过6位首相。

虽然弗里德曼为货币学派的主张设计了支持性的理论，但很快他就要进行实证性的、历史性的研究，以回击那些持怀疑态度的或是冷嘲热

讽的批评者。弗里德曼长期以来抱持着这样一种哲学态度：对理论的真正检验是看它能否正确地预测事件的发生。他坚持认为，如果模型在现实世界中不管用，那再优美的模型也是错误的。1963年，他与安娜·施瓦茨发表了一篇大型报告《美国货币史：1867～1960》。[10]弗里德曼深知，支持凯恩斯学派的最有力的案例就是大萧条。很快，他就毫不犹豫地宣布，经济萧条其实证实了货币政策的力量，而非凯恩斯相信的那样证实了货币政策不起作用。换句话说，他把凯恩斯学派的最佳证据偷过来为己所用。1929～1933年期间，货币数量骤减了1/3，弗里德曼和施瓦茨将矛头指向了美联储，当惊慌失措的消费者涌向银行挤兑存款时，该委员会却拒绝向银行提供流动现金。弗里德曼和施瓦茨说，只要美联储给予一点点支持，就可以大大地增强消费者的信心。

总之，《美国货币史》声称，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每次严重的经济衰退和每次显著的通货膨胀，都与货币政策的不当使用相伴而生。并没有凯恩斯学派所说的经济衰退或通货膨胀。弗里德曼著作的一个副产品就是它转移了对于工会助长通货膨胀的指责，在这之前工会经常是被指责的对象。

弗里德曼和其他货币主义者，例如艾伦·梅尔策和卡尔·布伦纳，削弱了凯恩斯学派的正统理论，对此凯恩斯学派反应不一。有些凯恩斯主义者用他们自己的研究进行反驳，有些承认货币学派确有道理，其他人则继续冷嘲热讽。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麻省理工学院的罗伯特·索洛对弗里德曼的论文发表评论：“米尔顿和我之间的另外一个不同点是，所有的事情都让米尔顿想到货币供给，咳，而所有的事情让我想到的是性，只不过我试着不把这一点写到我的论文里。”

然而，随着20世纪60年代的结束，货币主义的观点变得更加有力，因为货币流通速度显示出惊人的稳定态势。事实上，在1948年之后的30年里，货币流通速度的表现如人所料，每年以超过3%的速度在增长。弗里德曼和几位相信他的理论的学者共同发起的这场圣战犹如得到了神助。

在证明货币的力量且赋予货币数量理论以新的生命之后，货币主义者又试图挑战凯恩斯学派的主张，即政府支出可以刺激经济的增长。要想降伏这条“龙”，他们需要证明凯恩斯乘数等于零。

货币主义者宣称，凯恩斯规避了一个重大问题：用于财政支出的货

币是从哪里来的？如果货币供给保持恒定，而政府也进行了支出，那其他人能花的钱一定会减少。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如果美国国会通过增税来为政府的计划埋单，消费者就不可能购买那么多的东西了。如果国会通过向大众出售长期国债来借钱，企业就不会借到那么多的钱用于投资。利率上升而投资下降。政府支出必定会对私人支出产生挤出效应。凯恩斯的基本乘数忽略了这一点。

凯恩斯学派无法否认挤出效应的产生。但是，他们反驳说，挤出效应不会完全抵消政府支出的效果，尤其是在经济衰退期间。真正的问题是挤出效应的程度有多大。联邦储备银行圣路易斯分行基于货币主义的原理提出了一个计量经济模型，该模型估计，如果政府永久性地增加10亿美元开支，在第一年里经济几乎感受不到什么作用，之后则是完全没有作用。更倾向于凯恩斯学派的数据资源模型估计，在第一年里货币乘数大约为1.6，之后便是稳步下降。即使是凯恩斯学派的人也承认凯恩斯夸大其词了。[11]

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使得米尔顿·弗里德曼倍感沮丧，但也让他出了名。在这一个10年的开始阶段，大学生们受到的教育是：只要社会能够承受略微高一点的通货膨胀，就会有更多的就业岗位被创造出来，这是“尽人皆知”的事情。这种相机抉择似乎被以英国经济学家菲利普斯的名字命名的曲线所佐证。经过菲利普斯曲线的分析，如果你不愿意为了获得更多就业岗位而忍受稍高的通货膨胀率的话，你不但愚蠢，而且小气。弗里德曼不做这种交易。他与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的埃德蒙德·菲尔普斯一起证明了：如果政府试图通过放弃对通货膨胀的控制，从而“购买”到更多的就业岗位，那就只会促使物价更高。事实上，通货膨胀甚至可能会削减就业岗位。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证明它对于美国家庭来说是一个灾难，但却给弗里德曼的分析能力一个明确的认可。著名经济学家和美国前财政部部长劳伦斯·萨默斯回忆到，米尔顿·弗里德曼曾经是进步经济学家这一群体中的一个“魔鬼人物”。但是，在萨默斯当大学生的20世纪70年代早期及10年后成为一个年轻教授这个期间，“弗里德曼的异教邪说变成了正统理论”，弗里德曼不再是一个恶魔，而是成为萨默斯怀着“非常钦佩”的心情去仰视的一个人。[12]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想象你就是米尔顿·弗里德曼，你刚刚证明了货币不仅会讲话，还会随着经济的发展变得活蹦乱跳。那么下一步你要做的就是说服美联储在经济衰退时增加货币供给，当有迹象表明通货膨胀即将来临时减少货币供给，对不对？当生意清淡时，你会用手指着印钞机，对着美联储的官员大叫："别只是傻站在那里，要有所作为！"可是，我们的米尔顿不会这样做。相反，他会大声说："就站在那里，别动！"

弗里德曼声称，在对货币政策了解不足的情况下，经济学家是不可能精明地操作它的，这种谦虚或许是异乎寻常的。有时要经过6个月的时间货币政策才可以对名义国内生产总值产生影响，有时则要长达两年的时间。因为委员会不知道这种滞后会持续多长时间，因此当美联储尝试对经济进行微调时通常就已经对经济造成了伤害。1968年，美联储担心经济衰退，它重重地踩下了货币供给的油门，但是直到经济不再走下坡路时才开始感受到货币政策的作用。因为在经济复苏期间，政策的效果才显现，结果是造成了高通货膨胀。1974年，美联储为了阻止通货膨胀又猛地踩下了货币供给的刹车。经济衰退在1975年接踵而至。当杰拉尔德·福特入主白宫，跳上国家经济这台车的驾驶座后，他明智地接受了汽车的比喻，并且告诉国会要克制对货币政策过高的期望，因为他"不是林肯，而是福特"。这真是一个聪明的建议，因为此时的经济就像是福特公司滞销的埃赛尔汽车一样，表现平平。

弗里德曼要求美联储不要对经济新闻做出反应，它听起来就像是阿德米拉尔·海曼·里科弗对五角大楼感到厌烦时所提的建议。里科弗说，五角大楼应当分为三个部门，第一个部门应当做所有的工作，第二个部门和第三个部门应当用普通书写方式而不是速记整天相互写信。有了这样的方案，五角大楼工作起来会比弗里德曼希望美联储做的更加卖力。

支持弗里德曼学说的货币主义者建议美联储应当由一个机器人来取代，不管经济形势如何，这个机器人都会按照固定的货币供给增长率灵巧地踏下货币政策的油门。无论是3%、4%或5%，货币供给的持续增加可以削除经济不稳定的主要来源——美联储的反复无常。如果经济下滑，货币流动性的持续增加会满足支出的要求。在经济回升期间，通货

膨胀的火花就会因没有足够的燃料而不再加剧迸发。

这与布鲁金斯学会的经济学家阿瑟·奥肯在20世纪60年代满怀信心的、极度活跃的凯恩斯学派立场有多么大的不同啊。1962年的《美国总统经济报告》，并没有停止抗击通货膨胀或经济衰退的步伐。久经世故的经济学家会对国民经济进行微调。财政政策为经济繁荣扫除了障碍：

> 需求不足意味着失业……需求过剩意味着通货膨胀……稳定性政策并非表示仅仅是把生产和就业的波峰削掉，并把低谷填平……它表示的是要将对一个上升趋势的偏离保持最小化。[13]

虽然在今天没有哪个诚实的经济学家会写出如此吹牛的大话，但多数经济学家还是不同意弗里德曼的货币法则。他们的座右铭是：人难免会犯错，但要把事情真的搞砸的话只需要一台电脑。即使弗里德曼是正确的，并且货币流通速度在长期内也是稳定的，但在短期内它一定是偏离的。如果货币供给继续保持固定的增长趋势，而货币流通速度已经下降了好几个月的话，那经济就会崩溃。或许时间不会持续太久，但在这种情况下，就业岗位确实会取决于美联储的表现。关于美联储的难题还是悬而未决：美联储要用多长时间才会察觉到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动（认知滞后）？他们的行动要过多长时间才可以对经济产生作用（作用滞后）？美联储知道它应当作什么吗？

在学术界，当同事取笑批评你的声音大于取笑你的声音时，你就胜利了。在20世纪70年代晚期，货币主义者已经从笑柄变成了翘楚。世界各国的中央银行开始严密监视货币供给。德国中央银行的行长变成了正统的货币主义者，并且督促新的欧洲中央银行听从货币学派的主张。主流经济学吸收了许多货币主义者的主张，不再对货币政策的力量视而不见，也不再对财政政策的力量顶礼膜拜。经济学家再也不能被干净利落地区分为货币学派和凯恩斯学派两大阵营了。回想一下尼克松的话“我们现在全都是凯恩斯学派了”，甚至弗里德曼也承认尼克松是对的，当然了，他的话是有所保留的。学术的轮盘再次转动起来，因为莫迪利安尼已经承认“我们现在全是货币主义者了”，他说的当然也有所保留。

在萨缪尔森与威廉·诺德豪斯合著的1985年版《经济学》一书中，他们承认“早期的凯恩斯主义从‘货币的再发现’中受益。货币的确意义重大，许多凯恩斯学派的学者早期对财政政策的角色狂热追捧，因此不合

理地贬低了货币政策的作用”。[14]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并没有提及任何助纣为虐之人的名字。

有一个或许是杜撰的故事可以说明这一点。一个成功的商人拜访他以前的经济学教授。闲聊之时，这位以前的学生注意到教授的桌子上有一份试题，并开始阅读。他很惊讶地问道：“这与15年前你考我的试题一模一样！难道你不担心学生们会直接查阅原先的试题吗？”教授笑了：“不担心，没关系的。我确实持续在用同一个试题，只不过每年我都会改变答案。”

谜一样的货币流通速度

在说服莫迪利安尼和萨缪尔森相信货币事关重大之后，到1981年，货币主义者可以高唱《现在谁笑到了最后》，这是美国著名作曲家乔治·格什温的一首老歌。

但是，货币主义者很快就停止了歌唱。英国的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美国的罗纳德·里根强烈要求中央银行走货币主义者提出的反通货膨胀的政策道路。减少货币供给，不要顾及利率的上升。果然，通货膨胀以惊人的速度下降，在美国它从1980年的12%以上下降到了1982年的4%以下。很少有经济学家预测到货币政策如此有力。然而，不出所料，严重的经济衰退伴随而至（因为最初货币政策改变了产出和物价，并非只是改变物价，一如在长期内所做的那样）。美国的失业率攀升到10%，只是到了1983年才开始下降。将通货膨胀从经济之中挤出去，可不是一件好玩的事。

货币主义者认为美联储采取的方式太粗野了，将货币政策的刹车踩得太猛了。此外，他们断言在主席保罗·沃尔克的领导下，美联储会让货币供给剧烈振荡。不过，即使是货币主义者也承认，一个渐进式的货币政策仍然会引致经济衰退。

如果反通货膨胀的方法证明了货币政策的力量，为什么货币主义者仍然无法哼唱快乐的小曲呢？为什么这场“反通胀运动”最后会打成了平手？好吧，在通往经济复苏的道路上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还记得货币主义的中心思想是“稳定的货币流通速度”吗？正当货币主义者抵达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时，人们开始重新检查他们装袜子的抽屉。1948～1981年，货币流通速度以每年3.4%的比率稳定增长。突然之间，1982年装袜子的抽屉里钞票爆满。货币流通速度骤然下降了近5%。1982～1988年，货币流通速度的表现完全把人搞糊涂了。如果货币流通速度下降，并且货币供给没有以较高的比率增加的话，国内生产总值必定也要下降。

美联储如何应对货币流通速度的暴减？它完全没有遵循3%或4%增长比率的货币规则，而是猛踩货币政策的油门。不顾3%～8%的经济增

长目标，在1986年，美联储以超过15%的比率发行Ml货币，想以此来抵消下降的货币流通速度。

1986年，如果采用固定不变的货币法则将是灾难性的。贝利尔·斯普林克尔是弗里德曼的门生，也是第一个担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正统货币主义者，甚至连他都在1987年的《美国总统经济报告》中承认：

> 在适度实质增长、通货膨胀率很低和下降的通货膨胀预期的环境中，并且考虑到货币流通速度具有不确定性，在有利于其他变量的情况下降低Ml的重要性……似乎是一个恰当的判断……没有证据表明美联储在货币控制方面犯有过错。[15]

撒切尔夫人领导的英国政府，也在面对较低的货币流通速度时猛地踩下了货币供给的油门。

没有人知道，是否货币流通速度会回归到稳定的模式。学者们提出了几个假设来解释货币流通速度下降的原因。因为在过去的10年里对银行业管制的放松，人们正在将更多的资产储存到计息的活期存款账户中，他们持有了更多的货币，货币流通速度因而下降。然而，某些测试显示就算是没有这个转变，货币流通速度还是会下降。弗里德曼和其他货币主义者对此做出了解释，在20世纪80、90年代通货膨胀和利率的大幅下降导致了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经济学家低估了货币流通速度对利率的敏感性。另外，住房贷款的再融资工具给房主提供了一个货币流动性的新来源。近些年来，美联储一直沿着货币供给的思路在操作，但主席本·伯南克却反对过度依赖它。尽管如此，世界各国的中央银行都认可，无论货币供给是急剧增加还是骤然减少，都是萦绕在政策制定者耳边的大声的警报。

套用丘吉尔的话，货币流通速度变成了藏在闷葫芦里的一个谜，而它正在成为最后的赢家。

学术争论让经济学历久弥新

自从凯恩斯死后，这个世界见证了一个富有价值的学术争斗。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持续加温使得可以追溯几个世纪的这一传统得以继续充满生机。主流经济学既不能否定它的过去，也不能抹去凯恩斯的所有创新。美联储的经济学家密切关注着M2货币供给和凯恩斯学派所谓潜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概念，而采用的方法被人描述为“将凯恩斯的脑袋安到弗里德曼的身体上”。

在前一章中，我们曾问过“凯恩斯在今天是否还会选择研究经济学”这一问题。现在我们可能会问：倘若他活着看到货币主义者的研究和振兴，凯恩斯是否还会依然坚守纯粹的凯恩斯学派？考虑到他实用主义的、敏锐的头脑，他当然会承认，随着时间的推移，某些基本的内容仍会适用。

在弗里德曼和萨缪尔森之后闪光的一代经济学家包括了以下杰出人物：马丁·费尔德斯坦、迈克尔·博斯金、保罗·克鲁格曼和劳伦斯·萨默斯，他们已经放弃了凯恩斯学派和货币学派之间血腥的派系争斗。他们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找到了新角色。

他们没有对试图控制总需求的政策展开争论，而是转向了总供给的问题，开始探究美联储如何能够引导厂商提高生产率。更高的生产率可以转变成更高的生活水平，但提高生产率就要提高对厂房、设备、研究与教育的投资。与两大主要政党密切合作的美国经济学家，因为慢如蜗牛的生产率增长而对轻率的税收政策大加谴责。[16]

这些经济学家大多数都小心翼翼地与被赫伯特·斯坦称为“废物供给学派”的人划清界限，这些人是20世纪80年代早期狂热的短篇文章作家和政客，他们中有些人信誓旦旦地说：降低所得税率将会大大刺激经济活动，使其迸发出巨大的活力，税收反而会快速增加。拉弗曲线因南加利福尼亚州大学经济学教授阿瑟·拉弗在鸡尾酒会的餐巾纸上所画的草图而得名，不过这个拉弗曲线的推论常常被夸大，供给学派的热情已经感染了主流经济学家，驱使着他们更加努力地推进关于高税收和低储蓄率对经济不良作用的研究。

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爱德华·普雷斯科特坚持认为：高税率解释了法国人、德国人和意大利人为什么要花那么多的时间在咖啡馆和温泉浴场里。他发现西欧人“比北美人和日本人要少工作1/3的时间”，因为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征税人员拿走了他们收入的60%，而美国、加拿大和日本这一比率则为40%。他指出，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法国人通常要多付出接近50%的努力，但他们的边际税率却要小得多。[17]

即使那些鄙夷供给学派的经济学家，也反对返回到1980年高达70%的个人纳税等级（或回到20世纪60年代早期高达91%的边际税率），这么高的税率刺激人们通过在账目上耍花招、把利润用于再投资和钻税法的空子来逃税。在20世纪80年代的后半期，有50多个国家削减了最高税率，包括捍卫平等主义的堡垒，例如瑞典和澳大利亚。（黎巴嫩是两个提高税率的国家之一。难道他们的问题还不够多吗？）当克林顿总统说服国会提高富人的税率时，他的意思是将最高税率从33%提高到39.6%。尽管在竞选时他花言巧语，宣称20世纪80年代的低税率简直就是送给乡村俱乐部成员的赠品，他却并不建议回到欢迎罗纳德·里根入主白宫时的70%的高税率。同时也要注意，在克林顿提高美国税率的同时，他用了7年的时间力劝日本政府降低所得税率，以重振奄奄一息的日本经济。

与克林顿增税的做法不同，小布什总统正好反其道而行之，尽管几位著名的民主党州长在自己的州里强调要减税，以此来增加他们实行供给学派政策的诚意，但政治家之间的互相推诿仍然在继续。

税赋永远与我们同在，而且通过企业和个人的决策对我们进行推动和拉动，无人能幸免。1998年，滚石乐队主唱米克·贾格尔取消了滚石世界巡回演出《通向巴比伦的桥》在英国站的演唱，他抱怨说，如果他的乐队要在英国本土表演，英国就要向他们征收1900万美元的税。滚石在英国只不过开一场演唱会，却被迫要为他们在国外举办音乐会赚的所有收入缴税。但如果远离他们的家乡，他们就可以逃避英国税收。他们就这样做了，让35万名英国粉丝倍感失望。顺便说一句，贾格尔并没有躲到公关人员的身后，他向媒体中肯地解释了自己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而做出的决定，他所讲的恰如你期待从某个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上过伦敦经济学院的人那里听到的一样。

感谢凯恩斯，如今我们全都是凯恩斯学派了。感谢弗里德曼，我们现在又全都是货币学派了。今天我们又全都成了折中主义者了，全得感

谢这个动荡的世界。

米尔顿·弗里德曼的争论已经超越了对货币的争论。当自由市场经济学家有时被人嘲笑缺乏同情心时，弗里德曼早在1962年就提出了“负所得税”的概念，目的是帮助穷人，并且替代复杂交错的福利体系。他的设计促成了今天的劳动所得退税补贴方案（EITC）。在国际经济学中，弗里德曼也犯下了离经叛道的错误，他在1953年主张汇率也应当浮动，而不应由政府加以规定。当今社会外汇交易市场和全球债券市场每天有数万亿美元的交易，使得政府和银行必须更有效率地工作。在他于2006年以94岁的高龄去世前的几年里，米尔顿·弗里德曼和罗丝·弗里德曼一起精力充沛地进行为增强校际间竞争而展开的争辩，他们主张向学生父母提供自由择校的权利，以此来取代当地学校的垄断。

让米尔顿·弗里德曼感到最为骄傲的事件发生在1970年，其意义远远超过了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也远远超过了他取得理论和实证的胜利。这件事与经济学没有多大的关系：它是有关军事的，美国将成千上万名美国年轻人投入到了血腥的越南战争。尼克松总统任命弗里德曼坐镇志愿役委员会。在开始阶段，委员会中支持和反对自愿服兵役的人平分秋色。威廉·威斯特摩兰将军声明他不想指挥一支雇用军。弗里德曼阻止了他：“将军，你是不是更愿意指挥一支由奴隶组成的军队呢？”威斯特摩兰挺直了身子说道：“我不喜欢听到把我们爱国的应征入伍者称作奴隶。”弗里德曼回答道：“我不喜欢把我们爱国的志愿兵称作雇用兵。但如果他们是雇用兵，那么，我，就是一个雇用教授，而你，就是一个雇用将军；我们接受的是雇用医生的服务，我们使用的是雇用律师，而我们从一个雇用肉贩子那里买到我们想要的肉。”弗里德曼回忆说，“这是最后一次我们听到将军谈论雇用兵。”[18]就像是电影《十二怒汉》中意见不同而又各执己见的陪审员一样，为了自愿服役制，为了争取自由，弗里德曼提出在委员会中进行无记名投票。

第十一章 詹姆斯·布坎南：从经济市场中的个人选择到政治市场中的公共选择

“我今天看到了一派惊人的景象，”马克·吐温说，“有一位政客把他的手插进了自己的口袋。”

马克·吐温刻薄的嘲笑，能够促生一个经济学思想的新学派吗？1986年，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将经济学奖授给了詹姆斯·布坎南，他是经济学公共选择学派的创始人。公共选择学派的理论研究者要求我们重新考虑和摒弃马克·吐温所理解的正统的公共财政理论。他们认为，相比货币主义者搜集的任何乘数统计数据，政治的现实主义态度对凯恩斯学派经济学的挑战更加确定无疑。公共选择学派的支持者对政治人物的信任不会比对他们的唾弃更多。

公共选择学派相信它能够为许多经济和政治问题做出解释：为什么我们要长期忍受财政赤字的折磨，为什么特殊利益集团的数量在激增，为什么尽管总统承诺要精简机构，但官僚体系还是在持续地膨胀，以及为什么政府监管部门常常更多的是保护企业，而不是保护消费者。大多数经济学家把政治看作令人反感的、难以理解的，而且是对良好政策的非经济性阻力。与此相反，公共选择学派的经济学家坚持认为：政治必须用经济学的方法来加以研究。他们指出，政治是一种经济活动。经济学家不应当仅仅是两手一摊，厌恶之情溢于言表。他们应当要问，为什么政府官僚和立法者屡次破坏良好的政策。

如果你观察得足够仔细的话，你会发现许多公共选择学派的先行者，包括亚当·斯密、詹姆斯·穆勒、瑞典经济学家克努特·维克塞尔，以及任何诅咒官僚主义的人。不过，真正的公共选择学派的学术研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集中出现的。随着政府规模的扩大，对其的批评也随之增加。

就像尖锐的批评家索尔斯坦·凡勃伦一样，詹姆斯·布坎南也常常感觉自己是主流学术圈里的一个受鄙视之人。1919年，布坎南出生于田纳西州的默夫里斯伯勒，由于无法负担一流大学的学费，他只好选择了位于家乡的中田纳西州立师范学院就读。每天清晨和傍晚，这位中田纳西州

立师范学院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要靠挤牛奶来赚钱交学费。在熬过了4年的打工上学的生活之后，布坎南考入了田纳西大学，并且取得了经济学硕士学位。第二次世界大战打断了他的学术之路，“山姆大叔”把他送到了纽约的海军军事学院。

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也有类似的乡村生活背景，他的人生起步于加拿大的奶牛牧场。然而，加尔布雷思顺利地跻身主流学派，并且获得了哈佛大学的教席，而布坎南则依靠艰苦奋斗，而且很快学会了蔑视“东岸精英”。作为一个在纽约的南方佬，有些知识分子在他面前摆臭架子并歧视他，面对这些布坎南仍然是退避三舍。战后，布坎南向西来到了芝加哥，并在那里拿到了博士学位。之后他便去了弗吉尼亚大学。

布坎南还是把他很多的工作看作对美国东部象牙塔里的学者理想化的冥想做出的反攻。当哈佛大学的教授在众人簇拥下于肯尼迪和约翰逊执政时期成群结队地涌向华盛顿时，布坎南在弗吉尼亚山上静静地攻击着他们的思想，1962年，他与戈登·塔洛克一起发表了《同意的计算》。

根据布坎南的说法，“东岸学术精英无法摆脱某种心态，自认为他们扮演的角色是向政府传达奥林匹亚宣言的高贵、智慧的长者。他们总是认为自己是联邦政府的顾问。”

至于布坎南呢？“我自认为是伟大平民的一分子，只想试着弄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1]

甚至他的朋友都不认为布坎南是一个热情又好相处的家伙。只需看他简朴的个性和对饮用过多巴黎水的享乐主义者的厌恶，不难想象，如果布坎南和优雅的加尔布雷思同处一室，他们的关系会有多么紧张。

与其追溯公共选择学派的历史渊源，还不如让我们了解一下这个学派如何看待政治经济领域里几个最让人关注的议题。公共选择学派的实质异常简单：如果商人是自私自利的，那为什么不假设政府官员是“政治企业家”呢？他们追逐的是什么的最大化呢？是他们的权力和赢得选票的能力。经济学家用了200年的时间开发出一个人类行为的模型，为什么在面对政府时却要弃之不用呢？

特殊利益集团是经济发展的绊脚石

当美国国会开会时，没有人是可信赖的，包括国会议员。说客们对国会议员及其助手纠缠不休，以争取优惠、减税、拨款和保护政策。已故马里兰大学教授曼瑟·奥尔森主张，系统化地削弱社会效率的诱因在驱使着特殊利益集团，无论它是工会、社团还是公司。[2]

为什么特殊利益集团不展现出它们的爱国精神，说服国会提升社会效率和国家的福祉？这是得不偿失的。且看奶农协会的农业政治教育委员会，它在国会竞选活动的捐赠人名单中位列前茅。奶农想要政府用补贴的方法维持牛奶价格，以保证他们在每加仑牛奶中“赚取”一个最小的差价。经济学家痛恨价格补贴，而且消费者也会因此受害。（顺便说一下，儿童与饮用牛奶的数量不成比例。因为儿童在穷人中的比例相当大，穷人的儿童可能受害最深。）假设委员会成员占美国人口的1%，如果他们成功地游说美国国会通过了可以提升美国整体生产率的一般性措施，他们也只能获得1%的利益。然而，他们要付出100%的努力求得法案的通过。这样的话，他们最后要花上5万美元，用于为国家创造100万美元新财富的立法上，但他们只能分享到1万美元的好处。因此，只有法案为游说者带来的新收入超过其游说成本的百倍以上，这种爱国行为才有意义。结果是，这些团体对通过政治运作构建一个更有效率的社会没有多大的兴趣。因为它不划算。

现在，让我们看看乳品委员会如何为自己谋求利益。他们可以通过价格补贴方案从他人身上获取利润。从谁那里取得利润呢？当然是消费者。让我们假设委员会游说政府同意乳品价格补贴花费了5万美元，但将生产者的收入提高了1000万美元。奶农承受了100%的游说成本，但也获得了100%的利益。政治游说活动堪称是一项完美的投资。难怪奶农常常更热衷于装饰在华盛顿的办公室，而不是在工厂里安装新设备呢。难怪他们雇用了大量的律师，因为投资回报十分可观。美国银行大盗威利·萨顿解释说，他打劫银行的原因是“那是放钱的地方”。对于许多团体组织而言，钱就放在华盛顿。

这些特殊利益集团的活动通常会对社会造成伤害，但这种临时结成的联盟会在乎吗？我们上述案例中的乳品委员会受到的影响，只有全部

伤害的1%。也就是说，只有国内生产总值下降的幅度是他们回报的100倍时，对经济的伤害才会构成他们罢手的原因。奥尔森说过："一个充斥着特殊利益组织的社会就像是一间瓷器店，挤满了争抢货物的摔跤手，他们打碎的东西要远远超过他们搬走的东西。"[3]

如果价格补贴掠夺了消费者的钱包，为什么消费者不组织起来挫败这种阴谋诡计？因为它不划算。在我们举的例子中，消费者的总成本是1000万美元。如果人口相当于2.5亿，则每个消费者要负担的成本是4美分。然而，它给每个奶农的好处是4美元。到头来，奶农获得的好处是牛奶消费者的40倍。而且，奶农更易于组织起来。

仅占美国人口万分之二的蔗农，试图让美国的食糖价格维持在世界价格的3倍。不但他们的收益颇丰，玉米甜味剂（食糖替代品）的生产商也因为与人为操纵的食糖高价竞争而赚取了可观的利润。小木屋牌糖浆是没有槭糖味的糖浆，它只是玉米糖浆。科学研究证明，某些人造甜味剂会导致实验用鼠得癌症。而人为的价格补贴则让一国国民有可能罹患癌症。

在民主国家，这样的问题屡见不鲜。逐利的团体组织得以践踏消费者的利益，而从单个消费者的角度来看，这样的结果没有多少利害关系。最终，单个的消费者就会随着国家效率和收入的下降而受到严重的伤害。但他们应该责备谁呢？不会有明显的恶棍出现，因为特殊利益集团只是从公共福利中抢吃了小小的一口。

消费者责怪自己意义不大，了解国会行动的动向需要花钱。当给别人一点好处而只花费你4美分时，理性的做法是对这种行为不加理会。毕竟，仅打电话给你的国会议员弄清楚此类行为让你损失多少钱这一项，就会让你的花费多出几倍。经济学家称此为"理性忽视"。我们不可能知道每一件事情。我们没有那么多的脑力、时间或金钱去了解情况。正如某位喜剧演员所说，"你不可能拥有所有的东西，你往哪里放呢？"

住在纽约和波士顿的人都意识到出租车供不应求。事实上，这些城市在限制出租车牌照的数量，从而导致出租车司机收入增加，却降低了两个城市市民的满意度。尽管如此，市政府还是无视普通大众的抱怨，反而对吼闹的出租车主让步。公共选择学派不仅指出"会哭的孩子有奶吃"，更重要的是，奥尔森和他的同事让我们明白了：为什么一个紧密团结的临时联盟会比散漫的、无组织的大众发出更大的声音。

通过得出更宽泛的历史规律，奥尔森将他的推论引向了一个更具争议的领域。他假设稳定的社会更易受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然后他宣称，“长期稳定的”社会要比相对新兴的社会增长速度更缓慢。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社会的寄生虫会繁殖，并且吸食一个国家维持生命的“血液”。如果情况如此，就只有革命和战争才能够激发经济的活力，因为特殊利益集团不受制度的束缚。他以英国为例，说它是一个稳定而发展迟缓的国家，又引用了战后的日本作为经济发生奇迹的例证。

很少有经济学家一路跟随着奥尔森，认同他关于国家兴衰的结论。即使如此，他对特殊利益集团的分析却言之有理。

特殊利益集团如此说来好像无可救药，是吗？未必。毕竟，当美国国会将利益授予消费者时，每一个特殊利益集团都会受到损害。如果总统或国会领导人责令实行全面预算削减或实施反津贴、反价格补贴和反贸易保护方案的广泛政策，则所增加的经济效益足以补偿这些特殊利益集团在特殊优惠政策上的损失。可悲的是，历史上几乎看不到这样的例子。似乎更有可能的情况是，当特殊利益集团滔滔不绝地慷慨陈词时，政治家将继续发表措辞强硬的豪言壮语，但没有什么事会真的发生。

政府为何要进行行业管制？

为什么政府要对许多行业进行管制？简单地说，就是因为这些行业是垄断行业或寡头垄断行业，而且消费者理应受到保护，免得被它们敲竹杠。这个答案暗示企业痛恨管制。

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斯蒂格勒的引导下，公共选择学派的经济学家补充了另外一个可能的答案：企业希望被管制，因为管制使得它们规避了动态竞争的风险。实际上，它们为能被管制而游说。这就是著名的管制“俘获”理论，因为被管制的实体“俘获”了管制者。[4]

它是怎样运作的？可以考虑一下某个州立理发师委员会。该委员会坚守某些规则和标准，比如所有的理发师要把他们使用过的梳子进行杀菌消毒，并且拒绝接待任何衣着邋遢的顾客。委员会的干涉可能会让费用略微提高，但理发师会说服委员会采用其他能够让他们大为受益的规定，特别是限制新理发师进入这个行业的规定。为了阻止新理发师搬迁到本州，委员会要求：理发师要在牙买加花一年的时间给拉斯特法理信徒骇人的长发绺理发（他们基本不剪头），或者在一个合格的治疗头皮屑的诊所做3年实习医生，并领取最低工资。其中的每一项措施都旨在保护当地理发师免于竞争的压力，而提出这些措施的借口是，为了让顾客避免碰到经验不足就开业的理发师。事实上，大众上当受骗了。美国亚利桑那州则要求发型师要在政府批准的美容美发学校听取1600个小时的课堂教学。而其首府菲尼克斯市的一个警察需要接受多少个小时的培训呢？600个小时。显而易见，在地上捡起一把梳子所需要的培训时间几乎是捡起一颗.357马格南左轮手枪子弹的3倍。

管制对一个产业的影响很少是只有好的一面或只有坏的一面。牛奶管制条例要求使用不锈钢的桶，它的成本要比塑料桶大得多。这项规定会让奶农感到烦恼，但他们获得的价格补贴和津贴，肯定会比这种无关紧要的心理刺激更有价值。

为什么受管制的行业，能够成功地俘获这些被人信以为真当作公共利益的守门人呢？回想一下“理性忽视”——特殊利益集团的悖论。这些行业有动机去搜集所有有利于它们的学术证据。经济学家通常在法律杂

志上大肆宣扬，提议专家们进行研究。既然“大众”似乎并不太在乎，负责管制的政府官员也常常感觉他们应该向这些行业让步。最后，甚至出现一个更为讽刺的解释：管制者常常与被管制者有近亲关系。行政长官来自于私营部门，并且在任期结束之后又返回私营部门。交朋友就是一种赚钱的途径。1970年，自称消费者保护人的拉尔夫·纳德认为，“州际商业委员会的疏忽”其实就在于这个联邦政府机构让美国的卡车运输业过上了温暖且舒适的日子。

俘获理论并没有俘获所有经济学家的思想，这个理论代表着狭隘且片面的政治观点。有时政客能够反向控制，胁持企业作为人质。一个具有煽动性的政客会因为承诺打倒贪婪的强盗式资本家而登上权力的宝座，他可以许诺要让每个人都能买得起一只阉鸡，并且利用损害家禽养殖业的惩罚性管制措施来压低阉鸡的价格。这些激起众怒却又唤起群众兴趣的愤愤不平的政客，为公共选择学派的假设提供了反证。

公共选择学派经济学家并不认为所有的管制都是有利于产业，而有害于消费者权益的。他们并不想为纯粹自由放任的经济学争辩。然而，他们极力主张人们要将自由市场的结果与政府管制的仿真模型相比较，而不要与虚幻的愿景相比较，虚幻的愿景都是假设一个仁慈的政府总是殚精竭虑地为大众利益服务的。

精简政府机构不过是一句实话而已

奥尔森和斯蒂格勒对特殊利益集团有生动的描述，说它们是贪婪地将自己的猪嘴竭力拱到公共食槽里去。为什么政府会给它们提供“饲料”？为什么政府会供给不同利益集团需求的产品和服务？通过检视官僚机构和政治人物，公共选择学派理论研究者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解答。

戈登·塔洛克和小威廉·尼斯坎南像生物学家研究实验用小白鼠一样对官僚进行了仔细观察，这个比喻表明了两位作者对他们研究对象的欣赏程度。根据尼斯坎南的说法，官僚之间的激烈竞争与商人之间的竞争相类似。和商人一样，官僚也是追求个人利益的，只是表现方式不同而已。商人为利润最大化而拼杀。当然，除非借助收取贿赂的方式，政府官员是不能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的。相反，他们努力寻求一个不同变量组合的最大化：工资、津贴、权力、声望和退休后的机会等。官僚是如何将这些变量最大化的呢？通过增加预算和扩大编制。尼斯坎南将政府机构描述成一个将预算最大化的组织。政府机构会膨胀到远远超过有效率地工作所需求的规模，而且它们是通过压榨纳税人的钱而臃肿起来的。更多的钱意味着更大的权力，因此官僚不具有削减政府开支的强烈意愿。官僚机构的不足，会导致官员牢骚满腹。

即使参加竞选的官员曾经扬言要精简机构，他们当选之后也几乎不会集中力量去实施。吉米·卡特和罗纳德·里根均许下承诺，又双双食言，在他们执政期间，政府官员的工资总额继续攀升。他们学会了同情沙皇，因为沙皇承认“统治俄国的不是我，而是上万名公务人员”。虽然一位政治领导人能够下命令采取某些行动，但只有官僚机构才可以将这些行动付诸实施。有时官僚们会巧妙地拒绝、妨碍或延迟执行，巴望着领导人将要退休、落选或驾鹤西去。赢家常常是态度模棱两可的人。

尼斯坎南的理论存在一些问题。正如马克思将所有工人混为一谈那样，他将所有的官僚一概而论，好像他们具有高于一切的共同利益。其实他们没有。我们可以描绘出一个更复杂的官僚机构的模型。终究谁算是这个机构的头儿呢？是内阁大臣还是高级公务员？他们可能会在某些时候从精简机构的举措中得到政治上的好处吗？在里根第一届任期内，内政部部长詹姆斯·瓦特试图精简其所在的机构。另外一个更显著的例子

涉及美国前国防部部长卡斯帕·温伯格。在尼克松执政时期，因为对保健、教育和社会福利预算进行了是否节约的审查，他赢得了“快刀卡珀”（卡珀为卡斯帕的简称）的称号。后来，他在里根执政时期担任国防部长，“快刀卡珀”就变成了“长勺卡珀”，他将五角大楼变成了肥差之地，因为他找不到工具将吉露果冻切开，这个果冻可是接近1万亿美元的预算。温伯格在预算立场上的逆转有什么价值呢？为什么尼斯坎南的理论只有一半的时间在发挥作用？也许因为温伯格认为一个部门人事臃肿，另一个部门就必须要扩编，以满足总统的施政目标。

尼斯坎南的官僚机构模型已经六分熟了，但它可能还需要在炉子里多烤一会儿。

现在，让我们转向公共选择理论对民选政治人物的论述。

一位苏联的移民曾经观察到，“美国国会太奇怪了，一个人站起来什么也不说。没有人听。然后每个人开始站起来发表反对意见”。与此相反，詹姆斯·布坎南看到了在国会中有太多的一致意见。政治家喜欢对政府的恣意浪费、欺骗行为和滥用职权进行猛烈抨击。1988年，在民主党总统竞选活动中，州长迈克尔·杜卡基斯对美国国内收入署不合理的税收问题提出质疑，参议员加里·哈特抨击五角大楼的挥霍无度，牧师杰西·杰克逊则针对富人的纳税漏洞进行谴责。然而在削减预算赤字的问题上，他们却欣然一致，点头同意。

在政治家异口同声地谴责政府浪费的同时，他们又投下赞成票，将更多的钱用于政府计划项目，导致预算日益膨胀。1958～2006年，美国只有6次享受到了平衡的预算。根据布坎南的说法，政客们的慷慨陈词与他们的表决记录相冲突。他们的话听起来像政治家，但在投票时他们就成了狡猾的黄鼠狼。有人会说，联邦政府最严重的赤字就位于政客们的脊椎和两耳之间（头脑）。正如特迪·罗斯福总统所说：你用香蕉雕个人都比政客们的背梁硬。

虽然布坎南贬低政客很到位，但他并不是一味地贬低他们。他还要寻找驱使政客们像伪君子般做事的力量所在。实际上，这个问题并不在于国会中某个特定的人，它是系统性的毛病。布坎南认为，是政治体制孕育了预算赤字。

让我们对布坎南立即进行反驳：如果持续的预算赤字对经济造成伤

害，难道人们不会感到痛苦，并且期望有一个平衡的预算吗？

布坎南回答说，预算赤字的确会对经济造成伤害，但是人们感受到的痛苦是间接且分散的。将预算盈余所带来的直接痛苦和预算赤字带来的间接痛苦作一个比较。如果我们把一个平衡的预算作为起点，并且希望创造出预算盈余，我们可以增加税收，或削减政府开支。这两种做法都会带来直接的痛苦。高额的税收通常会减少私人的消费性支出，减少政府开支则会损害政府计划的受益人。在一个健全的经济体制下，任何的受益都是在日后方显，而且对高税收和低支出政策的受害者只能间接地提供帮助：受害者必须设想他们如何在未来受益。

现在再来考虑预算赤字。通过降低税收或增加政府开支，我们可以创造出预算赤字。这两种做法都会让纳税人和政策受益者眉开眼笑。预算赤字使得人们将更多的钱花在自己身上。没错，预算赤字会对经济产生挤出效应，但这个效应是间接的：人们必须设想未来，并且要问他们是否会受到影响。[5]

布坎南的解释建立在人们对间接的、未来的效应做出错误判断的基础上。有太多的人在仿效爱因斯坦，因为他说过："我从来不考虑未来，因为它很快就会来到。"布坎南更喜欢人们听从由田纳西·威廉斯编剧的电影《玻璃动物园》中阿曼达·温菲尔德说过的话："未来终将变成现在，现在终将变成过去，如果你不好好地打算，过去就会变成无穷无尽的遗憾。"

布坎南断言，因为政府财政寅吃卯粮而忽略了未来，它会殃及我们的子孙后代。事实上，他提出了一个道德问题：赤字难道不是与"有纳税义务而无代表权利"相类似吗？今天的国会议员通过危及子孙后代的福祉，来增加他们的选民在当前的福祉。尚未出生的人是不能投票的，不过，每个小孩一出生就背上了债务。

布坎南关于后代的观点受到理性预期学派强烈的反驳，该学派的思想将在下一章中加以阐述。本质上讲，理性预期学派的学者认为人们可以正确地权衡自己的未来，并且也可以豁达地为子孙后代着想。正如你所预期的那样，这个新的学派激起的论战甚至比公共选择学派还要多。

当然，对布坎南最有力的反驳来自于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在1977年，联邦政府的预算赤字消失，开始出现盈余。它是如何发生的？它是

否宣判了公共选择学派的失败呢？在1990年、1993年和1997年，美国国会通过立法，削减联邦政府的开支增长率，并且（在1990年和1993年）增加税收，特别是对高收入的美国人增加收税力度。不过，更重要的是，财政收入猛增，长期而强劲的经济扩张促使失业率下滑，低到美国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没有见过的程度。更多的在职工人意味着有更多的人赚取收入和缴纳税款。同样，较高的公司利润导致公司缴纳更多的税款，并且造成股价飙升。1995年6月～1998年6月，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两倍。只要股票投资人卖出手中持有的股份实现“获利”，他们就必须缴纳资本收益税。总而言之，这是美国经济史上一个骄人的业绩，而且还是处在政治家们确实在限制自己继续大手大脚花钱的时期。

因为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终结了预算赤字，我们是否应当将公共选择学派的研究论文撕成碎片呢？当看到预算盈余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被浪费时，公共选择学派的学者们并不吃惊。甚至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美国国会议员开始试探古老的政治取悦性开支。1998年由克林顿总统签署的公路法案包含了大量老式的讨好选民的支出。某研究人员对此进行了计算，毫不夸张地说，这项高达2000亿美元的公路法案简直可以让美国用黄金来铺设道路了（当然是镀金的）。然而，这个法案并没有让公路镀金，而是让国会议员的政治生涯镀了金，他们得以吹牛是他们为选区争取到了建设桥梁、隧道、渡口和自行车专用道的新资金。在这一公路法案被通过5个月之后，98%的现职国会议员都成功地竞选连任。1999年的预算法案包括了对公司的拨款，比如30万美元的经费用于研究家乐氏的葡萄干小麦片是否符合联邦营养计划的质量要求。

2001年，几乎是在小布什总统刚刚就职，美国国会就打开美国人的钱包，口朝下使劲地摇晃。一个价值1800亿美元的农业法案让生产干豌豆和小扁豆的农民得以摆脱困境，同时让那些已经停止的针对生产马海毛的牧羊人和养蜂人的扶持计划得以重新启动。在一项2860亿美元的公路法案中，有差不多10亿美元的资金被分流到了阿拉斯加州，用在了119个特定工程上。其中有一个50位居民的小村收到了2.23亿美元，用来建设一座1.6公里长的桥，将这个村与大陆上的繁华城镇凯奇坎连接起来。另外，有2.31亿美元被用来在安克雷奇建造一座桥，并特别立法为它取名“唐·扬之路”，唐·扬是谁？他是美国国会众议院交通与基础设施委员会主席。

20世纪90年代末的预算盈余表明，美国人并不像公共选择学派鼓吹者相信的那样无知和被动。像1992年参加美国总统竞选的罗斯·佩罗这样不安分的个人，以及像联邦政府预算监督组织协和联盟这样鼓吹两党执政的集团，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有效地激起了美国选民的怨气。政客们突然间感到了害怕，意识到如果他们不削减开支，就会丢掉饭碗。由共和党把持的国会持续向民主党总统施压，直到位于华盛顿宾夕法尼亚大道两边的国会山和白宫就削减开支达成共识。如果普通选民没有对反复出现的财政赤字发出愤怒的吼声，政府还会继续挥霍纳税人的钱。这件事带给我们的教训是：有时“人民的力量”的确会打败“公共选择”。

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预算平衡在所有工业化国家突然成了热门话题。20世纪90年代初期，加拿大、瑞典和澳大利亚都曾面临破产的威胁，只能大幅削减政府计划，以便重新获得信用。在欧洲，欧盟成员国共同签署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强迫各成员国压缩赤字，否则将丧失参加新一轮单一货币计划的投票资格。只有日本完全坐失良机，因为可怕的经济衰退已经让过度膨胀的预算超过了警戒线。然而，对于西方世界而言，时代精神要求财政紧缩，而且允许少数凯恩斯信徒发挥出他们的想象力。

退休后，谁来为你的养老金埋单？

对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的争论提供了另外一个极好的例子，让我们看到利益集团为争夺公共钱包而产生的冲突。社会保障计划开始于大萧条时期，当时是作为帮助老年人保持退休之后的尊严而制订的计划。作为对他们的工资征收一个新税种的交换，政府会避免让老年人在他们不能再工作时陷于贫穷的生活。因为大多数人活不过65岁，因此刚开始时并没有很多退休的人真正领取这笔钱，但后来的两项发展推翻了这样的估算。第一，人们的寿命开始延长。通常美国人在60岁时退休，但现在几乎可以活到80岁。第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婴儿潮时代出生的人数在人口统计图表上飞速增加。带来的结果是，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美国将有越来越多的退休人口，相对来说却是由越来越少的工作人口来养活他们。目前，领取社会保障的人只占到总人口的12%，这一数字将在几十年后攀升到20%。因此，谁来养活退休的婴儿潮一代呢？我们又从哪里筹措多达27万亿美元的养老金，来兑现已经承诺过的福利呢？

许多美国人错误地相信，社会保障资金已经被用于投资，并且正在赚取利息，可以用来支付这些费用。很抱歉，事实上，美国国会所创造的社会保障是一种“现收现付”的体系，也就是说，大多数当今的税收直接支付给了当今的退休人员。剩余部分进入联邦预算用于支付其他政府计划。的确有一个“社会保障信托基金”，但这是美国财政部支付给社会保障管理部门的一堆债款。大约到2012年，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将达到退休年龄，并带来退休人口的高峰，届时美国国会要么削减开支、提高税收，要么找到一些目前尚未探明的黄金宝藏。老年保健医疗计划也面临着相似的困境。难怪X一代感到巨额税赋增加的威胁迎面而来，同时，那些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也拿不准他们是否已经成了子孙的累赘。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某民意调查显示，许多18~24岁的年轻人更相信不明飞行物，而不是社会保障。毕竟，到了2100年，天空中仍然会出现不明飞行物，而社会保障就要另当别论了。

近来，出现了一缕希望之光，那就是政治人物现在能够自由地讨论彻底改革社会保障计划这个问题了。仅仅在几年之前，它还被称为“美国政治的第三轨”。任何提议改革的人都会被4200万伏特的死亡电压猛然击中，发出嘶嘶的响声（目前，有4200万人在领取社会保障）。当巴里·

戈德华特于1964年在佛罗里达参加总统竞选期间提到这个话题时，他的幕僚们似乎听到了林登·约翰逊以压倒性优势获胜的隆隆声。20世纪80年代共和党人对社会保障问题窃窃私语，他们担心一言既出，擦枪走火，民主党人会突然袭击他们。两党都任由政策制定者探讨改革。首先，20世纪90年代关于预算的争论给政客们以勇气，攻击政府的预算赤字原来是一个“政治市场”。其次，美国人开始在20世纪90年代将他们的私人存款投入股市，除了2000～2002年出现大幅下滑之外，他们收获颇丰。他们深知，归根到底股票投资要比证券投资赚得更多。如果确实如此，那为什么他们的社会保障金没有获得高额的回报？普通的双职工家庭只拿出年收入的1%投入社会保障基金，相比之下，有平均9.5%的年收入投入到了股市。如果政府将社会保障金投入股市，美国人可能会享受到较为富裕的退休生活，而不必将沉重的工资税负压到年轻的劳动力身上。

虽然国会现在也没有解决社会保障问题，但在1998年，一些优秀的民主党人比如参议员帕特里克·莫伊尼汉和鲍勃·克里跳出来挑战之前的保守势力，建议工人们可以将他们的一部分社会保障金投资于股市。莫伊尼汉认为这肯定是有风险的。与其眼看着整个系统崩溃，还不如放手一搏，冒一下风险，因为让年轻人挑起婴儿潮一代强加给他们的重担，这在算法上和政治上都是说不过去的。小布什总统尝试在建立个人社会保障账户方面得到广泛的支持，最终失败了，但至少他能够在没有受到选民和反对者抨击的情况下对这一建议进行探讨。

医疗保险也需要重大改革，甚至它在获得财政支持上比社会保障还要不靠谱。我们的医疗保险制度给退休者的激励还不够大，他们没有兴趣关注这些钱去了哪里。医保卡给人的感觉是你正在使用其他人的信用卡，实际上是属于别人孩子的信用卡。经济学家称它存在道德风险问题。你有没有租过车，并且决定在归还之前清洗干净呢？当然没有。事实上，人们对借的车不如对自己的车那样在意，如果是开着借来的车就会敢于在最密集的停车场平行泊车，并且猛踩油门，冲上高速公路的入口坡道。同样，如果医疗保险支付你80%的账单，你可能就会心血来潮，决定顺便拜访一下足病医生的诊所做做足疗。你不会花10美元购买暖脚用的电热垫，而是会花250美元与一位外科整形医生进行交谈。这种动机不是只在医疗保险领域能看到。由雇主支付的健康保险也会导致同样的浪费。兰德公司的一项研究表明，当人们是政策的“免费搭车者”时，他们会在账单里塞进超过45%的附加消费。令人更加吃惊的是，

这些添加的项目并不能让他们更加健康。接受重病特别护理的病人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的花费是在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的两倍，但并没有显示出任何更加有益健康的迹象。[6]不过要注意，对于人们自掏腰包付款的项目，比如眼睛的激光手术以及注射肉毒素和牙齿美白这些美容治疗，随着这些医疗服务的提供者一拥而上，竞争出现了白热化，这些项目的收费会大幅下跌。

政治周期与经济周期的咬合

某些公共选择学派的学者将詹姆斯·布坎南的方法加以详述，并且声称政治人物为了提高他们竞选连任的胜算而操控宏观经济。根据“政治周期”理论拥护者的说法，竞选期间政治人物运用具有通货膨胀性质的政策促使失业率下降。通货膨胀最终会出现，但那只能是发生在选举之后了。经济衰退则会矫正通货膨胀，然后失业率将会被再次降低，以及时赶上下次的选举。虽然许多保守派的理论研究者对这一理论嗤之以鼻，但一位波兰的马克思主义者米哈尔·卡莱茨基在1943年首次提出“政治周期”理论，而且这一理论在尼克松执政时期受到重视。当时货币工具似乎根据民意调查的结果决定，而不是由健全的经济政策来决定。

尼克松看待货币政策的观点是既精明又嘲讽。在他担任总统期间，时任美联储主席是阿瑟·伯恩斯，他爱吸烟斗，衣饰讲究，头发中分，佩带怀表。伯恩斯可不只是外表看上去的那个样子，他也有含金量很高的头衔：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艾森豪威尔的首席经济顾问（担任过一届）和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主席。尼克松对伯恩斯是劝诱加威吓，试图说服他在1972年美国总统选举之前增加货币供给。尼克松将他1960年的总统竞选败给约翰·肯尼迪归咎于萧条的经济，他可不想这样的结果再次发生。当伯恩斯向尼克松汇报说，他已经说服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降低贴现率时，尼克松兴奋地叫道：“太棒了，太棒了……只是在他们的屁股上轻轻踢一下”。尼克松知道货币政策的作用是滞后的。虽然他敦促伯恩斯在大选前1年多就开始刺激经济，但在1972年2月，他告诉美联储主席，“到4月份，我就真的不会在乎你做什么了”。[7]货币供给确实在1971年实现了激增，增幅超过了13%，相比之下，1970年的货币供给只增长了7.4%。经济刺激因素使得大选之年的经济增速突飞猛进，达到了7.7%。不幸的是，通货膨胀很快也会突飞猛进。没有人真的明白是伯恩斯屈服于白宫的压力，还是仅仅因为他误解了经济的需求。但这一事件的确给了我们一个有价值的教训：不要让总统靠近货币政策的操纵杆。

自尼克松和伯恩斯时代以来，有关政治周期的证据逐渐缺乏。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要探讨的那样，快速游走的“债券市场自卫队员”使得中央银行官员和政治人物的共谋变得更加艰难。在服务于老布什领导的美国政府时，我看到财政部长尼古拉斯·布雷迪一路上冒着怒火，越过我的

办公桌，直奔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布雷迪和总统都认为格林斯潘造成了货币供给在1991～1992年的下降。格林斯潘要证明自己完全不受布什总统的左右。他最终降低了贴现率，但为时已晚，帮不了布什什么忙了。1997年，因为宣称英国央行独立于财政大臣，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和财政大臣戈登·布朗为工党建立起了信誉。他们的措施提升了英镑在全球投资者眼中的地位。

公共选择学派的著述每年都在扩充，问题也变得引人入胜。为什么人口在持续增加，而美国国会议员的数量仍然保留在435个席位？哪个国会选区获得的政府拨款最多？竞选捐款如何影响政府的施政纲领？

许多经济学家对公共选择学派持怀疑态度。然而，即使是最激烈的反对者也承认这一事实，即该学派提出了一个最重要的课题：不要想当然地认为，政府在面对政治上的反对时才会在经济上采取审慎的步骤。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20年间编写的经济学教科书指出了市场的不完善，比如市场垄断和环境污染。继而，它们声称市场的不完善可以通过政府行为加以治愈或者避免。然后，它们描述了政府在理论上可能会如何采取行动以确保效率。描述至此结束。公共选择学派理论研究者迫使我们提出疑问：政府会真的尽到它们在理论上的责任吗？或者，政治压力和政治动机会毁坏极好的施政方案？正如市场有其缺陷一样，政府同样也有其不完善之处，我们必须将市场经济的现实结果与政府施政结果的预测加以比较。有太多的教科书将私营经济有瑕疵的看法与政府干净得一擦就吱吱响的观点相比较。最终我们会承认，在华盛顿发出的吱吱响声只能来自于地铁，而不是来自于国会大厦。

凯恩斯对现代政府的定义

尽管思想起源于亚当·斯密、克努特·维克塞尔和其他19世纪的经济学家，公共选择学派却是20世纪晚期的产物。为什么早先的经济学家没有对政治体制提出任何的质疑？特别是，为什么天才如凯恩斯这样的政府干预的倡导者，没有向我们发出政府存在系统缺陷的警告呢？凯恩斯要么在政治上天真幼稚，要么在政治上极其恶毒，或者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推销一个有缺陷的系统，又或者他知道问题的所在，只是避而不谈。通过对他再次察看，我们得以更好地理解公共选择理论在20世纪的独特性。

关于政府的适当角色，凯恩斯简明扼要地指出：“不要去做私人已经在做的事情……而要去做那些目前根本没有人做的事情”，比如，通过增加消费和投资促进完全就业。[8]凯恩斯并不怀有摧毁资本主义的渴望。他认为马克思没有给经济学带来什么贡献，只是为政治学带来了麻烦。然而，他看到了资本主义体系中的缺陷，但他认为这些缺陷是可以通过政府行为而加以修正的。1929年，在其政治和党派色彩非常浓的小册子《劳埃德·乔治能做得到吗》中，凯恩斯热情地催促兴建公共工程，以减轻失业带来的压力，并且猛烈抨击所谓“财政部的观点”，这种观点体现了新古典学派的主张，认为政府开支只会排挤私人投资，而不会创造就业岗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保罗·斯威齐将凯恩斯的方法描述为“一种将国家看作解围之神的做法，每当人类演员按照资本主义的游戏规则举手投足，但却陷入显然无法逃脱的困境时，它都会被祈求显身”。[9]

凯恩斯知道，对政府的“适当”规模进行先验式的判断是愚蠢的。尽管如此，他认为国家必须借助所得税和利率来引导消费。早在1925年，凯恩斯认识到现代国家应当需要新型的行政机关：“我相信，未来的政府将不得不履行过去被规避的许多责任。这些责任是现在的部长和议会所不能胜任的。”[10]凯恩斯认为，这些最终对国家负责的新行政机构会实施或至少影响2/3～3/4的总投资。

凯恩斯几乎不会带着警告出现在读者和听众面前。哈耶克在他《通往奴役之路》中主张，对经济学不断增加的政治介入最终会导致极权主义。在回应这本书的一封信中，凯恩斯坚持认为，“几乎可以确定，我们

想要”更多而不是更少的规划。“计划的制订应当在人数尽可能多的社区里进行，无论是领导人和追随者都要分享你个人的道德立场。如果这些计划的执行在他们自己的头脑和心理是正确地以道德问题为导向的，则稳健的计划是安全的”。[11]但是，至于大众如何能够分辨谁的心理是“被正确导向的”，或者是否大众会更喜好被正确导向的人，而不是选择那些会承诺更多利益的人，凯恩斯没有花多少时间进行解释。

不切实际的政治理想

文化和思想因素能够解释凯恩斯为何缺乏谨慎吗？我们之前对凯恩斯的研究描述了他维多利亚式的教养。牛津大学经济学家和凯恩斯的第一位传记作者罗伊·哈罗德谈到了“哈维路上的预想”，凯恩斯在剑桥大学的家就在这条路上。可是，有时凯恩斯自己都排斥这些预想，他把它们归咎于其他人。这些预想是些什么内容？它们听起来就像是童子军的誓言：经济、道德的健全、公共责任和纪律。凯恩斯相信英国的知识分子一般会遵从这些信条。

然而，对于他自己和以“使徒”著称的剑桥学术精英小集团而言，这些古老的道德规范受到乔治·爱德华·摩尔《伦理学原理》的致命伤害。摩尔是剑桥大学的哲学家，他为凯恩斯和他的精英朋友提供了一种猛烈抨击亚里士多德、耶稣、约翰·穆勒和康德的新信仰。根据摩尔的说法，最高层次的善是一种意识状态，而并非某种特定的行为。凯恩斯对摩尔的思想进行了解读，认为对美好事物的享受和人际交往的需求要高于传统道德行为。凯恩斯承认他们贬低了摩尔（不无讽刺的是，琼·罗宾逊指责现代的凯恩斯主义信徒贬低了凯恩斯），他指出：“我们从摩尔那里得到的不完全是他给我们的……我们接受了摩尔的教条……但摒弃了他的伦理思想。”凯恩斯也承认，他和他的朋友没有看到良好的心理状态和“做善事”之间有多少联系。他们的态度让人回想到贵格会教徒，据说后者来到美国是为了做好事，结果做得很好。这种假冒摩尔的方法显得有些吹毛求疵了。他们是如何知道哪种心理状态是真善美的：如果出现了不同意见，他们通常会得出结论，认为只是有些人已经提高了他们的判断力，“就像有些人能够鉴别出某一年份的波特酒，而其他人却不能”。一般的道德规范是不是曾经约束过他们？没有。“我们拒绝接受全部习以为常的道德、社会习俗和传统智慧。我们是……非道德论者。”[12]或许这可以解释凯恩斯在1905年的那封揭示他对经济学产生兴趣的信：“我想管理一条铁路，或者组建一个信托公司，至少也要骗骗投资的大众。”[13]

1938年，凯恩斯披露，尽管有些遗憾，但他的“信仰”要比任何其他的学说“更接近真理”。问题不在于信仰是好是坏，或者是对摩尔的贬低。真正的问题是，因为接受了提升利己意识状态的信仰，同时他又假

定其他人会愚蠢地抓着濒临消亡的道德不放，而自己却早已从中快乐地脱身而出，凯恩斯不是自相矛盾吗？他要么是一个自认为高人一等的人，假定别人不会看到光明，要不然就是在否定自己。凯恩斯在确认自己属于精英中的一员方面遇到了一点小麻烦，但谁会反对呢？不管怎样，对于假定政治人物和官僚不会像利己行为那样去做以权谋私的事情，凯恩斯没有给出什么解释。

为什么凯恩斯不会担心那些脱缰失控的政治人物和官僚呢？原因主要有两个。首先，凯恩斯似乎对政治学和官僚机构抱持着一种马克斯·韦伯式的看法，即虽然不受康德绝对道德论的约束（即使天塌下来，也要行善），这些政治家仍然要受道德责任的约束，即受结果论的约束（大众的利益就是至高无上的法律）。他无法对为了追求个人所得，而藐视大众利益的结果视而不见。凯恩斯也接受了韦伯对官僚的看法，认为官僚们认真地且不动感情地服从着命令。韦伯说："公务人员的荣耀来自于凭良心执行上级部门命令的能力，就好像这些命令与自己的信念一致一样。"[14]当然，正如韦伯强调的那样，这是一种理想的政治，这样的纯洁不太可能在现实中找到。虽然如此，凯恩斯似乎常常处于一种假设之中：他正在探讨这种理想的政治。

其次，凯恩斯吸收了哈耶克的预想，即政府应当由智力发达的精英来管理，他们会越过愚钝的自利主义，对紧迫的社会议题进行知识渊博的争论（毫无疑问，不会顾及年份波特酒的辩论）。凯恩斯与政府官员、英国央行高级主管和其他英国重要机构领导人的接触经常类似于牛津、剑桥两所大学的联欢会。虽然这些代表不一定是"使徒"的人才，他们却是公益事业十分称职的鼓吹者。难怪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表明："与观念的逐步入侵相比，既得利益集团的权力被极度放大。"[15]但是，凯恩斯从来没有问过这个经典的问题：谁来监管这些监管人？他也没有问过，随着政府规模的扩大，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是否能够培养出足够的使徒、教士和唱诗班男童填充他想象出来的所有职位，并且热诚地传播他们的教义。

考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国的行政机构，凯恩斯对政府的印象或许是合理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只能责备他没有预料到政府官员会自私自利地做事。凯恩斯看到许多政府官员拒绝按照政治上有利的方式采取行动的例子。他一次又一次地看到公务员固守着旧的观念，并且唾弃新的、有吸引力的主张。1925年，英国政府以牺牲就业为代价，重

新恢复了1914年前的黄金平价。几年以后，凯恩斯指责政府拒绝增加公共开支。为什么他们会拒绝？肯定不是因为高失业率让他们更受欢迎、更有权力或更富有。凯恩斯认为，他们有良好的动机，却拥有糟糕的经济理念。本质上讲，政治领袖和公务人员相信经济自由放任的学说，他们就是这样被教导的。最大的障碍来自于人的顽固和惰性，而不是来自于自负的雄心壮志。从凯恩斯在经济大萧条最严重时所写的书信和文章中，他强烈谴责部长们死抱着可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行为准则和标语口号。在经济增长的道路上，站着“几位老而无用的绅士，他们被紧紧地裹在自己的长袍里，只需受到一点点不友善的对待，他们就会像九柱戏（早先的保龄球）的木柱子一样被击倒”。行政机构也会阻碍进步。凯恩斯声称，在建设性的行动中公务员要比部长们更重要。事实上，“在值得做的事中，没有他们的帮助和善意很少能够做成……当今的行政机构由财政学派控制着，这个学派接受的是传统的、经验主义的训练，有着天生的技能以及各种形式的智力发育上的障碍……他们限制着我们的能量，破坏或抛弃我们的想法。”哈耶克和布坎南的农奴制噩梦对凯恩斯来说似乎微不足道，因为部长和公务员们“消磨他们的时间，并不是在为我们打造锁链，而是在寻找貌似有理的借口，不去做那些公众舆论强烈要求他们做的事”。[16]

因此，凯恩斯认为，政府官员在蓄意地逃避任何通过公共开支来增加他们的权力和获得最多选票的机会。他从未触及对未来的权力滥用发出警告这件事，反倒是幽默地宣称，一旦这些长袍裹身的绅士放弃已被赶下神坛的和不起作用的自由放任的经济立场，他们会“极有可能非常地享受……当他们从震惊中缓过神来时”。[17]公共选择学派的支持者声称，他们太喜欢这样做了，而且也是常有的事。

利用其对理性思考的坚定信念，凯恩斯也展示了他的学术素养。如果政治或学术上的反对者不赞成他，他们肯定是想法不正确。他可以说服他们改变思维。凯恩斯承认他的信念过于强烈，而且归因于受到了摩尔的影响。凯恩斯坦承“我们完全误解了人的天性，也包括我们自己的天性。我们所归咎的这种理性不只是把我们引向肤浅的判断，也引向了肤浅的感觉……从理智上讲，我们都属于前弗洛伊德时期……我仍然无可救药地忍受着一种痛苦，那就是将不真实的理性归因于其他人的感觉和行为上（毫无疑问也强加到我自己身上）”。[18]尽管如此，相较于当今理性预期学派的理论研究者，凯恩斯看起来像是一位神秘的印度哲人。

因为他常常相信高尚的动机和理性，凯恩斯几乎总是将糟糕的政策归咎于糟糕的逻辑（或者至少是基于糟糕的逻辑思考习惯，就像前面提到的“老绅士”）。在《凯恩斯文集》中满是指责官员的信件，因为他们实施了愚蠢且不合逻辑的政府计划，但从没有提及他们贪赃枉法和自私自利的举措。他把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强加给德国的紧缩银根的媾和条约称作“严重的政治蠢行”。当财政大臣恢复与黄金价值挂钩的固定汇率制时，凯恩斯质问丘吉尔为什么会“做这种蠢事”，并且责备被错误信息误导了的专家。1928年，在呈送一篇文章的同时，他也给当时的财政大臣丘吉尔发出了一封精练的信件：

亲爱的财政大臣：

你提出的货币法案多么愚蠢。

丘吉尔很客气地回复说，他会认真阅读凯恩斯随信附上的文章。[19]

有时，凯恩斯对那些没有做出正确判断的政府官员十分恼火。当其时，他会指责他们简直是精神错乱，或者绝望地搜寻一个合理的解释。然而，他仍然没有对官员的动机产生怀疑。早在1911年，他在给好友、著名画家邓肯·格兰特的信中写道：“我想，你可能从来没有与政府官员们近距离地打过交道吧。他们很是差劲……他们的蠢行没有人性。”[20]

除了相信理性论述之外，凯恩斯还对说服的力量充满信心。在他的信念中有一条黄金定律，那就是他比其他任何人更能说服别人。这条金科玉律常常表明它是正确的。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凯恩斯就经常向报纸和杂志的编辑发出一连串的信件，其中包括《曼彻斯特卫报》《国家》杂志和伦敦的《泰晤士报》。根据伦敦经济学院的莱昂内尔·罗宾斯的说法，凯恩斯在回答关于废除临时性关税这一难解的议题时说道：“我从没有论及这一问题”。[21]哈耶克常常提及1946年凯恩斯去世前几周与他的一次会面。凯恩斯向他保证，如果他为20世纪30年代设计的理论曾经带来损害的话，他会快速改变舆论。按照哈耶克的说法，凯恩斯相信“他能够像乐器演奏高手玩弄乐器一样，将舆论玩弄于股掌之间”。[22]凯恩斯对其被夸大了的人类理性的假设进行了反省，并仔细考虑了一个“微小但却特别愚蠢的表现……即抗议的冲动，比如向《泰晤士报》写一封信、在市政厅召集会议、向基金捐款……我的行为表现得就像是某些权威机构或标准真的存在，如果喊叫得声音足够大，我就可以成功地

向它们求助，或许这是信奉祷告就有效力的信仰所留下的一些后遗症吧”。[23]

总之，凯恩斯的经验和影响力使他坚信，虽然政治人物和官僚有时顽固不化，并且常常愚昧昏庸，但正如他们认识到的那样，他们是在为大众的利益效劳。此外，他们的错误在于他们的不作为。最终，即使没有头脑，大众也是思想开明的，而且能够被说服采取正确的立场。这些思想观念驱赶着凯恩斯远离了公共选择学派的原则。但如果文化和思想的影响不是决定性的，我们还可以就全盘接受这些想法追究凯恩斯的责任。

政治上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

或许凯恩斯没有怀疑过政治人物和官僚的动机，是因为他暗中觉察到存在着一只政治上的看不见的手，这只手确保了政治上的自利和公共利益之间的重合。例如，一位政治人物可能提倡某个政策，只因为这个政策热门，并且可以带来最多的选票。但是，这个政策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大众准确地认识到它正是人们迫切需要的东西。因此，大众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而他们想要的是有益无害的。政治人物也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尽管他对自己所采取的行动并不太关心。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有一只政治上的看不见的手可能会行得通。如果是这样，凯恩斯在政治上的天真也就无关紧要了，因为政府只是出于信念才轻视公共利益的（按照“财政部”的说法），而不是出于贪婪或者腐败。贪婪只会引导政府官员制定出正确的政策，或者至少是受欢迎的政策。意大利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尼古拉·马基雅弗利重新定义了“美德”这个术语，列奥·施特劳斯认定他为第一位现代政治哲学家。反之，中世纪哲学定义的美德表示的是“道德上的完美”，对于马基雅弗利而言，美德意味着技艺精湛、获得一连串的完美结局，而不顾及正义、慷慨等。24

凡尔赛和会上，凯恩斯在讲述乔治、克列孟梭和威尔逊时提出了“政治上看不见的手”这一议题。很少有书能够生动地描绘如此多变的特征。在凯恩斯看来，世界派了两位艺术大师和一位有德之人来参加峰会。克列孟梭“从美学角度来看是最高尚的”，而且是最坚决地迫切要求有一个来之不易的和平。在理智上最难以捉摸的是乔治，他是一个“威尔士巫师”，是长着山羊脚的半人半兽，他是“从远古的凯尔特人梦魇般的魔法森林中走到我们时代的一个访客”。威尔逊则是一个“长老教会的老糊涂蛋”，然而在道德上最高尚。尽管有如此强烈的反差，这出戏中的每一个角色都受到了激励，就是要按照大众的期许来提高本国的利益。克列孟梭想毁坏德国再次超越法国的实力。乔治想用严厉的条款让英国人民对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威尔逊则想获得一个宽宏大量的和平，这也是美国人非常渴望的结果。遗憾的是，克列孟梭和乔治这两位艺术大师竟然可以说服威尔逊，让他相信严厉的和平并不严厉，而是宽大为怀。最后，凯恩斯指出，乔治明白这个计划太残酷了，但“要让这位老长老教会成员

不感到迷惑比糊弄他还要难……”[25]虽然每一个人都带着完全不同的动机参加此次会议，但克列孟梭和乔治被一只政治上看不见的手所引导，为他们的国家利益服务，正如各自国家的民众所要求的那样。无论如何，那位道德高尚的长老教会成员本应该也做同样的事情。

然而，如果政治上看不见的手失去了控制，凯恩斯的天真态度最终会显示出毁灭性，他可能会因为没有预见到这个致命的失误而受到指责。为什么呢？因为普通的、系统性的力量总是隐藏在失误的背后。它不仅仅是一种让人震惊的、凶神恶煞般的举动。

为什么政治上的私利行为会与大众利益背道而驰呢？随着政府的管制、津贴、关税和拨款计划演变成一个个微型交易，不仅政府的信息成本提高了，而且大众的信息成本也增加了。也就是说，任何想获得公共开支和政策信息的公民必须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收集信息。对于大多数公民来说，这种投资在经济上是非理性的，因为搜集信息的成本超过了给他们带来的收益。某人会花一整天的时间，调查一项给100个人发放100万美元的政府计划。然而，取消或者实施这个计划带给每个人的价值，可能只和一包薯条的价钱差不多。不在这100人之列，而且不进行调查的人可能会理性地加以忽视。因此，政府规模扩张的趋势就是将政治人物的行为与大众对这些行为的认知相分离的趋势。在大众不知情的情况下，政治人物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既会做好事，也会做坏事。不知不觉中，这样的行为就从这只政治上看不见的手的指缝中轻巧而迅速地溜走了。

美国政府对25%的国内生产总值负有责任。此外，联邦机构及其管制也遍布全美。由于有如此多的集团可以有机会接近联邦政府，那么利用政治体系的成本就会急骤下降。不再需要有人站到临时演讲台上去说服大多数同胞行动起来，或说服立法者制定政策，与几位委员的一个社交聚会就把事情办成了。一个洋基体育场的4座包厢比中央公园的一个临时演讲台能够促成更多的事情。

起初，政府各部门和利益集团之间的核查和平衡被期望用来防止出现以权谋私者。美国第4任总统詹姆斯·麦迪逊的《联邦党人文集》第10部分的主张：《宪法》应当让一个通过利用政治体系获取经济利益的派系集团变得无利可图。但是，到处渗透的联邦权力削弱了麦迪逊的方案。

在一个复杂的世界里，这只政治上看不见的手已经失去了控制力。民主制度已经不是自由市场经济的一个明确的政治代名词。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肯尼思·阿罗所告诫的那样，给某个候选人投票并不等同于购买一件产品。经济学家不能设计出一个能够反映市场的符合逻辑的政治体系。[26]在一个民主国家，选民不是在购买某个特殊的商品，比如微波炉，他们是在购买一个组合，他们会按照自己的意愿投票给他们希望能够当选的一个候选人，事实上，投票的这个人并不确定自己会得到什么。

通过提倡大幅增加公共开支和政府干预，凯恩斯间接地削弱了这只政治上看不见的手的力量，却暴露了相信政府官员动机的危险性。在凯恩斯的时代，公共知识和由来已久的规则有助于强化公务人员的良好动机。如果凯恩斯设想对政治权力的滥用加以遏制的话，就必须经过竞选程序，在这个程序中要有一位行政官员必须回答来自对手的指责。[27]这样的检查确实有它的道理。尽管如此，它却忽视了未参加选举的官员不管现行选举任用制度如何都要扩大他们影响的权力，也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抨击一个小的政府计划（基于人均价值）可能不会对醒目的竞选标语有什么助益。

因其“政治上看不见的手”这一隐性假设而引发的对凯恩斯的指责，既来自微观经济的维度，也来自宏观经济的维度。在微观经济方面，当选民的信息成本高于他们因此获得的收益时，政府官员就可以为获得政治私利而扭曲开支计划和管制措施。随着政府计划的扩展，这样的信息成本会增加。而且，当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即人民看不到政府和其他人之间的微观经济交易产生的间接结果所带来的伤害时，他们就会轻视掌握政府行为的信息所带来的益处。在宏观经济方面，公共财政将会对低税收和高政府支出产生偏见，直至选民低估财政和货币政策的间接成本和收益。因为微观经济的弊病而产生的争论可能会更强烈，因为这些弊病的产生更多是靠着理性的忽视，而不是靠着非理性或错觉。

如果公共选择理论是正确的，凯恩斯在政治上就是单纯的。即使公共选择理论只是部分正确，凯恩斯好像对提出的议题仍然视而不见，甚至他的崇拜者哈罗德也承认这一点。[28]然而，基于凯恩斯与英国行政部门周旋的经验和历史背景，我们只能责备他没有在其理论框架中预言政治权力的滥用。此外，对凯恩斯的批评应当小心，要把对他的政治或公共选择的批评与对他经济理论的批评区分开来。将愤怒和不信任的手指

指向政治人物，并不足以表明凯恩斯的经济学是错误的。这就好比是因为消防人员太懒了，以至于舍不得不玩飞镖游戏，你就否定水能将火熄灭一样。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凯恩斯的经济学是正确的，他给了我们可以浇灭经济之火的水。但是，他应该多发出一些警告才是。

第十二章 理性和非理性：一个匪夷所思的现实世界

准备好接受一个听起来确实古怪的理论了吗？一个不相信非自愿性失业的理论，你认为怎么样？一个提倡用掷飞镖的方式选择股票的理论，难道会无趣吗？你觉得一个相信政府既不会太伤害经济，也不会对经济有多大帮助的理论，如何？对于我们本次经济学说史的研究之旅来说，这是多么奇异的一个结尾。一开始我们谈到重商主义者，他们说政府一般是有助于经济的。之后，亚当·斯密的理论称政府有害，而凯恩斯学派则称政府有益。货币主义者说政府有帮助，但常常造成伤害。公共选择学派的经济学家说政府常常有害。现在，理性预期学派（或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学家则嘲笑他们的所有前辈，并且声称政府干预是一种幻觉，就像是魔术师的戏法一样，无法改变很多现实问题。

为了得出这一惊人的结论，新古典经济学家运用了一些复杂的逻辑。然而，当他们完成研究后，他们得到了一个一目了然的模型，让人不禁赞叹其理论之美。不过，批评家对这个原始却不切实际的模型不屑一顾，认为它更适合于放在画廊里展示，而不是进入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

詹姆斯·托宾、弗兰科·莫迪利安尼、萨缪尔森和弗里德曼等经济学家中的保守派发现，他们毕生的心血正在被那些后起之秀所轻视。这些新人的崛起可以追溯到卡内基理工学院年轻的教授约翰·穆斯在1961年写的一篇论文。朝气蓬勃的理性预期思潮对相当一部分年轻学者产生了吸引力，让他们陶醉在理性预期精确的数学推算和有机会获得新发现的喜悦之中。凯恩斯学派开始担心，就像他们50年前超越拒绝接受凯恩斯的古典学派的学者一样，新学者会将他们抛在后面。主流经济学面对的挑战就是要从理性预期理论中挖掘出少许真理，然后再将它们掺和到主流经济理论中去。

让我们找出为什么没有人完全摒弃理性预期理论的原因所在。它的第一个信条叫作“所有的市场会出清”（供求均衡），意思是说价格总是同步调整，以消除任何的过剩（超额供给）或短缺（超额需求），供过

于求的状况不会存在。如果一条鱼产了太多的鱼子，那鱼子酱的价格就会下降。如果对劳动力的需求减少，工资就会迅速下降。现在，大多数经济学家同意市场最终会出清，但是货币主义者和凯恩斯学派则考虑到在市场出清之前，会有一个较长的过渡期。凯恩斯学派提出黏性工资来说明问题，货币主义者则提出货币政策的传导时滞作为证明。少壮派激进分子说这是在胡扯。

第二个信条，理性预期学派主张，在市场经济决策中人们会考虑所有可能得到的信息，并且持续升级他们的模型，更新他们的预期。将传统的适应性预期与理性预期作一比较吧。如果人们按照适应性预期采取行动的话，他们会盯着经济变量在过去的表现，并且只是逐渐地调整对前景的看法。如果在过去几年里价格每年上涨6%，只不过今年上涨了10%，依据适应性预期模型，人们可能会预计下一年的价格要上涨7%，适应性预期模型着重强调的是以往的数据。他们等待着经验来对他们当头棒喝，而不是基于新的信息改变他们的预期。假如听到联邦政府要采用疯狂的扩张政策，放弃对货币供给和财政支出的控制，他们将会怎么样呢？根据适应性预期理论，在看到确凿的证据之前，他们不会改变自己的预期。

假设卡通人物大笨狼怀尔在好莱坞大街和葡萄藤大街的拐角处等公交车回家。过去的经验告诉他，每天下午5点30分要站在离开公交车站两步远的地方，因为每天那个时候都会有一个5吨重的铁砧意外地从巅峰铁砧公司50层楼高的屋顶上掉落下来。有一天，怀尔狼在拐角等车。铁砧晚掉落了15分钟，在5点45分把他压扁了。如果怀尔狼的预期是适应性的，在第二天的5点45分，他会做什么？他会再次站在公交车站，想着铁砧很少会在下午5点45分掉落下来。他又被压扁了。最后，在有了一周之内天天被压扁的经历之后（因为这样的情节只能发生在卡通人物身上），他可能会明白过来：巅峰公司铁砧掉落的时间表已经改变了。

如果怀尔狼的预期是理性的，情况又会如何呢？在第一次被击打之后，一旦从扁平状态恢复原形，他会走到巅峰公司一探究竟。他会重新制订自己的时间表。如果新的信息导致旧信息过时，他会把过去的数据舍弃。

约翰·穆斯是一个腼腆的、笨手笨脚的男人，却创立了理性预期理论，他在美国中西部长大，因为猪而建立起个人声誉。通过研究猪，穆

斯从头开始学习经济学，并且似乎对他某些同事获得的荣誉从来不感兴趣，这些光彩照人的同事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赫伯特·西蒙、弗兰科·莫迪利安尼、默顿·米勒，以及书籍和电影《美丽心灵》男主角的原型约翰·纳什。莫迪利安尼赞赏穆斯的头脑，但也说过这个留有胡子、略微驼背的研究者"煞费苦心地表现得像个怪人"。[1]有一次，当他还在印第安纳大学商学院当老师时，他的工商管理班的学生径直闯入院长办公室，挥舞着请愿书，要求学院炒穆斯的鱿鱼，因为他那高超但令人费解的数学搞得他们一头雾水。

到底为什么猪会与经济学扯到一起呢？在穆斯为世人所知之前，大多数人相信猪的市场经历了野蛮的、非理性的兴衰。当咸猪肉价高时，每一个农夫的反应似乎就是多养猪。然后，所有的猪会同时乱窜涌入市场，导致咸猪肉的价格大幅跌落。面对较低的价格，部分农夫会停止养猪，这会再次导致猪肉短缺和咸猪肉价格的上涨。对此，穆斯得出的结论是"一派胡言"。他搜集了猪肉价格的数据，并且证明了养猪户不会愚蠢到相信假若今天猪肉的价高就一定会保证明天的价格也高。[2]穆斯说，农夫是理性的，从而反驳了约翰·加尔布雷思关于农夫是身体强壮却头脑简单的观点。

如果人们拥有理性预期，他们就不会犯系统性的错误。他们可能会被愚弄一回或受一次惊吓，但会努力防止第二次犯错。正如电影《星际迷航》中的工程师斯科蒂说的，"耍我一次，无耻的是你；骗我两次，丢脸的是我。"

股票经纪人应当去做管道工

股票市场为理性预期提供了最具说服力的证据。学院派的经济学家指出，股票市场几乎是即时吸收信息的。换句话说，一旦信息被公开，股票价格就会立即做出反应。如果你在昨天的报纸上读到“西尔斯百货公司预计会有一个好年景”，那你就知道得太晚了，已经失去了利用这一信息的良机。西尔斯公司的股价会基于对前景的看好而立即上涨，所有人都知道的信息也就没有什么用处了。现举另外一个例子，假如你聪明地观察到在感恩节前有数百万的大学生会从波士顿涌向纽约，你又发现凯帝航空公司会是这些学生的首选。在感恩节购物狂潮前两个月，也就是9月份，你购买了凯帝公司的股票，期盼着到11月份股价会扶摇直上，这真是愚蠢的举动。凯帝公司的股价已经反映了感恩节期间的利润预期。每个人都知道感恩节是凯帝公司的良机，其股价是基于预期的利润和分红决定的，而不单单是依据现在财务报表上的数据。

如果这个叫作有效市场假说的模型是对的，你就无法通过认真地跟踪公司运营、阅读财务收益报告，或者回溯过去股价的运动轨迹来获得平均水平以上的股票收益。市场已经有效地估计到了未来的回报，股票价值不会被“高估”或“低估”（除非差不多所有的人都误解了公司的某些特征，或是还有尚未披露的信息）。市场价格变成一个绝对可靠的信号，直到新的信息证明一个新的价格的合理性。（但是，1987年10月股市崩盘和2000～2002年科技股的价格暴跌或许表明，原始的“动物本能”仍然潜伏在股票经纪人整洁的白衬衫之下。）

你可能既会相信股票经纪人用扔飞镖的方式来随机选定股票，也会听从他的建议，那你要发财了。这里有一个符合有效市场假设的做法，因为著名的股票顾问也会这么做：在你的狗面前放两只狗食碗，其中一只碗的正面粘着IBM的名字，另一只碗则粘着美孚的名字。你的宠物狗朝着哪只碗走去，你就购买哪个公司的股票。如果你的狗狗不饿，那就把你的钱投到公司债券基金中去吧。

20世纪90年代的牛市将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从1993年的3500点推高到2000年1月的11700点，这让基金经理们个个灰头土脸，因为被动型“指数”基金的表现抢了几乎所有专业荐股人的风头。等到人们支付广

告费、研究成本和佣金时，绝大多数共同基金的收益比稍大点的飞镖靶还要小。保罗·萨缪尔森很早之前就建议“多数投资组合的经纪人不应当再从事投资行业了，而应当改行去修水管、教希腊语……”当然，根据有效市场假说，一个不称职的投资组合经理不会把绩效搞糟到哪里去（因为比掷飞镖选股票的人表现得更差劲的话，那得需要无能到白痴的程度才行），然而一个不称职的管道工却可以造成某些实质性的损害。

大量的股票经纪人和财经公关人士极力吹嘘自己预测的准确性。若加以细心研究，你就会发现没有什么理由相信他们的话。[3]的确，有些人可能会有走运的时候。但美国拉斯维加斯的赌客有时也会赌运当头。关键不在于经纪人常常赔钱，而在于他们不能始终如一地战胜股价的平均涨跌。即使当某些超级明星分析师发现了一种看盘解盘的制胜方法，其他人很快就会跟进，这种方法就不再适用了。因此，为什么要支付额外的佣金和财务顾问费，却只能得到平均的收益呢？你也可以购买一个足够分散的投资组合来分摊各种风险，或者投资一只指数基金，随着市场平均水平浮动。

包括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和托马斯·萨金特在内，理性预期学派的理论研究者都声称政府对于市场没有多少影响力。他们从股票市场开始分析，然后再类推到更加广泛的市场经济。如果政府试图通过购买凯帝航空公司的股票使其股价暂时上扬，结果会怎么样呢？初始股价代表的是目前对未来获利和分红的“正确”感觉，未来的收益会给予一个合理的回报率。如果政府购买股票并且抬高了股价，持股人会立即感到股票价格被人为地高估了，他们就会卖出股票。如果政府抛售股票迫使股价大跌，投资者感觉这只股票理应价格更高，他们会买进股票。到最后，无论政府怎么做，价格都会回归到其“正确的”价值，除非有新信息让投资者确信一个新的股价是有其道理的。

在将类推应用于宏观经济之前，让我们仔细观察两个重点。首先，要注意的是，有效市场假说不包括公司管理层可能掌握的内幕消息和未来盈亏的机密。了解未公开信息的投资者会得到高于平均收益的回报。这似乎合乎逻辑，却不公平。在董事会中没有席位的可怜的倒霉蛋不会与内部人获得同样的收益。基于这个原因，内部人交易是违法的。证券交易委员会负责监督内部交易，并对非法交易进行处罚，包括判刑和“吐出”非法所得。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非法交易者都会被逮到，法律也不会监控到每一个拥有内部消息的人。

假设菲都公司暗中计划通过购买股票的方式收购斯波特公司。菲都公司的经理人将更加有效地运营斯波特公司，如此一来，就会提升斯波特公司的资产价值。出于这个原因，菲都公司愿意为其股票支付一个较高的价格，而斯波特公司那些出售股票的股东会大赚一笔。接管计划是秘密进行的，只有菲都公司的总裁和副总裁与他们的律师知道此事。很自然地，如果菲都公司的管理者在收购意图被公布之前购买斯波特公司股票的话，他们会因为内部交易而遭到逮捕。如果即将公布的文件在印刷厂里印刷，而印刷厂里的员工在信息发布之前购买了斯波特公司的股票，情况会有什么不同吗？他会被认定为内部人并受到处罚吗？根据最高法院的判例，他是无罪的。

不无讽刺的是，当最高法院宣判无罪的印刷工人文森特·基亚雷拉被问及伊万·博斯基是否应该受到惩罚时，他回答说：应该给他最重的惩罚，几年之后，伊万以内部人交易的罪名获刑。[4]

关于有效市场假说的第二个重点是提出了另外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事实。因为有太多的人从事个股研究和股市分析，选择股票是不起作用的。当前的价格已经“正确地”反映了预期，因为很多人根据可获得的信息在卖出和买进股票。你没有多少机会持续地以优于别人的方式来解读信息。然而，如果除了你之外没有人研究，你所做出的预测就会比随机选择的方法更好。因此，如果每个人都听从这个劝告，那有效市场假说信仰者的随机选择股票的劝告就成了废话！

因华尔街而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

直到最近，华尔街的经理人和经济学家仍然认为彼此之间话不投机半句多。毕竟，像萨缪尔森这样的经济学家正在给投资组合的经理人大泼冷水，叫他们去做管道工。当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伯顿·马尔基尔写了一本支持有效市场假说的书《漫步华尔街》时，华尔街的“天之骄子”们则叫经济学家哪里凉快哪里歇着去。权威人士则回应说，学者们只是太胆小了，不敢在金融市场上一赌输赢。即便除了凯恩斯之外的大部分经济学家有胆量掷骰子，他们也不会赢钱。

当某些经济学家嘲笑华尔街选股机制的能力时，其他的经济学家正在构想创新性的方法来设计投资组合，并赋予一个公司及其股票期权一定的价值。这些是极其困难的技术性挑战，需要高深的数学和经济学知识。可是，对于研究者来说，问题是在20世纪60、70年代没有哪个单一的学科需要这样的人才。经济学家认为他们的工作技术性太强，而数学家认为他们的研究太世俗化。不管怎样，1990年诺贝尔奖委员会还是将经济学奖授予三位开拓性的金融经济学家，实际上，他们三人是在寻求帮助华尔街，而不是将它撕成碎片。

1952年，一位叫作哈里·马科维茨的年轻研究生发表了一篇论文，题目为《投资组合选择》，从此开启了一场金融理论革命。该论文为“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这句简单的格言建立起一个分析框架。乍一看，这个道理似乎太明显不过了，以至于你可能要赞同将诺贝尔奖颁给传说中的英国童谣集作者鹅妈妈或是写寓言的伊索的后人了。500年前，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告诉我们的是：

> 我的买卖并没有寄托在一只船上，
> 也并非是到一个地方去；
> 我的全部财产也不是，
> 完全靠今年的运气，
> 所以，我的货物不会让我难过的。

但是，在马科维茨将其精力倾注其上之前，这种民间智慧不过是主妇间流传的故事，或是一个经验法则。事实上，伟大的凯恩斯拒绝这个概念，主张在一个你熟知的公司投入大本钱要比进行许多较小的投资更安全。马科维茨并没有简单地证明多就是好，即不是包含5家航空公司股票的投资组合会更安全。他证明的是股票的种类应该多样化。你的投资应该是真正的多样化，即互相之间不关联。拥有全美航空公司和美国强生公司的股票要胜过拥有两家航空公司或两家制药公司的股票。尽管开始时有所怀疑，华尔街遵循马科维茨的教导已经30多年了。

然而，要做一个开路先锋并不容易。马科维茨讲述了当他必须要为自己的研究生论文进行答辩时，米尔顿·弗里德曼是如何折磨他的。马科维茨一直在提醒自己："我知道这种待遇不会太友好，但即便是米尔顿·弗里德曼也难为不了我。"然而，在他进入答辩程序几分钟之后，弗里德曼就大声叫道："哈里，我看不出你论文里的数学有任何错误，但我有一个问题。这不是经济学的论文，我不能因为它而给你经济学博士学位。它不是数学，也不是经济学，更不是工商管理。"接着，其他人也说出了同样的抱怨。马科维茨坐在走廊里等待答辩委员会的决定。几分钟之后，一位资深教授走进过道，注视着他的眼睛说道："恭喜，马科维茨博士！"[5]

1990年，与马科维茨同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是斯坦福大学的威廉·夏普和芝加哥大学的默顿·米勒。夏普设计了资产定价模型，在每一本公司财务教科书中，这个模型以及β值的概念至少要占用一章的篇幅。β值用于帮助投资者计算出一只特定股票的风险程度会有多少。尤其是，β值会告诉你一只股票是否会随着整个股票市场同步涨跌。拥有嘉年华游轮的嘉年华公司的β值为1.0，它表示，如果纽约股票交易市场上涨10%，嘉年华公司的股价也可能会上升10%。言之有理，因为市场的强劲标志着经济的强劲，如果人们感觉自己更富有，他们就有钱乘坐嘉年华游轮。其他种类的股票可能β值较低。即使经济前景糟糕，人们还是会继续购买糖果。所以，毫不奇怪，土特希卷的β值较低，只有0.69，它意味着如果整个市场下跌10%，生产这种可可软糖的公司只会下跌6.9%。当人们指望着将他们的投资组合多样化时，他们要留心β值的分布，确保他们所有的股票不会一起上涨或下跌。

默顿·米勒通过研究公司组织方式而赢得声誉。在米勒和弗兰科·莫迪利安尼（198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共同研究之前，许多公司的财

务主管认为，如果通过发行更多的债券且发售较少的股份来为运营融资的话，他们的公司得到的利润会更高，因为这种方式将会有更少的股东来与他们分享利润。然而，米勒和莫迪利安尼证明，无论你如何分割公司的所有权，公司的总价值取决于未来的收益。举例来说，如果公司负债累累（发行了大量债券），借款方会要求支付较高的利息，这会抵消发行较少股份所带来的收益。[6]

米勒首先用一桶全脂牛奶作了一个生动的比喻。奶农可以将奶油单独出售，这会得到一个较高的价格。不过，他可就只剩下脱脂牛奶了，它的卖价就低了。奶油加上脱脂牛奶带来的总体收益，会与全脂牛奶带来的收益一样多。不管你怎么搅和，一桶牛奶就是一桶牛奶。同样地，不管你把利润分配给谁，公司的利润流就是利润流。

利用在经济学上受到的教育，3位1990年的诺贝尔奖得主集中研究金融市场，从而充实了华尔街，而他们自己也并没有（像流行观点认为的那样）做得很糟糕！夏普和米勒曾经为华尔街上的许多一流公司做过咨询。颇负盛名的共同基金先锋集团董事长约翰·博格尔告诫投资者不要忽视经济学家：“虽然在学术知识中有大量难解的‘巫师符咒’……虽然既复杂又深奥，但最严肃认真的学术思考……将会被应用到实战当中，也会应用到投资市场。”[7]

唉，就算是诺贝尔奖得主也必须懂得谦虚。由于对金融衍生品定价的研究，罗伯特·默顿和迈伦·斯科尔斯赢得了199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加入了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这是一家有宏图大志的投资公司。1998年8月，他们的基金破产，造成全球金融市场的一片混乱。该公司不计后果地借了太多的钱，并且押下巨额赌注，赌世界各地的利率将会越来越接近。他们错了，欠下几十亿美元的债务。事实证明，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终究还是没能活得长久，几天之内就赔光了所有的资本。我们可以归咎于默顿和斯科尔斯获得的诺贝尔奖吗？可以。毕竟，大量借款给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银行对如此卓越的人士和他们优秀的合伙人充满了信心，认为他们不会误判风险。爱因斯坦可能算是拥有20世纪最伟大科学头脑的人了，但你可能不会想要他为你更换汽车散热器冷却液吧。同样道理，他们获得了诺贝尔奖，但并不表示你就应该把你的钱交给他们管理。

锋芒毕露的理性预期理论

在就理性预期理论进行辩论之前，让我们先理解其在宏观经济中的重要意义。请记住，理性行为人会持续地更新他们的经济模型。因此，理性预期给我们上的第一堂课是：计量经济模型过时了，因为它们建立在以往数据的基础上，统计模型也不能预测政府新政策的实施效果。例如，如果政府发现在棒球赛和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存在一个稳定的、历史性的关系，因此尝试通过增加棒球赛的次数来提高国内生产总值，经济行为人会把这一政策看作新的信息，继而改善他们的模型。因此，他们过去的行为无法为新政策的建立提供良好的基础。这被称为“卢卡斯的批判”。[8]卢卡斯是芝加哥大学的教授，事实证明他是讲授理性预期再合适不过的老师。当位于斯德哥尔摩的诺贝尔奖委员会在1995年10月宣布他获奖的消息时，他前妻的律师透露，她早就预见到他获奖的可能。早在7年以前，她就在他俩的离婚协议中添加了一个条款，如果卢卡斯得奖，她将有权索要半数的奖金。她根据理性预期添加的这一条款价值50万美元。

遵循卢卡斯的批判，罗伯特·霍尔指出，依赖过去的收入、财富、利率和通货膨胀率建立起来的主流消费模型无法预测未来，这一点与只有两个因素（前一年的消费和随机变量）的简单模型是一样的。霍尔认为，下一年和今年的消费水平之间的不同只能用随机的出人意料来解释，即新信息的出现。[9]

理性预期的第二堂课是将政府的稳定政策视为垃圾：只有政策出人意料才会有效果。假设经济陷入以高失业率为标志的严重衰退中。主流经济学家可能会主张实行扩张政策。根据多数经济学家的看法，较高的总需求会导致较高的产出和更多的用工招聘，促使经济从低谷中爬出来。

在理性预期理论研究者看来，事情并不是这样的。他们认为，行为人知道联邦政府总是会紧急行动起来，通过扩大内需来挽救衰退。因此，厂商仅仅会提高价格，而不是任由他们的价格在衰退期间下跌或是增加产出。他们能够预料到政府将要采取的政策。因为较高的需求即将来临，他们已经知道不需要让价格在衰退期间下跌。这就好比是政府通

过一项法律，只要失业率达到7%，美联储就会踩下货币供给的油门。作为支持他们主张的一个证据，理性预期理论研究者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经济衰退时期物价都是下跌的，而在战后的经济衰退时期，因对需求方的反应有所预期，物价较为稳定。保证最大就业率的《1946年就业法案》差不多是在通知厂商，“山姆大叔”总会前来救援的。总而言之，如果“山姆大叔”做了人们预料之中的事，结果等于他什么都没做。只有出人意料的举动才会对产出水平产生影响。

想象一下理性预期理论让凯恩斯学派和货币学派感到多么震惊。因为这个理论让他们的政策建议显得毫无价值，就像喜剧女演员格蕾西·艾伦要求解决加利福尼亚州和佛罗里达州边界争端的提议一样荒唐。

还有让人震惊的。如果理性预期理论是正确的，美联储会发现轻而易举就可以降低通货膨胀率。为什么呢？根据主流经济学的方法，紧缩政策首先会造成经济衰退，并且最终减轻通货膨胀。然而，按照理性预期的理论，如果信守承诺的美联储宣布货币供给的增长率为零，人们将自动地预期会有较低的物价，他们的工资也会降低，而且基于美联储的政策，人们会自动地接受一个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因为他们不是适应性预期，也就不需要在调低对价格的预期之前先经历一段让人揪心的经济衰退。

既然理性预期理论已经彻底羞辱了凯恩斯学派和货币学派，我们再简略地看看他们射向公共选择学派经济学家的那支带刺的利箭。詹姆斯·布坎南坚持认为，政客们鼓励赤字开支，是对我们后代的掠夺。另一位公共选择学派经济学家布鲁诺·弗雷则主张政治周期存在于民主国家，为了赢得选举，政客们不惜操纵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

这两项主张与理性预期理论冲突。首先了解一下政治周期，假设政客们为了提高赢得选举的胜算而试图玩弄政策工具。根据理性预期学派的观点，选民会在政客第一次试图耍花招后看透他们，人们会琢磨出：选举之年的经济繁荣预示着高通货膨胀。因为明白了政府会在选举之后很快踩下货币供给的刹车踏板，他们会采取毁掉这种虚假繁荣的行动。这种解释有道理，它可能还可以解释为什么政治周期理论没有获得十分有力的证据支持。至于持续性的预算赤字，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罗伯特·巴罗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指出：投资者和储蓄者会把对未来的预期计入长期利率。[10]较高的长期利率一定会影响目前的经济表现。因此，未来的抱负和预期实际上已经在当今的资本市场上反映出来了。巴罗的主张

实际上源自李嘉图，李嘉图注意到发行公债和征税的效果十分相似，因为理性的人们知道公债肯定有偿还的那一天，而且方法是提高税收。因此，为财政支出融资的政府债券改变了人们对于税收的未来预期。布坎南做出了回应，因为他注意到，即使我们的后代在债券市场上可以间接地表达自己的心声，但他们没有政治发言权。毕竟，布坎南将这一议题既看成一个道德问题，也看成一个经济问题。

顺便说一句，理性预期理论研究者能够搜集到人们看穿政客在选举时耍弄花招的证据。想想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玛格丽特·撒切尔，她信誓旦旦要削减英国的预算赤字，甚至为了兑现承诺，她不惜在经济衰退期间增加税收。她再次赢得选举，是否说明英国人理解且拒绝了老工党随心所欲的政策呢？

在现实世界中，理性预期学派的教授们得到了“债券市场自卫队员”的帮助。这个听起来声名狼藉的群体是些什么人？他们并不带枪，也不带刀，却让一个国家的财政部长心惊肉跳。债券市场自卫队员是些交易商和投资商，基于对国家经济的表现和展望的了解，他们买卖政府债券。他们在惩戒政府方面大有作为。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债券经纪人和外汇交易商盯上了瑞典，他们看到其经济薄弱、贸易赤字庞大、政府机构臃肿，而且货币坚挺使得瑞典的出口商无力与外商展开竞争。几年之后，瑞典的公共债务增加了1倍，赤字以10倍的速度增加。瑞典正在摇摇欲坠。自卫队的交易商们预见到了这个国家正在向着未来飞奔，只不过这是一个没有能力偿付债务的未来。[11]瑞典大型金融企业斯堪地亚公司宣布：“鉴于创纪录的预算赤字和快速增加的债务，它正考虑拒绝购买政府债券。”[12]瑞典之外的债券经纪人和外汇交易商开始低价抛售瑞典资产，迫使利率上升，并且威胁瑞典政府对其金融体系进行重组。面对如此众多具有前瞻性的交易商，瑞典政府大幅削减财政赤字，从1994年令人难以置信的12%（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降到1997年的2.6%，到1999年出现了真正的财政盈余。自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瑞典看起来就像是国际市场上的一个凶狠的竞争者。虽然有些不太情愿，但这还是要归功于债券市场的那些自卫队员们。

预期模型失效了

最后，该是回击理性预期理论的时候了，也理应对它大加挞伐。理性预期就是个自命不凡的新贵，几乎每一位经济学家都受到了它的羞辱。我们首先探讨一些理论性的难题，之后转入真实的经济事件。

理性预期理论研究者可能是咄咄逼人，让与他们争论的人倍感沮丧的一群人。就像伊斯兰教基本教义什叶派一样，他们对任何问题都有一个直截了当且坚定的回答。他们的著作中包含了许多捉摸不定的假设，比如立即调整市场和吸收信息的超级能力。如果我们认同这些假设，理性预期理论似乎就固若金汤了。我们又该从哪里下手攻击呢？要推翻一个经济模型，我们只是嘲笑它那不切实际的假设可不行。正如米尔顿·弗里德曼（追随奥地利哲学家卡尔·波佩尔）指出的那样，对一个经济模型真正的考验在于它的预测，而不在于对真实经济所作的严谨而又忠实的描述。[13]

理性预期理论预言，政府的宽松政策不会起到刺激经济的作用，政府的紧缩政策也不会伤害到经济。我们从后者开始谈起。1982年10.6%的失业率听起来感觉如何？紧跟在1980年和1981年的货币紧缩政策之后，经济骤然陷入衰退。紧随着1975年相似的财政紧缩之后，经济也同样滑坡。这两个时期都利用了极高的失业率才将通货膨胀的预期压下来。卢卡斯和他的支持者可能会把货币崩溃当成一个“意外”来作为回应。他们可能会问：“谁知道美联储是不是能够坚持其紧缩银根的打算呢？”尽管有这样的反驳，在人们调整他们的通货膨胀预期之前，的确经历了好几个漫长而又令人沮丧的财年。如果理性预期理论总是将每一个经济事件都称为一个意外的话，它就成了一个“中看不中吃”的空心萝卜。

你认为政府刺激经济，会怎么样？如果理性预期理论研究者是正确的，减税政策在实施时就不会影响到消费水平。一旦减税的法案签署，即便是几年之后才会实施，人们也会调整他们的消费开支。但是，肯尼迪和里根在宣布减税时，却显示消费稳定，在政策实施之后消费才开始增加。普林斯顿大学的艾伦·布林德是一位凯恩斯学派的成员，他发现理性预期学派的理论研究者对财政政策的这种奚落特别烦人：“有一次巴罗

对我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财政政策是有效的。只要睁眼看看减税和增加政府支出的这一幕幕‘活话剧’你就知道了。你觉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如何？它可是对产出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布林德对市场总能出清这个主张，也进行了激烈的批评：“这也一定是荒谬的。不知怎么搞的，有些人能够睁眼看世界，却对非自愿性失业视而不见。在周期性的低迷时期，我认为我看见到处都是非自愿性失业的人。我也认为我看见遍地都是卖不出去的商品，比如一辆辆汽车。”[14]理性预期学派的捍卫者能一本正经地将大萧条归咎于长达12年出其不意的“新”信息吗？

为什么在谈论股票市场时，多数经济学家倾向于同意理性预期学派，而当论及宏观经济学时却又爆发争议呢？事实在于，股票市场比其他的市场更有效率，它具有良好的流动性，股民可以很容易地买进和卖出，交易成本很低。一个投资者甚至可以利用收取贴现佣金的股票经纪人来处理他或她的交易。相比之下，商品和服务的实体市场则显得更复杂和更死板。你可以像卖出股票一样容易地辞职吗？一个公司能像买卖股票那样快速和容易地解雇员工、关闭工厂或新建厂房吗？当然不行。

在真实的市场上，合同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它们提高了劳动力、资本和设备在名义价格上的稳定性。但是，它们却降低了流动性和灵活性。即使凯帝航空公司预期工资会下降，它可能也会因受到3年劳动合同的约束而维持员工的工资不变。即便这个公司的经理是理性预期的人，合同也会把他们禁锢到适应性预期的路径之上。批评理性预期的人实际上就问了两个问题：人们拥有理性预期，却没有长期保持的习惯吗？即使有持久保持的习惯，他们会按照心里所想的那样机敏地采取行动吗？如果两个答案都是否定的，理性预期理论则是对经济进行了错误的描绘。

行为经济学帮我们做出理性的选择

心理学家也急切地想将理性预期学派“毁尸灭迹”。相信你一定能够理解心理学家要凑这份热闹的那种急不可耐的心情。毕竟，如果人们是完全理性的，你就不需要如此多的心理学家了。怀着对理性的极大信心，德国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确实建议过患有精神疾病的人应当接受心理学家的辅导。精神病人的推理能力很差。因此，逻辑性和推理能力强的专家会给他们提供最大的帮助。自康德那个时代以来，我们已经了解，当人们产生妄想以至于不能清晰地推理时，他们可能会有严重的情绪障碍，或者体内出现化学物质的失衡。让精神病人与康德或笛卡儿同处一室可能会让哲学家发疯，而不是哲学家帮助了病人。就像康德过分强调思考的能力一样，某些经济学家也会犯过分强调理性预期的错误。假设你正在购买一个新款照相机，而且发现ABC商店所卖的款式和XYZ商店一模一样，但ABC商店标价200美元，比XYZ商店便宜10美元。多数人会为了省下10美元而多开车1公里。现在假设你正在购买一辆新车，发现ABC特许经销商的标价是30080美元，比XYZ特许经销商的标价贵了10美元。多数人会忽略这个价格的差异。但是，10美元就是10美元，心理学家指出：为什么便宜10美元的相机会吸引你开车多绕一个街区去买？而便宜10美元的汽车，却不会对你的购买决策产生任何影响？

20世纪50年代，两位以色列的研究人员在服役期间开始发展自己的思想，并在访谈和真实体验的基础上编辑了一本非理性经济行为的百科全书。几十年前，198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丹尼尔·卡尼曼为以色列的部队设计了一套心理筛选测试，他和阿莫斯·特沃斯基共同证明了人们会从规避风险快速地转变成追求风险。在与以色列战斗机飞行员教练一起工作时，他们开始发展自己的理论。下面的例子是一个古怪但却普遍的经济理念：一项调查显示，人们宁可让通货膨胀率提高，也不允许失业率从5%增加到10%。然而，如果问题反过来问，他们是否喜欢较高的通货膨胀率，而不愿意让就业率从95%下降到90%呢？他们的回答是“不愿意”。[15]两个选择实质上是一样的，只是问法不同。

同样地，另外问一个实验参与者：他们更倾向于以何种方式与疾病的突然蔓延作斗争？A计划可以拯救200人，B计划有1/3的机会拯救600人和2/3的机会连一个人也救不了。72%的调查对象看重A计划的确定

性。人们喜欢确定性。行为经济学家发现，人们厌恶损失，有时人们会因此惊愕地站在原地。即使当股票市场投资者被警告说更大的损失会来到时，他们也厌恶在损失较小的价位上抛售他们的股票。他们可能在感情上对他们的股票、他们的家和他们的工作产生了眷恋。[16]

特沃斯基是一个谦虚的人，他死于1996年，他说过他所观察的事情是所有二手车销售员和广告人都已经知道的。如何从语义或数学上对问题加以设计，则决定着你的书会成为畅销书还是滞销书。1988年，特沃斯基登上了报纸头版，因为他对费城76人队过去一年半里每次投篮得分进行了仔细观察，发现投中一球的队员下次投篮入筐的概率不会更大，从而证明篮球界“手感很热”的说法不成立。关于特沃斯基和决策再说最后一段话。特沃斯基是一位真正的战斗英雄，1956年时他才19岁，担任中尉，当时有一名年轻士兵在带刺的铁丝网下面安放了一枚手榴弹，之后他就“僵”在了那里，确切地说，是躺在了爆炸点的上方动弹不得。明知手榴弹要在几秒之内爆炸，未来的风险专家特沃斯基还是跑向这个年轻人，就在手榴弹爆炸的时候抓起他的身体把他扔到了安全的地方，而特沃斯基被炸伤。因此，以色列政府将最高的荣誉勋章颁发给他。

理查德·塞勒现为芝加哥大学教授，他用了好几年的时间在《经济展望杂志》上发表描述经济异常现象的文章，该杂志开始举办许多课堂讨论和教授讨论会。但当诺贝尔奖委员会将2002年的经济学奖颁给卡尼曼之后，行为经济学立即变成了明星课题，吸引了更多的研究生和企业赞助人。一个关键话题是“跨期选择”，它描述的是人们如何评价未来。行为经济学家指出，人们不太重视未来。他们想要及时的满足，这种需求导致他们对退休储蓄的缩水和腰围的增大并不在意。行为经济学家指出，大约1/3的美国工人会忽视他们公司的401（k）退休养老计划，他们中的许多人也就不能从中受益，因为（如果他们参加该计划的话），公司会向他们的账户相应缴纳与他们自己所缴同样多的钱。利用行为经济学家的研究，2006年，经国会批准，并经小布什总统签署，一部新法生效，该法使得公司建立自动登记加入401（k）计划的机制更加容易。以前，工人必须要主动选择参加。现在，符合条件的工人会被自动登记加入，除非他们主动选择退出。理性预期思想家并没有花很多的时间担心人们的惰性，而行为经济学家则对它忧心忡忡。

跨期选择确实能把人弄糊涂。哈佛大学行为经济学家戴维·莱布森曾经说过，如果你问人们他们今天想要巧克力还是水果，他们会说“巧克

力”。但是，如果你问他们下周要预订什么时，他们的回答是“水果”。[17]今天我们会在海滩上阅读约翰·格里森姆的惊悚小说；有一天，我们会辛苦地读完普鲁斯特的小说。对行为经济学家来说，这是一个问题。但是，研究证明，当你问那些遵守清规戒律的老年人，如果少吃巧克力并多吃掺有麸子的格拉诺拉麦片是否会高兴时，他们会大声说“不高兴”。回顾往事，他们希望更多地“过着逍遥的日子”！

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发明的心理游戏和测验会让我们抛弃所有的经济理论，并且让美国心理学会取代美联储吗？大概不行。主流经济学不需要假定每一个人永远都是理性的，相反地，它假设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力量会促使人们和机构趋向于更加理性。

行为经济学家可能是正确的，因为许多人变得失去了理性，甚至对他们已经亏损的股票恋恋不舍，而专业人士却不会让亏损的股票搞晕了头。最终，“飞镖扎得准”而又冷血的专业人士将业余炒股的人踩在了脚下，留给这些散户的教训是他们只能二选一：要么不玩这个游戏，要么摆脱你的情感依恋。[18]

另外一个关于投资的案例也能说明问题。20世纪80年代早期，有些研究人员发现小公司的股票似乎胜过大公司的股票，可以为投资人带来更多的收益。这听起来就像是一个非理性的结果，它证明有效市场假说是错误的。然而，自从这些发现公布之后，争抢着购买小型股票型基金的人越来越多，以至于到了20世纪90年代，它们的收益反而落后于较大型的股票。想买便宜货的理性投资者，纠正了非理性的历史趋势。

利用行为经济学家的深刻见解，我们可以将理性预期学派大胆的思想架到火上烧烤了，直到它被烤得酥脆为止。但是，理性预期学派理应表现得更好。如果不再拘泥于充分信息和魔幻般的市场出清这两个假设，我们就会得到几种观点，而主流经济学家现在正试图将这些观点移植到他们标准的理论框架中去。不久，人们就会看透政治和经济的这些把戏。人们会快速地改进和抛弃原先的预期，在这一点上它要比一个逐渐适应的模型描述得要快。在认识到存在合同和不完全信息等问题的情况下，将这些深刻的见解包容进去是一个挑战。[19]

理性预期学派的理论研究者说过一些激进的话，这让他们听起来就像是刚刚从奇迹漫画公司的连环漫画书中跳出来的一样。如果假设人们总是完全理性地采取行动，为什么就不能相信他们也有X光透视眼和飞

行能力呢？当然，氪星球上从来不会发生滞胀。以一种激烈的形式，理性预期理论给了我们一个对于现实世界来说过于完美的模型。我们确实不能忽视差异性。正如詹姆斯·托宾所言，利用这个原始的理论来解释这个世界就像是借着路灯寻找丢失的钱包。[20]问题在于丢失的钱包常常在黑暗之中。当你在让人昏昏欲睡的路灯光下徒劳地弯下腰时，你可能会被现实猛地击中头部。[21]

第十三章 穿透乌云的希望之光

自亚当·斯密以来，我们经历了很长一段经济思想的发展之旅。这条路如此漫长，经济思想发展得又如此迅速，以至于我们就像是滑着旱冰浏览卢浮宫里陈列的几个世纪的杰作一样，刚好还有足够的时间一瞥蒙娜丽莎那让人迷惑不解的微笑。给可怜的经济学家一点同情吧。他被寄予厚望，认为他可以从盘根错节的经济思想史中把“真理”挑选出来，之后自信满满地向总统建言。

即便是最聪明的脑袋也会让经济学弄得晕头转向，这一点似乎才是不变的“真理”。自吹自擂会招致惩罚。傲慢的经济学家会从取代普罗米修斯的位置中汲取经验教训，老鹰会啄食他们的肝脏，直到他们学会谦卑。为什么经济学难倒了那么多人，甚至吓跑了更多的人？和生物学家不一样，经济学家不能利用准确监控的对照组来进行科学实验。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自然科学都有对照组。天文学家也没有多余的月亮样本供他们利用，跟经济学家处理一个家庭主妇的随机样本没有什么两样。但至少天文学家不必担心那个星球会突然像消费者那样反复无常。天文学家预测了哈雷彗星何时再次出现，所以他们在预测方面有着相当良好的记录。而经济学家在预测家庭储蓄率方面，则有着相当差劲的记录。在苏联曾有一个笑话，有人问“共产主义是生物学家发明的，还是政治家发明的”？“当然是政治家。生物学家会先用小白鼠做试验，看看可行不可行。”不幸的是，小白鼠也不能给经济学家太大的帮助。小白鼠可能在循环系统方面与人类的相似，但经济学不只是解剖，更多的是一种思想问题。

就像亚当·斯密和他的一些理性传承人尝试描述的那样，经济学不是一门有精确定律的学科，也许可以说它是一门关于趋势的学问。除非当炫耀性的凡勃伦商品进入市场，否则，较高的产出通常意味着较低的价格。除非是对通货膨胀的恐惧将利率推高，否则较多的货币供给通常意味着较低的利率。除非当“动物本能”使投资者产生恐慌或者兴奋，从而造成投资的突发性振荡，否则股票价格通常代表着对未来现金流的理性预期。除熊彼特所谓的“超人式”企业家能够获得超额利润外，投资人通常会冒险投资，直到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这些并不精确的破坏科学

方法的力量并不一定是非理性的（即疯狂的）。它们可能是不理性的和不可预知的，就如同在量子物理中，电子的运动并不疯狂，它们却对我们建构原子模型的方法提出了挑战。作为经济学家，我们还没有理解所有的事。另外，故意嘲笑由那些入选“名人堂”的杰出经济学家发现的趋势会招致经济灾难。价格补贴、贸易保护主义、听之任之的污染政策很快便会产生高物价、高税收和污浊的空气。尽管有好与人争论的名声，但很少有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会建议采取上述政策。

做一名经济学家并不容易。像往常一样，凯恩斯找到了最为亮丽的词句来描述经济学大师，称他们“必须像艺术家一样超然脱俗和公正纯洁，不过，有时也要像政治家一样流于世俗”。[1]国王的文臣武将全都满足不了这个职位的要求。

本书所考察的经济学家没有一位能够在一般与特殊、未来与现在或理想与现实之间找到完美无瑕的平衡点，也没有人在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方面表现得同样惊人。他们的能力是有边界的，其中有些人非常明白这一点。

然而，他们都知道一件事：他们不能忽视政府和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亚当·斯密猛烈抨击政府支持行业协会的贸易限制，马尔萨斯则主张《济贫法》会加速贫穷，李嘉图警告说贸易保护主义可能会将英国带入一个新黑暗时代的深渊，马克思认为政府只是剥削和压迫的工具，凯恩斯则试着摇醒在危机之中沉睡的政府官员。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尽管极端主义者在孤独地呐喊，我们已经知道政府未必就是邪恶的或善良的。虽然政府的政策有时会起到拯救的作用，有时会带来恐怖的后果，但他们既不是救世主，也不是撒旦。

虽然我们在前面研究过的每一位经济学家都有其不同之处，但他们都一致地警告我们：面对政治压力，政府总是会采取毁坏良好经济状况的措施。美国国会议员可以将整个职业生涯用于安慰和安抚那些愿望良好的经济政策的受害者。国际贸易自由化伤害了某些国内生产商，低通货膨胀率伤害了贷款人，低利率伤害了债券购买者，技术创新伤害了某些工人，而对污染征税则伤害了厂商。

不要受到诱惑，认为愿望良好的经济学给受害者造成的损失会完全抵消受惠者得到的好处。愿望良好的经济学不是一个“零和”博弈，就像

从佩特拉那里得到钱付给波拉一样。事实上，我们可以给愿望良好的经济学下一个定义：即便有人因此而蒙受损失，但在整体上它是产生正收益的政策。

因为即便是愿望良好的经济政策也常常会有人成为受害者，经济学家就很难说服民主政府采纳好的建议。愿望良好的经济学可能并不是受人欢迎的经济学，特别是就短期而言更是如此。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和较多的投资带来的影响，可能要假以时日才能表现出来，特别是通过电视画面上落寞的农民和抑郁的房主表现出来（这些房主在20世纪70年代通货膨胀期间享受到了急骤增长的资产价值，到了20世纪80年代又因为通货膨胀趋于缓和而经历了艰难的岁月，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他们又开始享受资产价值的猛增）。遗憾的是，相对于宣传快乐而平和的画面来说，媒体一般偏爱短期爆发的扭曲而激烈的影像。

愿望良好的经济学不可能在专业媒体人称为15秒的“原声插播”中表达清楚。在15秒内，某集团众多说客中的一个就可以彻底打垮一位公正的经济学家。经济学家真正需要的是如何使用标语口号和如何撰写时事评论小册子的经验，而新闻节目需要的则是耐心地倾听不同的主张。

不过，我们还是实在点吧。在很大程度上，媒体只不过是反映了观众对麻辣趣闻的需求罢了。很显然，人们喜欢看可怕的新闻故事，就像他们爱看恐怖电影一样。出现荒唐的新闻节目这种过错，有一些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我们不能对市场经济表示同情，然后再苛责广播电视网迎合大众。

作为大众的一分子，对于经济文献，我们至少存有3种心理障碍。首先，我们喜欢信息的一闪而过。其次，我们喜欢结果立现，并且很快失去耐心。凯恩斯有一点错了。从长远来看，我们或者至少我们的子孙后代还没有死。如果我们屈服于今天的每一个强烈要求，我们留给明天的就是一无所有。如果我们不知道储蓄，如果我们一味地借钱，如果我们今晚跳舞跳得太愉快，那明天将会是漫长而又艰难的一天。只有当人们有长远打算时，社会才会繁荣。这并不是说一个由小气鬼组成的社会会更加繁荣兴旺。中世纪的人对于天堂和来生的痴迷可能会使他们逐渐丧失在现世进行创新的动力和追求卓越的努力，而活在当下的我们却把今晚当成千禧年的欢乐时光，并因此欣喜不已，全然忘记了明天和后天。

再次，尽管我们关注短期，我们发现难以辨别何时是“美好时光”，即使我们已身处庐山之中也未必识得它的真面目。经济上的快乐，并不等于暴富。工业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经济事件，但也只不过带来了每年5%的经济增长。生活水平增长5%并不能让靠救济过日子的人昂首入住豪华的宫殿，也无法将稀粥换成法国人喜欢吃的鹅肝。年复一年的变化是缓慢进行的，但在一个穷人临死之前，他会发现他的生活水平已经提升了4倍。生活很少是无忧无虑的，常常只是过得去而已。就算是较高的生活水平能够带来快乐，对我们来说，它也常常姗姗来迟。[2]当快乐最终来临时，我们已经到了唱“过去的好时光”这样的怀旧歌曲的年纪了。就像是在时光旅行时，我们用近视眼镜透过挡风玻璃向前凝视，不过又用玫瑰色的眼镜瞄着后视镜。按照这种方式前进可就麻烦了。让经济学家为我们指出正确的方向也很困难。

报纸几乎很少宣称盛世的到来。只有史书才会这样做。回顾过去，20世纪60年代中期是经济学的盛世。持续的经济增长延续了好几年。凯恩斯的理论显得很强势。然而，当时的新闻报道强调的却是绝望和经济的不确定性。人们还没有太注意，美好时光就已经流逝，就好像我们有权利期盼经济经久不衰一样。只有经济衰退才可以登上报纸的头版。正如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所说，和平岁月在史书中只是散落在各处的短暂插曲，而战争和革命才是主要内容。贝卡里亚说得更加精辟：“快乐只存在于没有历史的国家。”

塞缪尔·戈德温警告我们不要做什么预测，特别是涉及未来的预测。不要理他。尽管随处可见全球饥荒、绝望和苦难的悲观论调，我们还是有理由坚信乐观主义。没有什么保证，也没有压倒性的胜算在握，一切只在情理之中。回想一下，国民所得取决于劳动、资本、自然资源和技术。近期以来，在这些生产要素的每一项上取得的进步都表明了长期的经济增长是可以实现的。

在美国以及其他西方民主国家，劳工阶层似乎比10年或20年前更了解管理了。受日本管理技术的影响，在大型工厂里的工人们在设计和优化生产流程方面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此外，工会也认识到自身的蓬勃发展是建立在公司成功经营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设法获得高薪却没有同时提高生产率的基础上。美国工会似乎愿意接受在经济衰退期间降低工资而不是临时解雇工人，允许他们的收入随着公司经营状况的起伏而增减。反过来，管理人员终于也明白了工人应与公司的经营业绩有更大

的利害关系。许多员工现在接受公司把股票期权当成报酬的一部分这种做法。劳资双方更加合作的关系促进了经济增长。

与10年前比，资本市场更有效率。国际金融资本在国家之间流动得更加顺畅。效率低下的政府和公司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因此要改善它们做事的方法，以免在吸引投资人方面败下阵来。厂商发现，增资建设新的工厂和购买新的设备变得更加容易。从前，厂商会围绕着他们能够获得融资的地理区域画一个圆圈。100年前，这个圆圈的半径可能是16公里。如果当地居民没有储蓄足够的资金，厂商从银行里就一点钱也借不到。经过一个世纪之后，这个圆圈的半径已经扩大，现在等于地球的半径。今天一家位于美国匹兹堡的公司能够在澳大利亚发行债券，即使这家公司所有匹兹堡的邻居将他们的钱藏在床垫里而不购买共同基金也没关系。

技术代表了生产函数中最迷人和最不可预测的那部分变量。谁知道下一个数学家图灵或冯·诺依曼何时会出现，以及他们会把我们带到何处呢？他们将现代电脑带进了我们的生活，但即便是他们也对互联网如此快速又如此强有力地把世界联系在一起感到惊讶。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的一个女学生只需轻轻点击一下鼠标，就可以开始迪士尼世界的虚拟之旅，或者观看美国航空航天局关于太空船的简介。刚果一个突然查出前列腺癌的患者可以下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成果，并拿给他的医生参考。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疯狂地投入超导性质的研究工作，这是一个几乎可以消除摩擦力给我们带来阻力的研究课题。超导物质和纳米技术，能够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实现交通运输和传输资讯。生物学家争先恐后地（我们希望是小心谨慎地）利用DNA重组技术改进营养源，并消除疾病的祸根。在机构的层面上，我们看到大学研究中心和企业间的合作正在迅速增加。由这两类机构的精英们合作成立的合资企业，更是加速了已如闪电般的科学进步的步伐。

当然，每当技术给我们提供了萃取、回收或补充地球物产（以及太空资源）的新方法时，我们的自然资源就会成倍地增加。

当然，我们不应追随着潮流，怀着不顾后果的乐观主义冲向未来。每一项积极开发的可能性中都有风险和缺陷。回想一下生产函数，工会和管理层并不总是握手言欢的。工厂的创新可能会取代一些工人，罢工可能会随之发生。资本市场可能会受阻于内部人交易和其他骗局。自然资源可能会被不负责任的厂商自私自利地加以开发，如此等等。

最后，我们必须考虑所有塑造我们思想的那些其他的政治、心理和制度因素。技术可以开花结果，但部落禁忌会阻止进步。例如，如果我们认为沙子是神圣的，我们可能就不会有玻璃或半导体了，迈阿密海滩上的度假屋也会大大减少。诚然，古代和中世纪对于借贷的约束限制了几个世纪之前的经济发展。此外，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斯隆发现的那样，经济增长需要受过教育的大众。斯坦福大学的保罗·罗默极力主张，经济学家要像研究工厂和道路的缺点一样，把大量的时间放在研究“思想分歧”上。罗默认为大多数技术不会偶尔蹦出来，或者像普罗米修斯盗取火种一样自动交到人的手中。因为有如此众多的人受惠于半导体和化学疗法等发明，社会应当鼓励科学家和工程师，或者是给予他们减税优惠，或者授予他们专利权，专利会给发明人一个暂时性的利益独占的保障。就像约瑟夫·熊彼特说过的那样，经济增长也需要企业家的推进。有谁知道心理和精神的力量是推动我们前进，还是弄得我们团团转，抑或是让我们退回到原始落后的状态呢？有伊朗精神领袖霍梅尼那样的企业家吗？

熊彼特在他精彩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一书中对资本主义的未来进行了思索。对熊彼特来说，最大的威胁不是来自像利润下降这样的经济因素而是来自政治因素。事实上，资本主义的极致成功将会毁掉资本主义。由于资本主义创造出一个有大量闲暇时间的高级知识分子阶层，他们开始质疑资本主义的道德框架，他们开始对收入不均、公正与污染等提出疑问。最后，他们那些辛辣的问题会烧穿资本主义薄弱的道德基础，并且他们会主张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承诺物质福利，并为那些在这个世界上寻求公正的渴望提供道德支持。熊彼特有一个现在很出名的质询，他问道：“资本主义能够存活下去吗？不，我认为它不能。”3

20世纪60年代后期，随着长发披肩、硬摇滚音乐、迷幻色彩绘画与吸毒的泛滥，熊彼特的预言似乎要变成现实了。刚从欧洲殖民地解放出来的第三世界国家转向了社会主义阵营。直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还有拿到博士学位的人在开着出租车时抨击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体制。

但是，20世纪80年代给我们带来了什么？雅皮士、短发、条纹衬衫和不发达国家开始标榜他们不再阅读《资本论》，改为阅读《穿出成功》。甚至苏联也努力要使其僵滞的经济苏醒过来，不再主张中央计划经济了。以下是摘自《纽约时报》专题报道的几个标题：“南斯拉夫向资

本主义的倾斜变成了倒栽葱”，“亚当·斯密在安哥拉推搡着马克思”，“拉美国家经济不振的彻底诊断：促进企业家精神突袭占领这个区域的一本书”。[4]最后，再读读《纽约时报》的新闻报道“全球迈向自由市场：随着世界经济的竞争变得更加激烈，资本主义国家和共产主义国家会同样转向亚当·斯密”中的几行文字：

> 在莫斯科，企业家同志正在经营着他们自己的漂亮小店和汽车修理厂，而在中国，许多农民正在设法将他们自己种植的产品卖出去……似乎不论你往哪里看，政府已经在转向市场体制，用亚当·斯密那只天才的看不见的手来振兴他们的经济。经济学家说，关于给予市场更多自由发挥空间的重要性，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达成了异乎寻常的一致意见，那便是，自由市场首要的机制是有利于明确表达消费者的欲望、鼓励发明创新和惩戒缺乏效率的生产者。[5]

虽然现在的俄罗斯和远东地区走得跌跌撞撞，但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早期，走向市场的趋势还是得到了更广泛的增强。例如，当1995年共产党在波兰赢得民主选举时，他们承诺遵守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罗马尼亚也与土耳其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领导人丹尼尔·奥尔特加扬弃了他原来的信仰，参加了尼加拉瓜的竞选。当英国和加拿大的工党取代保守党执政时，他们在严格控制预算和国有企业民营化方面比他们的前任迈出的步伐还要大。当时英国首相布莱尔第一波行动之一就是将英格兰银行（英国的中央银行）从政治支配中解放出来，使其能够自主决定货币政策，无须顾及难以取悦的政治家所施加的压力。难怪玛格丽特·撒切尔声称布莱尔做得非常出色。

虽然重回市场机制并不会魔术般地变贫穷为富有，至少各国政府已经放弃了对市场经济体制那种僵硬的、意识形态上的憎恶。最重要的是，令人惊奇的通讯技术给世界带来了互联网，使得人们几乎不可能被蒙在鼓里，或者始终保持沉默。

当然，物质上的富足不会解决某些熊彼特认为让知识阶层感到苦恼的问题。社会不平等和贫穷仍然存在。如何才能最大化地减轻这些问题？不会妨碍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税收和财富再分配会有所帮助。许多经济学家提倡用消费税来最终取代所得税。

然而，有一个问题可能不是市场或精明的政府所能解决的。新的发明使得传统的工作和角色成为过去时，人类能否跟上这些新发明的步伐呢？人类的自我教育能否快到足以应付计算机时代和后计算机时代？绝大多数人可能会做到。但是，随着社会发展日趋复杂，越来越多的人会被各种各样的社会保障体系遗漏掉，那些有心理问题、身体残疾和智力障碍的人将会软弱无助。与200多年前相比，生活在当今世界更容易获得物质财富，却更难以解决心理问题。20世纪城市的精神生活与过去农村的物质生活一样艰难困苦。身处现代世界，一个人很容易就会失去自己的立足之处，就像《摩登时代》里的查理·卓别林，不是在工厂里团团转，就是沦落为无家可归的流浪汉。

我们的生物钟可能不再与我们的生活方式保持同步。200年前，妇女在20岁之前就生育子女。但在那个年纪，她们就已经知道这个世界必须提供什么，知道她们可以拥有什么样的工作，知道她们可以期待一个什么样的未来。她们可以教育她们的孩子如何生存。今天有多少20岁的人知道他们能够做什么，或者知道当他们25岁时将要做什么？现代社会为我们提供的机会太多，以至于我们无法很好地预知自己未来的生活，更不用说我们的后代了。我们的孩子不再由了解这个世界的人抚养长大，并不是因为父母变得愚蠢或懒惰了，而是因为这个世界大得无法掌握了。父母最后必须学会教育他们的孩子如何处理不确定性，而不是教导他们如何确保稳定性。

在列举了让人闷闷不乐的新情况之后，我们还是忽略了许多其他可能性，其中包括自然灾害。加利福尼亚州可能会漂浮在太平洋上，瘟疫可能会杀死几百万人，干旱可能会再让几百万人忍饥挨饿，战争可能会夺去许多年轻的生命。我们轻而易举就可以为美国和世界上其他的国家描绘出一幅令人绝望的前景画面。

经济学家一定要研究所有这些事件，它们全都会朝着经济学家的画架冲撞过来，把他们想呈现给世人的用心描绘的精制图画泼溅得污迹斑斑。

对于大多数生活在地球上的人来说，用两条腿走路不见得会比用四条腿走路过得更好。请给经济学家一点鼓励吧，因为当观点产生分歧时，正是他们解释并且描绘了这个稍纵即逝的闪光瞬间。

注释

第一章　经济学家的坏名声由何而来?

1. William Manchester, *The Last Lion: Winston Spencer Churchill* (New York: Dell, 1983), p. 35.

2. T. 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2d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0).

3. With the rise of quantum physics and its corollaries such as Heisenberg's principle, even the "hard" sciences are losing their muscle tone.

4. John Maynard Keynes, "Alfred Marshall," in *Essays in Biography,* in 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John Maynard Keynes,* vol. x (London and New York: Macmillan/St. Martin's Press for the Royal Economic Society, 1972), p. 173.

5. See my "Biblical Laws and the Economic Growth of Ancient Israel," in the *Journal of Law and Religion,* vol. 6, no. 2 (1988).

6. For a fascinating history of the usury doctrine, see Benjamin Nelson, *The Idea of Usu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9).

7. Georges Duby, *The Age of the Cathedral,* trans. Eleanor Levieux and Barbara Thomps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1), p. 3.

第二章　亚当·斯密：自由市场与“看不见的手”

第二章　亚当·期密：自由市场与“看不见的手”

1. Adam Smith, *Lectures on Justice, Police, Revenue, and Arms,* ed. Edwin Canna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896), p. 179. These lectures are based on notes from students.

2. Adam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R. H. Campbell, A. S. Skinner, and W. B. Todd, eds., 2 vol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6 [1776]), vol. 1, p. 284.

3. Smith, *Lectures,* pp. 172–173.

4. Adam Smith, *The Correspondence of Adam Smith,* E. C. Mossmer and I. S. Ross, ed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7), p. 102.

5. Peter Gay, *The Enlightenment: An Interpretation,* 2 vols.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holson, 1967), vol. 2, p. 348.

6. Ibid., p. 349.

7. David Hume, *The Letters of David Hume,* J. Y. T. Greig, ed., 2 vols. (Oxford: 1932), p. 19.

8. Smith, *Wealth of Nations,* vol. 2, p. 678.

9. Thomas Hobbes, “The Introduction,” in *Leviathan* (New York: Collier, 1962), p. 19.

10. Smith, *Wealth of Nations,* vol. 1, p. 341.

11. Ibid., p. 25.

12. Ibid., pp. 26–27.

13. Ibid., p. 456.

14. Ibid., p. 15.

15. Ibid., p. 20.

16. Both the preceding Hayek quotation and this Whitehead quotation appear in F. A. Hayek, “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35 (September 1945), pp. 526–528.

17. Smith, *Wealth of Nations,* vol. 1, p. 456.

18. Ibid., pp. 23–24.

19. See Milton Friedman, *Capitalism and Freedo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7), p. 109.

20. Smith, *Wealth of Nations,* vol. 2, pp. 782–785.

21. Paul A. Samuelson, “A Modern Theorist’s Vindication of Adam Smi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vol. 67 (February 1977), pp. 43–44.

22. Smith, *Wealth of Nations,* vol. 1, p. 145.

23. Ibid., p. 137.

24. Steve Jobs Commencement Address, *Stanford Report* (June 12, 2005).

25. Even MIT economist Lester Thurow, a fiery adversary of Friedman, argued against the government breakup of AT&T on these grounds. See “Antitrust Grows Unpopular,” in *Newsweek* (January 12, 1981).

26. Smith, *Wealth of Nations,* vol. 1, p. 457.

27. Ibid., p. 471.

28. Ibid., p. 468.

第三章　马尔萨斯：一个悲观的人口预言

1. William Godwin, *An Enquiry into Political Justice,* 2 vols. (London: 1798), vol. II, p. 504.

2. Ibid., p. 528.

3. The formula for the future value (FV) of a principal amount of money (P) held for (N) years at (R) percent compound interest is:

$$FV = P \times (1 + R)^N$$

A helpful rule of thumb is the Rule of 72, which states that the number of years it takes for a number to double, when growing at a constant rate, equals 72 divided by that number. For instance, if the economy expands at 4 percent per year, in 18 years the economy would double.

4. Thomas R. Malthus, *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1st ed. (London: Macmillan reprint, 1909), pp. 139–140.

5. Ibid., pp. 6–7, 92.

6. James Bonar, *Malthus and His Work* (London: Macmillan, 1885), p. 127.

7. Thomas R. Malthus, *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2d ed. (London: Everyman Library, 1914), vol. II, p. 168.

8. Quoted in Patricia James, *Population Malthu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9), pp. 110–111.

9. See Paul Bairoch, "Agriculture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rans. M. Grindrod, in C. M. Cipolla, e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Sussex: Harvester Press, 1976), pp. 452–501.

10. André Armengaud, "Population in Europe 1700–1914," in Cipolla, p. 48.

11. Thomas R. Malthus,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Boston: Wells and Lilly, 1821), pp. 4–5.

12. See Dennis Meadows et al., *The Limits to Growth* (New York: Universe Books, 1972); Jay Forrester, *World Dynamics* (Cambridge: Wright-Allen Press, 1971); Robert Heilbroner, *An Inquiry into the Human Prospect* (New York: W. W. Norton, 1974).

13. Gerald O. Barney, ed., *The Global 2000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1).

14. Wassily Leontief, *The Future of the World Econom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6.

15.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Washington: World Bank, 1984). See Allen C. Kelley,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Population Change in the Third World,"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XXVI (December 1988), pp. 1685–1728.

16. Stephen Buckley, "Africa's Agricultural Rebirth," *Washington Post* (May 25, 1998), p. A18.

17. Noel Ignatiev, *How the Irish Became White*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18. See George J. Borjas, "The Economics of Immigrant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December 1994. Also see Rachel M. Friedberg and Jennifer Hunt, "The Impact of Immigrants on Host Country Wages, Employment and Growth,"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Spring 1995), pp. 26–27.

19. See Todd G. Buchholz, *Market Shock*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0), pp. 237–256.

20. See Spencer R. Weart, "The Discovery of the Risk of Global Warming," *Physics Today* (January 1997), p. 34. For the latest IPCC report, see R. T. Watson, M. C. Zinyowera, and

R. H. Moss, eds., *Climate Change 1995: The Impacts, Adaptation, and Mitigation of Climate Chan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21. Robert Mendelsohn, William D. Nordhaus, and Daigee Shaw, "The Impact of Global Warming on Agriculture: A Ricardian Analysi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3, no. 4 (September 1994), pp. 753–755. For a skeptical (and technical) view of warming, see R. S. Stone, "Variations in Western Arctic Temperatures in Response to Cloud Radiative and Synoptic-Scale Influence,"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vol. 102 (1997), pp. 21, 769–770, 776. Easier reading would be Matt O'Keefe, "Solar Waxing," *Harvard Magazine* (May/June 1998).

第四章　大卫·李嘉图：最富裕的经济学奇才

1. David Ricardo, *The Works and Correspondence,* Pierro Sraffa,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1–55), vol. VI, p. 231.

2. Quoted in Robert Lekachman, *A History of Economic Idea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59), p. 143.

3. If the opportunity costs are equal, there are no possible gains from trade. They might as well be self-sufficient. The model works less persuasively if resources cannot be reallocated and prices are extremely "sticky." More complex approaches such as the Heckscher-Ohlin-Samuelson model examine what determines opportunity costs and comparative advantages besides labor hours.

4. Quoted in Harry Anderson, Rich Thomas, and James C. Jones, "Carving Up the Car Buyer," in *Newsweek* (March 5, 1984), p. 72.

5. If Britons dump their dollars, the value of the dollar (the exchange rate) will fall. Thus, trade deficits generally lead to depreciating currencies. But with a cheaper dollar, American exporters would find it easier to sell to foreigners, and foreign producers would have more trouble selling their good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is process would eventually reduce the trade deficit. Foreigners may also use their U.S. dollars to buy American assets such as property and factories, if they think the U.S. economy is healthy and will yield higher returns than investing in their own countries.

While an "invasion" of foreign purchasers could give foreigners a larger political voice in the United States, so far the proportion of foreign ownership is still small enough that the political effects remain slight. In the meantime, Americans benefit through more jobs, more tax revenue to towns, states, and Washington, and a transfer of foreign skills and technology to the United States.

6. See Murray Weidenbaum and Michael Munger, "Protectionism at Any Price?" in *Regulation* (July/August 1983), pp. 14–22, cited in Benjamin M. Friedman, *Day of Reckoning*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8), pp. 58–60.

7. "Economic Impacts of the Canadian Softwood Lumber Dispute on U.S. Industries," U.S. Senate, Committee on Commerce, Science and Transportation, Hearing Archives (February 14, 2006), pp. 1–53.

8. Frédéric Bastiat, *Economic Sophisms* (Princeton: D. Van Nostrand, 1964), pp. 56–57. Bastiat also sarcastically suggested that France double its need for jobs by chopping off everyone's right hand.

9. Ricardo, vol. V, p. 55; vol. I, p. 265. Also see Mark Blaug, *Ricardian Economic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8), p. 33. The German Historical School would later reject Ricardo's approach and apply an organic model to nations. Wilhelm Roscher and Gustav Schmöller argued that nations are born, raised, and ultimately buried. Policies and principles that work well at one stage in a nation's life may work badly at another.

10. Ibid., vol. I, p. 97. Query what material goods are necessary today to define "necessaries." A radio? A television?

11. Ibid., vol. I, p. 70.

12. Ibid., vol. I, p. 35.

13. Ibid., vol. I, p. 120.

14. Ibid., vol. VIII, p. 208; Also see Ricardo writing in the 1820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vol. 8, p. 179.

15. Henry George, *Progress and Poverty* (New York: Schalkenbach Foundation, 1929), p. 545.

16. Malthus,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p. 186.

17. Smith, *Wealth of Nations,* pp. 337–338.

18. Malthus,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p. 395.

19. John Maynard Keynes, “Thomas R. Malthus,” in *Essays in Biography,* in *Collected Writings of John Maynard Keynes,* vol x, (London: Macmillan, 1972), p. 100.

20. Ricardo, vol. VIII, p. 184.

21. Robert Torrens, *Essay on the External Corn Trade* (London: 1815), pp. viii–ix.

22. Mark Blaug, *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 3d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140.

第五章　约翰·穆勒：大多数人的幸福捍卫者

1. John Stuart Mill, *Autobiography* (London: Longmans, Green, Reader, and Dyer, 1873), p. 28. Michael St. John Packe takes a more lenient view of James Mill in *The Life of John Stuart Mill* (New York: Macmillan, 1954).

2. Ibid., pp. 28, 30.

3. W. L. Courtney, *Life of John Stuart Mill* (London: Walter Scott, 1889), p. 40.

4. Mill, pp. 66–67.

5. Ibid., pp. 98–100.

6. Jeremy Bentham, *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 (New York: Haffner, 1948), p. 1.

7. Ibid., pp. 30–31.

8. Quotation from Bentham, “Defence of a Maximum,” in *Jeremy Bentham’s Economic Writings,* vol. iii, W. Stark, ed.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54 [1801]), pp. 247–302. See my “Punishing Humans,” in *Thought,* vol. 59 (September 1984) for a critique of Benthamite justice.

9. Mill, pp. 40–41.

10. Ibid., p. 109.

11. Ibid., pp. 132–134.

12. Ibid., p. 49.

13. John Stuart Mill, *The Early Draft of John Stuart Mill's Autobiography,* J. Stillinger, ed.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61), p. 184. See also A. W. Levi, "The Mental Crisis of John Stuart Mill," in *Psychoanalytic Review,* vol. 32 (January 1945), pp. 86–101.

14. Lionel Robbins, *The Evolution of Modern Economic Theory* (London: Macmillan, 1970), p. 109.

15. John Stuart Mill, "Bentham," in *Essays on Politics and Culture,* G. Himmelfarb, ed. (Garden City: Doubleday, 1962 [1838]), pp. 85–131; "Coleridge," in *Essays* (1840), pp. 132–186.

16. Ibid., pp. xix–xx.

17. Mill, *Autobiography,* pp. 186–187.

18. John Stuart Mill, *On Logic* (1840), p. 617.

19. John Stuart Mill,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W. J. Ashley, ed. (New York: A. M. Kelly, 1965 [1848]), pp. 199–200.

20. George J. Stigler, "The Nature and Role of Originality in Scientific Progress," in *Economica,* vol. 22 (November 1955), pp. 293–302.

21. John Stuart Mill,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p. 808.

22. Ibid.

23. Ibid., p. 869.

24. Ibid., p. 759.

25. Ibid., p. 950.

26. Ibid., p. 799.

27. Ibid., p. 748.

28. Ibid.

29. Ibid., p. 757.

30. Quoted in Gertrude Himmelfarb, "Introduction," in *Mill, On Liberty* (London: Penguin Books, 1986), p. 10.

31. Mill, *Autobiography,* p. 199.

32. Edmund Burke,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1790), in *The Works of the Right Honorable Edmund Burke* (London: F., C. & J. Rivington, 1808), vol. 5, p. 149.

第六章　卡尔·马克思：愤怒的神谕

1. David McLellan, *Karl Marx: His Life and Thought*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3), p. 4. See Karl Marx, "On the Jewish Question," in Robert C. Tucker, ed., *The Marx-Engels Reader* (New York: W. W. Norton, 1978), pp. 26–52; Gertrude Himmelfarb, "The Real Marx," in *Commentary* (April 1985), pp. 37–43 and "Letters" (August 1985).

2. McLellan, pp. 6–7.

3. Ibid., p. 33.

4. Robert Payne, *Karl Marx*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68), p. 77.

5. McLellan, p. 53.

6. Saul K. Padover, *Karl Marx: An Intimate Biography* (New York: McGraw-Hill, 1978), p. 179.

7. McLellan, p. 99.

8. Karl Marx, "Introduction to A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 in K. Marx, *The Early Texts,* D. McLellan,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 116.

9. Karl Marx, *The German Ideology,* in Tucker, pp. 155–156.

10. Karl Marx,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trans. N. I. Stone (Chicago: Charles Kerr, 1904), preface.

11. Karl Marx,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in Tucker, ed., p. 595.

12.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Samuel Beer, ed. (Arlington Heights: Harlan Davidson, 1955), p. 9.

13. Marx,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preface.

14. Karl Marx, *Capital,* vol. 1 (Chicago: Charles Kerr, 1906), p. 13.

15. Marx and Engels,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pp. 13–14.

16. Ibid.

17. McLellan, p. 98.

18. Sandover, pp. 291–293.

19. Payne, p. 295.

20. McLellan, pp. 264, 357.

21. Ibid., p. 284.

22. Karl Marx, *Capital,* vol. 1, pp. 649, 652.

23. Ibid., p. 687.

24. Ibid., p. 836.

25. Ibid., p. 837.

26. Marx and Engels,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p. 46.

27. Marx and Engels,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pp. 31–32.

28. Marx, *Capital,* vol. 1, p. 637.

29. Payne, p. 143

30. Marx and Engels,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p. 22; Thomas Sowell, *Marxism: Philosophy and Economics*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85), p. 138.

31. The question of relative poverty is extremely difficult to assess. First, since there is an income gap between rich and poor, even if the poor gain at a faster rate, the gap in absolute dollars may enlarge. Compare person A, who starts with $10,000 and enjoys a 10 percent raise each year with person B, who starts at $100,000 and enjoys only a 5 percent raise each year. In about seven years, A is earning about $20,000, while B is earning over $140,000. Second, in the United States, over the course of a generation there is considerable upward and downward mobility. One major study revealed that about one-third of the children of the most affluent parents in the country received income below the national average. Furthermore, about one-third of the children of the poorest parents climbed up and above the national average. See Christopher Jencks et al., *Inequality: A Reassessment of the Effect of Family and Schooling in America*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2), pp. 209–216. For an international approach to mobility, see W. W. Rostow, *Why the Poor Get Richer and the Rich Slow Down*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0). We can confidently say that during most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all classes in the United States have enjoyed sustained absolute progress. Nonetheless, during the stagflation from 1974 to 1982 all income classes lost ground. The poor especially suffered for economic as well as sociological reasons, as the number of female-headed households jumped by about 40

percent. During the middle and late 1980s the 1973 plateau was reached again and surpassed.

32. 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33. John Maynard Keynes, *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John Maynard Keynes,* vol. 28 (London and New York: Macmillan/St. Martin's Press, 1973), pp. 38, 42.

34. See Stephen A. Marglin, "Radical Macroeconomics" (Cambridge: Harvard 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 1982), Discussion Paper No. 902, pp. 1–26.

第七章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经济学有自己独特的时间表

1. We assume that the backpacker cannot return to Italy for more pleasure. Also, the cost of stepping forward includes the opportunity cost—the pleasure derivable from staying home, for instance.

2. John Maynard Keynes, "Alfred Marshall," in *Essays in Biography* (London: Macmillan/St. Martin's Press for the Royal Economic Society, 1972), p. 164. Though majestic, Keynes' essay contains some factual errors uncovered in Ronald H. Coase, "Alfred Marshall's Mother and Father,"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6 (Winter 1984), pp. 519–527.

3. Ibid., p. 171.

4. A. C. Pigou, "In Memoriam: Alfred Marshall," in *Memorials of Alfred Marshall,* A. C. Pigou, ed. (London: Macmillan, 1925), p. 89.

5. Keynes, p. 175.

6. C. R. Fay, "Reminiscences," in Pigou, pp. 74–75.

7. Alfred Marshall,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9th ed., Guillebaud, ed. (London: Macmillan, 1961 [1920]), vol. 1, pp. 7–9.

8. Ibid., p. xv.

9. Ibid., p. 461.

10. Alfred Marshall, "Letter to Bowley," in Pigou, p. 427.

11. Keynes, p. 196.

12. John Neville Keynes, *The Scope and Method of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Macmillan, 1891), p. 217n.

13. Marshall, *Principles,* p. xiv.

14. Ibid., p. 366.

15. Ibid., p. 271.

16. Ibid., p. 316. Schumpeter argued that dominant firms and monopolists could help the economy, because their excess profits enabled them to invest heavily 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chumpeter's position remains controversial.

17. For a profile of the fascinating Sarnoff, see my *New Ideas from Dead CEOs*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7).

18. John A. Byrne, "Is Your Company Too Big?" in *BusinessWeek* (March 27, 1989), pp. 84–94.

19. Ibid., p. 348.

20. Ibid., p. 99.

21. Ibid., p. 118.

22. Keynes, p. 205.

23. Marshall, *Principles,* pp. 587–588.

24. This is a highly complex issue. See Ellen E. Meade, "Exchange Rates, Adjustment, and the J-Curve," in *Federal Reserve Bulletin,* vol. 74 (October 1988), pp. 633–644.

25. Alfred Marshall, *Money, Credit and Commerce* (London: Macmillan, 1923), p. 247.

26. F. Y. Edgeworth, "Reminiscences," in Pigou, p. 70.

27. Alfred Marshall, Letter to Lord Reay, in Pigou, p. 462; Marshall, *Principles,* p. 713.

28. Marshall, *Principles,* p. 3.

29. Keynes, p. 173.

第八章　从凡勃伦到科斯：事关社会与法律制度的经济学

1. Auguste Comte gave the same advice to Mill. The neoclassicalists didn't listen. Instead they derided the even limper "soft" sciences. Ironically, the new institutionalists today meet on the same turf as other social scientists, partly because they bullied themselves into anthropology, criminology, and sociology.

2. Joseph Dorfman, *Thorstein Veblen and His America* (New York: Viking, 1934), p. 79.

3. Thorstein Veblen, "Why Economics Is Not an Evolutionary Scienc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2 (July 1898), p. 389.

4. Thorstein Veblen, *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1934), pp. 42–43.

5. Harvey Leibenstein, "Bandwagon, Snob, and Veblen Effects in the Theory of Consumer Demand,"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62 (May 1950), pp. 183–207.

6. Jonathan D. Glater and Alan Finder, "U.S. Universities Raise Tuition, and Applicants Follow,"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December 12, 2006).

7. Although he eschewed Marx's approach to exploitation, Veblen accepted Marx's charge that the institution of private property hurts society. Nonetheless, his antipathy toward private property did not stop him from defending his secluded mountain cabin from a trespasser by attacking the intruder with a hatchet.

8. See my *New Ideas from Dead CEOs*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7).

9. Thorstein Veblen, *The Theory of Business Enterprise* (New York: Scribner's, 1904), p. 309.

10. Ibid., p. 286.

11. Thorstein Veblen, *The Engineers and the Price System* (New York: Viking, 1921), pp. 18–19.

12. Thorstein Veblen, *The Vested Interests and the Common Man* (New York: Capricorn Books, 1969), p. 165.

13. Veblen, *The Engineers and the Price System,* p. 58.

14. T. Pare and Wilton Woods, "The World's Top 50 Industrial CEO's," in *Fortune,* vol. 116 (August 3, 1987), p. 23.

15. Wesley C. Mitchell, *What Veblen Taught* (New York: Viking, 1936), p. xviii; Joseph Dorfman, "Background of Veblen's Thought," in Carlton C. Qualey, ed., *Thorstein Veble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8), p. 129.

16. John Kenneth Galbraith, *The Scotch*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64), p. 26.

17. John Kenneth Galbraith, *The Affluent Societ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6), p. 149. Given his forceful critique, it is ironic that Galbraith recently agreed to write a hardcover book (for Whittle Communications) that will contain advertisements!

18. Friedrich A. Hayek, "The *Non Sequitur* of the Dependence Effect," in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vol. 27 (April 1961), pp. 346–348.

19. Lee Benham, "The Effect of Advertising on the Price of Eyeglasses,"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 15 (October 1972) pp. 337–352.

20. Joseph Pereira, "Pricey Sneakers Worn in Inner City Help Set Nation's Fashion Trend,"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December 1, 1988), pp. A1–A10.

21. Louis Brandeis, "The Living Law," vol. 10, *Illinois Law Review* (1916).

22. *United States v. Carroll Towing Co.,* 159 F.2d 169 (2d Cir. 1947).

23. Ronald Coase,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 3 (October 1960), pp. 1–44.

24. See Werner Z. Hirsch, *Habitability Laws and the Welfare of Indigent Tenants*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25. Marc Beauchamp, "Bankrupt Landlords in Wonderland," *Forbes* (March 20, 1989), pp. 105–106. Rent control is another issue that unites economists regardless of liberal or conservative politics. See Alan Blinder's lucid *Hard Heads Soft Hearts: Tough Minded Economics for a Just Society*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87), pp. 194–195.

26. See Gary Becker, "Crime and Punishment: An Economic Approac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78 (March/April 1968), pp. 169–217; I. Ehrlich, "Participation in Illegitimate Activities: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81 (May/June 1973), pp. 521–565; D. L. Sjoquist, "Property, Crime and Economic Behavior,"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63 (June 1973), pp. 439–446.

27. See Todd G. Buchholz, "Revolution, Reputation Effects, and Time Horizons," *Cato Journal,* 8 (Spring/Summer 1988), pp. 185–97.

28. Richard A. Posner, *Economic Analysis of Law,* 2nd ed.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77), p. 22; 3d ed. (Boston: Little, Brown, 1986), pp. 25–26. See also my "Punishing Humans," *Thought,* vol. 59 (September 1984), p. 290.

29. A. A. Berle and G. C. Means, *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 (New York: Macmillan, 1932).

30. For example, see Lucian Bebchuk and Jesse Fried, "Executive Compensation at Fannie Mae: A Case Study in Perverse Incentives, Nonperformance Pay and Camouflage," *Journal of Corporation Law,* vol. 30, no. 4 (2005), pp. 807-822.

31. See Dale Arthur Oesterle and John R. Norberg, "Management Buyouts: Creating or Appropriating Shareholder Wealth?" *Vanderbilt Law Review,* vol. 41 (March 1988), pp. 207–260; Michael C. Jensen, "Takeovers: Their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2 (Spring 1988), p. 21; Benjamin J. Stein, "Loss of Values: Did Amsted LBO Shortchange Shareholders?" *Barron's* (February 16, 1987), p. 8.

32. Bruno S. Frey and Heinz Buhofer, "Prisoners and Property Rights,"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 31 (April 1988), pp. 19–46.

33. For a theoretical model and an examination of South Vietnam in 1975, see Todd G. Buchholz, "Revolution, Reputation Effects, and Time Horizons," *Cato Journal,* vol. 8 (Spring/Summer 1988), pp. 185–197.

第九章　梅纳德·凯恩斯：带领人们走出大萧条的救世主

1. Bertrand Russell, *Autobiography* (London: Unwin Paperbacks, 1975), p. 69.

2. Robert Skidelsky, *John Maynard Keynes,* vol. i (London: Macmillan, 1983), p. 180.

3. Milton Friedman, *Dollars and Deficit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68), p. 15.

4. R. F. Harrod, *The Life of John Maynard Keynes* (London: Macmillan, 1951), p. 50.

5. Skidelsky, p. 118.

6. Harrod, p. 101.

7. Skidelsky, pp. 165–166.

8. Ibid., pp. 173, 175.

9. Ibid., p. 177.

10. Joseph A. Schumpeter, *Ten Great Economists*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52), p. 265.

11. Andrew Sinclair, *The Red and the Blue*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86), p. 17; Michael Holroyd, *Lytton Strachey: A Critical Biography,* vol. ii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68), p. 17.

12. John Maynard Keynes, *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John Maynard Keynes,* vol. xvii (London: Macmillan/St. Martin's Press for the Royal Economic Society, 1973), p. 16.

13. For different views on the causes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see Milton Friedman and Anna J. Schwartz, *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1867–196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Peter Temin, *Did Monetary Forces Cause the Great Depression?* (New York: Norton, 1976) and Karl Brunner, ed., *The Great Depression Revisited* (Boston: Martinus Nijhoff, 1981).

14. Paul Samuelson, "Lord Keynes and the General Theory," *Econometrica,* vol. 14 (1946), p. 190.

15. Elizabeth S. Johnson and Harry G. Johnson, *The Shadow of Keynes* (London: Basil Blackwell, 1978), p. 102.

16. Keynes, *CW,* vol. xxi, pp. 134, 144.

17. Keynes, *The General Theory,* in *CW,* vol. vii, p. 128. For more elaborate proofs and explanations why the tax cut multiplier is smaller than the government and investment multiplier, see any introductory economics textbook.

18. Keynes, *CW,* vol. xxi, p. 296.

19. Keynes, *The General Theory,* in *CW,* vol. vii, pp. 380–381.

20. Ibid., p. 129.

21. Samuelson, p. 187.

22. Keynes, *The General Theory,* in *CW,* vol. vii, p. 154.

23. Ibid., p. 156.
24. Ibid., pp. 162–163.
25. Ibid., pp. 383–384.
26. Keynes, *CW,* vol., ix, pp. 321–332.

第十章 米尔顿·弗里德曼：向凯恩斯宣战的货币主义者

1. A. C. Pigou, ed., *Memorials of Alfred Marshall* (London: Macmillan, 1925), p. 25.

2. John Maynard Keynes, *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John Maynard Keynes,* vol. xxi (London: Macmillan/St. Martin's Press for the Royal Economic Society, 1973), p. 294.

3. Milton Friedman, "Money: Quantity Theory," in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Macmillan and Free Press, 1968), p. 438.

4. Milton Friedman, "Discussion of the Inflationary Gap,"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32 (June 1942), pp. 314–320. Reprinted in *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3), p. 253.

5. John Kenneth Galbraith, *Economics in Perspectiv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87), pp. 270–271. For more on Friedman's life and career, see his memoirs in Milton Friedman and Rose D. Friedman, *Two Lucky People: Memoir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6. Milton Friedman and Simon Kuznets, *Income from Independent Professional Practice,* (New York: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1945); Todd G. Buchholz, *Bringing the Jobs Home* (New York: Sentinel/Penguin 2004), pp. 97–116.

7. Milton Friedman, *Studies in the Quantity Theory of Mone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6).

8. Milton Friedman, *A Theory of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9. A. Ando and F. Modigliani, "Tests of the Life Cycle Hypothesis of Savings: Comments and Suggestions," *Bulletin of the Oxford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Statistics,* vol. 19 (1957).

10. Milton Friedman and Anna J. Schwartz, *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1867–196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For a critical view see Peter Temin, *Did Monetary Forces Cause the Great Depression?* (New York: Norton, 1976) and Karl Brunner, ed., *The Great Depression Revisited* (Boston: Martinus Nijhoff, 1981).

11. Gary Fromm and Lawrence R. Klein, "A Comparison of Eleven Econometric Models of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63 (May 1973), pp. 385–393.

12. Lawrence H. Summers, "The Great Liberator,"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9, 2006), p. 13.

13. *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1962), p. 68.

14. Paul A. Samuelson and William D. Nordhaus, *Economics* (New York: McGraw-Hill, 1985), p. 331.

15. *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1987), p. 55.

16. A good primer on the matter is Martin S. Feldstein, ed., *Taxes and Capital Form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The book contains articles by Summers, President Clinton's Deputy Treasury Secretary, as well as articles by Boskin, Feldstein, and Lawrence Lindsey, key advisers to the Reagan and Bush administrations.

17. Edward C. Prescott, "The Transformation of Macroeconomic Policy and Research," in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Minneapolis 2004 Annual Report,* pp. 19–20.

18. Milton and Rose Friedman, *Two Lucky Peopl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p. 380.

第十一章　詹姆斯·布坎南：从经济市场中的个人选择到政治市场中的公共选择

1. David Vesey, "Personality Spotlight: James Buchanan; Nobel Prize winner for economics," *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 (October 16, 1986).

2. Mancur Olson,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2).

3. Mancur Olson quoted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est Groups," in *Manhattan Report on Economic Policy,* vol. IV

(1984), p. 4.

4. George J. Stigler, "The Theory of Economic Regulation," in *The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ience,* vol. II (Spring 1971), pp. 3–21.

5. James M. Buchanan, in *The Consequences of Mr. Keynes* (London: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1978), pp. 20–21.

6. Joseph P. Newhouse, *Free for All: Lessons from the RAND Health Insurance Experimen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Matthew J. Eichner, "The Demand for Medical Care: What People Pay Does Matter,"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8 (May 1988); Jonathan Skinner and John E. Weinberg, "How Much Is Enough? Efficiency and Medical Spending in the Last Six Months of Life,"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6513 (April 1998).

7. Burton A. Abrams, "How Richard Nixon Pressured Arthur Burns: Evidence from the Nixon Tape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20, no. 4 (June 2006), pp. 181, 187.

8. John Maynard Keynes, "The End of Laissez-Faire," in *Essays in Persuasion,* in *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John Maynard Keynes,* vol. vii (London: Macmillan/St. Martin's Press for the Royal Economic Society, 1973), p. 379.

9. Paul M. Sweezy, "John Maynard Keynes," *Science and Society,* vol. 10 (1946), reprinted in R. Lekachman, ed., *Keynes' General Theory: Report on Three Decades* (London: Macmillan, 1964), p. 303.

10. Keynes, "Am I a Liberal?" in *Essays in Persuasion, CW* ix, pp. 301–302.

11. Keynes, *CW* xxvii, p. 387.

12. Keynes, "My Early Beliefs," in *Essays in Biography, CW* x, pp. 436, 437, 446.

13. Quoted in Robert Skidelsky, *John Maynard Keynes,* vol. 1 (London: Macmillan, 1983), p. xviii.

14. Max Weber, "Politics as a Vocation," in *From Max Weber,* trans. and eds. H. H. Gerth and C. W. Mill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48), p. 95.

15. Keynes, *CW* vii, p. 384.

16. Keynes, "Can Lloyd George Do It?" in *CW* ix, p. 125.

17. Ibid.

18. Keynes, *CW* x, pp. 440, 448.

19. Keynes, *CW* xix, p. 750. See also *CW* ii, p. 92; *CW* ix, p. 212; *CW* xxi, p. 201; and Geoff Hodgson, "Persuasion, Exceptions and the Limits to Keynes," in Tony Lawson and Hashem Pesaran, eds. *Keynes' Economics* (London: Croom Helm, 1985), p. 23.

20. Quoted in Robert Skidelsky, "The Revolt Against the Victorians," in R. Skidelsky, ed., *The End of the Keynesian Era* (London: Macmillan, 1977), p. 7.

21. Quoted in Charles H. Hession, *John Maynard Keynes* (New York: Macmillan, 1984), p. 258. See also D. E. Moggridge, *Keynes* (London: Fontana, 1976), pp. 38–39.

22. F. A. Hayek, *New Studies in Philosophy, Politics, Economics and the History of Idea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8), p. 287.

23. Keynes, *CW* x, p. 448.

24. See Leo Strauss, *What Is Political Philosophy?*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1973), p. 40; Douglas Sturm, "Process Thought and Political Theory," *The Review of Politics,* vol. 41 (1979), pp. 383–384.

25. Keynes, *CW* ii, pp. 22–23. Keynes deleted his more cutting remarks on Lloyd George from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 They appeared fourteen years later in *Essays in Biography.* See *CW* x, pp. 22–26 and *CW* xvii, p. 41.

26. See Arrow's "Impossibility Theorem," in Kenneth Arrow, *Social Choice and Individual Values* (New York: Wiley, 1951).

27. Keynes, *CW* ix, p. 295.

28. R. F. Harrod, *The Life of John Maynard Keynes* (London: Macmillan, 1951), p. 103.

第十二章　理性和非理性：一个匪夷所思的现实世界

1. Ike Brannon, "Remembering the Man Behind Rational Expectations," *Regulation* (Spring 2006), p. 18.

2. John F. Muth, "Rational Expectations and the Theory of

Price Movements", *Econometrica* 29, (1961) pp. 315–335; Dermot J. Hayes, Andrew Schmitz, "Hog Cycles and Countercyclical Production Response,"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Vol. 69, No. 4 (Nov., 1987), pp. 762-770.

3. See P. H. Cootner, ed., *The Random Character of Stock Market Prices* (Cambridge: MIT Press, 1964); Eugene Fama, "Efficient Capital Markets II," *Journal of Finance* (1991), pp. 1575–1617; Paul A. Samuelson, "Challenge to Judgment," *Journal of Portfolio Management,* Vol. 1 (Fall 1974), p. 17.

4. *Chiarella v. United States,* 445 U.S. 222 (1980); quoted i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December 16, 1987), p. 29.

5. Markowitz's seminal paper was "Portfolio Selection," *Journal of Finance,* vol. VII, no. 1 (March 1952), pp. 77–91. He expounded on the idea in a book, Harry M. Markowitz, *Portfolio Selection: Efficient Diversification of Investments* (New York: Wiley, 1959). The quotations come from Peter L. Bernstein's *Capital Ideas* (New York: Free Press, 1992), p. 60. An aside: in 1990 the Free Press asked me whether I would be interested in writing a book on financial economists. Since it would have violated the White House rules, I declined. Instead, Peter Bernstein wrote this excellent book for that publishing house.

6. Franco Modigliani and Merton Miller, "The Cost of Capital, Corporate Finance, and the Theory of Invest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48 (June 1958), pp. 261–97. The "MM" model had to be revised to take account of corporate tax laws, which encourage firms to issue bonds by making interest payments deductible.

7. Quoted in David Warsh, "Nobel-est in Economics: Three Americans Share Prize for Corporate Finance Theories," *Boston Globe* (October 17, 1990).

8. Robert E. Lucas, Jr., "Understanding Business Cycles," in Karl Brunner and Allan Meltzer, eds., *Stabilization of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y,* Carnegie-Rochester Conference Series, vol. 5.

9. Robert E. Hall, "Stochastic Implications of the Life-Cycle-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 Theory and Evidenc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86 (December 1978), pp. 971–987.

10. Robert J. Barro, "Are Government Bonds Net Weal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82 (December 1974), pp. 1095–1117.

11. Urban Backstrom, "What Lessons Can Be Learned From Recent Financial Crises: The Swedish Experience," Kansas City Federal Reserve Board Symposium (1997), pp. 1–12.

12. *Financial Times* (July 5, 1994), p. 20.

13. Milton Friedman, *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6).

14. Quoted in Arjo Klamer, *Conversations with Economists: New Classical Economists & Opponents Speak out on Current Controversy in Macroeconomics* (Totowa, N.J.: Rowman, 1984), pp. 159, 162.

15. For an example of their work, see Daniel Kahneman and Amos Tversky, "Choices, Values, and Frames," *American Psychologist,* vol. 39, no. 6, pp. 341–350. Peter Bernstein's *Against the Gods: The Remarkable Story of Risk* (New York: Wiley, 1996) presents their theses clearly, pp. 270–278.

16. David Genesove and Christopher Mayer. "Loss Aversion and Seller Behavior: Evidence from the Housing Market," NBER Working Papers 8143,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Inc (2001).

17. Quoted in Craig Lambert, "The Marketplace of Perceptions," *Harvard Magazine* (March-April 2006), p. 53.

18. John A. List, "Neoclassical Theory versus Prospect Theory: Evidence from the Marketplace," *Econometrica,* vol. 72 (March 2004), pp. 615–625.

19. See John Taylor, "Staggered Wage Setting in a Macro Model,"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63 (May 1979), pp. 108–113.

20. See Mark H. Willes, "'Rational Expectations' as a Counterrevolution," *The Public Interest* (Special Issue 1980), p. 92.

21. In a 1997 decision, the Supreme Court revisited the insider trading doctrine and tightened it up, based on change in the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rules. A financial printer is no longer free to misappropriate inside information. *United States v. O'Hagan* 97 C.D.O.S. 4931 (1997).

第十三章　穿透乌云的希望之光

1. John Maynard Keynes, “Alfred Marshall,” in *Essays in Biography,* in 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John Maynard Keynes,* vol. x (London: Macmillan/St. Martin’s Press for the Royal Economic Society, 1972), p. 173.

2. See Richard A. Easterlin, “Does Economic Growth Improve the Human Lot? Some Empirical Evidence,” in Paul A. David and Melvin W. Reder, eds. *Nations and Households in Economic Growth: Essays in Honor of Moses Abramovitz*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4), pp. 89–125.

3. Joseph A. 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6), p. 61. Paul Romer’s “idea gap” discussion appears in his “Idea Gaps and Object Gap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vol. 32(3), 1993, pp. 543–573.

4. John Tagliabue, “Yugoslavia’s Capitalist Tilt Becomes a Headlong Plunge,”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14, 1988), p. E2; James Brooke, “Adam Smith Crowds Marx in Angola,”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9, 1987), p. A6; Larry Rohter, “A Radical Diagnosis of Latin America’s Economic Malaise,” *Th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7, 1987), p. E3.

5. Steven Greenhouse, “The Global March to Free Markets,”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19, 1987), sec. 3, p. 1.

致谢

本书通过探究最伟大的经济学家的生活和思想来解释现代经济理论。因为当今的许多经济问题也曾经向我们的前辈提出过挑战。亚当·斯密的附和者及他的传承者现在仍旧在对我们说三道四。为了对他们的理论提供更好地理解，我采用了当代的案例，我希望读者会发现其中的乐趣和启发。

正如任何学习经济学的学生在第一天学到的那样，经济学是关于稀缺和选择的学问。我选择忽略掉许多杰出的经济学家，并且只关注于英美传统。因此，瓦尔拉斯、杰文斯、门格尔和其他人在经济思想史这个长卷中受到的关注要少于他们应该受到的关注。我只能希望读者被激起兴趣，到另外的书中去探寻这些人物。借用培根的话，我不打算冗长乏味地讲道理，而是简略然而却是富有成效地激发人们的思考。

我想要向那些在本书中提到的，但今天仍然健在的经济学家道歉。本书的主角不是他们，也非他们的个性或公共演讲能力，而是已经去世的经济学家，虽然在内容上有相似性，但这个责任不能让我承担。他们应该为能与亚当·斯密、李嘉图、凯恩斯和其他的人相提并论而感到满足。

我愿意对激发我的灵感和能量的许多个人和机构表示感谢。马丁·费尔德斯坦和劳伦斯·林赛对这一选题给予鼓励，并且要求哈佛大学的学生阅读本书的初稿。我的哈佛学生听过大量的经济思想史漫谈。罗纳德·科斯和米尔顿·弗里德曼提供的对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评价很有帮助。弗里德曼不仅是21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而且对自己的时间特别地慷慨。剑桥大学的杰弗里·米克斯和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的前任院长哈里·欣斯利爵士允许我在剑桥大学的回廊上漫步和思考，这可是本书中许多伟人经常光顾的地方。在撰写关于马尔萨斯、马歇尔、凯恩斯那几章之前，我查阅了中世纪的法庭和议会对这些人物的回忆和纪念性的资料，他们的遗产激励着我一直向前。我也想感谢巴克内尔大学的迈克尔·摩尔和道格拉斯·斯特姆，他们激起了我对经济史和学术思想史的兴趣。

当然，本书所表达的观点都是我个人的看法，并没有受任何人的指

使，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家人，他们的支持和幽默使我看到了希望，那就是我可以从“兴味索然”的科学家中间发现少许的经验和一些笑声。如果经济学家们了解我的快乐和我可爱的妻子黛比的话，他们也许就不会那么乏味了。我把本书献给我的妻子。